前　言

北京是一座历史名城，是首善之区。从金贞元三年（1153年），完颜亮来到燕京改南京为中都，北京成为金王朝的正式首都起，历经元、明、清，到今天已八百四十多年。我们的祖先在这座古城为我们创造出各种熠熠闪光的文化。现在尚存的钟鼓楼、东四、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商业街和鹤年堂、同仁堂、万全堂、瑞蚨祥、全聚德、砂锅居、烤肉季等老字号，就是其中极为耀眼的文化遗产、历史遗产。

商业街的形成是有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交通方便，其次是有招揽四面八方之客的文化娱乐场所。元代，大都城的钟、鼓楼一带最繁华，是由于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设于积水潭。明末清初，北京最繁华的地区从内城转移至前门、崇文、宣武“前三门”的外城。特别是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商业街店铺鳞次栉比，游人如蚁，车水马龙，热闹非常。这与大运河终点码头从积水潭南移至大通桥下，和清政府规定内城不准建戏园，戏园都建在前门外一带有关。清末民初时，京奉、京汉两个火车站又都建于前门，从而使前门、大栅栏的商业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王府井大街和东单等一带地区的繁荣发展，成为北京最早的新式商业街，是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后，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一些商人想赚洋人的钱，做洋买卖有关。

商业街是由众多的店铺组成。几百年来，北京在商业和服务业中形成了一大批闻名遐迩，经营风格各具特色的老字号。不少老字号到现在还闪耀着光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有些老字号因种种原因，已不复存在，但至今老北京人依然怀念它。因为过去的老字号大多数是前店后坊，生产经营的商品极

重视质量，有自己的特色，所以经久不衰；过去的老字号都有一条极严的店规，就是“买卖人，必须有三分纳气”，谁得罪了顾客，就要搬铺盖家吃去”。所以，过去的职工极少敢与顾客吵架的，如果有，也是那不打算在商界中干事的人。过去的老字号都以“童叟无欺，言不二价”做生意，取信于顾客。所以店铺一开，就是几十年，一二百年。

《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一书，一改只孤立的介绍老字号的写法，而是将老字号放在商业街中去写。这样，便于看清其发展的轨迹。如东四与王府井大街、东单，只是咫尺之远，因所处地理环境不同，东四的店铺多是经营民族传统商品者，而王府井大街、东单，既有传统的，更多的是“洋”的。

《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一书，不仅写商业街和老字号繁荣发展的现象，重在写其发展繁荣的内在原因。

《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一书，既写今天尚在的老字号，也写不复存在的老字号。过去有些老字号不是因为产品质量差或招待顾客不热情而退出商业市场，而是经营者头脑守旧，没有认清社会发展潮流，而被社会所淘汰。像喜轿铺、棺材铺、杠房等行业我们姑且不论，我们就以三山斋的眼镜，万昌的锡器，花汉冲的香粉等为例，它们的商品确实曾名噪一时，但是经营者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换商品，所以，只能败下阵来。而成文厚的经营者就是认清了这个问题，及时地从经营老式账本，改为新式簿记账，从而取得成功。

编写此书，力图为北京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各行各业企业家经营好各自企业；为热爱北京的人，茶余饭后，了解北京，尽我一点微薄之力。

王永斌

1997 年初冬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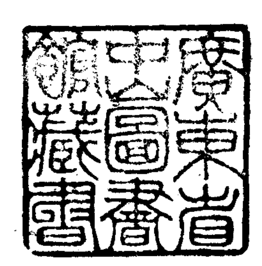
上卷　内城商业街和老字号

中卷　外城商业街和老字号

下卷　商品单一的商业街

上卷

内城商业街和老字号



第一章　鼓楼、钟楼地区——北京现存元代的商业街

第一节　鼓楼和钟楼——我国古代城市无论大小都建鼓楼和钟楼

鼓楼是古代北京的报时台，用击鼓向全城报告时间。鼓楼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经正阳门、天安门、故宫三大殿、景山、地安门、鼓楼，止于钟楼。

我国古代每座城池，无论大小，都要建筑鼓楼和钟楼。北京的这座鼓楼始建于元朝至元九年（1272 年），原名齐政楼，是按天文历法的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合称为齐（七）政，而命名的。当时这座鼓楼正位于元大都城的中心，后失火被焚毁，元大德元年（1297 年）重建。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 年），又将在战火中被毁的齐政楼修起。以后更名为鼓楼。明嘉靖十八年（1539 年）、清嘉庆五年（1800 年）、光绪二十年（1894 年），先后对鼓楼重建或修缮。

一、关于鼓楼位置之争

关于鼓楼的位置，多少年来众说纷纭。有人说，元大都城的齐政楼在今天鼓楼的西侧，具体地说，在现在旧鼓楼大街，或更西，在今清虚观附近。还有人说，元大都城的齐政楼与现在的鼓楼的位置是一致的。也就是现在鼓楼的位置就是当年齐政楼的所

在地。但是，不管怎样说，在当年元大都时，今鼓楼是商业最繁华的地区。

二、击鼓报时

鼓楼坐北向南，总占地面积约6800余平方米，四周有围墙。楼建在一座砖台上，台高4米，东西长56米，南北宽33米。台的南北两面各有三个券洞门。楼高42.7米，通高46.7米，三重檐，歇山顶，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上有吻兽。面宽34米，进深22.4米。楼北面，东侧有个门，内有69级石阶可达楼上。楼分两层，第一层是主要部分，原有24面鼓，用整张牛皮蒙制，高2.22米，直径1.4米。楼内仅存一面鼓，其余23面已无存。关于昔日击鼓报时，每天由戌时起更（就是晚7至9时），起更也叫“定更”。在明清时期，起更，各城门关闭，街巷就不许走行人了，叫“净街”。亥时打二更，子时打三更，丑时打四更，寅时（早3至5时）打五更。每个更次，鼓楼与钟楼互相配合报时，钟楼先敲钟，鼓楼随后击鼓。敲钟、击鼓都是“紧十八下，慢十八下，不紧不慢又十八下”，如此打击两遍，共108响。第二层是专为查验房顶而设。

原来鼓楼上还有铜壶漏一座，制工极其精致，但早已遗失。到了清代时，改用燃香计时定更次，以便击鼓报时。

三、鼓楼的历史沧桑

鼓楼也和北京其他古建筑一样，遭受过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破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掠财物。侵略军闯进鼓楼，原打算把大鼓掠走，但太大，无法携带，他们就用刺刀将鼓面刺破。民国十三年（1924年），当时市政当局曾将鼓楼改称“明耻楼”。并在楼中陈列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证。后来，又将鼓楼做为“开通民智，改良风俗”的教育基地，在鼓楼设立“京兆通俗教育馆”。不久，又改名“第一民众教育馆”。

1949 年北平解放后，鼓楼为当时东四区文化馆所在地，成为职工和当地居民自娱自乐，自我教育之所。1957 年，鼓楼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4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拨巨款，对鼓楼进行大修。这次大修不仅将墙皮脱落，木架、梁柱上油漆彩画朽旧失去光泽等部分重修见新，更主要的是将那梁柱腐朽倾斜，墙体裂缝等严重损伤部分，该换的换，该修的修。

鼓楼大修竣工不久，还对照已残破不堪旧鼓的尺寸大小复制了两面更鼓，并且也用整张牛皮蒙制鼓面。

1987 年，鼓楼正式对国内、外人士开放。

四、令人泪下的铸钟娘娘故事

钟楼位于鼓楼正北约百余米。钟楼在元代大都城的万宁寺中心阁旧址，据《析津志》记载：钟楼至元中建，“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动工改建成钟楼，与鼓楼同为京城报时之用。清乾隆十二年（1748 年），重新修建，内现存乾隆书写的《御制重建钟楼碑记》。钟楼面南，占地约 5700 多平方米，内部都用砖石材料建成。楼建在一座高 14.9 米的砖石台座上，楼高 33 米，通高 47.9 米。楼的建筑格局独具特色，上顶是重檐歇山顶，黑色琉璃瓦用绿色剪边，色彩调和。台座东、西、南、北各有一券门。在门内有一 75 级的石阶，通至楼上。楼中矗立一个八角形木架，正四角每边长 2.3 米，斜四角每边长 1.35 米。一口雄浑的大铜钟悬挂在架上。这口大钟重约 63 吨，通高 5.4 米，只钟纽高就 1 米。在铜钟的两边各吊着一根长约 2 米，直径约 0.26 米的圆木，这是为撞钟时所用。

原钟楼上挂的是一口大铁钟，因铁钟声音发闷，所以，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特铸此大铜钟。关于这口大铜钟，还有一个令人泪下的铸钟娘娘的故事呢。当年，明永乐皇帝下旨限定时间铸口大铜钟，以便将钟楼上原有铁钟换下。到期铸不成，就以抗旨论，定为死罪。监造铜钟的官员，就派人把造钟的铜匠看管

起来。但是，这口铜钟太大，实在不好造，造了几次都失败了。铸钟的铜匠都很着急，工匠的头儿就更着急了。眼看限期快到了，他请假回家看看独生女儿。见到女儿后，就将铸钟几次失败，这次再不成，就要杀头，都对女儿说了。并说，我这是回来看看你。他的女儿沉吟了一会说，女儿不放心，我跟您去，能帮什么忙，就帮什么忙。第二天，工匠头儿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铸钟厂。在铸钟现场，工匠们个个忙得汗流夹背，做最后一次奋斗。谁也没留神，工匠头儿的独生女儿，一跃就跳进铜液滚滚的熔炉中。一个工匠急忙用手一拉，把工匠头儿女儿的一只鞋扯下。钟最后是铸成了，铜钟的声响既浑厚又绵长，但细听后音，好像有个"鞋"音。过去，老北京讲的铸钟娘娘的故事，就是这件事。永乐皇帝深感铸钟娘娘的忠孝，特敕建铸钟娘娘庙。此庙建成后香火很盛，民间传诵时加进了一些神密色彩。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带地方的商业发展。

钟楼在民国年间，曾经对外开放，称"钟楼电影院"。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保护这座古建筑极为重视，1957 年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4 年由政府拨款进行全面修葺。1989 年正式对社会各界开放。

第二节　鼓楼、钟楼地区发展商业的条件

为什么说，鼓楼和钟楼附近是北京现存元大都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呢？它有哪些优越条件？

据《析津志》记载，在元代大都城的鼓楼和钟楼附近，有帽子市、皮帽市、段子市、沙剌（珠宝）市、珠子市、鹅鸭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等，买卖交易热闹。这和鼓楼、钟楼居于大都城的中心有关。纵观我国古代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在城市中心的鼓楼、钟楼附近最繁华，元大都的鼓楼和钟楼也不例外。但是，使

大都鼓楼和钟楼附近形成最繁荣的最佳条件，是当年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在积水潭。因为直到元初，大运河的北终点还是通州，从通州到大都，还有五十里旱路，漕粮要用车、马转运至大都。路虽不长，但运输量大。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向朝廷提出在通州与大都之间挖条河道的建议。得到忽必烈的照准后，郭守敬根据他掌握的地形和水源资料，又亲自实地测量考察。在他主持下，引昌平白浮泉水，汇神山诸泉，向西又折而南流，过双塔、一亩、玉泉，经瓮山泊（昆明湖），入大都城至积水潭，然后往东再折南，出大都东流与大运河汇合。这就是北京有名的通惠河。据《日下旧闻考》引元李洧孙《大都赋》云：自漕船从大运河直航到积水潭后“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经抵辇下。”每天，积水潭中舳舻蔽水，往来船只如梭。因此，使鼓楼、钟楼成为最繁华的商业街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其东南是转角街市，针铺、瓜果摊、油盐米面铺、日用杂货店铺；西街更是繁华，酒馆，唱戏，游艺等场地很多。游人如蚁，热闹非常。

这样我们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知道鼓楼、钟楼附近是元大都的繁华商业街。而且，经明、清、民国时期，至今几百年来，经久不衰。

第三节　“鼓楼前”——老北京商业繁华地区

地安门俗称后门，关于地安门恐怕年轻人知之甚少，因为它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拆除。要讲述地安门，得先说说皇城。紫禁城的外面是皇城，皇城的前门是天安门，左边是东安门，右边是西安门，后边就是地安门，因为地安门是皇城的后门，所以俗称后门。其位置就在现今地安门内、外大街和地安门东、西大街的十字路口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这座残破的地安门孤零丁的立

在那里，（其东、西皇城早已不存在）有碍交通，于1953年拆除。后来北京市整顿地名时，将地安门改为地安门外大街，并将这条大街与鼓楼大街合并，统称地安门外大街。

前文已经讲了，现在已没有鼓楼大街这个地名，为什么还要写它。不写它不行，因为它的名声太大，老北京人没有不知道，“东四、西单、鼓楼前”的。必须交待清楚。鼓楼大街就是俗称的鼓楼前。过去以后门桥为界，桥北是鼓楼大街，桥南是地安门大街。

鼓楼前和地安门大街最热闹、最风光的时候是清代。这与清八旗有关。在清代，这一带是正黄旗和镶黄旗的驻地，后来，一些年老出宫的太监就居住在钟楼后边的娘娘庙里。这些人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他们讲派头，讲住好房，讲吃讲穿，还讲玩。因此，一些会做买卖的人，都争先恐后在这条街上租房或买房子，开店铺。当年在这条街上，北从鼓楼前，南到地安门，东西两侧店铺一家挨一家，真是鳞次栉比。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清朝皇帝逊位。从此，八旗人丢了官，钱粮俸禄没处领了。他们大多数都是坐吃山空，破落了，鼓楼前随之也失去往日之风光。尽管如此，进入民国年间，这条街依然还很繁荣。如朱光潜先生1936年，在《论语》半月刊杂志上，写的记实性散文《后门大街》有这样一段话：“到了上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的百支烛光的电灯，照像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家家洋货铺门上都张着无线电的大口喇叭，放送京戏鼓书相声和说不尽的许多其他热闹玩艺儿。这时候后门大街就变成人山人海，左也是人，右也是人，各种各样的人。”

正像朱光潜先生在《后门大街》文中所记，鼓楼前至后门一带热闹的很。下面我们分其经营的不同将一些店铺记叙之：油盐

酱菜店有南洪泰、宝瑞兴、谦益号、洪兴号；干果海味铺有乾德号、大顺德、聚盛长、聚盛隆、新茂魁；绸缎布匹庄有天兴号、谦祥益北号、通兴长、永通诚、复兴隆；鞋铺有乾有斋、全安斋、全顺斋、聚茂斋、庆荣升；首饰楼有信远楼、瑞成楼、义泰楼、泉兴楼；茶庄有同裕号、吴肇祥、荣源号、汇源号、祥泰号、和丰号；烟叶铺有北豫丰、北益丰；饭庄饭馆有庆和堂、合义斋、福兴居；大茶馆有天汇轩，此外还有照像馆、理发馆、钟表铺和平易钱庄等。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合义斋、福兴居灌肠铺

合义斋、福兴居这两家灌肠铺都在后门桥北，合义斋路西，福兴居路东。昔日，北京人讲究吃前门外都一处的烧麦，鲜鱼口会仙居的炒肝，穆家寨的炒疙瘩，后门桥头的灌肠。这两家灌肠铺以合义斋开业早，最有名。它的掌柜原在后门一带酒馆门前摆摊卖灌肠。他卖的灌肠，片的薄，放油多，用铁铛煎的外焦里嫩，放适量的盐汤蒜泥，吃到嘴中别具风味。吃过的人，都想再吃。所以，买卖越作越好，每天做多少灌肠，就卖多少。供不应求。干了两年，约于清光绪二十年（1884 年），他就在后门桥北侧路西，火神庙旁开设了这号合义斋灌肠铺，不久又添上家常饭菜，到夏天还卖荷叶粥。生意十分兴隆。在合义斋买卖越发兴旺时，有人在他的对面开办了福兴居，也卖灌肠。合义斋与福兴居两家比着干，虽然福兴居十分努力的干，但总也不如合义斋生意好。现今合义斋迁至德胜门内继续营业。

二、"大葫芦"宝瑞兴油盐酱菜店

由于宝瑞兴油盐酱菜店门前立着个一人多高的木制外涂红油漆的压压葫芦的招幌，日子一长，人们都叫它"大葫芦"，店铺的

本名，却少有人过问。大葫芦的创办时间已无法详考，只知道就是这个大压压葫芦，曾使宝瑞兴免遭抢劫的恶祸。事情是这样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大多数清政府官员和富人都跑了。各店铺掌柜也逃了。宝瑞兴的掌柜和伙计也都藏了起来，店铺只留个看门的老头。大街上八国联军的侵略兵各处乱窜，有的进店门不容分说就杀人，有的见什么抢什么。但是，这些鬼子兵走到宝瑞兴门口，一见门口的大葫芦，不是吓得退了回去，就是绕着走。所以，在这次“庚子事变”中，宝瑞兴没有被抢。后来人们猜想，可能是鬼子兵误认为大葫芦里装着炸药，所以躲着走不敢靠近。大葫芦为宝瑞兴立下了大功，因之，后来宝瑞兴视这个大葫芦为传店之宝。

大葫芦宝瑞兴享誉北京全城是清末和民国年间的事。这一时期宝瑞兴的掌柜是宗宝全，这个人善于经营，买卖做的活，有专人到各饭庄、饭馆和各大宅门，推销油盐酱醋和各种酱菜。宗宝全深深知道，要将买卖做好，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当时做买卖的人都知道“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就来”这句做好买卖的宝贵经验。就是因为大葫芦极为重视酱菜的制作质量，才受到顾客的欢迎，生意日渐兴隆。

大葫芦的酱菜和黄酱最有名。前文已经讲了，鼓楼和后门一带居住不少清代旗人之后，吃、穿、用都很讲究。这些人都爱吃大葫芦的酱菜。大葫芦的酱菜讲究外观颜色好，吃入口中香甜，味道咸甜适中。大葫芦的各种酱菜都好，最受欢迎的是，酱黄瓜、甜酱萝卜、酱黑菜、甜酱什香菜、甜酱瓜、甜酱八宝菜、酱萝卜干等。

大葫芦制作酱菜，一是用料真实，不用次货，如制作酱黄瓜，一定购安定门外种的新摘的鲜嫩秋黄瓜，而且必须选约五寸长短，顶着花的黄瓜。这个地方产的这种黄瓜，比市价高几倍。又如酱制酱菜必须用好黄酱，大葫芦做黄酱必派人去北苑买那颗粒饱满，

大小均匀，黄色鲜艳，油性大的黄豆。二是严格制作工序规程，如做黄酱，第一道工序，必先把黄豆用温水泡一昼夜，俟泡透后，上屉蒸。将黄豆蒸熟，再将黄豆用白面拌，放在石碾上碾碎，随后放入模子里，上盖干净白布，工匠赤着脚在上边踩，到踩硬，取出拿刀切成大小一样的方块，码放于特制的木架上，用席箔包严，使其发酵。发酵后，打开席包，将酱料上生出的白毛刷去。如此，制酱的料块才算做成。这样做虽然时间长，大约一个月，费工时，但是不这样做，黄酱的质量无法保证。第二道工序，是将酱料放入大缸里，加盐放清水，让工匠按时用木耙在缸里上下搅动。等硬料块都稀软后，再将缸口封严，经过夏天三伏，黄酱就制成了。大葫芦的黄酱，外观发光泽，入口咸中带香甜，人称“伏酱”。当年北京人都爱吃炸酱面，用大葫芦的伏酱炸出的酱，存放多久都不会坏。

1956 年，大葫芦宝瑞兴参加了公私合营，后改为副食店。

三、谦祥益绸布店北号

谦祥益绸布店是北京有名的老字号，与瑞蚨祥等几家绸布店合称“八大祥”。总店在前门外廊房头条，这是分号。关于总店情况，后文另有介绍。谦祥益绸布店是山东孟家开办的，谦祥益北号于民国初年由孟家委托刘述斋在后门桥北侧创办。主要经营棉布、绸缎、皮货等商品。其经营风格本着总店的要求，商品保证高质量，不卖假货次货，价格不二，诚实待客。为了取得顾客的信誉，在有些商品上，标有“谦祥益北号”的字样。虽然谦祥益北号的各种货物都统一由谦祥益总店进，但是谦祥益北号一般都向总店订货，总店在向工厂订货时，要求在布匹或绸缎、呢绒的机头上，织“谦祥益”或“谦祥益北号”几个字。谦祥益北号以做官僚、富户的生意为主，每逢这些顾客登门，都先不谈生意，让至很讲究的屋子里沏茶敬烟。看商品时，有小学徒给取来样品请顾客挑选。这些顾客每来一次，都不是买一两样，或几尺绸缎。一

买就买很多。而且不给现钱，记在账上，到年终结算付款。像这样的官僚、富户的买卖，一般绸缎布店是做不了的。一是它们的商品少，不齐全；二是它们的资本少，赊不起。而谦祥益北号，货多货全，要什么有什么；资本雄厚，来这个店铺的有钱顾客都是记账，先使用后给钱。没资本是做不了这样买卖的。在民国年间，清代的一些遗老遗少和段祺瑞、吴佩孚、徐世昌等军阀都曾是谦祥益北号的常客。

虽然谦祥益北号是个大买卖，到这个店铺的多是有钱有势的大顾客，但是对一般市民或乡村农民进店，他们也热情接待。伙计、小学徒迎上去，主动打招呼。请坐看商品。买与不买，顾客走时，也都送至店门，并说您再来照顾。这些普通市民和乡村农民进店，一般都购买低档的粗布、白布或蓝布。买的少，价钱低。但是，谦祥益北号卖给他们的这些棉布，还都是用尚好的棉纱交给织布作坊定织定染的，这种布缩水小，不褪色。而且顾客买10尺，外加1尺，这叫“老尺加一”（当时木尺有两种，老尺大，新尺小。谦祥益北号卖布用老尺）。这就说明，谦祥益北号很会作买卖。多赚官僚、富户的钱，少赚普通市民和农民的钱。让他替谦祥益北号做广告宣传，说他们货好还便宜，而且另外“老尺加一”。因此，谦祥益北号在北城一带人人皆知，生意十分兴隆。

1937年“七·七事变”后，社会动荡不安，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艰苦，谦祥益北号就开始进入艰难时期。他们卖出的大号到年终算账，收进的钱只是卖出去的十分之一。不赊账卖，买卖自然少了。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但是，盼来的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久，三年国内战争爆发，依然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谦祥益北号实难维持下去，就停止营业，将余货都运到前门外谦祥益总店。

四、聚茂斋靴鞋铺

聚茂斋靴鞋铺位于后门大街，是创业于清光绪末年的老买卖。

掌柜的姓孙，原在一家鞋铺学会了一手好活计。出师后，就去耍手艺。他做的活好，到哪家鞋铺都不愿意让他走。他做的活人人欢迎，因此，他想不如自己开个鞋铺干干。

聚茂斋靴鞋铺开业后，由于资本短缺，当时除去几件绱靴鞋的工具外，资金只有十几两银子。孙掌柜带着一个小学徒一边给顾客做来料加工，一边给顾客订做靴鞋。聚茂斋以材料真实，加工精细，赢得众多顾客的信任。因此，到聚茂斋做加工的、购买靴鞋的顾客越来越多。聚茂斋干了几年发展很快，从开业时的只有一名学徒，增加伙计、学徒十几人。并且在鼓楼后门等地一带有了众多的熟主顾，特别尚武好练的武术家、摔跤手、赶车、卖力气的人，爱穿聚茂斋做的双脸鞋和洒鞋，老年人爱穿聚茂斋做的“老头乐”，雨天，顾客喜欢穿聚茂斋做的“雨靴”或称“油靴”。

双脸鞋、洒鞋、“老头乐”和“油靴”都是聚茂斋的名产品。

所谓双脸鞋是在鞋面前缝有两条平行的皮脸（即皮条），这样做，一是耐穿，二是好看。聚茂斋的双脸鞋的鞋面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劳动者工作时穿的低档双脸鞋，另一种是练武者和普通劳动者休息时走亲访友穿的高档双脸鞋。低档双脸鞋的鞋面用足青布。聚茂斋用的足青布是在织布作坊和染坊定织定染的。高档双脸鞋的鞋面用礼服呢。聚茂斋用的礼服呢是花大价钱买的厚实的头等礼服呢。双脸鞋和洒鞋鞋面上的皮脸，大多数鞋铺都用一般的羊皮，因为羊皮价钱便宜。而聚茂斋必用价钱昂贵的“骨子皮”（就是驴屁股皮），这种骨子皮厚硬，耐磨耐踢碰。双脸鞋的鞋底是千层底，洒鞋的鞋底是“山底”。聚茂斋的双脸鞋和洒鞋都是供不应求。

千层底耐穿，不折不断，不开花，是聚茂斋靴鞋铺一大特色。一般鞋铺都是从专门生产千层底的底局子进货，而聚茂斋为了保证鞋底的质量，就自办底局子生产千层底。做千层底工序很繁杂，

先切底，工人把袼褙用大斧头似的切刀切成各型号的底片；第二道工序是“沿边”，工人用细白布条将底片四边都沿上（就是用浆子粘住），随后将千层表面那层用白布包上；第三道工序是圈边，这道工序是外加工，当年专做千层底圈边的都集中在现今的朝阳区沙板庄、虎城、南磨房、三间房、双井、八棵杨树、八里庄、十八里店等农村。第四道工序是纳面，这道工序也是外加工，昔日做这道活的都集中在现今通州区的马驹桥、永乐店、牛堡屯一带农村。圈边和纳面是确保底子质量的两道重要工序，因此聚茂斋要求检查极严。对圈边的质量要求是针脚齐、密，杀得紧。对纳面的质量要求更严，不仅要针脚齐，有杀手，而且必须一方寸要一百针，最少不能少九十针。第五道工序是锤底，这道工序是聚茂斋底局子工人自己干。在锤底前，先将底子用开水浸泡，并用棉被包严。用一天一夜，硬底都泡软了，工人用十几斤大平底铁锤在大平青石上锤。既要锤平又要整底形。最后将锤好的湿底晾干，千层底才算成了。聚茂斋的千层底，穿到什么时候，不仅不折断，而且底子边不会开花。

靴鞋绱得牢、漂亮是聚茂斋又一特色。绱鞋分正绱、反绱两种。双脸鞋、洒鞋是正绱，千层底小圆口鞋是反绱。正绱最要手艺，因为正绱不能上鞋楦，工人用双手拿着鞋帮和鞋底直接缝绱。反绱是将鞋帮和底子反着绷在鞋楦上，绱好再翻过来。聚茂斋绱的鞋，不管正绱还是反绱，要求必须“腮满、跟圆、腰平”，腮满是鞋前两边鼓整好看，跟圆是鞋跟圆整，腰平是鞋的中腰没绉折，平整。最重要的是绱得牢，不开线。

“老头乐”是老年人冬天御寒穿的肥大棉鞋。聚茂斋做“老头乐”有三种，最好的是礼服呢面，中等的缎子面，普通的是足青布面。底子都一样，是约有 1 寸厚的底子。这种“老头乐”穿着舒适、暖和。当年富有的老年人入冬后都喜买聚茂斋的“老头乐”。

“油靴”是清末民初时，夏季雨天最普通的雨具。雨橡胶鞋、靴是舶来品，至30年代，上海才仿造。“油靴”先用市布做高腰，靴形帮，底子除中腰外，前脚、后跟，满用大帽钉子钉牢。最后用桐油涂刷。聚茂斋做的“油靴”，因为做工细，桐油涂刷的厚，穿着轻便，不论水多大，不漏水。当年，每人夏季“油靴”是聚茂斋的畅销品。

聚茂斋做了几十年的好买卖，但是，到了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侵占全中国、独霸亚洲的狼子野心，疯狂掠夺华北占领区的物资，以便扩军进行更大规模地侵略战争。因此，聚茂斋所需的棉布奇缺，又由于北京人民，有的工商者破产，有的佣工者失业。过去买鞋穿的，改为家中自己做鞋穿。聚茂斋的生意开始衰落，年年亏损，最后无法维持，40年代停业了。但其店名依然没被人忘却。

五、北豫丰烟叶铺

豫丰烟叶铺在北京有两号，在鼓楼前的，因为位于北京的北部，因此称“北豫丰”。在前门外大栅栏里的，因为位于北豫丰的南边，所以称“南豫丰”。北豫丰开业于清代乾隆年间，主要经营关东烟叶、兰花烟和杂拌烟。各种烟叶注重质量、成色，并注重加工。北豫丰卖的各种烟叶都不暴、不燥、不要火，为广大抽烟的顾客所称道，该烟铺生意一度很兴隆。进入民国后，各种牌子的纸烟流行，北豫丰所经营的烟叶逐渐被人冷落，买卖走下坡路。到40年代，终于为社会所淘汰。

六、平易银钱兑换所

平易银钱兑换所坐落在地安门大街，是徐子才投资1000块银圆于民国三年（1914年）开设的，经理徐子才，副经理陈友三，后换王云生。主要经营银元、铜钱、纸币等各种货币的兑换，从中获得扣钱。如银元换铜钱，或铜钱换银元，兑换所从中扣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缺角或破烂的纸币兑换不缺不破的纸币，兑换所

从中扣十分之五。特别是银元与铜钱的兑换，兑换所获利更多。当时，一块现大洋是白银七钱二，换铜钱应换50吊。但是，由于银元要随白银的涨落，换铜钱可多可少。民国年间，很长时间，一块现大洋可换铜钱46吊，这是官行情，拿一块现大洋去店铺买东西，店铺就按46吊收款。但是到兑换所，一块现大洋只能换45吊，另外，兑换所还要从中扣十分之一或二的佣钱。反过来客人用铜钱换银元，就用47吊铜钱换一块现大洋，另外再扣十分之一或二的佣钱。

到了1941年，平易银钱兑换所加入了徐寿亭、王荣甫、宁华卿、马咏峰、徐聘如、白瑞生、徐霖业、徐静宜等8股，资金改为伪"联合准备银行"50万元。并更名为平易银号。从此，就可经营存放款业务。1945年10月停业。1947年3月，恢复营业，定资本2亿法币。董事长为徐子才，常务董事张聘如，董事宁华卿、蔺文轩、任公亮，监委王荣甫、徐寿亭，经理徐士才，副理张聘如、襄理蔺文轩、任公亮。

1952年，平易银号停止营业。

七、吴肇祥茶庄

吴肇祥茶庄位于地安门桥北路东，是安徽歙县人吴肇祥在清光绪年间开办的。安徽歙县是我国著名的茶乡，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安徽歙县人在北京经营茶叶生意的很多，其中吴姓算个大户。如当年前门外大栅栏里的吴德泰，崇文门外大街的吴鼎裕，北新桥的吴裕泰，宣武门内大街的吴恒瑞，灯市口的吴瑞春等都是他们同族人。吴肇祥茶庄即是这些吴姓茶庄中的著名大户。

吴肇祥茶庄所以能够经营发展起来，这和吴肇祥本人经营有方有关系。据吴肇祥茶庄店中职工介绍，吴肇祥茶庄为了降低茶叶成本和经营出自己的特色，自己派人去南方办货。在汉口、安徽、杭州和福建都有人在该地"坐庄"，就是在该地设办事处，收购茶叶或用茉莉花薰制茶叶。吴肇祥茶庄这样从南方采运回来的

茶叶，不仅成本低，而且质量好，进货便宜。所以，吴肇祥茶庄的门市销售自然比别家就便宜。茶叶薰制、拼配，加工细，多放茉莉薰。茶叶泡后颜色呈淡黄，味道浓香并且持久，因此，顾客多，买卖十分兴隆。

吴肇祥茶庄在光绪末年时，曾交上了清皇宫的买卖，每年卖给清宫内各种茶叶约一千多斤，很受清宫的欢迎。吴肇祥茶庄因此店名大振，生意越作越兴隆。过去，吴肇祥茶庄的顾客，大多数是旗人。旗人讲究喝茶，要做旗人的买卖不容易，但，有许多旗人都是吴肇祥茶庄的常客，别家的茶叶不买，非买吴肇祥的不可。因为他们喝别家的茶叶不是味不好，就是颜色不正。这与吴肇祥会作生意有关。他对店中伙友说，薰制茶叶不能图省钱，偷工减料。如薰花茶用的茉莉花，价钱高，薰制出的茶叶味好；用白玉兰花薰茶，价钱低，但薰制的茶叶味道远不如用茉莉花薰制出的味道香。吴肇祥茶庄绝不以次顶好，绝不用白玉兰花替代茉莉花。由此，吴肇祥茶庄的买卖经久不衰。

解放后，虽然吴肇祥茶庄已不自薰茶叶了，但其热情招待顾客的老店作风并未改。

八、信成杠房和李大钊烈士葬礼

信成杠房坐落在地安门外西皇城根，开业于清末，掌柜的叫狄琴荪。在当时北京内城信成虽不是有名大杠房，但是一些三十二杠，四十八杠等比较像样的中等杠，他们常抬。

人死后，厚葬在我国从古代就兴起了，到明清时期，厚葬之陋俗有增无减。厚葬主要表现在用好棺材，用大杠上。所以，北京在解放前，棺材铺和杠房到处都有。有名的大棺材铺和大杠房大多开设在内城，因为内城有钱的大户多，对婚丧嫁娶喜欢讲排场。

棺材铺和杠房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特别是杠房，它是出租葬礼仪仗的买卖。也就是它不是出卖商品，而是出租抬棺材的

"杠"和仪仗"执事"等。这些工具只要不损坏，旧了，油饰后又是新的，依然可用。

信成杠房就是这样的买卖。因为不是天天有杠抬，一个月内能够抬几次，就算很不坏了。所以，只要有顾客进门，就千方百计的把这号买卖应下来。1933年4月23日，信成杠房抬了李大钊烈士葬礼的三十二杠，就是这样应下的。据说，还有个原因，就是承办李大钊葬礼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通过熟人找到信成杠房，信成杠房明知这号买卖会有麻烦，但是有熟人求，又由于应个买卖不容易。如果没出麻烦更好；出了麻烦，客人雇杠，我们不能不应。别的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政府）也把杠房怎么样不了。

据1933年4月24日，《世界日报》等报刊报导：当时，李大钊烈士的灵柩停在宣武门外长椿寺旁的浙寺里。是一口外涂黑漆的柏木棺材。要安葬至京西的万安公墓。葬礼路线是，出浙寺，经过菜市口，进宣武门，过西单，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至万安公墓。由于沿途观礼的人多，而且有许多人自动加入到送葬的队伍中来。沿途设了不少祭桌，一些人士要求路祭，所以，灵柩走得缓慢。走至西四，有人正在路祭时，突然大批军警冲了过来。信成杠房的杠夫和执事人等被迫落下杠来，躲至一旁等待。军警对送葬的学生进行镇压，当场拘捕学生三十余人。

信成杠房的杠夫和执事队伍，走到万安公墓已日头压山了。

信成杠房直干到北京解放后，才停业。

九、天汇轩大茶馆

老北京时，到处都有茶馆设立。老北京的茶馆不仅供茶客品茶而其文化内含极丰富。朋友之间交流感情结义，房屋买卖、合伙做生意签订合同，同业议事等都可在茶馆中进行；也可在茶馆里对弈，静听鸟鸣和欣赏文娱节目等。因之，北京的茶馆分清茶馆、书茶馆、棋茶馆和野茶馆等。另外还有一种大茶馆，因为这

种大茶馆比以上几种茶馆历史都久，所以，又称老茶馆。

下面就介绍当年北京最有名的天汇轩大茶馆。

天汇轩大茶馆的遗址就在地安门外大街路东，现今的天汇大院地名就是用天汇轩大茶馆命名的。据“北京通”金受申《大茶馆》文中记：大茶馆在清代北京曾走过红紫大运。庚子以前，北京大茶馆林立，以后门（地安门）外天汇轩为最大，（庚子）毁于火，今成天汇大院，曾一度开办市场，其大可知。方彪先生的《茶馆的咏叹和畅想》一文对天汇轩大茶馆的介绍较具体：天汇轩“临街是五间门面房，进深有四五重院子，各院均有罩棚（天棚）。由于门脸坐东朝西，所以东房为正厅，南北房反而成了厢房。正厅中间是三间通间，两头是厨房之类的工作间。三间通间均有通向后院的功效，故称之为过厅。最后一排房为后堂，后堂和两侧厢房是‘雅座’。前堂柜、灶之间有一大铜壶悬之梁上，高有五六尺，直径达三尺之上，系红铜制成。内贮大灶中烧沸的开水，壶的底部有一个木炭炉，可以保温。”

天汇轩的座位比较讲究，一般座位是擦得锃光瓦亮的擦漆八仙桌和四方凳子，雅座里是榆木擦红漆的八仙桌和靠背椅。茶具一律是盖碗。

当年北京人，特别是八旗子弟讲究到茶馆喝早茶、吃早点。天汇轩制做的艾窝窝、蜜麻花、喇叭糕、糖耳朵和焖炉烧饼等小吃点心，不仅甜咸适度，味道好，而且外形漂亮。各种点心都做成核桃大小，每碟放六块。茶客一早就到天汇轩泡碗盖碗茶，要一碟点心，边吃边喝边听鸟哨。茶客之间山南海北的聊大天，养鸟的茶客要比谁的鸟哨得好。在天汇轩喝早茶、吃早点的除去附近居民外，以步军统领衙门胥吏为多数。因为步军统领衙门就在附近的帽儿胡同，所以，大多数官员和差役都是在天汇轩喝了早茶，吃过早点，再去到衙门当差。

过了中午以后，来天汇轩喝茶的客人就杂了。有到鼓楼、后

门买东西来天汇轩喝茶休息一会的，有逛什刹海后来天汇轩泡碗茶解解渴的，也有特意来天汇轩听鸟哨或下棋的。

天汇轩大茶馆知名度如此之高，为什么在光绪庚子年间被火烧毁后没有重建复业，却在其旧址上建起商场呢？原因很多，而主要原因是，从庚子年间后，很多茶客都到新兴的书茶馆里既可品香茶又可听评书、欣赏大鼓单弦演出去了。大茶馆红火的日子已经过去，生意冷落了，所以天汇轩没必要重建。而且此后，东四的天宝轩，护国寺街的天泰轩，前门外鲜鱼口的天泉轩等内外城十几个大茶馆也都先后停业了。

天汇轩大茶馆在生意兴隆时期，是"四九城"的聚集之所，因此它对地安门、鼓楼一带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四九城"是指皇城四门，内城九门，也就是旗人为主体的内城居民的称谓。

第五节、热闹的鼓楼市场——相声大师侯宝林第一次说相声的地方

鼓楼市场位于鼓楼北，钟楼南，就是这个小空场从清末直至北京解放前，多少年来一直是北城一带老百姓的娱乐场所。在这个鼓楼市场里有说评书的，变戏法的，打把式卖大力丸的，有唱小戏的，有说相声的。每天上午10点多开始，到太阳落止，除下雨下雪外，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据相声大师侯宝林回忆，他在鼓楼市场学会了说相声。他说，当年钟楼前，鼓楼后有个市场。那年我也就是十几岁，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在鼓楼市场里唱戏，我在这唱了一年多的戏。这个市场有铁蒺藜围着，东、西、南、北都有个出入口。进南口有卖破烂的、算卦的、卖扒糕、卖炸丸子、豆汁、馅饼、锅饼等小摊儿。还有个小酒摊，三个茶馆。路北的是鲁记茶馆，路东的是石记茶馆，路西的字号记不清了。西口外边有个落子馆。别看鼓楼市场地方不大，卖艺的场子可不少。一

进南口还有两份说书的，东边说《前后七国》，西边说什么，也记不清了。再往北走，是说相声场。还有个唱喝喝腔的大棚。据说，喝喝腔是沧州一带农村的剧种。现在这剧种已经消失了。再往北，还有两块地，一个是“全家福”，老夫妻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一个女儿。他们唱的可能是花鼓戏。还有个场子是一个人带一个儿子，一个徒弟，唱莲花落。他们时常唱太平歌词。据说，北京当初有个外号叫“抓髻赵”的，曾进皇宫给慈禧太后唱过莲花落，慈禧太后听了感到很新鲜，问，唱的是什么戏，抓髻赵回答是莲花落。慈禧认为不雅，就说改叫太平歌词吧！

后来我学会了唱太平歌词。我第一次说相声也在鼓楼市场。这个市场有几个相声场子，一个场子是常宝臣、聂文治两位先生与常宝臣两个徒弟，一个叫郑祥泰，一个叫王世臣，他们在那说。后来又换了张兆新、张书元，还有个小李在鼓楼市场说相声。我爱听相声，老听就想也说说。有一次刚开场，我看场子里就有一个人，我就说，我给你帮忙吧！他同意了。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当时不叫《戏剧杂谈》，叫《杂字》。我自己认为，第一次说相声说的并不差。

侯宝林大师最后说，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和第一次说相声都在鼓楼市场。

第二章　什刹海地区

第一节　说法不一的什刹海之名

什刹海位于地安门桥西，什刹海古代原是高梁河的故道，此处地势洼积地下水喷出，因此，汇成此“海”。元代称海子或积水潭，清代将德胜桥以西之水面称积水潭，又因北岸有座庙宇净业寺，以庙命名，又叫“净业湖 ”。德胜桥以东，银锭桥以西的水面称什刹海后海；银锭桥东边的水面称什刹海前海，因为水中莲花多，所以又称“莲花泡子”。

关于什刹海之得名，多年来说法不一。多数人说，因为在历史上，其附近有万善寺、广善寺、净海寺、三圣庵、海会庵、心华寺、慈恩寺、金刚寺、龙华寺和广化寺等十座寺庙，故称“什刹海”。另一种说法是因什刹海畔有什刹海寺而得名。并解释说，此寺是明朝万历年间，陕西僧人三藏来京时所创建。至今谁是谁非尚无定论，只能等待新的资料发现，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

第二节　什刹海荷花市场——夏天乘凉的好去处

什刹海在北京古都的地位上，十分重要，与古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戚戚相关。在元代曾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在北京水运交通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几百年来，什刹海是北京的重

要水源，它滋润着北京的大地，哺育着北京人民；它是北京文化风景名胜的一颗明珠，是夏季北京人消夏胜地。

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公开刊印的《燕京岁时记》中记："十刹海俗呼河沿，在地安门外迤西，荷花最盛。每至六月，士女云集，然皆在前海之北岸。……谓之前海，即所谓莲花泡子者是也。……北岸一带风景最佳，绿柳垂丝，红衣腻粉。"这段文字说明早在光绪年间，什刹海就是盛暑时游玩之处所。自民国五年（1916 年），在什刹海前海开设了荷花市场，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七月十五，湖畔商贩云集，游人如梭，岸边垂柳微拂，盛放的荷花在湖中放着清香。从每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开始游人增多，到傍晚时是游人最多的时候。小贩的吆喊声，娱乐游艺场的锣鼓胡琴声悠扬动听，确实热闹异常。

什刹海荷花市场最繁盛时是民国年间。首先说，卖北京地方的小吃摊。多以夏天冷食为主，凉糕、扒糕、凉粉卖的最快。凉糕是用黄米、江米上屉蒸摊而成，糕面上撒放小枣、金糕、青丝和红丝。将凉糕放在一大块天然冰上。使游客看糕上花花绿绿，又有冰，自然引起食欲，买块尝尝。扒糕的主料是白荞麦面，用水合面，揉成扁椭圆形上屉蒸熟。卖时也是用冰镇，用小片刀片成薄片，放适量的花椒油、醋、芝麻酱、蒜泥、辣椒油。凉粉的原料是老干团粉做成。做得好的小贩，凉粉要洁白晶莹如白玉。

卖豆汁的是荷花市场里最多的。昔日，北京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爱喝豆汁。冬天喝热豆汁，御寒；可是盛夏时，也要喝碗热豆汁，以祛前晚之夜寒。

苏造肉和莲子八宝粥是荷花市场中比较高级讲究的食品。苏造肉为清代内务府中掌管戏班的升平署的名食。名是极其好听，不知者都以为是与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有关系呢。原料及其做法必很讲究，其实不然，它就是普通猪肉、猪下水，用酱肉之法制成。类似今天的卤煮小肠。莲子八宝粥的主料是糯米与莲子，将糯米

洗净下砂锅熬，而后选新鲜的莲子俟糯米快熟时下锅。顾客吃时，用细瓷碗盛，上撒青梅、葡萄干、山楂、桂圆、果仁等果料，这种莲子八宝粥，既有糯米之稻香味，又有莲子和各种果料的河鲜与果香味。当年，在荷花市场品尝苏造肉和莲子八宝粥的都是富户和知识界的名流。

此外还应说一说，前文已经介绍过的后门桥头的合义斋。当年，每年夏天荷花市场开放时，合义斋必派人来。它的摊位与众不同，别家摊位一般不摆在岸边也摆在游客众多之处。而合义斋独摆在湖中小土岛上。游客必须走过一段小堤才能到合义斋的摊位。合义斋在这里不仅出售客人爱吃的灌肠，并且增添夏天祛暑的荷叶粥。游人在湖心吃灌肠、喝荷叶粥，四周是水，水中盛开着荷花，真是村店野味十足，使游客如置身于江南村镇也。

接着说说戏棚等娱乐之所。在这里有莲花落、什不闲、单弦牌子曲等，还有演化装文明新戏的，变戏法，耍狗熊，踩软绳，大变活人等杂耍场子。

在荷花市场里卖各种吃食、用品、昆虫等货摊位是最多的了。夏天，人们都爱吃河鲜，如莲蓬、鸡头米、菱角、白花藕、荸荠；除河鲜外，还有卖酸梅汤、西瓜汁、冰激凌、雪花落、果子干等清凉食品。卖玉兰花、茉莉花，卖折扇和粘折扇面是荷花市场的主要用品摊。玉兰花和茉莉花是当年夏天大多数女士佩戴衣衫纽扣上，这样不仅以解汗气味，而且清香袭人，使人解除疲乏。折扇是暑热天气时，男人必不可少的夏季用品，粘折扇面是一种又商又手工的行当。过去有的折扇骨架是极其讲究的，有香妃的、檀香木的，还有象牙的。有的折扇骨架，不仅质地好，而且上面还有精细雕刻。一把好折扇骨架，既是取风的实用品，还是观赏的艺术品。所以，一把好折扇骨架不是可以随便丢弃的，要长期使用，有的甚至用一辈子。扇面坏了，找粘扇面的另换。卖昆虫的，夏秋季昆虫很多，北京人喜欢的有蛐蛐、油葫芦、金铃子、蝈蝈

等。荷花市场里应时当令，卖昆虫也是好买卖。此外，还有卖儿童喜欢的泥人和用草或荆条编织的小玩艺。

荷花市场时，在这里做生意最多的，还是开茶棚的为多。沿着什刹海畔搭的席棚一个挨一个，亚似一条席棚商业街。茶棚内茶桌、茶壶、茶碗都擦洗的干干净净。茉莉花茶、龙井、碧螺春、雨前毛尖，样样俱全。茶棚里除了卖茶水外，还卖纸烟。有的茶棚还卖莲子粥。凡是到荷花市场来的游客，别的什么也不买，也不看，也一定要进茶棚里，沏上一壶好茶，一边品茶，一边歇歇脚。所以，每年荷花市场时期开茶棚的都会做一阵好生意。

荷花市场的游人，平日总是熙熙攘攘，而人最多最热闹的，就属末天七月十五了。一般的庙会或集市都是最末一天就没人了，北京有"残灯末庙"之说。而为什么荷花市场末天的日子，游人却人山人海呢？因为这一天，是北京民俗"放河灯"的日子。荷花市场有小贩卖纸制的莲花灯，有特制的各种鸟兽形状、可放置水中的河灯。入晚什刹海里，水中漂浮着各种各样的河灯，水面上星星点点，与河岸上点燃的莲花灯连成一起，煞是好看。

第三节　著名老字号

以上介绍的都是流动商，逢荷花市场时都聚至此处，俟荷花市场结束时就走了。除此之外，什刹海也有几个固定不动的店铺，其中著名的是：

一、会贤堂饭庄

过去北京饮食业称饭庄与现今的饭庄不同。过去，饭庄、饭馆、饭铺都有严格的区别。挂出饭庄的招牌者，从规模说，一般要有两三套四合院，几十间房屋，同时能摆开八人一桌五六十桌席面，五百多人同餐。而且还要有戏台，可以演大戏，供四五百人看戏。现今一些饮食业称饭庄的，没有一家具备以上条件的。甚

至只有一间小餐厅，只能摆两张餐桌，十几个人吃饭的，也叫饭庄。我们说这些的意思，怕读者误解，认为会贤堂饭庄，与现今叫饭庄的差不多而已。其实不然。

会贤堂饭庄开业于清光绪末年，掌柜的王承武。其所在位置极优越，它坐落在什刹海的西北侧，店门面向什刹海，环境幽雅。沿街是青砖对缝，木结构一片两层小楼。店门内是前后两层院落，西跨设有戏台，可供数百人观戏。每个院子都建有高高的铁罩棚。各房间都设备齐全，榆木擦漆的桌椅，白灰墙上挂着不同时代的名士书法与绘画，布置得很典雅。

会贤堂饭庄是山东风味的饭菜，以善做猪肉，如炖肘子、炒肉片、炒里脊、四喜丸子；红焖栗子鸡、糟鸭头、四做鱼等菜见长。会贤堂的鱼翅席、海参席、像四冷荤、四鲜菜、六大件、八大件等高席面他家是常做的。该饭庄不仅成桌的大菜做的好，应节令菜也独具风味。像夏天的四鲜冰碗，冰鲜莲子、冰鲜菱角、冰鲜白花藕、冰鲜核桃，这四样鲜果分放在四个蓝花瓷碗中，并配以青梅、山楂糕、玫瑰等，在冰桶中镇着。顾客随要随取，再适量放些白糖。顾客用它下酒，其有凉鲜、甜酸之味，是夏天开胃，增加食欲，祛暑的美食。

会贤堂饭庄的主要顾客是王公大臣、贵族、官僚、大户有钱有势之人。因为什刹海附近，王府多，清政府大员多，一般中下层官员更多。像摄政王府，就是光绪的生身之父的王府，还有醇王府、恭王府、庆王府就在会贤堂的西边。因为这些王公大臣，政府要员平日养尊处优，讲吃讲穿，讲究排场。会贤堂饭庄，建设得雕龙画凤，房屋油漆彩画，房间多，又有戏台可以演戏，又离他们住处近，比较方便，各种大菜做的又很讲究。因此，他们每逢家中有喜、寿、生小孩、办满月都由会贤堂承包办理。尤其这些王公大臣等都爱京戏名演员的演唱，凡办堂会戏，像当年的名伶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尚小云、侯喜瑞等经常在此演出。而

且戏码都很硬，每次堂会戏都是好角荟萃，一演就是一宵。

会贤堂饭庄风光了好些年，在清末民初时，是北京饭庄业的佼佼者。但是，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不久，会贤堂饭庄就改为伪满洲国驻京办事处。出入其门者不是当汉奸的大官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高级官员。1945年，抗日胜利后，会贤堂旧址做为逆产没收，遂改做辅仁校友会址。

二、烤肉季

“银锭观山”的银锭桥是什刹海前海与后海的分界处。在晴朗的傍晚，立于桥上，远眺西山，峰峦叠翠，层林尽染，历历在目。烤肉季这座驰名全城的老店铺就位于这座历史名桥的东侧。

“烤肉季”本是北京北城一带群众送给在什刹海设摊售卖烤肉的季德彩的美名。季德彩是直隶通州牛堡屯人，生在清代道光年间。他为人勤恳，在他二十多岁时，就到了咸丰做皇帝的时候了。为了生活，推着独轮小车，吃力的行几十里进北京，到什刹海卖烤肉。在什刹海一带，卖一夏天烤肉，秋后再推着独轮小车回家，年复一年。后来他的儿子季宗斌长大成人，就将他父亲季德彩的独轮小车接过来，依旧每年夏天来什刹海卖烤肉。由于季家父子卖的烤肉，肉切的薄，佐料齐全，顾客吃到口中，没有筋头筋脑的，而且味香醇，所以，大家都叫他们为“烤肉季”。季德彩和他儿子季宗斌做买卖都憨厚，对老人不欺，对少者不骗。季宗斌比他父亲还老实，又不爱说话，所以，大家都叫季宗斌是“季傻子”。

在清代时，附近恭王府、摄政王府、庆王府和一些八旗子弟经常到什刹海游玩。也经常吃季傻子的烤肉。特别是摄政王爱吃，有时派人把季傻子找来，季宗斌就推着独轮小车，带着牛肉和羊肉、所用的佐料、烤肉炙子、大长筷子等，来摄政王府侍候王爷吃烤肉。

烤肉季的第三代叫季阁臣。他做买卖时，已经是民国时期了。

是他把原祖父和父亲做了几十年的行商“雨来散”，改为小铺子。在什刹海岸搭起简陋的棚子，并正式挂出“烤肉季”牌匾。而且在选用肉、料和燃用柴料上，都比过去讲究了。烤肉季以烤羊肉为主，用的是西口羊，就是黄河河套、宁夏银川一带的“滩羊”。这种羊，肉嫩肉鲜，并且选羊的后腿、上脑等部位。这两部位的肉最精。佐料有切碎的大葱、香椿末、卤虾油、高酱油、料酒、姜、醋、香油、白糖等。燃用柴料上，专门用松枝子和柏木。因这种木料有一股香味，用燃烧的松、柏木的香气，增加肉香。

北平解放前，吃烤肉都是顾客自己烤，并且要带尚武的架势。一只脚踩在长条凳上，右手用长有尺余的大筷子夹些肉片，先在凉水碗中涮涮，而后将肉片放在肉炙子上烧烤。俟肉片一变颜色就马上夹下，因为时间再长，肉就老了。将夹下的肉片蘸些佐料，或下酒或吃烧饼。烤肉季卖烤肉是在炎热的夏天，天气酷热，旁边又有熊熊火焰烤着，文雅的顾客不好意思脱下衣衫，就敞开怀，一边用芭蕉叶扇风，一边吃着喝着。那些不讲文明的人，索性脱下衣衫，赤着背大吃大喝。由于烤肉季的生意兴隆，引起一些饮食业同行的注意，有的店家也添上烤肉卖。后来越来越多，到处可见卖烤肉的饭馆。

现在“烤肉季”已发展成北京颇具相当规模的大饭庄了。店堂建设得古色古香，经营扩大了，除传统的烤牛羊肉外，并增添上具有北京地方风味的牛羊肉炒菜。

老店“烤肉季”在什刹海畔、银锭桥旁，正放着新的光彩。

三、白米斜街冰窖和宝泉冰窖

在过去没有电冰箱、电风扇、空调和机械冰的年代，开冰窖的生意都很兴旺。在清代时，大多数冰窖不是清政府的官冰窖，就是王府所属的王府冰窖。商人开的冰窖极少。清政府垮台后，民国政府成立，遂将官冰窖和王府冰窖租给商人承办。白米斜街冰窖包了什刹前海，宝泉冰窖包了什刹后海。白米斜街冰窖设在西

口，什刹前海东岸。宝泉冰窖在李广桥东。

开冰窖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所具备的条件是挖建冰窖。冰窖都是一部分在地下，一部分在地上。地下的地面用稻草铺平，地上用砖或大土坯砌成约三尺厚的墙，高约丈余。先不封顶。再有就是准备冰镩和打冰工人穿的老羊皮袄、皮帽、毡帽和皮靰鞡等。

打冰都在三九天，因为北京的三九时最冷，经过入冬封河，到三九时冰就结厚了。打冰时，都在夜里四更天，就是夜里一点多钟。打冰的工人穿戴好了，每人拿个大冰镩，在工头的带领下，先打远处的冰，而后逐渐打近处的冰。打冰的工头都是有经验的老手，大家都听他的指挥。他给划出范围，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工人。他发口令，大家就用冰镩使劲凿冰。这样打下来的大冰块浮在水面，就如同一个大冰筏。而后按一定尺寸，将大冰块分割成若干小块，一般是 3 尺长，2 尺多宽。工人用的冰镩都有两个倒须钩，用冰镩的倒须钩将小冰块往冰窖拖。管冰窖的也要用有经验的工人。因为冰块从最低层，一个一个往上码，没经验的码不牢。俟一窖都装满了，就用席箔泥土封顶，并封上窖门。每次上冰打冰，只要五更过，天快亮时就收工。在三九天，天气极冷，打过一层，很快又结上一层冰。冰窖将打过一层冰，叫“一茬冰”。在冬天最寒冷时，打过“一茬”又结一茬，再打再结。如此，可以有“四茬”。但，到第四茬时，冰又薄又不硬，因此，第四茬冰就不能打了。

白米斜街冰窖和宝泉冰窖主要与北京的各大饭庄、饭馆、肉杠交买卖。夏天炎热，肉、菜离开冰不行。饭庄、饭馆和肉杠都有冰桶。冰桶可大可小，一般 3 尺多长，2 尺多宽，高 3 尺，为椭圆形。当年桶铺专门做冰桶，用若干根木板箍起。里挂锡里。饭庄、饭馆、肉杠用冰桶储藏肉类。当年不仅饭庄、饭馆、肉杠用冰，像大户人家夏季降温，做冷饮的制冰激凌雪花落也都用冰。

过去冰窖中藏的冰是天然冰，北京有人造冰，就是机械冰，始

于1937年。1940年《晨报》的《中国制冰场巡礼》一文记："中国制冰场在北京已有短短三年的历史。在本年春季始由日本水产公司经营。"这是北京第一家制冰厂，最初建在天桥。在当时，人造冰虽然比天然冰清洁卫生，但由于"成本昂贵，不能畅销"，只是那些有钱人家能用，穷苦大众只是望冰兴叹，还是食用天然冰。

北平解放后，50年代，该制冰厂改名北京制冰厂，并从天桥迁至永定门外沙子口，后又迁东罗园。而且扩建厂房，大量生产。不久，北京卫生部门鉴于天然冰不洁净，故而令什刹海的白米斜街冰窖和宝泉冰窖停产。

第四节 烟袋斜街

北京有不少斜街，有的是由于河道不正而形成，有的是人走出来的，建房者依斜路而建，故成斜街。烟袋斜街属后者。因为人们从鼓楼大街去什刹海游玩，或从什刹海到鼓楼大街只有咫尺之远，极为便当。是极近的路了，天长日久，走出了一条斜路，又由于光绪年间，东口有几家卖烟袋的烟袋铺，其中有两家卖的烟袋，型号齐全，大小都有，有高价的和低价的，而且质地好。很多用过他两家的烟袋后，都一致称赞，故大家都叫这条街为"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在清末民初时，曾繁荣一时。它的繁荣与它东口是鼓楼大街，南口就是什刹海，地势优越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在烟袋斜街中有几个行业特别吸引人，买卖兴隆，因此，使这条既短又窄的小街巷，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驰名京城。

第一个行业就是烟袋铺。在当年，汉人吸旱烟，用旱烟袋。八旗满人，既闻鼻烟也吸水烟。烟袋斜街的双盛泰和同合盛两家烟袋铺，既卖旱烟袋也卖水烟袋。所以，天天顾客盈门。第二个行业是古玩行。烟袋斜街里在民国年间开办了几家古玩铺和挂货铺

古玩铺所经营的是历代磁器、历代书画、古代陶器、铜器、石器、玉器、金银首饰和家具等，都是旧货。挂货铺的性质与古玩铺相同，不过资本少，买的卖的，以价钱低者为主。清代凡是八旗子弟，每月都可以领到钱粮禄米，他们都过着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人，一生无所事事，每天出茶馆进酒肆。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会干。1911 年，武昌起义成功，1912 年，民国建立。不久，八旗子弟的钱粮俸米停发。这些身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八旗子弟，一部分人就以变卖家中的古旧珍宝度日。烟袋斜街里的古玩铺和挂货铺是应运而开的，所以，这些家古玩铺和挂货铺将一些变卖古玩珍宝的八旗子弟引来。第三个行业是装裱字画铺。原在清末，烟袋斜街西头有两三家裱画铺，其中有一姓古的裱画铺最有名。这家善裱佛像和“影像”（死后遗下的画像）。远近慕名至此裱画的顾客很多。这也是烟袋斜街繁荣的一个原因。

但是，社会是不断地前进，事物在不断地变化。民国年间，洋纸烟在北京市场上逐渐取代旱烟和水烟。过去吸旱烟和水烟的，有的改吸洋纸烟。新吸烟的年青人，开始就吸洋纸烟。烟袋斜街的几家烟袋铺受冷落了。其次是没落的八旗子弟出卖家藏古玩物品，也不会无休止的，就连那些清贵族，家藏的古玩珍宝较多，但也有卖完的时候。到了三四十年代，到烟袋斜街几家古玩铺和挂货铺卖东西的明显见少。再有是，烟袋斜街的古姓裱画铺，因故，从烟袋斜街搬到鼓楼东大街营业。由此种种，原来繁荣的烟袋斜街走向衰败。

第三章　东四地区——明代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区

第一节　东四地名的来历

东四是东四牌楼的简称，因为明代在东四的十字街头，每个路口各建一座四柱三楼式、描金、油漆彩画、木结构的牌楼，檐下有如意斗拱。据《京师坊巷志稿》上记载，南北牌楼上书“大市街”，东侧牌楼上写“履仁”，西侧牌楼上写“行义”。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毁于火，后又重建。1954年，鉴于城市的迅速发展，把它们拆除了。

大市街俗称东四牌楼大街或东四大街。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字路口以北改称东四北大街，以南改称东四南大街，并沿用至今。

古代在城市的重要交通路口建造牌楼有什么用？我们的祖先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极讲究格局，讲究气势。它是一座城市的装饰物，据一些史书记载，明永乐皇帝改建北京城时，就在东四、西四、东单、西单、东、西长安街等建有牌楼。这种布局，使北京城更加雄伟壮观。如果从老百姓来说，牌楼是行路的标志，牌楼能使你辨别方向，认识道路。

第二节　东四的崛起——发展商业的几个条件

东四地区能继鼓楼、钟楼后，成为北京的繁华商业街，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先说第一个条件，1368 年，元顺帝逃出大都，元灭亡。明永乐年间改建北京城，后又将南北大运河终点码头积水潭废弃，改在东便门外的大通桥为终点码头。

元代时，在通州建有有年仓、富有仓、广储仓等十三座粮仓，当做储粮之用。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明代将管理漕粮的总督仓场公署设在裱褙胡同。通州和北京都设粮仓。北京城的粮仓大多建在朝阳门内左右和东直门等处。到了清乾隆年间，原通州的官仓只留两座外，其余多移至北京。北京有粮仓十三座。朝阳门内南侧有禄米仓，北有新太仓、旧太仓、南新仓、富新仓、海运仓等。

此外，虽然定东便门外的大通桥附近为漕运卸粮之地，但是由于粮多船多，大通桥一处不够使用。因此，必须有一部分漕粮在通州卸。而后改用大车、骡马驮运至北京进朝阳门入仓。不管是在东便门外大通桥卸下的粮食，还是在通州卸下的粮食，都要改装车、马，运进朝阳门。众多的马夫，搬运粮食的夫役和管理粮仓的人员，就都聚在东四牌楼，喝水、吃饭、休息。

第二个条件是，明代，东四牌楼迤南有官妓院，有演奏乐器的娱乐之所。现在的内务部街，在明代时，叫“勾栏胡同”。现在的演乐胡同，是明代乐队演习奏乐的地方，现在的本司胡同，是明代管理官妓院、管辖戏曲、音乐活动的“教坊司”所在地。

据说，强迫妇女出卖身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此后，这种有损妇女人格和身心健康的勾栏院，历代相沿。统治者利用

勾栏院增加财政收入，并用勾栏院作为对犯罪官员家属（妇女）的一种惩罚办法。即“没为官妓”。所以，早期的勾栏院大多是官办的。

明燕王朱棣与他的侄子建文帝发生了皇位之争。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在北平起兵。建文四年（1403年），燕王攻破南京，建文帝逃亡（有说死于宫中）。燕王做了皇帝，就是成祖，年号永乐。攻破南京时，把原建文帝手下的亲信大臣，大肆杀戮，灭族，株连者数万人。把一部分未被杀者男人“没官为奴”，女人“没为官妓”。妓院是人多的地方，这也是东四繁华之一。

第三个条件是，灯市口的繁华兴盛，对东四影响很大。

据《燕都游览志》记载：“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街西，亘二里”。在明代，正月观灯是当时极盛的一种风俗。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时，每年正月就“放灯十日”以与百姓同乐。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就在东四牌楼迤南设灯市。从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在此放灯。并赐百官假五日以观灯。当年，从二郎庙往西，其街很宽阔、整齐。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戚家，豪右家眷属”饮宴观灯之处。街中列市，珠玉古玩、儿童玩具、日用杂品之货摊，应有尽有。而且还有文娱玩耍之地，“童子捶鼓，傍夕向晓，曰太平鼓”，有童子“跳白索”以为戏。俟太阳西落，入晚，满街张灯，从二郎庙往西观之，如同星月之街，五光十色，煞是好看。有各色纱灯，灯上都画着山水风景、各种花卉和历史故事等图画。特别是冰灯“细剪百彩，浇水成之”而千姿百态，最吸引观众。在灯市期间，有人卖灯，供人选购。灯市上还燃放烟火，每届灯市之期，观者如云，游客若狂，老幼男女，从四面八方拥至灯市。其中有很多官宦、富豪、文人墨客也来此观灯。但是，灯市缺少卖茶水、饭食的店铺和货摊，观灯者就到东四饮宴休息。

第四个条件是，东四东侧的三官庙庙会对东四的影响。

三官庙原称大慈延福宫，其遗址就在今天外交部东相邻之处。这个庙始建于明成化年间，供奉天、地、水府三元的神，故称三官庙。这座庙规模大，香火旺。每逢开庙之时，香客拥挤不堪，东至朝阳门，西至东四都是人群。据传说，明成化以后的皇帝都到三官庙降过香，特别是崇祯经常去三官庙，在李自成起义军打到山西太原危及北京时，崇祯又求助三官神，求签问卜吉凶。但神灵也保护不了他。没几天，农民起义就兵临城下。最后，城破，崇祯走投无路，自缢于煤山（景山）东麓一棵槐树下。

第五个条件是，隆福寺庙会对东四的影响。关于隆福寺和隆福寺街情况，下文再作详细介绍。

第三节　大市街——东四南北主干道

一、“东富”说的来源

大市街前文已经讲了，是专指东四南北这条街。而“东四”只是泛指包括十字路口在内及附近一带地方。

“世言京城‘东富西贵’由来久矣”这是一些史书所记。说“东富”确实如此，在东四有控制北京金融市场的四大钱庄，“四大恒”。这四个恒字号钱庄是，恒兴号、恒和号、恒利号和恒源号。除恒源号位于东四牌楼东侧外，其余三号都在大市街上。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又记“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至内务府与宫内流动之款，则由泰源司之”。从中可以看出，当年四恒号钱庄在北京金融界起的作用。过去一些钱庄可以自出银票和钱票在市面上流通。小钱庄资本少，出的银票和钱票，人们不爱存储和使用，店铺里也不愿意收。因为怕其停业，受损失。对于四恒号钱庄出的银票和钱庄，人们不

仅都欢迎，而且以储存和使用此票为荣耀。据《旧京琐记》中记：当时人们以使用四恒号钱庄的银票和钱票为体面。并举出一件事，说某个旗人一天约朋友到前门外剧场看戏。说这位旗人已更衣进了剧场，待了很久。忽然发现自己衣袋中带的银票不是四恒号钱庄的。就对朋友说，“甚抱歉，需稍候也。”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很生气地说：“账房可恶，竟以烟蜡铺的票与我，故痛责之，已往易矣。”朋友问他，戏马上就开演了，误了看戏，怎么办，他却说，误了看戏，没什么。我怎么能拿这样的银票付人。很久，仆人回来了。将崭新的四恒号钱庄的银票给他，他才高高兴兴地去看戏。这并不是故事，是当时社会的事实。故于清末，北京普遍流传着“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陞，腰缠四大恒”的顺口溜。“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对四恒号钱庄）多倚为泰山之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中，四恒号钱庄被八国联军抢掠，损失惨重。“然犹支持十余年，始次第歇业。恒源、恒兴歇业最早，恒利直至民（国）十（年）以后尚营业。”

二、店铺众多

在大市街上，除四大恒外，从北往南讲，在十字路口以北有，瑞芳斋饽饽铺，原来这家饽饽铺一般，没什么名气。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后，大市街十字路口以南的有名的合芳楼饽饽铺歇业后，其铺中的存货和工人都归到瑞芳斋中。这样瑞芳斋的技术力量大增，产品质量、品种都增多了。过去饽饽都以八样为全份，瑞芳斋的大八（件）样、中八（件）样、小八（件）样，都做的很受顾客的欢迎。但是，最著名的饽饽，是“反毛月饼”。在靠近十字路口处，有两个聚庆斋饽饽铺，路东者称“东聚庆”，路西称“西聚庆”。在隆福寺街东口外迤北有家便宜坊烤鸭店。中药铺有，北庆仁堂药铺和宏仁堂药铺。森春阳海味店在十字路口，牌楼的北侧，主要经营金华火腿、南京板鸭、燕窝银耳等名贵产品。晋阳干果铺在其北边。另外路东还有东天义、东天源两家酱园。

在十字路口以南的店铺是，牌楼低下，有家姓满的开设的爆肚铺，人称“爆肚满”。其旁有两家大酒缸，一家叫恒和庆，一家叫鸿源长。东升祥绸布店是个大买卖，主要经营的商品都是名贵高档货物。像绫罗绸缎、细毛皮货、各色棉布等。北京有名的东四清真寺是座古老的清真寺，建于明代正统年间。寺内现珍藏着一部元代手抄版本的《古兰经》，文字精美，实为国宝。在明、清时期，该清真寺就是北京穆斯林做礼拜的地方。在清初曾规定，北京内城不准设戏园，因之，戏园“惟正阳门外最盛”。但是，至清末政令松弛，东四南之“泰华轩，隆福寺之景泰二处，时演杂耍、八角鼓、曲词之类而已。”像当年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刘宝全、滑稽大鼓演员老倭瓜、架冬瓜等都曾在该处演出过。

在大市街上除以上店铺外，还有：油盐店，天和号、德和瑞、汇水泉、鸿源长；干果杂货铺，全德昌、公昌义、公和义、全盛号、源兴永、公泰义、德隆昌、德义长；米面店，新盛号、德兴号、东和兴、通盛德、恒顺店；烟铺，复丰号、源顺德、聚兴隆；布店，同义祥、利源增、德祥益、恒信公、万聚祥、义成号、万聚长、锦泰涌、祥聚德、和顺祥、天增成、裕兴隆；棉花铺，元丰泰、广兴魁；香蜡铺，天馨楼、万兴楼、蕙兰芳、合馨楼；颜料铺，隆盛号；钟表铺，德古斋、永信斋；古玩铺，瑞珍亨、义兴和、全兴顺、松古斋、永和号、裕记、椿秀山房；金银首饰楼，英华楼、瑞增楼、天聚楼、聚宝楼、泰源楼、宝源楼；靴鞋铺，老华盛；肉铺，内同兴；砖灰麻刀铺，丰盛和、天泰永、新盛号、东泰兴；当铺，东恒肇等。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聚庆斋饽饽铺

聚庆斋是饽饽田家开办的，当年在北京有3个聚庆斋，前文

已讲了，东四有东聚庆和西聚庆。前门外大栅栏里的称“南聚庆”。这三个聚庆斋都开业于清同治、光绪年间，东聚庆开业于同治初年，西聚庆开业于光绪初年，南聚庆开业于光绪末年。清末人崇彝写的专门介绍北京地方的历史《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瑞芳、正明、聚庆诸斋，此三处，北平有名者”。而且在其他史书上还记有，清末，朝廷祀典或庆典，都用月盛斋的全羊，便宜坊的全猪，聚庆斋的饽饽。由这些记载，说明聚庆斋是名噪一时的老店铺。

聚庆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声誉，是和它的饽饽好吃，货色齐全，热情招待客人有关。要使饽饽人人爱吃，首先在饽饽的原料上，不用次货；好货价钱贵，聚庆斋不怕贵，定进好原料。用河北密云县的小枣，房山县的核桃，云南的桂花，台湾的蔗糖。并且从中挑选质优的果品投入料中。挑选好原料是一个方面，而且还要舍得多往里放料。聚庆斋的饽饽都是油大、糖既要放的足，但还要适量，以使饽饽甜、咸适度。像聚庆斋的红、白月饼，按传统做法一斤白面用四两香油，而聚庆斋是一斤白面用四两香油外，还要加二两大油。因为只放香油不行，放大油才能让月饼酥软。聚庆斋的月饼放到磁盘中，一会工夫，盘中就会汪出一层油。另外像春节时祭祀用的供品——蜜供，不管放在冷屋子里，还是暖和屋子里，蜜都不流淌下来，供不会散架。因为聚庆斋用的高价买的好冰糖，所以，蜜不管屋子冷热都不流。一般饽饽铺是用普通糖，他们制做的蜜供，屋中温度一高蜜就流下。

聚庆斋的老田掌柜经常对他的后人说，作买卖必须货色齐全，不怕没人买，就怕你没有。这是作生意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经验。

聚庆斋是前店后作坊，东四这两家聚庆斋的饽饽都在东聚庆后边制作生产。聚庆斋生产经营饽饽分：平日供应的饽饽，季节性饽饽和婚丧喜庆用的饽饽。平日供应的饽饽品种很多，有江米条、套环、燎火、槽子糕、金钱饼、芙苓饼、俄式排叉、官样月

饼、西洋糕等。细八件，大八件，小八件等成套饽饽也是聚庆斋平日供应的饽饽。细八件的八样饽饽是：状元饼、大师饼、鸡油饼、杏仁饼、白皮饼、囊饼、硬皮桃、蛋黄酥。大八件的八样饽饽是：福、禄、寿、喜、枣花、卷酥、核桃酥、八拉饼。小八件的八样饽饽是：喜、石榴、苹果、桃、杏、枣方子、杏仁酥、桃仁酥。细八件和大八件都是一套八样一斤，小八件为半斤。

过去北京居民极讲究到什么时候吃什么饽饽，聚庆斋就根据市场需要，按季节生产时令饽饽。每年春天，按习惯是，上元节也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必须大量生产各馅元宵。二月二龙抬头，北京居民都要吃太阳糕，这时就生产太阳糕。进入夏季，五月节做应时五毒饼、江米小枣粽子。在天气炎热的伏天，聚庆斋做水晶糕、绿豆糕、豌豆黄等供应市场。立秋后，天气渐渐凉爽，八月中秋节是我们民族仅次于春节的一个重要节日。居民吃月饼以应佳节，聚庆斋的红、白月饼是该铺的名产品，所以销售量很大。尽管他们日以继夜的加紧生产，但是，每年还是供不应求。九月九重阳节登高，做花糕。到了冬天，居民都喜欢吃蜂糕、喇嘛糕、蛋黄酥等饽饽，聚庆斋大量供应。

过去北京居民举办婚丧等红白之事时，也有其该吃的传统风味饽饽。娶媳妇、聘姑娘是件大喜事。男家给女家“放订”时，要随送给女家的鹅、酒、衣物和金银首饰外，还要送几十斤或上百斤的“龙凤饼”。“龙凤饼”俗称“大饼子”。由于聚庆斋生产的龙凤饼，皮酥、馅好、吃入口中松软、香甜。因此，大多数人家都在聚庆斋订制龙凤饼。妇女生孩子，坐月子，娘家和亲戚在小孩“洗三”时，除了送鸡蛋、小米、红糖外，还要送“缸炉”。这种“缸炉”是聚庆斋做饽饽时，都要开炉“试火”。用作试火的饽饽，称作“缸炉”。不用看这种缸炉，表面呈深棕色，边裂，但质量高，营养丰富，而且价钱还便宜。很适合生孩子的妇女食用。

聚庆斋站柜台的伙计，上柜台接待顾客必须穿长衫，衣服整

洁，梳洗干净，说话和气。买的多，派人用圆笼给顾客送到家里。买的少，就是买一块饽饽，也是热情接待，用纸给包好。

东四的两个聚庆斋都在1958年，全市调整商业网点时，并点撤消。

二、东四便宜坊鸡鸭铺

东四便宜坊鸡鸭铺是民国年间，从宣武门外米市胡同老便宜坊出来的伙计开办的。

清代乾隆年间开业的米市胡同老便宜坊，是享名多年的名店。该店焖炉烤鸭和清酱肉原是他家独有。后来，从米市胡同老便宜坊陆续出来几个伙计，在外边开买卖。焖炉烤鸭和清酱肉这种美食，虽然打破了只一家生产经营局面，但是，当年民国年间，北京的东城还没有经营焖炉烤鸭和清酱肉的买卖。东四便宜坊是在如此背景下开业的。

东四便宜坊经营的商品种类有生猪肉，生鸡鸭坯和活鸡鸭，烤鸭，清酱肉等。而且买卖做的十分灵活。顾客买活鸡鸭，店中有人管杀、褪毛，拾掇干净；烤鸭管送至家，并且在顾客的餐桌前，边片边往餐桌上端，让顾客吃的舒服。

东四便宜坊在30年代，又在店中设了餐厅，招待顾客到店中进餐。餐厅中酒、烤鸭、炒菜，应有尽有。炒菜主要是从鸡鸭上找。拌鸭掌、炒鸡肝、宫保鸭块。其次是肉类菜，溜肉片、溜里脊、宫保肉、四喜丸子等。由于东四便宜坊买卖作的灵活，生意曾风光一时。但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者对北平的物资控制极严。东四便宜坊的买卖就不好作了，年年亏损，最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停业倒闭了。

三、东恒肇当铺

东恒肇当铺在东四六条西口外，其联号在阜成门内锦什坊街，叫西恒肇当铺。东恒肇当铺开业于清光绪末年，当家的（就是经理）叫王紫山。

过去北京将金店、钱庄、粮行与当铺称为“四大行”。他们操纵着金融行情，老百姓口粮的价格。特别是当铺打着“济世利人，周旋两便”的幌子，对穷苦百姓进行高利贷盘剥。所以，多少年来，社会曾有“宁可人饿死，也不进当铺”的说法。人们都痛恨当铺，但是，又离开它不得。一般都在穷困得实在没办法时，才夹着当物进当铺。

东恒肇当铺的主要营业活动是通过以物品作抵押借给顾客用款，收取高额利息；如果到期顾客不能赎回抵押物品，就是“死当”。东恒肇当铺就将“死当”公开拍卖，从中获得厚利。这就是东恒肇与一些当铺经营赚钱的两种主要办法。

因为东恒肇当铺所处地理位置好，到此当当（过去将拿着抵押品进当铺借钱者，称“当当”）的，既有破落的大家庭，也有一般穷苦百姓。所以收押的当物既有古玩玉器、古今名人字画、金银首饰、钟表眼镜、贵重皮毛、绫罗绸缎、铜锡器皿等贵重物品，也有一般的棉布衣物等。当当人（顾客或借钱人）不论拿什么物品作抵押品，与当铺讲好价钱后，当铺先扣下利息。东恒肇当铺收月息二厘六分，期限 24 个月。如果到期当当人不来赎当，这样，此当物就是“死当”。东恒肇当铺每年都要将各种“死当”集中在一起，请来古玩铺、首饰楼、估衣铺等行业之人，进行“打当”。就是拍卖。这里还应说明，当当者拿来的当物，如果价置 10 元，当铺最多也写价 3 元。如此，当当者能赎当物，当铺可获高额利息；不能赎当，当铺“打当”获得利润更高。

当当者将当物交给东恒肇当铺的收当人（当铺职工）后，讲好价钱，在付给当当者钱时还要给写个将来赎当时的凭证——“当票”。东恒肇当铺对自己发出的“当票”极为重视，因为它是东恒肇当铺发出去的有价证券，与钱庄发行的银票和钱票一样。如果当铺的当票出现伪造的，不仅给业务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会给买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故此，东恒肇当铺请专门刻制当票

木版又有信用的篆云斋刻字铺给刻制木版，自己买东昌纸印刷当票，书写当铺统一由账房先生负责，收当人高声向账房先生唱说，当的是何物，当物的成色，当价钱若干等。书写当票的“当字”是当铺行的特有。其字似行书又非行书，似草字又非草字，外行人是看不懂的。这种特有的字是当行人多少年来共同创造的。从行文造句上各当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论任何物品，新旧程度如何，都冠以“虫吃”、“鼠咬”、“光板无毛”、“破旧”和“坏烂”等字眼。像衣裳要冠以“破旧”二字，毛织物就冠以“虫吃”或“鼠咬”，皮毛物一般要冠以“光板无毛”几字，就连足赤的金首饰也冠以“淡金”或“冲金”等字眼，字画必冠以“纸片”。这些字眼，当物人难以辨认，就是看懂了也无可奈何，因为多年来，每一个当铺都是如此书写，不是东恒肇当铺一家如此。

东恒肇当铺贬低当物也是为了一时当物保管不慎，真的破损、残烂后，赎当人也无话可说了，只可自认倒霉。尽管如此，可是，东恒肇当铺对当物还是认真负责保管的。他们每收一件当物都登记入账，编号拴上号签，放入库房中。库房里分珠宝古玩、玉器字画、金银首饰类，皮毛呢绒类、丝绸绫罗类、棉布、杂项等类。像怕虫吃的皮毛、呢绒、毛织物和棉织物等都放樟脑。并按时查库盘点，东恒肇当铺专门由二当家负责，每年春秋二季查库盘点当物。此外，还规定每年春季谷雨节气和秋季的秋分节气，要开库晾物。每次晾物都是按库按号查对，取出风晾。对皮毛、毛织物等容易招虫的物品都要加细检查，并抖晾。如发现虫蛀物时，要命人修补。

世人都知道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时，曾发生过老百姓砸当铺的大门，将库房里的各种当物大抢一空。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六年抢当铺”。这次抢当铺，因为东恒肇当铺开业晚，没有赶上。但是，发生在1912年和1917年两次抢当铺它都赶上了。

辛亥革命后，南北发生了“建都之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

党人主张建都在南京，而袁世凯主张建都在北京。1912 年，南京民国政府方面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来北京迎接袁世凯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这个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明着不说不去，暗着搞了个“兵变”阴谋。2 月 29 日晚，他指使他的亲信曹锟搞假兵变闹剧。曹锟的一部分军队在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把守朝阳门的军队听见枪声后，就主动打开城门，也跟着闹了起来。在东四、东安门、前门一带放火抢劫。随着全城枪声四起，一直闹了一夜。在这次抢劫中，东恒肇当铺被抢了。

1917 年 5 月，北洋军阀政府发生了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的“府院之争”。张勋乘机率大辫子兵进北京，演了一幕宣统复辟的丑剧。7 月，张勋正式宣布清帝溥仪复位，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爵，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一时之间，过去已被推翻的东西又都重新冒了出来，真是牛鬼蛇神，无丑不现。

但，段祺瑞看到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逐赶黎元洪的目的已达到，即组成“讨逆军”于 7 月 12 日攻进北京，经过激战，张勋复辟被粉碎了。在北京大乱时，东恒肇当铺和北京全市的当铺又一次遭抢。

东恒肇当铺经过以上两次抢劫元气大伤，后来又经过北平沦陷，生意无法维持，于 1940 年左右关门停业。

四、晋阳干果海味店

晋阳干果海味店是山西人于清末开办的。开业后就做红了，民国二三十年间，晋阳干果海味店曾兴旺一时。晋阳干果海味店作生意的经验是货全货好，而且价钱又低廉，才能招徕买主。他家有几个人专门到处采购货物，办到的干果有山东产的落花生，直隶的瓜子、核桃、栗子，东北的榛子、杏干、桃干，南方的桂圆等。鲜果有宣化府的葡萄，房山县的红果，陕西的柿子，密云县的小枣，深州的蜜桃等。山珍有猴头、熊掌、燕窝、银耳、香菇、

口蘑等。海味有海参、鱼翅、鲍鱼等。

晋阳干果海味店还自制果脯蜜饯等北京风味食品，如果子干、温朴、蜜饯海棠、炒红果、糖炒栗子等。晋阳干果海味店的糖炒栗子在东城一带很有名。每年入秋后，店门前放一个大铁炒锅，由一个有经验的伙计带两个小学徒负责炒栗子。他家的炒栗子所以有名，受欢迎，是他们挑选那皮薄、圆、大，仁又饱满的栗子，先放在糖水中泡，而后炒。炒得火又匀、熟。外观皮深红、油光亮，肉厚、甜，而且皮好剥。每年从入秋起，一直炒到转年二、三月，天天供不应求。

晋阳干果海味店不仅门市买卖兴旺，大宗批发也不错。他家有跑外的（推销员）专门拿着货样到各大饭庄、饭馆、大户人家推销货物。像当年有名的饭庄庆和堂、天寿堂、福寿堂、福全馆等都用晋阳干果海味店的货。

这家晋阳干果海味店也是在北平沦陷，日本占领北平时期，买卖亏损，无法做了而歇业倒闭。

五、恒和庆大酒缸

老北京专门卖酒的店铺很多，有小酒铺，酒馆和大酒缸之分。这些卖酒的店铺一般都开设在人来车往的繁华闹市中。这三种卖酒的店铺以小酒铺规模最小，一般只是一间房屋，里面有两三张油桌供五六位客人喝酒。以大酒缸规模最大，酒的质量好，酒菜多，所以，喝酒的人都愿去大酒缸喝酒。

恒和庆大酒缸是老北京有名的大酒缸之一。它位于东四牌楼十字路口南侧路西。三间门面，店堂宽深。店堂里除柜台外，就是摆列有序的七八个大酒缸了。这些大缸都高约三尺五六，缸口直径约二尺五六，埋在地下一节，地面露着约有二尺余。缸盖是个厚厚的红漆油着的木盖。这些大缸既用做存酒又做客人喝酒的酒桌，因此，恒和庆称作“大酒缸”。

恒和庆卖的酒主要是白酒，也有黄酒。白酒销量最大，因为

北京人都爱喝白酒。白酒俗称“烧酒”，也叫“白干”。磁器口的酒店定时给恒和庆送酒。酒装在酒篓里，酒篓是用荆条编的，里外糊着几层高粱纸并涂着血料。所以，这种酒篓放在车上不怕碰撞。酒运来，就倒入店堂中的大缸里。

恒和庆店堂里的柜台，既做收钱算账用，又做为客人零打酒和摆放酒菜之处。柜台上有小坛子，坛子里盛着酒。坛子盖是个涂着红漆的木盖，盖下钉着棉布垫，垫的四周还缝着个红布裙。坛肚上贴着用红纸写着“财源茂盛”四个黑字。在小酒坛子旁边，一个红铜盘子里放着1两装、2两装、4两装、8两装（当时16两为1斤）的打酒的“酒提子”。这种酒提子是用竹筒子做的，下是盛酒的小竹瓢，旁边有根直上直下的手提把，因而叫“酒提子”。另外铜盘子里还有个铜“酒漏子”。往“酒素子”（一种口大、脖细、肚大的小酒瓶）和酒壶里打酒需用酒漏子。“酒素子”是用来温酒的，冬天有些客人喜喝热酒。就将酒打入“酒素子”里放在炉火上热水盆里热酒。

磁器口的几家酒店都是官酒店，就是已经完过税的酒店，酒的质量好。恒和庆又兑水少，所以，酒味香醇。另外，恒和庆下酒的小菜花样多，炸花生米、煮小花生、焦排叉、饹饹盒、拌豆腐丝、拌粉皮、豆儿酱、炒麻辣豆腐、肉皮冻、咸鸭蛋、老腌鸡蛋、玫瑰枣、辣白菜、芥末墩等。此外，在恒和庆店门外，还有卖酱猪头肉、白水羊头肉和酱驴肉的货摊，供酒客选购。因此，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恒和庆生意很兴隆。尤其是每日天黑掌灯后，每个酒缸四周都坐满了酒客。

恒和庆大酒缸买卖好，招来四方之客，也为东四一带的繁华起过很大的作用。

但是，从北平沦陷后，客人逐渐减少，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维持到解放后，不久就歇业了。

第五节　朝阳门内大街——北京的主要粮道

朝阳门内大街是一条古老的街道，它最早可追溯至元代，在元代建造大都城时，这里有个城门叫齐化门，因之，这条街道称“齐化门街”。元代在街之北建祭祖先的太庙。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明军从齐化门攻入元亡。到了明正统建城楼时，齐化门改称“朝阳门”，故街道也改称朝阳门大街。成化年在街上建香火极盛的三官庙。清代时，先后在街上建恒亲王府、怡亲王府、孚王府。孚王府就是俗称的九爷府。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展宽马路，改称朝阳门内大街。

因为朝阳门内大街曾是北京城进粮的粮道，所以在这条街的东段米面店多，有永丰店、义吉店、义和店、义盛隆、义盛店、义祥店、永昌店、永泰店、晋泰店、德义永、晋源店等 11 家米面店。靠近东四牌楼处有“四大恒”钱庄之一的恒源号钱庄，恒源号钱庄于民国年间倒闭后，有人利用恒源号旧址改为中美楼山东饭馆。永安堂中药店在路南。在南、北小街以西至现外交部处，当年大街两侧是一个紧挨一个的估衣摊。像春秋两季的夹袍、夹裤袄，夏季的单衣裳，冬季的棉皮衣袍等旧物都卖。双顺成衣铺在民国年间曾驰名京城，为众多著名人士做衣裳，而且改制的女旗袍成为流行一时的各界妇女爱穿的时装。双顺成衣铺开业在朝阳门内大街南侧的老君堂，后迁至东四牌楼的十字路口迤南路东。后又迁至西大街。

第六节　著名老字号

一、永安堂药店

关于永安堂的开业时间，由于缺少可靠的历史材料，所以说法不一。有人说，永安堂开业于明朝永乐年间（1416 年）。有人不承认这种说法，说它开业最早，早不过清代康熙年间。但是，甭管它开业于明代，还是开业于清代，总之，是北京的老字号。

据知情者介绍，永安堂药店最早为南方人出资创办。后店铺产权归有名金店董家所有。店中管事掌柜先后是朱丽山、周子鑑、程跃宗、赵铎。北京国药业商会主席杨周臣也曾任永安堂总经理。

永安堂药店既经营汤剂饮片，又经营丸散膏丹。首先采办药材，一是在本城药栈选购一般药材，二是派人到全国各地药材产地采办特味药材。东北的老山人参，河南的金银花，杭州的白芍，蒙古的黄芪等在医药界极为受欢迎。这些名药材比同类药疗效高。有地道药材还要认真炮制。永安堂设有制药作坊，炮制遵守古法，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冻的必冻，绝对不偷工。据该堂保存清代乾隆年间刻印的《永安堂药目序》记“本堂实与名副，财以道生；随地产而徵材，种种依神农所办，奉成方而定品，般般尽抱朴之遗，有膏有丹有丸有散。”

这段文字道出永安堂从选材至炮制的讲究。其炮制的成药分风痰、伤寒、瘟疫、暑湿、燥火、补益、脾胃、泻痢、眼目、妇科、痰嗽、疮科、小儿、咽喉、口齿等十几个科门，计有一千一百多种。永安堂炮制的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胃丸、人参鹿茸丸、万应锭、龟龄集等疗效好，为该堂的名药。

永安堂从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在社会上声誉显赫一时。相继有盐山杨文愷为永安堂题“济世宝筏”，江朝宗题“济世寿民”，商震题“杏林春暖”，吴佩孚题“志在活人”，宋哲元题“采云蕙

匾”，秦德纯题“功同造化”等。由此，永安堂与外城的负有盛名的同仁堂药店，并称为“内有永安堂，外有同仁堂”。

近年，永安堂增加了西药、营养保健品和各种医疗器械等商品。为了更好地“济世寿民”，永安堂与十几家药店合作建立了“永安堂”药店联锁店。永安堂又创出了新的辉煌。

二、双顺成衣铺

北京地区的手工业里，成衣行（裁缝）是个大行业。当年北京大多数人都是定做衣服，买衣穿的不多。所以成衣铺到处都有。在繁华的东四、西单、前外大街等有成衣铺，在僻静的小巷也有，成衣铺遍及北京的各个角落。但是这些众多的成衣铺都是只有一、两个人的小作坊，只有民国初年韩俊峰创办的双顺成衣铺是个拥有职工三四十人的大店铺。由于双顺成衣铺做衣服注意质量，裁剪合体、缝制精细、样式新颖，因此，来此店光顾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军政界及社会知名人士都找双顺做衣服。这样，双顺发展成北京唯一有名的大成衣铺。为了了解双顺成衣铺建立发展的历史，特作者走访了双顺成衣铺老职工支善文、徐良、张先忠等人。由他们提供了双顺的资料。

河北省深县正处于华北大平原的中部，适合农业生产。韩俊峰就生长在深县安家庄。虽然家中有几亩地，但人口多，只靠他父亲一人干活，无法维持生计。所以韩俊峰只念了半年书，在八岁时就缀学了。这个韩俊峰虽然没念多少书，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聪明。不论学什么一学就会，而且不忘。他失学后，有时给人家放羊，有时在家里帮大人干活。在清宣统元年，韩俊峰十四、五岁时，他父亲借了几个钱做盘缠，送他到北京学徒。经老乡介绍到了东四六条西口的双顺兴成衣铺。

双顺兴成衣铺，在当时还算是个大作坊，除一个掌柜的外，有五、六个手艺人，有三四个学徒。当时学徒的规矩，一进店门头一年先打零杂。像给师娘看孩子、买东西、帮助厨师做饭、送活、

给掌柜的、工人师傅们搭铺等都得干。等第二年柜上再来师弟接这些杂活，才能去跟师傅学手艺。韩俊峰进双顺兴后，也不例外，先干杂活。不到一年，柜上又来个学徒。韩俊峰带着这个师弟干活，等这个师弟都熟悉后，掌柜的就叫韩俊峰到前边向大师哥学手艺。开始大师哥让他学着做简单活，编纽扣、打架子等活计。这种活干了一段时间后，大师哥又教给他缝边、跑直趟等基本功。由于韩俊峰机灵、勤奋、尊敬师傅、团结伙友，因此在他三年零一节出师时，糙活细活、皮、棉、夹、单、男活女活，就样样全行了。

韩俊峰满徒出师后，就在本柜上当手艺人。因为他手艺好，活又做得认真，所以深受顾客的欢迎。不少顾客点名要他给做。当时东四一带住着不少大户人家，韩俊峰都到他们家去过，给他们做过活。大家都叫他韩裁缝。韩俊峰又在双顺兴干了五六年。在1917 年左右，一次韩俊峰家里来人说："家中有急事需要几十块钱。"韩俊峰找掌柜子借支，碰了钉子。后来他从朋友、师兄弟处东借西凑，弄了几十块钱打发家中人走了。这件事使他很不痛快，他想这几年他为柜上出了不小的力气，为掌柜的拉来了不少的好顾客。家中急用几个钱都不借，不干了。等到年终"说官话"时，韩俊峰提出辞柜。掌柜的挽留他，他不答应，后来，掌柜的又托人说合。韩俊峰全拒绝了。

韩俊峰离开双顺兴后，托朋友在朝阳门里南小街找了一间房。买了些日常需要的家什做为生活用，买了一副高凳、一块案子做活用。从此，他就串起"宅门"来，白天他走东家去西家应活，晚上在家裁做。干了两、三年不仅双顺兴的一些老顾客都让韩俊峰做，而且又来了些新顾客。买卖很好，但一个人忙不过来。约在20 年代初，他在原住处不远的地方老君堂找了几间房子开了一间门脸，创办了双顺成衣铺。开张的那天，贺喜的人络绎不绝。刚开张时，双顺的职工还不多，有工人三、四个人，徒弟二人。后

来，生意日渐兴隆，随着买卖的发展，由一间门脸扩充为四间门脸，后边做活的职工由四、五人，发展到四十多人。很快双顺就成了全市闻名的成衣铺。

韩俊峰用人找伙计主要条件是手艺精，其次是老实能干。就连本铺出师的徒弟，手艺不精他也不留，满徒后马上叫走。双顺的工资本着能够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为主，采取固定工资，“四六分成”和“倒四六分成”等多样办法。韩俊峰同每个职工商量、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般做活虽好，但较慢的职工要选固定工资。那些做得既快又好的职工自然喜欢分成工资。吃柜上饭的按“四六分成”也就是本人做活收入总数的六成给柜上，自己得四成。不吃柜上饭的给柜上四成，自己得六成。这种多做多挣的工资方法，职工们生产积极性很高，成衣行业最忙的季节是冬天。在冬天最忙时，有时白天干，晚上还要“打夜作”到深夜。韩俊峰和一般店铺掌柜相比，他很会体谅职工，在职工或家中有事需要他帮忙时，他就出力帮助。一次一位职工家中要买五亩地，尚缺二百块钱，找韩俊峰帮助解决。韩俊峰二话没说，就给拿出二百块钱来。并且每月工资照发，从不提借钱之事。这种帮助职工解难的事经常有。由于韩俊峰的开明，对待金钱不是斤斤计较，有的职工不愿意离开双顺，在双顺干了一辈子。徐良、张志忠二位老师傅手艺好做活快，有条件离开双顺另立门户。但他们不好开口，也不愿意开口。所以在双顺干了一辈子直到退休。

顾客在双顺做的衣服，不仅合体而且缝制牢，款式漂亮美观。虽然布活、绸缎等细软双顺都接，但到双顺做衣服大都是细软之活。细软之活难做，很要手艺。在40年代以前，当时北京社会上流行的衣服有男人穿的长衫、马褂、短衫、带裤腰的裤子。女人穿的旗袍等。

双顺要求职工量裁必须随体。手工缝作，针脚成“鱼子”大小，正面不能看到针脚。沿出的边必须平直、粗细一样，而且要

柔软。纽扣盘花既新款又均匀。双顺有人专门检查质量，韩俊峰经常抽查质量。因为双顺很少有由于缝制质量问题回来返修的。一旦出现，职工们都视为最大的耻辱。因此，双顺的职工们都是认真加工细致，不当“粗活工人”。

韩俊峰做活不墨守成规，随着社会潮流走，善于改革。像中式长短衫的袖子和前胸相接处，人穿起来总是绉褶很多，很不好看。经过韩俊峰同职工们研究试做，采用肩上开缝，腋下挖除的办法。这样的改做，不仅使衣服穿起来平整，而且可以自由地抬胳膊，再不有上抬胳膊，下拽大襟了。这种做法很受顾客的欢迎。关于女旗袍的样子翻新，双顺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更大，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更大。女长衫叫旗袍是元宝高领，服体宽大，卡腰很小。下摆很大，大襟开到底。妇女穿起来既不随体，又不舒服。这种服装到了民国年间同当时的社会潮流很不合适。所以，韩俊峰决心改革翻新。他们是这样改的，把元宝高领改成后高前两头矮的领子，改后领子看着好看，穿着舒服，不再磨下颏了。把原来大襟开到底，下摆大，卡腰小，改成大边小开襟（后又改不开襟），上边套头，卡腰大随体。改成后的旗袍款式很新颖，穿着舒服，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一次东四钱粮胡同一个大户办喜事。贺喜的人很多，一个妇女穿着双顺改做的新旗袍也来贺喜。这件紫红色的丝绒新式旗袍，吸引了在场的男男女女。一大群姑娘、媳妇围拢过来，看这看那，问长问短，非常地羡慕。她走在哪里，人群围在哪里。没有两天，双顺的顾客骤然增多，大都是妇女来做旗袍。有拿丝绒料的，有拿春绸料的，有拿缎料的，都要做新式样旗袍。这时不少宅门大户有的打来电话，有的派人来叫，也是想做新式旗袍。这样双顺忙了几个月后，才稍微轻松些。后来大多数成衣铺也模仿双顺旗袍的样子，做起新式旗袍来了。在 30 年代中期，新式旗袍就取代老旗袍的地位，成为各界妇女爱穿的衣服。双顺韩俊峰这个“旗袍大王”的雅号也就叫开了。

解放前，双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社会的上层人物。像军政界的段祺瑞、吴佩孚、商震、鲍毓麟、金壁辉、殷同、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蒋经国、孙连仲、陈诚、李宗仁、卫立煌、工商界的乐松生、王光英、孙学仕、邹泉荪、福兴面粉公司的东家、瑞蚨祥的东家，文化教育界的俞平伯，马连良、谭富英等人及其家属都是双顺的老主顾。这些大户一般都是下人来找，双顺派人去其家量体把料子取回裁做。这些大户一做衣服就是一批。一次，他们给商震做衣服，二十多人做男女棉、皮、单、夹、纱等四季衣裳。因为商震等大官僚四季的衣服不是一两件，同样的衣服就有多件。像冬天的皮袄，有刚入冬穿的珍珠羔、有冬日穿的滩羊皮、灰鼠，三九天穿的狐狸皮。狐狸皮还分狐股，狐颜等贵重皮毛。做了半年。给他们做衣服加工费要多少钱，记多少钱的账，年终算账。双顺的加工费没有固定的价钱，看人定价。但是这些人家只要求做的好，多少钱都肯花。像吴佩孚的儿媳妇朱九小姐做衣服，一年的加工费多到四千多现大洋。给这些大宅门做活，老妈子、号房（就是门房）等下人的佣钱必需得花，你不给下次他们就不让你进门，或者在主人面前给你说坏话，让你做不成生意。你给他们钱，他们就欢迎你，老远就喊：“裁缝师傅来了，为什么这些日子没来，还真想你！”不仅做一次活给一次佣钱，到新年还得给他送礼。每到新年，双顺专门派几个人买几天礼物，腊月底挨门挨户的送。这是一大笔开支。双顺成衣铺同其他老店铺不一样，有兴有衰，而是久盛不衰。其原因虽和双顺加工精细，善于革新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它的主要顾客，那些社会上层人物虽然不断的衰败，但随即一伙衰败下去，而这一伙却乘机应运而生。因而，双顺的买卖越做越好。

1949 年北平解放，给北京人民带来了新生。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有了希望。双顺成衣铺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双顺的服务对象从单一为上层人士服务，而转变为，即为国家参加国际活动服务，

又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方向。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后，店址从老君堂迁至东四南大街的新址。在五六十年代，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各行业团体出访活动频繁。为了显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高雅服装，尤其一般女同志出国，都在双顺订做中式服装，旗袍是必做的。像王光美、张茜、林佳楣等同志随代表团出国访问，都要在双顺做一些服装。宋庆龄、薛明等同志更是双顺的老主顾。李宗仁先生归国后，郭德洁也常到双顺做衣服。

十年浩劫中双顺以为封建主义少爷、太太小姐服务的罪名被砸，门市部撤消。1976 年“四人帮”被打倒，党的事业逐步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尤其是党的“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肃清极左路线的影响。根据社会上一些人士的要求，于 1982 年“双顺”中式服装店在东四东大街路南恢复了营业。由双顺成衣铺的老徒弟支善文师傅主持。一切做法依按过去的要求。双顺恢复老字号后，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欢迎。过去不少在双顺做过衣服的老华侨，来北京也要在双顺做几件衣服带走。上次美国总统里根来华访问时，双顺的支善文师傅应邀去宾馆为里根夫人量裁了红、黄织缎旗袍各一件，这两件旗袍做好后，里根夫人试穿很满意。她对我国民族服装的试样和双顺缝制精细很是称赞。1984 年双顺又从东四东大街迁到东四西大街路北原华表服装店的旧址。他们为了面向广大人民，为广大人民服务，特设中式成衣销售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双顺从创立到现在已经 80 多年了，它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它为我国民族服装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七节　东四西大街——有名的猪市

一、街上发现了明代排水沟

在北京街巷胡同中有许多用河流、桥梁取的地名，说明过去这些地方就是水道。元代的通惠河是古代的漕运之河，在前文已作了介绍。另外，还有两条主要干流明沟，一条是从西直门南水关流入城中，顺今天的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南流。北京解放前，赵登禹路和佟麟阁路就叫“沟沿”。东城的东直门里南、北小街和朝阳门里的南、北小街过去也是一条排水明沟。近年东四西大街至朝阳门内大街扩展马路，在东四西大街的南侧发现一条宽约丈余，两边用大城砖砌就，上盖青石板的排水沟。据有关文物部门鉴定，此排水沟为明永乐年间所建。从而说明早在明代时，东四西大街就是一条主要街道。

二、北京有名的猪市

东四西大街在明代称“双碾街”，清代由于这里是马市，故称“东马市街”（因西四有西马市）。在《京师坊巷志稿》记有：“东马市街亦称西大街，有马市、猪市、羊市、百鸟市”等。及至清末民国年间，马市移至西边，现在的美术馆东街。羊市没有了。猪市扩大至整个一条街，街南街北有猪店，人和、保李、苏张、高八、李王、邳五、许大、东唐、程大、刘张、唐张、黄王、靳李、何王、兴杨、董八、蒙大、侯三、么王、丁张、辛杨、刘四、刘陈、沈大、兴马、辛李、蒋二、赵店、王张、陆张等四十九家。这些猪店，既作买卖生猪的生意，又为贩猪的商贩提供存放生猪的地方，还有人住的客房。每天上午整条街都摆满了生猪和肉摊。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猪市。百鸟市在猪市大街北边的南北向的一条短巷中，这条巷子叫“大沟巷”。黄雀、百灵、靛颏、交子、画眉、红子、老西、鹞鹂、太平鸟、老家贼等各种鸟儿，在这儿都看得

见。百鸟市里卖鸟的，卖鸟笼子的，卖鸟食的都有。在百鸟市里还有卖鸽子的。卖鸽子的都有大笼子，里边放着各色的鸽子，从形态分有“平头”鸽子和“凤头”鸽子。平头是鸽子的头，羽毛是光平的；凤头鸽子的头，长出一撮羽毛，似孔雀之头。从鸽子羽毛颜色分有白点子、玉环、墨环、白尾翅、黑尾翅、芦花、灰楼等。

三、弓箭大院

据《京师坊巷志稿》上记载：在东四西大街东段南侧，有“弓箭大院亦称帽行大院”。因为在这个“大院”里有许多制作弓箭的小作坊。其中有姓李的和姓田的两家，弓做得拉力大，又坚固。生意十分兴隆，慕名而来的订客很多。至解放后，50 年代有的停业了，有的加入了手工业合作社迁走了。

四、东四商场

东四商场坐落在东四西大街（原猪市大街）弓箭大院西侧，是爱国民主人士方仲纯于民国十一年左右（20 年代初）创办的。

方仲纯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时期，投笔从戎，跟随周介仁在绥远地区举起义旗，率骑兵转战塞北各地，曾攻克重要城市大同，（方仲纯先生曾著有《辛亥革命塞北回忆录》和《清末山西军政概述》等书。）。后因受阎锡山的排挤，而离开山西，到北京任北京政府内务部主事。目睹北洋军阀政治的腐败，随弃官入银行界谋求发展，致力于实业救国。20 年代中期，中国和俄国苏维埃政府恢复外交关系后，苏联成立了大华煤油公司，方仲纯先生为该公司的总经销商，在东四商场内成立了永济油庄。

东四商场的旧址是清政府的八旗兵营房，其营房分前、中、后三个营区，地域甚是宽广。方仲纯先生利用这座废弃的营房投资建成了这个商场。东四商场大门朝北，是座二层的楼房，楼上是个金店，楼下中间是出入商场的通道，东边是个酒店，西边是个

鞋店。场内的格局与旧东安市场相似，整个商场是封闭式的，上建有遮挡风雨的高大的铁板罩棚，场内走道的两侧是各自独立的各种店铺。有经销居民日常所需的洋广货物的百货店，裁剪制做中式服装的成衣铺和西服店，出售各式男女便鞋的皮鞋店和四季皮、凉帽子的帽铺，有照相馆；有供顾客进餐的饭馆和冷饮店；有供顾客娱乐的电影院和茶馆，茶馆里的座位很讲究，一律是舒适的藤木椅子。茶馆里还有个小型舞台，每天有大鼓和莲花落等文娱节目演出，客人可以一边品香茶一边欣赏节目。此外，东四商场内还有印书局和诊疗所。总之是吃、喝、玩、用，应有尽有。东四商场设有管理处，为了各家店铺和游人的安全，有“请愿警”维持商场治安。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是东四商场历史上鼎盛时期，每天各界游人很多，大多数店铺生意都很红火，特别是东四商场里永济油庄经销的苏联大华公司的煤油已占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市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随着就将魔爪伸进山海关内。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华北危亡！方仲纯先生激于爱国热情，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毅然再次从戎，任职于二十九军秘书处主编《武德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7 月 29 日夜晚，二十九军秘书处奉命向西苑转移，在西直门被截断道路，副参谋长张克侠命令未能撤出城区的人员更换便衣，待机出城。方仲纯先生受到日本宪兵的追捕，永济油庄被查封，东四商场大部分房屋被日军强占改为仓库。商场受到严重破坏而衰败下去。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东四商场虽然得以恢复，但是元气已伤，无法重新振兴，于 1950 年宣布停业。

东四商场当年对东四一带商业街的繁荣发展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八节　著名老字号

一、芙蓉斋饽饽铺

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记有："芙蓉斋者，东四马市大街糕点铺也。各种糕点并不胜于瑞芳、正明、聚庆诸斋，惟以所制黄、白蜂糕，为他处所不逮（及）。"因为芙蓉斋的蜂糕不是用麦面，而是用米面制成，加放适量香油、白糖合米面。辅料较多，如核桃仁、瓜子、芝麻、枣、青丝、红丝、玫瑰、木等干果调味。上笼屉蒸熟的蜂糕"食之松腻，以其宣厚内多蜂窠，故名之。"芙蓉斋的黄、白蜂糕有名于世，可是他家生产的碎蜜供更是北京独一无二。蜜供在旧北京时，是祭佛的供品。碎蜜供是过去饽饽铺门市销售的食品。芙蓉斋的碎蜜供"不若其酥而味厚，都人皆嗜之"。

二、普云楼猪肉杠

过去北京人将卖猪肉的猪肉铺俗称"猪肉杠"。卖猪肉的猪肉铺没有大店铺，都是只有一间门面的小买卖。一般都在进店门处，靠边架着个横圆木杠，整扇的生猪肉都挂在这木杠上。故称猪肉杠。一般的猪肉铺都是既卖生猪肉又自制熟肉出卖。切熟肉的地方都设在柜里较高之处。普云楼就是这样的猪肉杠。这家肉杠开业于清乾隆末年，历经兴衰沧桑，直到前两年，因店房被一家经营金银、珠宝饰品者所占，才迁至景山东街的冷落的胡同中维持营业。

三、汪元昌茶庄

汪元昌茶庄是昔日北京茶叶行方、张、汪、吴、王、孟六大家之一的安徽汪姓茶商于清同治年间开设的茶庄。生意始终兴旺不衰，汪元昌茶庄所以生意兴旺，主要是由于它在福建自办茶场，有专人在安徽采办茶叶，自己用茉莉花薰制拼配。因此，成本低，

茶叶质量高。茶叶外形小、匀整、泡出茶汤呈淡红、香味浓，有杀口。而且红、绿、花、乌龙等茶叶货色齐全；高、中、低档俱全。特别是汪元昌茶庄卖的小包茶叶，不仅分量足，而且价钱便宜。当时卖苦力的劳动大众多，买小包茶叶的顾客多；有些无事可做的老人买一小包茶叶到茶馆、酒肆或澡堂沏上一壶茶细细品茗。汪元昌茶庄的小包茶叶质量好又便宜，自然受到这些顾客的欢迎，他们在一些娱乐场所就成了汪元昌的义务宣传员了。

汪元昌茶庄于1956年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并点后，汪元昌就撤点了。虽然这家老店早已不在了，但老北京还想着它。

四、大豆腐巷——北京早期屠猪之所

大豆腐巷因在清代前期有豆腐坊而得名。到了清代中期后，大豆腐巷中陆续出现了屠猪的大小作坊十几个，像双盛永、永茂局、内永茂、广盛局、豆蔡局、豆田局、豆公局、福兴局、和升局、外金城、南宝盛等都是较大的屠猪作坊，这种屠猪作坊俗叫“汤锅”。这些作坊不是只管杀猪，而且还是“一条龙”作业，割下的猪头制成酱猪头，猪的内脏心、肝、肺、大小肠，俗叫“下水”，也煮熟酱出，卖给小贩去沿街叫卖。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当时政府“以商民每售卖屠宰病牲，有碍卫生，于警察厅内设立卫生检验所。”规定，凡宰杀之牲畜，必须经过检验后方可售卖，但是仍有漏检者。遂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选定（前门外）城南游艺园为（屠宰场）场址”。这个屠宰场分为东、西两场，东场是屠宰牛羊之所，西场为屠宰猪之处。入场之牲畜先经主体检查，宰杀后还需经过检验，确是无疫之牲畜方可出售。从官设屠宰场正式成立后，政府明令私宰点一律禁止屠宰牲畜。如发现私自屠宰牲畜者处罚不贷。所以，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大豆腐巷里的屠猪作坊就关闭了。

第四章　隆福寺街——有名的东庙

第一节　规模宏大的隆福寺

隆福寺街是由隆福寺庙而得名。据《宸垣识略》一书所记："大隆福寺在仁寿坊东四牌楼大市街之西，马市北，其街以寺得名。明景泰三年（1452年）建。"庙宇规模宏大，气势轩昂，殿宇描梁画栋、金碧辉煌。寺前有"神路街"，直通马市大街。神路街前矗着一座两柱一楼的木牌坊，上写"大隆福寺"。寺门前左右是石狮守门，山门两进五开间，山门内是鼓楼、钟楼，以后依次是三世佛殿、三大处士殿、藏经殿、转轮殿、毗卢殿、大法堂等。是明、清时北京著名的大寺庙，其神路街南至马市大街，寺的后门北通钱粮胡同。左有"东廊下"小巷，右有"西廊下"小巷，可谓雄伟矣。

第二节　热闹的庙市

隆福寺每月（农历）初九、初十、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日开庙。每逢开庙之日，香火极盛，庙里庙外，到处是赶庙会的摊贩。土布、竹柳、锅、碗、瓢、杓、帘等杂货摊都在庙外。庙里两侧都支着布棚，是卖字画、古铜器、玉器等古玩摊。豆汁、扒糕、切糕、炸糕、糖耳朵、老豆腐、豆腐脑等风味小吃摊庙里庙外都有。变戏法、说评书、摔跤、练把式的卖艺场所在庙里空旷

的地方。过去北京，以隆福寺的鲜花最有名，在《燕京岁时记》上有这样的记载：“两庙（隆福寺、护国寺）花厂尤为雅观，春日以果木为胜，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仙为胜。”隆福寺的鲜花厂以利和、隆兴等最大最有名。他们售的鲜花有盆花、桶花、花篮、花束，还卖盆景。这些花厂有经验丰富的“花把式”，他们可以让秋天开放的菊花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开放，可以使牡丹、梅花、芍药、桂花、茉莉、海棠等名花生长茂盛，含蕾多，花开得鲜艳。利和与隆兴等大花厂还为顾客代为培养花，并可去顾客宅中去养花。就是顾客家养的花多，但缺乏养花知识。花厂可按时派人去顾客家，给花剪枝、施肥、换土等。

逛隆福寺的游人，有平民百姓，也有豪门大户；有城里人，也有远道而来的农村人。每逢开庙都是游人如梭，作买作卖热闹非常。正像《草珠一串》上云：“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隆福寺着了一把大火，将第一层殿烧毁，又因寺庙年久失修。庙宇日渐残破。进入民国后，不断地军阀混战，隆福寺逐渐地失去往日风采。解放后，人民政府整顿了隆福寺的摊贩，并将近五百户原东单“东大地”的小商小贩迁到隆福寺，于 1956 年，办起了“东四人民市场”。至此，隆福寺庙市就成了历史。

第三节　隆福寺街——有名的文化街

北京的琉璃厂和打磨厂是北京外城的两条文化街，而隆福寺街是北京内城的文化街。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隆福寺街当年只有书肆三处，同立堂、天绘阁、宝书堂”。后来同立堂和天绘阁由于经营不善而换了主人，改名为三槐堂和聚珍堂。到清末民初时，这条街的书

铺大量增加，有三槐堂、聚珍堂、修绠堂、修文堂、宝文书局、文殿阁、三友堂、带经堂、宝会斋等二十多家，占了隆福寺东段半条街。这些书铺除收买销售经、史、子、集等类书、珍本、善本、孤本等古旧书籍外，三槐堂、聚珍堂等有条件的书铺还雇有工人刻版印制《书经》、《万历武功录》等大量古书。

隆福寺街的书铺在民国年间，进入了它的繁荣期，这与它的西邻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有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景山东侧创立京师大学堂。民国元年（1912 年），改称“北京大学”迁址至沙滩。沙滩与隆福寺只是咫尺之远。北京大学的师生在课余之时，大多数人都到隆福寺书铺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书籍。有许多教授和学生与这里的书铺的掌柜、职工建立了联系。

但是，从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平百业萧条，物价暴涨，各大学纷纷南迁，隆福寺街的古旧书铺因此趋于衰败。当时，一斤旧书还换不回一斤玉米面。转业的转业，倒闭的倒闭。目前，在这条街上只有个中国书店古旧书门市部在营业。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福全馆饭庄

福全馆是山东人于清末开业的大饭庄，民国年间的经理是王润田。该饭庄规模大，有房屋七、八十间。院落宽绰，并建有戏台，台前可容五、六百人看戏。内城一些官僚、名流、大户，举办喜庆、婚丧之事，多在福全馆宴请客人。当时的京剧名演员经常在此演出。其饭菜是鱼、肉、虾、海参，山东风味。在“七·七事变”前，生意兴隆一时，北京沦陷后，生意逐渐的衰落，40 年代中期歇业。

二、白魁饭庄

隆福寺街的白魁饭庄开业于清乾隆末年，至今已有二百余年

历史了。最早开业时的掌柜的名字就叫白魁，后来买卖转到黑姓清真教人手中，但“白魁”牌匾没有换。

白魁从开业直至北京解放前，只是个以卖生牛羊肉为主的羊肉铺。兼做一些酱牛肉和烧羊肉以及芝麻酱烧饼出卖。白魁所以出名是由于它家的烧羊肉做得好，肉烂，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味道香甜。每年夏季，是烧羊肉销售旺季。北京人每年夏天爱吃过水凉面，每天下午三四点钟，白魁的烧羊肉出锅时，远近居民都拿个大瓷碗来买烧羊肉。少买肉多要汤，拿回家用烧羊肉汤浇过水凉面，再放些黄瓜丝、蒜泥，吃入嘴里，面凉，汤热，味道极其鲜美。吃这种面，既开胃，又可祛暑热。因此，白魁这个字号与它的烧羊肉一起出了名。当年，人们常说，前门有月盛斋的酱羊肉，隆福寺街有白魁的烧羊肉。

现在白魁已发展成为各种风味小吃和各种炒菜都经营的大饭庄了。并在张自忠路西口外开设了一座分号。

三、灶温小饭铺

隆福寺街里的隆盛饭铺是山西省一个姓温的商人于清代嘉庆末年（1816—1819年）开办的。最早是个经营油盐酱醋和针线的小杂货铺。后来到了光绪末年，传到温思洪当掌柜时，才改为小饭铺，专营抻面和清油大饼等食品。

隆盛饭铺的掌柜温思洪善于经营，他的经营思想是薄利多销，只要顾客进店，就是一分钱的买卖也要做。像顾客带着干烙饼让厨房给做个烩饼，从白魁带来的羊肉要求给做个葱爆肉，从便宜坊带来的鸡、鸭要求做加工，这些都只收些加工费，隆盛饭铺的温掌柜都应。因此，有些人也叫隆盛饭铺为“二荤铺”。温掌柜另外一种经营思想是，只要顾客进店买东西，无论买多买少，都是“财神爷”，不能得罪。温掌柜经常对学徒、伙计说：“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因此，温掌柜连穷苦乞丐他都不得罪。隆盛饭铺在店门外，房檐下放个煮面的炉灶，白天使用，晚上营业结束将炉灶

封上。每年冬天严寒季节，有些无家可归的气丐都到这里避风雪取暖。温掌柜的不仅不让徒弟、伙计哄赶他们，并且叫伙计不要将炉灶封得太严，以便使炉灶多些暖气。天常日久，隆盛饭铺得了个“灶温”的雅号。而隆盛本名却少有人知了。

灶温经营的食品既有炒饼、烩饼、抻面，还经营炒伙菜、摊黄菜、炒肉片等。其中烂肉面最受顾客的欢迎。凡是老北京人逛隆福寺都要到灶温吃碗烂肉面。灶温的烂肉面，抻得细，浇面的肉煮得烂，再用黄花、木耳、口蘑、花椒、大料、小茴香等做佐料，勾成卤汁。顾客现吃现浇。冬天吃热锅挑，夏天过凉水吃凉面。不爱吃烂肉面，灶温还有“小碗干炸”。所谓小碗干炸，就是普通的炸酱面。

灶温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前，生意最红火，天天顾客满堂。所以，有人为其编了个溜口辙：

“隆福寺街说灶温，烂面白细卤汁醇；

店堂以内刀杓响，食客都是一般人。”

“七·七事变”后，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至解放前夕就倒闭了。

四、神路街水窝子

水窝子就是过去老北京对卖水的水屋子的俗称。北平在 1949 年，解放前，大多数居民吃井水。虽然，过去无论大街小巷都有水井，但苦水井居多，只能供洗东西用。吃水由卖水的水窝子供应。水窝子在北京内外城到处皆有，但隆福寺前，神路街的水窝子，不仅它地处繁华的商业街，而且它的水道多、“倒水的”多。所以，神路街水窝子是北京众多水窝子的大户。

北京的水窝子的井主和“倒水的”（过去北京对送水工人的称呼），从清代乾隆年间起，都是山东省籍人。据《草珠一串》上，一首竹枝词写道：“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著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神路街水窝子里虽然只有一眼井，但井深、井口大，水源充足，水质甘甜。井口上架着个双把辘轳，两

个人不停地摇着辘轳，一桶接一桶往上打水，把水往水屋前用大木板围成的水池子里倒。水池子前，“倒水的”用柳条杓，一杓一杓地往自己的独轮水车上的水箱倒。俟满了，就吱吱咿咿地吃力的推走了。他们推车送水都有固定的街巷，这就是所谓的水道，也即势力范围，水道带有很浓厚的封建色彩，它是从清代延续下来的。当年神路街水窝子据有，隆福寺街、猪市大街、益茂大院、盐店大院、马市大街、孙家坑、轿子胡同、崔府夹道、东廊下、西廊下、大沟巷、钱粮胡同、南花园、西花园、北花园、大佛寺、南兵马司、马大人胡同等水道。凡以上街巷胡同各户用水都由神路街水窝子送，其他水窝子不能送。如果送，就要发生殴斗和诉讼。相反，也是如此。

“倒水的”工作最累最苦，挣钱又少。山东人能吃苦耐劳，所以，这一行都是山东人干。“倒水的”推的独轮水车，左右各装着个 3 尺多长，1 尺多宽，2 尺多高的长椭圆大木水桶。若装满水约有六七百斤。车的轱辘又是木质铁皮的，当时街巷胡同都是土地，推这样的水车极其吃力。夏天热，曝晒，冬天最苦，冰天雪地，手经常被冰凉的水浇湿，每年入冬，每一个“倒水的”的手都冻得红肿裂大口子。“倒水的”推车给住户送一担水，在 30 年代初，只要一大枚（一个铜钱，2 个半是 1 分钱），还不收现钱。“倒水的”用滑石在住户门外墙上划一道，到节日数道算账。

过去北京有管“倒水的”叫“水霸”之说，这对以劳动为生的“倒水的”太冤枉了。真正的水霸是控制水道的水窝子井主。他们不用干活，“倒水的”等伙计都给他干活。哪个住户，要是得罪他，他就不让“倒水的”去送水。所以住户不敢得罪他。每逢得罪了这些人，要给他们赔好话，甚至送礼给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北京的自来水进入了各条街巷。神路街水窝子与全市的水窝子一样为前进的社会所淘汰。

五、永盛杠房

永盛杠房位于隆福寺街西口外路西，是当年北京最大最有名的杠房。

在过去人死后，用棺木土葬时雇用杠房派人使用木杠将棺木抬至坟地埋葬。由此看来，杠房、轿子铺和棚铺是属于赁货铺。它所有的杠、执事等“商品”可以多次使用。北京是个大城市，所以杠房到处可见，但是中、小杠房多，有名的大杠房不多。划分杠房大小，最主要的是两个条件，一是杠的多少和大小，一般小杠房就预备一、两份杠，一般能抬十六人杠，最大也就是三十二人杠。大杠房不仅预备的杠的份数多，而且能抬四十八或六十四人的大杠。二是执事的多少，一般小杠房只有锣、鼓和雪柳。大杠房执事全、多，要什么有什么。

永盛杠房就是杠的份数多、大，执事全的大杠房。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光绪死，永盛杠房曾抬过一百二十人的皇杠。1937 年，北京沦陷后，1939 年军阀吴佩孚死，六十四人大杠也是永盛杠房抬的。吴佩孚的六十四人大杠，虽然没有光绪一百二十人的皇杠人数多，但是气派大，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而且灵榇所到之处祭桌不断。

吴佩孚出殡规模之大，除去清代皇帝死后皇杠外，是近代北京少见的。吴佩孚居住东四北边的什锦花园，出殡那天，大殡队伍头已到了东单牌楼而棺材还没有出堂（没出灵堂）。队伍最前是个四个人拉着的、由冥衣铺用纸糊的高约两丈多的“开路鬼”。这个“开路鬼”手执大钗，并且不断地转动。接着是“金山”、“银山”、纸人纸马、“松树”、“柏树”。其后才是“执事，顺序是，一对开道锣、两对旗、雪柳四十对、引魂轿一乘、伞两对、亡人影（相片）亭一个、扇两对、金瓜两对、斧两对、钺两对、朝天镫两对、幡伞十二对、三尖刀一对、青龙刀一对、象鼻刀一对、斩马刀一对、金枪两对、银枪两对、飞龙旗两对、飞虎旗两对、飞凤

旗两对、飞豹旗两对、回避牌两对、肃静牌两对。打执事的一律用年青人，身穿新青布嫁衣、新鞋新袜子。抬杠的分三拨，一拨六十四人，共一百九十二人。这三拨人一律剃头洗澡，新绿嫁衣、新青布洒鞋、新白布袜子。打响尺（指挥）的二人。除这些执事外，还有和尚、老道、尼姑、喇嘛等送殡。

吴佩孚出殡那天，各界人士送殡的有数千人，相距不远就是个祭桌，进行路祭，沿途围观者数以万计。吴佩孚出殡，所以能牵动如此众多之人送殡、路祭和围观，是北平人对吴佩孚不肯为日本人干事，热爱国家，为日本所害的敬佩和同情。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者深知自己直接统治中国人民，不如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更有利。所以，他们就网罗一批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充当他们的傀儡。当年，在北京的旧军阀中吴佩孚的影响最大，所以，日本当局曾几次拉吴“出山”利用他组织伪政权，但都被他以各种借口推拖了。日本当局十分恼怒。1939 年，吴佩孚忽然得了牙疼病。北京有个俗话“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汉奸齐燮元曾是吴佩孚的老相识，为吴佩孚介绍个日本医生为其医治牙病。经过吃药打针治疗后，牙疼病不但没有好，而且日渐加重，没几天就死了。人们都说，吴佩孚是让日本人给害死的。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曾镇压过“二七”工人运动，做过坏事，但他不肯给日本人当傀儡，替日本人做事，尚未失民族气节，故得到礼葬。

永盛杠房抬了不少像样的大杠，生意十分的兴旺。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反对厚葬，提倡薄葬，永盛杠房的买卖明显的减少。不久，就关门停业了。

第五章　北新桥地区

第一节　北新桥的民间传说

古时候，关于北京的民间传说很多，北新桥锁蛟龙、平洪水就是其中之一。

故事发生在刘伯温修造北京城时。传说当时北京是一片苦海，要在这一片苦海中建造城市，必须先平洪水。但是，涛涛洪水，始终没办法平息。后来，请来了刘伯温。刘伯温经过几天的查看，他发现洪水所以平不了，是因为有蛟龙作怪。要平洪水，必须先治服蛟龙。经过几番较量，刘伯温终于将蛟龙擒住了。并用一条粗铁链子将蛟龙锁住，压在北新桥旁边的海眼里。当时这条蛟龙曾问刘伯温，什么时候可以放了我？刘伯温告诉它，你盼着这座桥什么时候旧了，就放你。

在北新桥的东北角（现在大华百货商场前）原有座小庙，庙中有眼井，井旁有块巨石拴条核桃粗细的铁链直坠入井底。人们都说，这就是当年刘伯温锁蛟龙的地方，井底压着的就是那条蛟龙。都是这样说，可是谁也没看见过那条蛟龙。北京解放后，1957年北新桥展宽马路，小庙拆除。这眼井也碍事，需要填平，修路工人就从井中往出拉这条铁链子。这条铁链子确实很长，从井中拉出的铁链子堆在井旁，约有3米高。而井底什么也没有，多年的谜解开了。

第二节 地理历史沿革

上面说的是北新桥的民间传说。这个民间传说，它反映出老北京人的美好愿望。因为在六百多年前，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而明朝当时攻下的大都城是一片荒凉。人民希望新建的北京城是个美丽的城，所以才编了这个动人的民间传说。

北新桥确实是个古老的街道，虽然在元代《析津志》上，找不着有关北新桥的记载，但是从街道走向格局看，北新桥以及附近的街道胡同至现在仍是元代的规模。它的北面这条街，就是现在的雍和宫大街。在元大都时，其街一直向北延伸，到了明洪武初年，“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所以才将这条长街断开。在北京城北城墙还存在时，雍和宫大街（明代称集贤街）北头直抵城墙，往南直通大都的文明门；东面是元代的崇仁门（今东直门），西通元大都路府。

北新桥在明代时，称绒家务角头，因为明代，习惯将拐弯有犄角的街称“角头”。清代改称北新桥。笔者在幼年时，约 30 年代，听当地老人讲，在他小的时候，曾在北新桥小庙前见过遗留下的桥墩。说明过去此处确有河，有桥。因此，留下北新桥的地名。

第三节 商业街的形成和商业

一、商业街的形成

北新桥的商业街，虽然远不如东四繁华，但是在过去它是居住在东北城一带居民购买日用物品比较方便之处。因为北新桥是十字路口，交通要道，又由于其东南有海运仓、北新仓和户部管理造币的宝泉局在“北新桥南大街路西”也为北新桥能成为商业

街提供了条件。

二、商业

北新桥的店铺很齐全，居民日常所需的物品在这一带都可买到。为人们所记的店铺有吴裕泰、万丰号、永馨号茶叶店，增福泉、德成号油盐店，天福斋猪肉酱肉铺，元发永、仁和店米面铺，大生堂、志善堂、三之堂药铺，同发祥、广元孟布店，永盛公颜料铺，桂林局、永庆楼、东芝兰轩香蜡铺，乾益恒干果海味店，瑞林号烟叶铺，天丰堂、丰顺堂饭庄、永盛、谦益当铺，长庆、万和、永泰成、恒丰炉房，盛全汽车行等。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吴裕泰茶叶店

吴裕泰是江南安徽吴姓于清光绪末年开办的茶叶店，安徽吴姓在北京开办的茶叶店，除北新桥的吴裕泰外，还有前门大栅栏的吴德泰，崇文门外大街的吴鼎裕，宣武门内大街的吴恒瑞，西单的吴鼎和等。清末民初，北京的茶叶行，吴姓是个大茶商，人称“茶叶吴”。

当年北京的内城居民，特别是八旗居民，饮茶是每天必不可少的，早起、午饭后、晚饭后，都要泡茶饮茶。他们大多数人饮茶是为品茶，摆排场，而不是单纯为解渴。与外城居民不同，外城居民品茶是少数，多数是为了解渴。因之，内城居民对茶叶的质量要求高。讲究喝盖碗茶，好茶叶。

吴裕泰的掌柜叫吴绍墉，这个人善于做生意，了解民情。他知道北新桥一带的居民一般都有饮茶之癖，既讲究喝好茶叶，又不愿意多花钱，都想买到既好、价钱又便宜的茶叶。吴裕泰在经营中，茶叶质量好，售价又比别家便宜，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所以，顾客多，生意兴隆。因为吴裕泰每年入春后，就派专人到安

徽采办茶叶，自己雇工人薰制、拼配。所以，成本低，货色好。而且，吴裕泰在店堂里设有品茶桌。在品茶桌上，摆放着几个大碗，碗中放些茶叶样子，任顾客选择品尝。满意再买，不满意可以不买。吴裕泰的生意好，还有个原因，就是货物齐全，花茶、绿茶、红茶、普洱茶等都准备，顾客进店买什么茶，吴裕泰都有。

近年来，由于各个茶叶店都不自薰制茶叶，一律从北京茶叶公司或外地茶商进货，因之，一些老字号茶叶店失去过去的特色，买卖不景气。而吴裕泰恢复了昔日前店后厂，自薰制、自窨、自拼配茶叶的经营作风。所以，天天顾客盈门，而且还有不少远道慕名而来购买茶叶的顾客。1997 年 8 月，先后在地安门大街和朝阳门内南小街各开了个分号。

二、天福斋猪肉酱肉铺

据一位叫杨顺贤的讲，他解放前后都在东四做猪肉行的生意，对天福斋比较了解。他说，天福斋在北新桥十字路口的北侧路东，三间大门脸，很气派。在我们猪肉行是家大户，掌柜的姓什么，我忘了，就知道他有两个老婆。一个开猪肉铺的能娶两个媳妇是很少见的。

天福斋开业于清代末年，原来只是个小猪肉杠，后来由于天福斋自制的炉肉和炉肉丸子味道鲜美，深得北新桥一带居民的欢迎。因为北新桥这个地方的人，既讲究喝好茶又讲究吃美味的饭菜。炉肉炖粉条，炉肉丸子熬白菜是当年这一带居民常吃的家常菜。天福斋的炉肉和炉肉丸子卖出名后，天天供不应求，生意十分红火，所以，到民国年间就发展为三间门脸的大猪肉和酱肉铺。

天福斋 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1958 年在全市调整商业网点时就摘匾并点了。

第六章 西单地区

第一节 西单地名的来历

一、“瞻云坊”是西单的原名

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内城西城有一座牌楼“瞻云坊”，俗称“西单牌楼。”此牌楼为明朝时建，位于西长安街西口迤北处，是一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檐下施如意斗拱，额书“瞻云”二字。因为此处只立一个牌楼，又因为它位于北京城的西边，所以俗称“西单牌楼”，简称“西单”。在西单牌楼以北，至甘石桥称“西单北大街”，或“西单牌楼北大街”。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民国的政权，做了大总统。但是，他还梦想当中华帝国的皇帝，于是，就将“瞻云”牌坊，改为“庆云”牌坊。后这座西单牌楼连同东单牌楼一起拆除，但西单和东单地名延用至今。

二、复兴门内大街的出现

复兴门和复兴门内大街的出现。北平在沦陷时期，日本统治者在西郊建了个“新北京”，梦想将北京一部份居民迁至此处。又为了对石景山铁厂的控制，日本侵略者于1940年左右，在西单西边的城墙处打了个豁口，称，“长安”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长安门改称“复兴”门。1958年，在展宽复兴门内的道路时，将西单西边的旧刑部街的南边和报子街的北边拆除。1965年，正式命名这条新路为“复兴门内大街”。

三、西单地区发展商业的条件

西城一带尤其是西单以北以西一带居民要到前门外买东西或看戏，西单是必经之大道。清代时，北京的前门外大街和大栅栏已经发展成为商业最发达、繁荣的地方，很多著名店铺都在这里。内城住的人都喜欢到前门外一带买东西。清代，戏园子都设在前门外一带，内城住的人，要看戏娱乐也要到前门外来。这是西单地区商业发展起来的第一个原因。

明、清时期，凡是经北京西南卢沟桥这条大道进广安门的人，一般都侨居宣武门外一带。其中有一部份是仕宦之人，他们要到宫廷、政府衙门办事，进宣武门，西单也是必经之路。这是西单地区商业发展起来的第二个原因。

清代，西单西边有个都城隍庙。这个庙，元时叫“佑圣王灵应庙，天历二年，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明永乐中为大威灵祠”（《宸垣识略》）。到了清代，叫“都城隍庙”，庙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北国初旧物。”都城隍仪门塑十三省城隍，全是立佛像。当年，都城隍庙是北京大庙市之一，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日开庙。到了清乾隆年间，改为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十日，开庙十天。这个庙市各种售货摊，从庙西往东直摆到旧刑部街东，也就是东单。这是西单地区商业发展起来的第三个原因。

北京自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相继设立起许多各级各类学校。据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最新北平市指南》一书记载：全市男女中学 66 所，西城就有 27 所；专科学校全市 45 所，西城有 8 所；大学全市 19 所，西城有 9 所。而且其中有名的中国大学（二龙路）、民国大学（太平湖）、交通大学（府右街）、孔教大学（甘石桥）、北平大学工学院（端王府夹道）等均在西单附近。从而使一些商人为了做这些新知识分子的生意，在民国年间，西单地区就出现许多新式商店、戏院和电影院等。这是西单地区商业

发展起来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民国年间的资料和一些知情人的回忆，自本世纪20年代至解放前，西单地区的店铺有金城、恒丽、恒兴祥、益茂、华昌、介福、德茂、震东等绸缎庄，上海、三友（实业社）、时髦等百货店，老佳丽、华北等鞋庄，烤肉宛、东亚春、忠信、新陆春、庆林春、同春园、西来顺、又一顺、西黔阳、聚仙居、贵阳春等饭馆，大陆、滨来春、有光堂等西餐馆，丰泰隆、裕泰、瑞大、福记、同聚鑫等西服庄，同春堂、同乐堂等药铺，中华、中德、北方、宏文、宏济、英美、韩奇逢等大药房，中国、万国、中央、兴隆、第一、仙宫等理发馆，中原、中国、长安、真光、大陆、新明、杰灵、艺文等照相馆，亨得利、有嘁、慎昌、义和斋、义源斋、大顺斋、永顺斋等钟表店，天福号猪肉铺，桂香村，和兴成、万春昌等南味食品店，乾义、开泰、吴鼎和、福生等茶庄，天源酱园，同兴魁、信成尚记、南桥王福记等鲜果店和秋家酸梅汤，六合棚铺，西单菜市场和西单商场以及明明眼镜公司、光明眼镜行等主要店铺。下面介绍几家比较有名的店铺。

第二节　著名老字号

一、天福号猪肉铺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记："西单有酱肘铺名天福斋者，至精。其肉既烂而味醇，其他肉食类毕备，与其他诸肆不同，历年盖百余矣。后因内容复杂，有伙友出号，于其旁开一号，亦名天福，因之涉讼数年。今始改名天福春记，而新号优于老号矣"。这段资料说明，早年在西单不只一号天福，最早的是"天福斋"，后来又出来个"天福春记"。而现在我们要介绍的"天福号"是第三号了。

天福号是山东人刘掌柜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在西单的东

北角处开设的，原本是个一间门面，上有一层小楼的猪肉铺。传说，刘掌柜这块“天福号”牌匾是从破烂市买回来的。说买卖很小，没有多余的钱做牌匾。一次，他去破烂市遛弯，真巧在市上发现一块“天福号”的旧匾，买回来挂上。所以，刘掌柜的小猪肉铺就叫天福号了。这个传说，编的有头有尾，像个真事。实际不是如传说编的那样。因为我们在本文开头时介绍的资料上，写的很明白，西单最先有的是天福斋，后者都是效天福斋而用“天福”二字。哪能如此之巧，就在破烂市买块“天福号”之匾呢？但是，必须说清一点，过去店铺冒用人家的字号，而在生产和经营的商品上，力求超过对方。不像目前，冒用字号者，产品都是次品。

现在我们不管天福号的匾是哪里来的，只讲他的买卖的经营和发展情况。

天福号猪肉铺生熟肉都卖，也卖鸡鸭。由于天福号酱制的猪肘子，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外皮色泽紫红发光，肉烂味香醇，顾客很多。光绪年间，一个家住旧刑部街的官员，常买天福号的酱肘子。一次，这位官员让天福号精心加工做了几个酱肘子，送进慈禧太后品尝，以便讨好她。慈禧太后吃了送来的酱肘子很高兴。后来，慈禧太后派人到天福号，要他们按时往宫内送酱肘子，好孝敬太后。从此，天福号的店名不胫而走，传遍京城。以后，不仅一般老百姓爱吃天福号的酱肘子，而且有不少政府官员也成了天福号的常客。天福号的老主顾、清后期状元陆润庠为该店书写“四远驰名”的横匾，户部尚书翁同龢为该店书写“天福号”门匾。可惜，这些珍贵的手迹现俱已毁掉。

在过去，天福号虽然名传全城，生意很兴旺，但是，店小人少，日生产有限，获利甚微。又由于掌柜只知道有钱到老家买地，不搞扩大再生产。所以，天福号只是惨淡经营，没什么发展。经营至1969年买卖关张了。1979年才又重新恢复营业。

二、烤肉宛

烤肉宛位于宣武门内大街路东，是以烤牛肉而闻名京城的老店，它与什刹海的烤肉季，并称为“南宛北季”。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古都，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建立的辽、金、元朝都曾在北京建立都城，这几个少数民族饮食习惯，喜吃牛、羊肉。而且习惯用烧烤方法餐食。因为他们较长时间居住在北京，与汉族人民互相影响，烤牛羊肉就是他们饮食习惯对北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效仿他们也用木炭烤牛羊肉吃。不过，经过多年的方法改进，现在的烤牛羊肉，已不是当年古老的方法了。

烤肉宛的祖辈是直隶省大厂回民聚居区的回民。这个地区的回民多少年来，养成了勤奋、能吃苦、爱劳动的生活性格。他们有的人除去在土地上勤于耕种外，在农闲时就做牛、羊的生意。因为直隶大厂距北京较近，过了通州不远就是大厂。所以，当年每至秋后，地里活忙完了，他们有的到通州做买卖，有的就来到北京做生意。宛姓来北京西单一带卖烤牛肉约在清康熙年间，推着一辆木交的独轮车，上面放着个烤肉炙子，沿街边走边卖。晚上在小店中食宿。在北京干一冬天，至农历年底就推车回家了，来年秋后又来了。年复一年，西单至宣武门内大街一带店铺和居民都认识推小车卖烤肉的宛姓回民，所以，都叫它“烤肉宛”。

“烤肉宛”年年来，而且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老了又传给他的儿子，不间断地传。大约清同治年间，“烤肉宛”才放下小推车，从行商改为“坐商”，在宣武门内大街找了间铺面房当了掌柜，招幌上就写“烤肉宛”三字。从此每年立秋节气起，就在店门前搭起个“天棚”，在“天棚”下摆放四五张油桌，每张油桌上放个烤肉的炙子，桌旁放两条二人凳。这是在天热时请顾客在“天棚”下吃烤肉。俟天气凉时再到店堂里边吃。

“烤肉宛”生意兴隆，四远驰名，是由于他家选肉精，肉片切

得薄，佐料全，味道鲜美。"烤肉宛"有专人到德胜门外马甸牛羊市上，选购北口外的肥牛。"烤肉宛"切肉片是家传的手艺。要求切出的肉都要在三寸长，一寸宽，薄如纸。这样，肉上炙子就熟，顾客吃到口中好嚼好下咽。吃烤肉离不开大葱，将大葱切成半寸长的斜段，供顾客烤肉时用。并每位顾客面前放个蓝边瓷碗，内放高酱油、香油、料酒、白糖、葱末、姜末、蒜泥、盐等佐料。当年，"烤肉宛"这种准备是让顾客自烤自吃，每个顾客都拿双长一尺多长的木筷子，一只脚蹬在二人凳上，一只脚着地，边烤边吃，边喝酒或边吃芝麻烧饼。

40年代，"烤肉宛"店内悬挂着的大镜框，里边宣纸上有老画家齐白石所书"清真烤肉宛"五字。从而说明，当时"烤肉宛"已是很有名的烤肉馆了。解放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已是北京"烤肉宛饭庄"了，并开了几处分店。

三、天源酱园

天源酱园位于西长安街路南，是开业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有名的"京酱园。"所谓京酱园，是说该酱园过去在北京的派别。当年除像天源北京派的酱园外，还有河北保定的"老酱园"和以江浙为主的"南酱园"。

天源酱园酱制的菜，口味咸中带甜，很适合北京人的口味。虽然没有南酱园酱菜那样甜，但当年南方人在北京做"京官"或经商者，吃天源的酱菜还算可以。所以，天源酱园的顾客比较广泛，买卖好作。而且，天源酱园又特别重视酱菜的质量，深得各界人士的赞许，开业后，不久店名鹊起，买卖越作越兴旺，成为与六必居齐名的大酱园了。

天源酱园保证酱菜高质量的办法，一是原料要好，多花钱也要进好料不用次料。像酱园做黄酱离不开大黄豆，当年以通州南边的马驹桥和北京南边的庞各庄产的大黄豆粒大、含油量多，但价钱高也要用马驹桥和庞各庄的大黄豆，又如天源酱园做甜面酱

离不开白面馒头，蒸馒头要用白面。他们自己从河南进粒大饱满的小麦，自己加工细磨细筛，以保证甜面酱的质量。二是酱制上讲究，一丝不苟。天源做黄酱选大豆50斤，用水洗净后，再放入大缸里用水泡胀，而后上屉蒸熟，加25斤白面，用碾子碾碎，放在席箔上用脚踩平。将其切为方块，放在架子上使其发酵长毛。这就是黄酱坯子，将坯子投入大缸里，随即注入缸内青水100斤，盐25斤。等酱坯泡软泡碎，过筛筛，将杂质筛出。以后派专人用酱耙翻倒，每天必须早、中、晚翻倒。从春末到立秋后，黄酱才算制成，这种酱叫“伏酱”，因为是经过伏天了。这种黄酱放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坏。

天源酱园的酱菜所以咸中带甜，是该店用甜面酱为主要酱渍原料。因而，甜面酱做的好与坏直接影响他们酱菜的质量。所以做甜面酱极其认真。先将白面馒头发酵后，投入缸里捣碎，往缸中注水，俟浆糊状即可，也将其翻倒，每天也按早、中、晚用酱耙翻。过几天后，再往缸里注些水，以便保持缸里的酱坯始终是浆糊状。从春末，经夏天，至秋后，酱变深红色，味香甜，甜面酱就算做成了。这种甜面酱也是经久不变质，是天源酱制酱菜最上等的原料。

天源酱园的酱菜好吃，不仅老百姓人人皆知，当年清朝宫廷中其酱菜也小有名气。其酱制的“桂花糖熟芥”曾“供奉”清宫“御用”。清末状元陆润庠为其书写“天源酱园”匾额。在四根明柱上，写“天高地厚千年业，源远流长万载基，酱佐盐梅调鼎鼐，园临长安胜蓬莱。”四句之首字，联起来即是“天源酱园”。

解放后，老店焕发新的光彩，先后有桂花糖熟芥、甜酱黄瓜、甜酱甘露、蓑衣罗卜、糖蒜等五个产品被评为北京市级优质产品。生意更加兴隆。

四、桂香村南味食品店

桂香村南味食品店创办于民国五年(1916年)，总店在前门外

观音寺（今大栅栏西街），不久，又在西单北大街开办一家分店。

说桂香村南味食品店得先简单讲一讲糕点行的北案和南案。清代时，糕点行称“糖饼行”。因为北京是全国的都城，首善之地，全国各省的工商业者争着到北京做生意，江南的糖饼行的人也不例外，最晚在清代康熙年间（因为以前的资料尚未发现）江南的糖饼行就在北京扎根立业。据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月初九日立的《马神庙糖饼行行规碑》刻记：“十六年重修大殿一座，京南两案，合行共捐资钱二千三百二十一吊。”其中的“京南两案”，京案是以北京为主的北方糖饼行，南案就是江南至北京糖饼行。又如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立的《糖饼行万古流芳碑》刻记：其中有记载江南糖饼行在北京的历史一段文字“如我江南糖饼行，在京贸易已久，所有铺户柜案人等，向于康熙年间，即在沙窝门内道左之马神庙，捐助银两，并置坟地，为供奉香火之费。”记录这两个资料有什么用呢？因为近来有些工商史研究者认为现在的稻香村是江南食品店迁入北京较早的一家。如一篇文章写：“桂香村的前身叫稻香村，原址在前门外观音寺街，大约在前清末年，由一个名叫郭玉生的南京人创办，是迁入北京较早的一家南味食品店。”

当年在清代道光年间，在北京的南味食品店有佩兰斋、馨兰斋、乾泰号、同泰号、金兰斋等多家。

桂香村南味食品店是个合资的买卖，其中汪荣清和朱有清是两大股。后来两家因闹纠葛分伙。汪荣清分得观音寺的桂香村总店，朱有清分得西单北大街的桂香村分店。朱有清经营的西单北大街的桂香村南味食品店是前柜经售，后柜制做。朱有清是江苏常州人，十几岁时曾在苏州南味店学徒，他精通江南食品糕点的制造，又会经营，不久，买卖干得很兴旺，店铺扩大了，由原来的一间门面增至四间门面，职工由三四个人，增至十几个人。但是，没几年朱有清身得重病，各方投医治疗也是无效，终于在1936

年病逝。其子不善于经商，第二年又遇上“卢沟桥事变”，北京物价不断飞涨，桂香村的买卖越来越不好干。1941 年经中人说合，朱有清之子将桂香村整个典与雷绍瑜、张光蕴等人。桂香村改由周锡铭、雷绍瑜、张光蕴、马子顾等人经营，字号还用桂香村三字。而且店中职工愿意离去的可自由离去，没地方去的全部留在店中干事。

桂香村改换店主后，经营特色，江南风味没变。店中生产经营的商品有南味糕点，三角酥、杏仁酥、桃酥、枣泥麻饼、太师饼、鲜花藤罗饼、梅花蛋糕、蒸蛋糕、猪油夹沙蛋糕等，并应节生产、经营广式月饼和苏式月饼、各式元宵和各种南糖。生产经营的南味肉类品有酱鸡、扒鸡、糟鸭、熏鱼、肉松、糟肉、香肠、五香火腿等。此外，还经销江南各地特产，如金华火腿、南京板鸭、兴化桂圆等。

虽然西单北大街桂香村的生意依然与过去的作法一样，但是由于当时百业凋敝，人民生活贫困，购买力很低，所以，桂香村的买卖日渐衰败。虽然，买卖艰难不好做，但是，八年沦陷难走之路，西单北大街桂香村总算走过来了，而前门外观音寺桂香村在北京沦陷期倒闭了。

北平解放前夕时，桂香村的买卖已经无法维持。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有了生机。并于 1954 年，桂香村提前参加了公私合营。近年，桂香村营业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

五、明明眼镜公司

明明眼镜公司是杜泽臣于本世纪 20 年代，创办在西单北大街路东。是过去北京眼镜行业一大户，从 30 年代初，至 40 年代末，在社会上曾煊赫一时，电台上、报纸上都有“明明眼镜公司验光准确，各式眼镜物美价廉”的广告宣传，真是家喻户晓。

杜泽臣弟兄三人，他行三，大哥杜圭臣在东安市场内开设漱石眼镜行，二哥杜杰臣在前门外大栅栏开办精明眼镜行和西单北

大街，明明眼镜公司迤北，还开设了个光明眼镜行。当年，社会上称这弟兄三人为“三杜”。而以杜泽臣最能干，脑筋最新。

说杜泽臣能干、脑筋最新的话，得先介绍一下当时北京眼镜行业的情况和西单一带人文社会状况。三四十年代，北京四九城眼镜店没几家，不像现在遍地皆是。而且都是以卖晶石老式眼镜为主。人们把晶石以外的眼镜统称是“假货”。在北京经营科学镜片的，只有南方人开的精益眼镜公司一家，后又添了一家大明眼镜公司，也是南方人开设的。杜泽臣是北京人，他是北方人第一个经营科学眼镜片，所谓卖假货的带头人。当年西单的人文社会状况与鼓楼、东四、前门大街和大栅栏不一样。鼓楼、东四、前门大街和大栅栏等的顾客，守旧者居多，喜欢购买中国传统的商品；而西单一带不同，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多，顾客维新者居多。所以，杜泽臣在西单干眼镜行，一是以卖克罗克斯镜片、白托力克镜片、色托力克镜片为主。这些镜片有圆形的，有桃形的，有上框的还有不上框的，样子都是新式的。眼镜架更漂亮了，各种化学架、克罗米架、秀郎架、黄白K金架都有。另外到夏天他就准备青年人爱戴的黑色太阳镜。水晶石、茶晶石等传统老式眼镜，明明眼镜公司也有，不过是少数。二是在店堂内设“验光室”，这也是北京眼镜行业，北方人的第一个。验光配镜的作法极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每天等待验光的人很多，客满厅堂。三是明明眼镜公司很重视广告宣传自己，他每月拿出大量的经费在电台、报纸上做广告。当时，其他眼镜店都没这样做。所以，明明眼镜公司也沾了做广告的光，顾客多，买卖兴盛。

明明眼镜公司虽然称“公司”，可是在招待顾客方面，没有一点“公司”的作法，而是中国店铺热情招待顾客的作法，不管顾客衣着好还是一般；是买还是不买，都是主动热情，迎进送出。明明眼镜公司店堂里准备茶叶和纸烟是招待顾客而用。顾客等着验

光配镜，或等着修理眼镜，学徒都要请顾客饮茶，吸烟。明明眼镜公司这种作法，自然使顾客高兴，下次配眼镜买眼镜还到明明来，而且还要介绍亲朋来明明买眼镜。

由于明明眼镜公司的经理杜泽臣善于经营，买卖十分兴隆。就是在日本侵占北平时，各行各业都处于衰败的态势，而明明眼镜公司营业依然不衰。

1979 年，明明眼镜公司恢复老字号后，店址迁至西四南大街营业。

六、西来顺羊肉馆

西来顺羊肉馆原址在西长安街路南，本世纪 20 年代末开业，资本 4000 银元，经理褚祥。30 年代，该羊肉馆曾以回民风味的烧、蒸、烤、涮的作法，引来众多爱吃牛、羊肉的顾客，名噪一时。

西来顺羊肉馆营业兴盛，一是该羊肉馆所处地理位置好，西单一带虽然商业繁盛，行人往来如梭，但缺少清真羊肉馆，西来顺羊肉馆的开业满足了一部份群众的消费要求。二是该羊肉馆经理兼厨房负责人是名厨褚祥。

褚祥擅长做全羊席，就是一只肥羊从羊头到羊尾，从羊肉到内脏心、肝、肺等都能做出口味鲜美的佳肴，摆成一桌席，称“全羊席”。褚祥还是烹调山东风味菜的高手。像香酥鸡、清蒸鸭、红烧鱼翅、扒海参等都是他的拿手菜。

1937 年，北平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米面、油、鱼、牛羊肉都被日伪所控制，而且物价飞涨，西来顺的生意不好作。可巧，40 年代初，支撑西来顺门市的褚祥又突然病故。不久，西来顺就宣告停业了。

1982 年西来顺老字号在阜成门内大街路南重新恢复营业，改称“西来顺清真饭庄”。

七、西单菜市场

西单菜市场约开办在民国初年，最早是在西单北大街路西，舍

饭寺东口外空地处用木板临时围个圈，里面两侧是一家一户用棚帐隔开的摊店，中间是摊位相连的货摊。他们卖的除萝卜、扁豆、白菜、韭菜、茴香等蔬菜外，还有鱼、肉、海味、豆制品等货物。

后来，逐步发展完善，从露天，到建铁罩，完全封闭起来是40年代中期才完成的。菜市场里的摊店和货摊，有的也逐渐地从小本经营，发展成有名店铺。他们大多数摊店和货摊既接待零散客人零售，也对大饭庄和一般饭馆做大量批发的生意。像当时的大饭庄，什刹海的会贤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护国寺的同丰堂，锦什坊街的富庆堂等以及西单一带被称为"八大春"的同春园、贵阳春、新陆春、东亚春、庆林春、春明园、鸿春楼、安乐春等饭馆也都与西单菜市场交买卖。

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今西单菜市场与崇文门、东单、菜市口等并称北京城区"四大菜市场"。

八、六合棚铺

六合棚铺位于西长安街大六部口处，掌柜的叫陈毓山。该棚铺是北京清末民初的大棚铺。

棚铺与杠房一样是赁货铺，棚铺的大小也和杠房一样，就看它的杉篙和席箔的多少，因为这两样东西是搭棚所缺少不了的材料。另外还有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好棚匠。棚匠就是搭棚工，过去的搭棚工是很了不起的，一要有力量，还要腿脚灵便能爬高。据《天咫偶闻》记载："京师有三种手艺为外方所无，搭棚匠也，裱褙匠也，扎彩匠也。……，搭棚之工，虽高至十丈，无不平地立起。而且中间绝无一柱，令人者祗见洞然一宇，无只木寸椽之见，而尤奇于大工之脚手架。"书中举了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修北京鼓楼的例子，棚匠搭的脚手架自地至楼脊，高三十丈，宽十余丈。层层皮木，凡数十层，每层百根杉篙。另外在"庚子事变"后，外逃西安的慈禧和光绪准备回来，但是，在庚子事变中，被八国联军烧坏的前门城楼和箭楼，一时又修复不

了。不得已，先找六合等棚铺搭席棚，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

六合棚铺的买卖，一是为办喜事的人家搭喜棚，为办丧事的人家搭丧棚。旧时，北京居民办喜事、办丧事，如果在饭庄、大寺院中办就省事了；在家中办就需搭喜棚、丧棚。虽然喜棚和丧棚都是用一样的杉篙和席箔搭起，而其装饰品不一样。喜棚结的红、粉色的彩子，丧棚用白色彩子。这是喜棚和丧棚之分，另外有大棚、小棚之分。富户有钱人家无论娶媳妇还是聘姑娘，或是死人送葬，所搭的喜棚、丧棚，都要搭高大讲究的大棚。这些大棚不仅高大，而且有的还仿照房屋起脊，四边装玻璃窗。喜棚玻璃窗上都有“红禧”字或“红福”字（办寿日）。丧棚的玻璃窗上，有“白花”的图案。一般人家搭的喜棚或丧棚都是搭与自家院中房屋高矮一样的小棚。既不起脊也不装玻璃窗。

老北京每年入夏，时兴搭凉棚。像有钱人家的庭院，店铺的门前，私塾学房等都搭凉棚。有钱大户住的四合院，搭的凉棚不仅高大，四边都有苇席遮阳，而且棚顶和四边遮阳都是活的。中午太阳光强时，将苇席用绳子拉严，俟太阳西下后，再用绳子将苇席拉起，以便院中通风。店铺门前搭凉棚一般都是窄长的，遮挡强烈阳光，使店堂内和门前凉爽，引来行人乘凉，可以多做生意。私塾学房夏天搭凉棚是多年来的定制。私塾学房的老师利用搭凉棚的事向学生收“搭凉棚钱”，从中获利，这是每年私塾学房老师一笔可观的收入。

所以，六合棚铺从每年的立夏节气开始，直忙到芒种节气，到处去搭凉棚。

六合棚铺大棚、小棚都应。而且还出赁“家伙座”。什么叫“家伙座”呢？老北京人，将厨房造厨用的锅、杓、刀、瓢、盆和客人吃饭用的碗、筷等一切用具，俗称“家伙”。桌子、板凳叫“座”。平日居家过日子，谁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办事，就去租赁。

过去北京有“家伙铺”就是专门出赁家伙桌凳的铺。六合棚铺既是棚铺也是家伙座铺，代赁家伙桌凳。这对顾客用家具就省事了，租了棚，同时一起租了家伙桌凳了。

六合棚铺虽是北京有名的大棚铺，但是平日职工并不多。用一个写账的先生，一个棚匠头，一个家伙座头，另外有几个棚匠长期工。这几个长期棚匠，做一些零活，像夏天给店铺和住家搭的遮太阳的凉棚，他们就自己干了。遇有好日子，办喜事的多，应的喜棚多，忙不过来，棚匠头就临时找人。

六合棚铺曾红火一时，但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生意就不景气了。维持到1945年，就宣告歇业了。

九、日升杠房与孙中山灵榇奉安

日升杠房坐落在西长安街西段路南，就是原长安大戏院处。东家（业主）郇兰斋是山西人，领东掌柜王宝之，二掌柜孟传受。日升杠房是北京有名的大杠房，大小杠、满汉执事、官罩等俱全。杠夫头、执事头、响器头都是有经验的人。所以，日升杠房抬的大小杠从未出过事故，在社会上名声不错。就因为日升杠房声誉好，1929年，“总理奉安”就是孙中山先生灵榇南移，抬棺之大杠，才由日升杠房承应下来。杠大，执事别致，人数多，规模大。据《孙中山与北京》引《总理奉移纪念册》上记载：日升杠房与迎榇专员所订合同是：

“（一）灵榇由碧云寺起行，用三十二名挟杠，上加蓝缎绣花小棺罩，全份。另加保重夫三十二名，抬至山下宽大地方为止。所用挟工、抬杆、坨木等项全部新制，用白粉油油饰三道，挟杠头尾画青天白日章。

（二）灵榇由宽大地方起行，改用六十四名大杠，全份。抬至前门汉平车站为止。

杠夫更换三班，每班杠夫六十四名，拨旗夫四名、拉幌夫四名、指挥夫四名，每班共七十六名。三班共计二百二十八名。

另外，响尺大头目二名，照料夫四名，划拨夫三名。

（三）挟杠应用大绳，一律用蓝布包做。

（四）大杠、枕木、千斤、抬杆等项，全用白粉油油饰三道，大杠头尾画青天白日章。

（五）大杠应用大绳全用蓝布包做。

（六）运料大车十辆，专为运送西山大小杠及影亭等项之用。

（七）所有杠夫及头目、指挥夫、照料夫、拨旗夫、拉幌夫、划拨夫共二百三十七名，应制做蓝布夹衣，用白布里，共二百三十七件。钮扣用蓝布做，一律用白布硬领。蓝布单裤共二百三十七条，裤腰一律用蓝布。青布靴二百三十七双，硬胎。折合蓝布棉帽二百三十七顶，每顶正面嵌青天白日章一枚，钉铜扣。织白线腰片带二百三十七条，带宽二寸五分，扣宽二寸五分。

（八）大罩顶长一丈一尺六寸，宽七尺二寸，前后坡高六尺左右，坡高四尺，前后走水长七尺二寸，左右走水长一丈一尺六寸，前后左右走水高二尺四寸，前后罩围长六尺二寸，左右罩围长一丈零五寸，前后左右罩围高六尺二寸，罩顶围及走水全体用加重蓝缎制做，用白布做里，全体周围花边用白丝线绣成工字不断花样，罩顶用白线织成线网，罩围以白丝线绣成青天白日章。罩围前后以蓝缎做成洋式分帘，并用白丝线绣成工字不断边。罩顶上用金漆火焰，罩顶四角用金漆吞扣，罩顶四角用白丝线缯穗，白绸拉幌，蓝缎罩之下，一律照图做成。另用蓝布做罩衬一全份，以壮观瞻。

（九）新制三蓝彩影亭一座，用抬夫十六名，头目二名，照料夫二名。

（十）提炉夫二十名，头目二名，新制铜链、铜炉、木柄二十份。

（十一）国旗一面，党旗一面，以蓝绸红绸白绸分别制成，其式样尺寸，分别另定之。执旗夫四名替换。

（十二）小罩顶长九尺三寸，宽五尺六寸，前后坡高四尺七寸，左右坡高三尺四寸，前后走水长五尺六寸，左右走水长九尺三寸，前后左右走水高一尺二寸，前后罩围长五尺，左右罩围长八尺五寸，前后左右罩围高五尺二寸，罩顶罩围及走水全体用加重蓝缎制成，用白布里，全体周围花边用白丝线绣成工字不断花样，罩顶用白丝线织成线网，罩围以白丝线绣成青天白日章。罩围前后以蓝缎做成洋式分帘，并用白丝线绣成工字不断边。罩顶用金漆火焰，罩顶四角用金漆吞扣，罩顶四角用白丝线see穗，白绸拉幌，蓝缎罩之下一律照图做成，另用蓝布做罩衬一全份，以壮观瞻。

（十三）彩亭、国旗、党旗、提炉共用夫役四十六名，所用衣帽靴带共四十六份，其式样与杠夫同。

（十四）铜棺外做蓝缎棉套，里用中国白板绫缝斜纹，前后左右以白绒做青天白日章各一座，四角按扣各五枚。

（十五）由石塔内用二十四名杠夫舁至前大殿安位。

（十六）影亭于起灵前五天安设于庙内。

（十七）前二日先期试验办法，另行规定。

（十八）另派头目二名，杠夫二十名，携带小杠服装等件，由前门西站随车护送至浦口往返以七天回北平为止。浦口回平车票，先由办事处发给。

（十九）大小罩、杠绳、衣帽、靴带、影亭、提炉、国旗、党旗等项，到汉平车站后，一概运回本柜。”前后全部杠价费是一万元。

原定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5日，移灵，后改定为5月26日。原定由前门西站走平汉路，后改由前门东站走北宁路。

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26日《迎榇日记》上记：是日，零时一点由西山碧云寺起灵，灵榇上加盖小棺罩，国旗覆罩上。行起灵礼节后，奏哀乐，鸣礼炮。先由杠夫二十四人杠，出碧云寺大门后，改用三十二人杠，至万寿山改用六十四人大杠。到了西

直门已九点五十五分，各界送殡代表及军警马、步各队，按次序排定。走至西直门内大街上，天空有三架飞机旋绕。灵梓经过地方，路两旁观众虽拥挤，但秩序不乱。民众均脱帽，俯首肃立。

过新街口、西四牌楼、西单、西长安街、天安门、中华门，出正阳门至前门东车站。上火车至浦口轮渡，杠夫和其他执事人等就回归。而事先日升杠房派有四十二名杠夫在南京等候，俟总理灵梓在中山陵安葬后，这四十二名杠夫才能回归北平。

日升杠房抬过孙先生的灵梓奉安后，其店铺声誉倍增。但，没过几年，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突然停业关张了。长安大戏院就是在日升杠房的旧址上建起的。

十、西单商场

西单商场是晚于东安市场，1932 年才在西单北大街路东，今槐里胡同西口外南侧建起第一座“厚德商场”。此后，又相继建成“福寿”、“慧德”、“玉德”、“福德”等几个商场，从今槐里胡同直建到堂子胡同口。这几个商场内部是相连通的，对外统称“西单商场”。经营的商品有中西纸张、新旧图书、各种食品、洋广百货等。此外，在商场空地上，还有个相声、曲艺场子。据已故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所写的《我的青少年时代》中回忆：“这时我十六岁了，那时西单商场盖得了，鼓楼市场唱戏的人又把我带到西单商场去唱戏，班主是马少箴。在西单商场唱戏，都是彩唱，那行头也简单，像唱《四郎探母》，公主没有花盆底鞋，穿平底鞋上场。戏袍是布做的，当蟒袍穿或当别的什么穿都行。”“我在的场子正好挨着说相声的高德明先生的场子，后来成为我老师的朱阔泉先生也在那儿说相声。我没事就去听，听完就琢磨，特别是说单口相声，我更受朱阔泉先生和汤金澄先生的影响。偶尔相声场子演出人少，我就帮着他们说”。侯宝林先生在鼓楼市场是第一次正式说相声，在西单商场认识了老师。这是侯宝林先生从事相声表演艺术的两个重要阶段。

西单商场建成开业后也就是三四年，1936 年冬季，着了一把大火，几乎全场都烧光了。各摊商为了维持生活就临时圈个露天场子设摊卖货。最终于 1940 年，新的“福德、玉德、慧德、厚德、福寿”等“西单商场”建成，重新开业。这次修复重新开业后，除原来的店铺外，又新添了不少以经营江南风味的中餐馆和欧美式的西餐馆、咖啡馆。享名一时的启明茶社也在西单商场开业。当时在启明茶社演出的是常连安和他的儿子二蘑菇、三蘑菇说相声，荣剑尘的单弦，马增芬的西河大鼓等。天天暴满，生意十分兴隆。

1958 年改为国营企业，1976 年在地震时被毁。1978 年改建成上下五层的营业大楼，现在是北京著名的综合大型商场之一。

十一、哈尔飞戏院

可能 50 岁以下的人，对哈尔飞戏院不用说见，恐怕连听说过都没有。因为它开业于民国十九年（1930 年），到 1938 年改名瑞园茶社了。它的历史只是昙花一现。所以，知者甚少。

哈尔飞戏院坐落在西单西侧的旧刑部街东口内路北。它的原址是奉天会馆，由一个叫郝锦川的人创办。当时郝锦川正经营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营业情况很好。他想，西单正少个戏院，如果在西单开个戏院，这一带住的爱看京剧的人就省得跑远道到前门外，或去东城吉祥戏院看戏了。所以，他创办这个哈尔飞戏院，“哈尔飞”是英文“快乐”之意。整个戏院上下两层，有观众席约 600 余。

订于 1930 年 9 月 14 日开幕。开幕那天，盛况空前，各界人士参加的很多，就连京剧大师梅兰芳博士都来参加，并且在当日晚场，参加演出《贵妃醉酒》。

哈尔飞戏院开业后，正如郝锦川分析的那样，很受内城，特别是家住西城戏迷的欢迎。在此应说明一点，在 50 年代以前，北京人绝大多数，不论男女老幼都喜爱京剧。到哈尔飞戏院来演出的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好角，像国剧宗师、武生泰斗杨小楼，四大

名旦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名老生马连良、谭富英、王凤卿、高庆奎、奚啸伯，名净郝寿臣、侯喜瑞，名丑马富禄、朱斌仙等都经常应邀在哈尔飞戏院演出，真可谓好戏连台，名角荟萃，火爆一时。

但是，好景不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天，距哈尔飞戏院不远处，西长安街西头路南的长安大戏院开业，不久，在长安大戏院东边又开了一个新新大戏院，这两座戏院，论设备，论规模都比哈尔飞戏院强得多。所以，京剧好角就不愿意到哈尔飞戏院来了，都被长安和新新两家戏院邀去。哈尔飞戏院上座大受影响。他们确有自知之明，于是他们改为瑞园茶社改演曲艺杂耍了。鼓界大王刘宝全，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白凤鸣、联幼茹，乐亭大鼓王佩臣，单弦曹宝禄，相声演员高德明、绪德贵、常连安、二蘑菇、汤金澄，河南陞子姚俊英以及古曲戏法、抖空竹、耍坛子、钻火圈、踢键子、练武术等演员都相继在瑞园茶社演出。改演曲艺杂耍后，开始情况还算良好，后来也不上座了，至1940年就停办了。不久，又改建为大光明电影院，专演一些欧美等外国进口影片，也是开始较好，后来上座率不佳。中间曾一度歇业，不久又重新开业。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定名为“西单剧场。”由于北京市人民政府拆除旧刑部街的南边之房，和报子街北边之房，拓宽马路。西单剧场就完全显露在大街上了，这对西单剧场及其附近店铺的营业极其有利。西单剧场定名后，既演戏又放映电影。从1960年起，北京曲剧团长期在此演出曲剧。1994年，因西单剧场所处地段为改建范围之内，所以拆除了。从1930年，哈尔飞戏院创办，到1994年，西单剧场停业拆除，共走了有辉煌也有惨淡64年之路。

十二、长安大戏院

新的长安大戏院已于1996年在建国门内大街落成开幕了。长安大戏院的原址在西长安街西端路南，它是京剧名票杨氏于民国

二十六年（1937 年）建成，整个戏院上下两层，长圆形舞台，楼下是池座，楼上前排是四五座的包厢，后边是散座，共有 1200 余个观众座席，是当时最现代化的一座大戏院。

同年，2 月 1 日，正式开幕演出。在该戏院开幕式上首演的是，名净金少山的《父子会》，胡菊琴的《玉堂春》，奚啸伯的《失街亭》等剧目。因为金少山久在上海演出，北京的戏迷久慕其名。金少山人高马大，声若铜钟，所以，整场演出，掌声不断，极为成功。

过去，京剧演员演大义务戏，或合作戏都在前门外的第一舞台或者在华乐戏院。1937 年第一舞台失火被焚毁，未重建。长安大戏院建成后，大多数的大型义务戏和合作戏都改在了长安大戏院了。如“国剧艺术振兴会”组织的合作戏，谭富英、金少山合演双出戏，第一出是《黄金台》，谭富英饰田单，金少山饰伊立。第二出是《黄鹤楼》，金少山饰张飞，谭富英饰刘备，姜妙香饰周瑜，杨盛春饰赵云。这场合作戏，座无虚席，观众反映强烈。另一场戏安排是，李多奎开场演《钓金龟》，第二是萧长华、叶盛兰的《连升店》，第三是孙毓堃、侯喜瑞的头二本《连环套》，压轴是尚小云、奚啸伯的《御碑亭》，大轴是金少山、谭富英、张君秋的《二进宫》。

长安大戏院除此两场大戏外，还上演过众多名角演的武生大会、老生大会、丑角大会等。

十三、新新大戏院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2 月 1 日，长安大戏院开业后，仅月余，3 月 7 日，在咫尺之远的新新大戏院就开幕了。创办人是京剧界的名人马连良和万子和等人。

由于新新大戏院的创办人是京剧界的名家马连良和万子和，又由于新新大戏院设备比长安大戏院略高一筹，自然能邀来名角在此上演佳剧。“国剧艺术振兴会”组织的“花脸大会”在新新大

戏院演出，开场戏是王泉奎的《大回朝》，第二出是刘连荣的《下河东》，第三出是侯喜瑞的《丁甲山》，压轴戏是郝寿臣的《审李七》，大轴戏是金少山的《御果园》。

但是，到了1940年，日本华北电影公司插进足来，硬将新新大戏院买去，遂改名新新电影院改映电影。1945年，抗日胜利后，该新新电影院为敌产，被接收，改名为国民大戏院。解放后，1950年又改名为首都电影院至今。

哈尔飞戏院、长安大戏院和新新大戏院在西单地区相继建立演出，既丰富了这一带居民的文化生活，又极大地促进这一带地区的商业经济的发展。

第七章　西四地区

第一节　西四牌楼

西四牌楼与东四牌楼都是明代同时建立的，一东一西遥遥相望，其整体布局和建筑形式相同。南北牌楼上也书“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也称“西大市街”。东面牌楼上书“行仁”，西面牌楼上书“履义”。这四座牌楼在1954年展宽马路时拆除。

一、当街庙

西大市街北与新街口相连，但是，在民国以前，距北面牌楼不远，就是现在西四五条口，有个奇特地名叫“当街庙”。在清末民初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书中记：“西四牌楼北，当年在甬路中间有一庙宇，座南面向北，名当街庙。其址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庙供额森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故北面。”这段文字很简短，可能有些读者看不明白，笔者做个解释，在明代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方的少数民族瓦剌部也先（额森）率军士侵犯北京，明皇帝英宗亲率大军迎战，在土木堡惨败，英宗当了俘虏。也先利用明朝无主，北京城防空虚，想利用这个被俘的皇帝英宗为政治资本，要挟明廷。但是，以大臣于谦为主的抵抗派，反对投降。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监国，总管国事。在北京城下，于谦率领全城军民打败了也先，北京城得到保护。也先战败后，他看到这个英宗已成了无用之物，留着不如将他放了好，放回去可以使英宗和他弟弟景帝（朱祁

钰）争夺皇位，造成明朝内部混乱。所以，才将他放回。明景泰八年（1457 年），明英宗就发动了政变，废了景帝，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

在大街当中立个庙，“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旁绕行，修马路时始拆却。”修马路时，是在民国二三年的事。但是，在民国六年（1917 年），出版的《北京市地图》上，该地还记有“当街庙”的地名。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在《京师坊巷志稿》上记：该当街庙是“观音庵”。也就是在这座小观音庵中供有额森的牌位。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最新北平全市详图》上，当街庙地名没有了，此段统称“西四牌楼”。1965 年，改称“西四北大街”。

二、西大市街南段的沿革

西大市街在明代曾做过斩杀犯人的刑场，其位置就在西四牌楼南侧，当时人称之为“西市”。据明代人史玄写的《旧京遗事》一书上记载：“西市在西安门外四牌坊，凡刑人於市，有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及宛、大两县正官。处决后，大兴县领身投漏泽园，宛平县领首贮库，所谓会官处决也。”该书并述，凡遇处决重要人犯，自刑部街至西市，沿途都有兵士把守。到了清代，刑场才迁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处决犯人都在繁华的闹市，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所以有“刑囚于市”和“弃市”之说。由此，说明西四在明代就是繁华的商业街。

西市不远处就是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师父行秀的死后葬地之处。行秀（1166—1246 年）俗家姓蔡，是河南洛阳人。十五岁时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是金、元时期著名禅宗僧人。因他长期在万松轩中居住，所以世称之为“万松老人”。在行秀的墓地建有墓塔，称万松老人塔，该塔是砖料七级密檐式，玲珑奇特，别具风格。塔北侧的胡同就用此座砖塔而得名“砖塔胡同”。

在《帝京景物略》上也对万松老人塔有所记载："甘石桥北砖塔七级，高丈五尺，草蒙其顶，人倚塔造屋，为酒食店。"

在西四牌楼南，从明代至清光绪年间，始终称西大市街，到宣统时改称"丁字街"。因其东是西安门大街，往西没有街巷，形如"丁"字，故名。1965年，从西四十字路口往南，将丁字街、缸瓦市并入，改称西四南大街。

三、西马市大街

西四牌楼东边的这条街很短，往东约三百多米就是皇城根。这条短街在明末清初，北口和西口马贩子赶来的马匹聚在这条街上贩卖，而形成马市。因为东四牌楼也有马市，故人称为西马市大街。到了清道光年间，在这条西马市大街的街南街北，一些山东籍人开办了约有二十几家猪肉铺。这些猪肉铺都以整片生猪肉销售。他们经营的对象主要是全市各小猪肉杠和举办婚丧嫁娶，宴请宾客人家及饭庄饭馆等。北京在清末民初时，有两个著名肉市，一个是东四牌楼猪市，另一个就是西四马市大街的猪市。

另外，在民国初年，西马市大街曾创办过西安市场，二三十年代曾兴旺一时。西安市场的遗址就在西马市大街街北的一个叫"西安大院"处。北口在小糖房胡同。南北两口是南北狭长的小巷，中间是个宽阔的小广场（现盖上民房）。市场里有卖扒糕、豆汁、凉粉、灌肠、老豆腐、炸小丸子等小吃摊。有说相声、唱大鼓、变戏法的游艺场地。当时有名的架冬瓜、老倭瓜、焦德海和刘德智等艺人都曾在此卖过艺。相声大师侯宝林当年也曾在西安市场说过相声。侯宝林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中说：我跑遍了北京的街头市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我干过；西安市场（就是现在的胜利电影院那儿）一进南门路东有个茶馆叫欣蚨来，我干过。"除欣蚨来外，还有几个茶馆，有的请王杰魁、品正三、连阔如等评书艺人说评书，有的邀来名票友清唱京剧。这些票友，除武戏限于场地无法演唱外，其他一切唱工戏都可以上演。不仅清

唱小段折子戏，而且经常上演像《红鬃烈马》、《失、空、斩》等连本大戏。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西安市场才停办。

1965年，全市整顿地名时，西马市大街改称西四东大街。

四、西四牌楼迤西大街的沿革

西四牌楼西面这条大街，一直往西就是阜成门，所以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始终称阜成门大街。约在乾隆年间以后，从沟沿往东至西四牌楼称“羊市大街”，沟沿以西，还称“阜成门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一条阜成门大街分为两段，有两个街名。其原因就是，每天上午，羊贩子赶着羊在西四牌楼西面这条街上卖羊，全市的各羊肉床子到此买羊。年长日久，人们就将这段大街叫羊市大街。到了1965年，由于羊市早在民国年间已不存在，故将阜成门大街和羊市大街合并，改称阜成门内大街。

在羊市大街东段路北的广济寺是现在中国佛教会的会址，是现今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明代寺庙。据《京师坊巷志稿》上，阜成门大街条目处记载：“宏慈广济寺在庙（历代帝王庙）东，临大市街，旧为西刘村寺。”相传这座寺庙建于金元相交的年代，元末时被毁。后来有个名叫普慧的高僧与其弟子圆洪在宦官廖屏帮助下，得其资助，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建成。进山门是钟、鼓楼，第二进院是天王殿，第三进院是正殿，大雄殿，第四进院是圆通殿，最后院落是舍利阁。北京解放后，曾多次修缮。现今不仅殿宇整齐，而且寺内的舍利阁与其他殿房都藏有许多古今文物和大量佛教文献。

广济寺迤西就是北京著名的历代帝王庙所在地。

历代帝王庙规模巨大，气势宏伟。是现今我国尚存的惟一的一座祭祀历代帝王的庙宇。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清雍正、乾隆等年间多次维修与扩建。庙门外隔街有座巨大的歇山顶绿琉璃瓦的照壁。庙前原有座石拱桥和牌楼两座。景德崇圣殿是帝王庙主体建筑正殿，殿中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左侧为少

昊、颛顼、帝喾、帝尧、舜、汉高祖、光武；右侧为禹王、汤、武王、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开天辟地创业的十六代君王。两厢殿中还供有各代开国的名臣名将三十二人。

这座古建筑群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典章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1979 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节　商业街的形成和商业

一、商业街的形成

西四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买与卖的商业点，是在明代。而真正成为商业街，是明末清初，更确切地说，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因为，这个时期，北京的商业经济已十分繁荣，据《定例汇编》记载：乾隆三十年，“京城为辇毂重地，商贾云集”。西四在这个时候，马市、羊市、缸瓦市、猪市等都已出现、形成。因为当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猪、羊是城市人民生活必需品，交易量大。在当时，这些集市不是设在偏僻的郊外，而是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西四南通西单、宣武门，北可达新街口；东与皇城西安门为邻，西直通阜成门，交通四通八达。马、猪、羊等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热货，购买者众多，集市上贸易兴旺。元、明、清时期，北京城内的燃煤主要依靠西山门头沟一带煤矿的供应。明、清的阜成门大街，到西四牌楼是运煤骆驼必经之路。因此，促进了西四地区的商业街的形成。

二、西四地区的店铺

清末民国时，西四地区商业街店铺有：恒聚、永聚、永德聚、广聚和等炉房，丰源长、源兴成、仁永顺、永源等米面铺，西广丰油坊，万魁干果海味店，兴隆馆、新顺号、天德馆、万隆号、泰源楼、东顺局、广来号、东永利、马陈号、新泰号、东和泰、南

永泰、四泰号、西兴隆、聚兴号等猪店猪肉铺，同和居饭庄，砂锅居白肉馆，阜升斋、普安斋等靴鞋铺，义和、天吉等首饰楼，佩德永、德元斋、永记、永明斋等钟表店，韫古斋古玩铺，开泰号、隆泰号、广大欣、泰昌号等茶叶铺，祥聚泰烟铺，天一堂、老玉和堂、仁和堂、怀德堂等药铺，宝兴香厂，东隆和、义成号等颜料铺，长顺染坊，丽丰祥、裕昌厚等绸缎庄，隆盛昌南货庄，东升和鲜果局，成文厚账簿卡片店等主要店铺。

第三节　著名老字号

一、同和居饭庄

同和居饭庄坐落在西四南侧，即现在的西四南大街路西。开业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掌柜的姓牟，山东人。同和居开业后早期，只是个经营大众饭菜的小饭铺。据一位民国初年，曾在同和居帮过忙的老厨工袁祥福说：那个时候，同和居的饭客大多数是劳苦大众，有拉骆驼运煤的，有马贩子、羊贩子，最有钱的是猪店的掌柜。他们到同和居多数人都是吃炒饼、烩饼，稍好的饭客吃“小碗干炸”。这是同和居当时的比较有名饭食。同和居的小碗干炸就是北京家常的炸酱面。为什么同和居叫小碗干炸呢？因为普通炸酱面，不管几个人都吃那一大碗炸酱，“面码”（佐料）只有豆芽菜一两种。而同和居的小碗干炸是只炸一小碗干炸酱，够一两个人吃就行。他们炸这种酱，酱里不对水，用油澥，多放五花肉，多放油，酱不粘锅，放入小碗中，酱上浮着一层油。而且面码全，除豆芽菜外，还有白菜丝、胡罗卜丝、菠菜、摊黄菜、香椿、青蒜、黄瓜丝、芹菜等。再有钱的，像猪店掌柜的、贩马的大客人，还吃同和居的干炸丸子、溜丸子、米粉肉、炒肉片、焦溜肉片等炒菜。同和居经营这种普通饭菜的生意，直干到民国初年。

进入民国年间后，同和居的买卖由牟掌柜后人牟文卿接手经营。这位牟文卿掌柜，头脑新，又善于交际，朋友多。在这众多朋友中，袁祥福原在清宫御膳房当差。因 1912 年，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宫内大量减人，这位袁师傅就从御膳房解职回家了。袁师傅是阜成门外人，在家没事干，就进城卖菜。经常到同和居吃饭，与牟文卿掌柜交了朋友。牟掌柜了解到这个卖菜人原是御膳房的掌杓的后，就恳切请他来同和居帮忙（不敢说是雇佣）。由于牟掌柜以礼对待这位袁师傅，袁师傅倍受感动，就将在御膳房所学都施展出来。其中“三不沾”这一道菜名噪全城。“三不粘”是以鸡蛋黄为主料，佐以绿豆粉和白糖，炒成后放入白瓷盘中，色泽金黄，分外好看。吃入口中，香甜、咸淡适中，鲜美爽口。由于它不沾盘、筷和口，故名“三不沾”。

1956 年，同和居参加公私合营后，改为国营企业，营业又有发展。目前，同和居已扩充为饭庄。其经营的除宫廷菜、山东菜外，还经营南方的海鲜菜。

二、砂锅居白肉馆

砂锅居白肉馆坐落在缸瓦市（今西四南大街）路东，开业于清乾隆初年，原名“和顺居”，由于该店煮肉使用的是个特制的大砂锅，故此，人们都叫它为“砂锅居”，原名和顺居却鲜为人知了。

清代，祭神、祭祖时，用“全猪”做祭品。其祭品做法是，选公猪，捆住，拿一把约七八寸长的牛耳尖刀，在猪的脖子处捅进，直接扎猪的心脏。俟猪血流尽完全死亡后，在猪的一只后腿处，用小刀割一小口直通其腹部，人用口对着破口处吹气，直到猪全身鼓起，再将破口处捆牢。而后把猪放入热水锅中，将周身的毛褪净，这样“全猪”祭品就做成了。祭祀时，把猪放在供桌上，前腿跪姿，头支起，后腿取卧态。祭祀完后，撤下来的“全猪”经切割后，用白水煮熟赏给人们食之。此种肉为“祭神肉”，人们把吃到“祭神肉”视为吉利。所以人们都喜欢之。

据说，砂锅居的白片肉就是来自清代的“祭神肉”。当年，砂锅居的创业者，用个直径有三尺长短的大砂锅煮“祭神肉”。因为用砂锅煮肉，可保持肉的原味。而且，普通百姓哪里能够吃上清宫“祭神肉”呢？可以吃上这种肉，是一生的吉利。所以，砂锅居白煮肉，天天做多少，就卖多少。但是，当时砂锅居人手很少，只是掌柜带个十五六岁的小徒弟干活、卖白煮肉，每天只能杀一口猪，夜里煮，早晨开门就卖，不到正午就卖完了。就摘下招幌，因之，过去北京人将不按时赴约，另一方就“砂锅居的幌子，过时不候”的，成为北京常说的俏皮话。

砂锅居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制做不断地改进，食品不断地丰富。到清末民初时，就形成了砂锅居独具特色的“烧、燎、白煮”的烹调方法。他们将一口猪从头到尾，从皮到内脏全分解开，用“烧、燎、白煮”的不同方法做出的“全猪席”，色、形、味俱佳，特受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誉。现在砂锅居门市经常卖的凤眼肝、芝麻丸子、炸肥肠和糊肘等，就是当年“全猪席”的名菜。

砂锅居是以白煮肉享名于世的。提起他家的白煮肉，真是名不虚传。首先说选肉，全是精瘦肉不行，全肥肉也不行，要选新鲜的五花肉才行。洗净，切两三斤的块，入砂锅用清水，先大火煮，开锅后改用小火煮约两个小时。取出切成薄片，佐以高酱油、蒜泥、腌韭菜花，喜欢吃辣的可放点辣椒油。另外一种吃法，是氽白肉。是冬天应时令的食品，佐以细粉丝，冻豆腐、虾仁、蘑菇等，是将白肉片和佐料下在热水锅中氽。白肉、白肠、白肚下热水氽是砂锅居的一道名菜，叫“砂锅三白”。

经过“十年动乱”保存多年的大砂锅圈镶铁锅底的工具，已经被毁，但，砂锅居里各式砂锅到处可见。现在已发展成砂锅居饭庄。

三、成文厚账簿卡片店

成文厚是专营账簿卡片的店铺，位于缸瓦市（今西四南大

街）路东。是刘国梁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创办的。

成文厚是个历史悠久的老店铺，最早的成文厚是山东省刘姓商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在济南开设的。当时天津有一家成文信的买卖与他们经营的商品一样，为与之区别，取“成文厚”为店名。早期的成文厚主要印制《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大学》、《中庸》等学生课本，以及《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下南唐》、《呼延庆打擂》等通俗小说，并经销毛笔、墨、砚、镇尺等文具用品。成文厚是自产自销，成本低，售价便宜。而且《三字经》、《百家姓》等学生课本，每年春季，私塾开学时，用量很大。另外，《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通俗读物，每年也销量很大。因而，成文厚的买卖做的火爆，营业发展很快。为了扩充营业，逐步地在山东半岛的烟台、奉天省（今辽宁省）的营口等设立代销点。

民国二十年（1931 年）左右，成文厚买卖发展到鼎盛时期，先后在吉林、哈尔滨等地开设分店。4 年后，吉林成文厚经理刘显卿打算向北京发展，于是派其子刘国梁到北京开办成文厚分店。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刘国梁用 500 银元在西单北大街路西开办了北京“成文厚”。主要商品也是学生课本、通俗读物等。货物都是由吉林成文厚供应。他们原想北京是中国华北的大城市，生意一定好作，万没想到成文厚开张后，生意很不景气。其原因是北京的新式学校，在当时已经普遍兴起，特别是西单一带是北京新式学校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些新式学校的学生以读新课本为主。另外，北京原就有许多家店铺与原成文厚经营的是同类商品。

成文厚在北京连年亏损，使得经理刘国梁不得不深思。如此下去就得倒闭歇业，不倒闭就得转产经营其他商品。正在刘国梁犹豫不决，想不出办法时，约 40 年代，他看到一本《改良中式簿记》的书，详细介绍了中式账簿不完备，随着社会发展，必须改用新式账簿的趋势。这对刘国梁是个极大的启发，从中看到成文

厚的发展方向。刘国梁便约请《改良中式簿记》的作者、会计师贾德泉帮助设计30余种新式账簿和表册，并署有设计者姓名和“翻印必究”的字样。1942年，新式账簿和表册投放市场后，很快销售一空。由此，成文厚转产转营成功，并成为北京市第一家新式账簿的专营商店。

当年，南方经营账簿以上海的“老立新”最负盛名，北方就数成文厚最有名了。

现在的成文厚除经营会计用品的各式账簿表册外，还经营图书卡片和各种办公用品。

第四节　白塔寺庙市

阜成门内，西四牌楼西边的白塔寺是北京著名的寺庙，它与东四的隆福寺，新街口南边的护国寺，宣武门外的土地庙，合称为北京的四大庙市。

白塔寺本名妙应寺，因为寺内有座我国建筑时间最早，最雄伟高大的佛教喇嘛白塔，所以，老北京都叫它白塔寺。

早在辽代时，这一带是辽南京城的北郊外，辽寿昌二年（1096年），此处就建有一座佛舍利塔，后毁于战火。到了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请尼泊尔的工匠阿尼哥主持设计建造了这座白塔。八年后，增建了寺庙，赐名“大圣寿万安寺。”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对该寺重修改名为“妙应寺”。至清代，又多次修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妙应寺遭到侵略军的破坏，后又进行修整。北平解放后，由于白塔寺山门残破不堪，某部门就将山门拆除改建成一座副食店。1997年，西城区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恢复白塔寺的原貌，投巨资拆除了副食店重修山门，以便迎接各界游人参观。

据《最新北平市指南》一书所记：白塔寺“每月之五、六两

日为开放庙会期，游人甚多，相传白塔寺底乃一海眼，苟无塔以镇之，海水上泛，都中人恐均成池中鱼矣，又谓塔身有铁箍三道，为鲁班所钉，言之虽属凿凿，殊难凭信也”。书中提到的用白塔镇海眼和鲁班爷将白塔打三道铁箍，都是老北京的民间传说。而每月逢五、六日开庙确是如此。

白塔寺的庙史有约九百年，但是长期以来白塔寺都是历朝封建王国皇族和官吏进行佛教活动的场所，直至民国初年才正式对市民开放定为庙市。自从白塔寺正式对市民开放定为庙市后，每逢开庙之日，各处的小商小贩有的担担有的推车来此设摊卖货，全城的男女老少也从四面八方到此买物游逛。

庙前东西街旁摆满了碗筷、笼屉、笤帚、锅盆、毛撢、鞋帽等货摊以及售糖葫芦、大串山里红、扒糕、切糕、驴打滚、灌肠、豆汁、茶汤、油茶等小食品摊。

山门里，钟鼓院多是卖布头的和日用杂品等货摊，这些摊都支着白布棚，商贩们不停地高声叫卖。

过钟鼓楼院是天王殿院，在这个院里靠东边是连为一片的儿童玩具货摊，空竹、地转、料器喇叭、“噗噗噔儿”，花脸面具以及木制的刀、枪、剑、戟等兵器。靠西边都是卖妇女日常所需的针、线、梳、篦、梳头油、红绒绳、胭脂、锭粉、疙瘩针、头网、胰球、玫瑰碱、鞋样、绢花、纸花和各种镀金假首饰等货摊。

第三层院是三世佛殿，在这个院子里东边一个大场子是个打把式练武术的，场子里摆着真刀、真枪、三节棍、双手带等武器，卖艺的壮汉赤着背，而后将一条钢丝缠在腰上，他一使劲钢丝嘎吧一声，就断了。这一手气功最受观众的欢迎，有很多的游客就是到白塔寺专门看他练这一手气功的。西边的说评书场地经常说的是《三侠五义》、《五女七贞》、《刘秀走国》等精彩评书、场子也是经常满座。

最后一层院子是塔院，这里最热闹。塔院就是白塔的所在处，

四周为红墙，院内没有其他建筑，所以宽阔。这里有唱小戏的，摔跤的，放映“土电影”的。另外还有两个相面、算卦的诳骗游人钱财。

白塔寺每月开庙六天，每次庙市游人都很多。但是，最热闹、游人最多的，还是农历十月二十五日，白塔“生辰”那天。寺中喇嘛穿戴整齐，排着长队，乐器齐鸣，环白塔绕一周，称“转塔”。而后回到殿中做佛事诵经。每逢白塔“生辰”日，万人空巷，观礼游人最多，小商小贩乘机做买卖。

北平解放后，白塔寺庙市还继续办了十来年，至1960年后就停办了。

白塔寺在西四的西边，相距虽然稍远点，但是每到白塔寺开庙时，东南方向的游人，到白塔寺游逛，西四是必经之路。因之，白塔寺庙市对西四商业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八章　新街口地区

第一节　一条古老的街道

新街口地名在明朝时就已经出现了，至今仍在延用。其街道南北向，北起元代的通惠河河道，南止正觉寺胡同，西面是新开路，东面无路，此处为丁字街。清乾隆年间时，新街口的地段北是头条胡同，南接西大市街，西为西直门内街。到了清宣统年间，地域扩大了，北起城墙根，叫新街口北街，南起护国寺大街，叫新街口南街，西起北沟沿，叫新街口西街。民国年间，北、西的地段未变，南面延长至前车胡同。而且，北、西、南分别改称为新街口北大街、新街口西大街、新街口南大街。解放后，1965 年北京市整顿街巷胡同地名时，新街口西大街并入西直门内大街中。新街口北大街地段未变，在新街口北大街以北，增辟了个新街口外大街（北起北环西路，南接新街口北大街），新街口南大街，北接新街口北大街，南止地安门西大街。新街口东街（东起德胜门内大街，西止新街口北大街）。

新街口从明代时，南北长不过 200 米的小地段，到今天扩展成南从地安门西大街，往北直至北三环路，并且增辟了新街口东街。其发展如此迅速，是和商业的繁荣分不开的。

第二节　发展商业的条件

新街口所处地理条件好，对发展地方商业极为有利。其所具备的好条件，一是，与元代大运河码头积水潭只咫尺之远，新街口就位于通惠河的南岸。二是，新街口西边是元代大都城的和义门，明清北京城的西直门，出入城新街口是必经之地。三是，正觉寺就在新街口东侧，此寺是“明成化间，内监韩谅赐宅施舍建寺”，（《宸垣识略》）。该寺在明、清时期，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日开庙，香火盛极一时。新街口的商业发展与正觉寺庙市有关。四是，昔日，新街口迤南有护国寺，与隆福寺是北京两个有名大庙，护国寺称西庙，隆福寺称东庙，开庙时，庙市极其热闹，作买作卖的众多，对新街口的影响很大。

由于新街口地区有以上几方面的有利条件，所以，早在明代时，这里就是店铺林立的商业街，至清代又有发展。根据当地老住户鲍子清老人的回忆，民国年间这一带有柳泉居黄酒馆，宝祥源泉记油盐店，德裕号、同泰公、新茂长干果海味店，福丰号、玉丰成、东泰山米面铺，乾泰永、北源龙茶叶铺，新亚春饭馆，义顺兴、宝兴斋蜡铺，泰和号、祥顺成、三益和绸缎店，美丽鑫鞋铺，晋隆号棉花铺，永铨首饰楼，德泰号、维新斋钟表店，广积祥、祥顺成、北万盛布铺，永顺号染坊，广立号颜料铺，同庆堂、天德堂、世德堂药铺，信康西药店，浴清池澡堂等。

第三节　护国寺庙市

护国寺原本是元代脱脱丞相的宅邸，后改为崇国寺，明宣德间，赐名大隆善寺，至成化年间，又赐名大隆善护国寺。清代乾隆有御制护国寺诗碑。护国寺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农历每月逢初

七、初八、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日，开有庙市。各种小贩纷纷至此设摊，游人摩肩接踵，热闹异常。过去作生意的小贩都逢庙会必赶，因为庙会上游人多，买卖好作，容易赚钱，特别是东城的隆福寺，西城的护国寺热闹，所以，都来赶庙会。在护国寺的货摊有：

卖农具杂品摊。这些货摊都设在庙外左右两边，有铁锹、镐头、犁、镰刀、簸箕、柳条笸箩、囤圈、水瓢、囤底、苇席、笤帚、掸子、面杖、案板、笼屉、茶壶、茶碗、油布雨伞等。

生活日用品摊。卖这些货的摊位散于庙里庙外，有卖胡盐的，北京在民国年间，大多数居民都用胡盐刷牙漱口。胡盐是用食盐、花椒，加少量香料，经炒制再用拐磨成细粉。玫瑰破、猪胰子是洗脸的。梳头油、梳篦、胭脂、疙疸针是妇女化妆离不开的物品。剪刀、针、棉线、丝线、顶针、镊子、鞋样等。护国寺庙市上，卖妇女化妆品的货摊以“金象”为记的货摊最有名。这个货摊，是个蓝布棚，棚里高桌上摆着个约有一尺高大的金色大象。

卖估衣的货摊。过去北京居民，多数生活贫困，穿不起新衣服，多在估衣摊上买旧衣服穿。护国寺庙市上，估衣摊棚也不少。卖的估衣有布衣布裤，皮货绸缎等。

此外还有布摊、鞋摊，应有尽有。

风味小吃摊。护国寺庙市卖北京风味小吃的货摊到处都有。特别是庙的最后一层殿都是卖小吃摊。这里有茶汤、油茶、爆肚、切糕、扒糕、豆汁、豆腐脑、糖葫芦。夏秋季还有卖酸梅汤、凉粉、白花藕、鲜莲蓬、鸡头米、菱角的货摊。

玩具摊。在护国寺庙市上，卖儿童玩具的货摊也很多。有木制刀、枪、剑、戟等打斗玩的兵器。有空竹、风筝、弯勾喇叭、噗噗灯、口琴等。

此外还有卖狗的、卖鸟的、卖鸽子的。

打把式卖艺的场子在护国寺庙市上最招人，每个卖艺的场子

都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过去天桥“拉洋片”的“大金牙”和唱滑稽京剧的“云里飞”有时也来护国寺赶会。说相声、摔跤、抖空竹、耍叉、唱小戏的艺人是逢会必到。

北平解放后，虽然护国寺庙宇年久失修，庙市的景况大不如前，但是，依然按时开庙。自60年代初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后，庙市就停办了。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柳泉居黄酒馆

据新街口老住户鲍子清老先生介绍，现今新街口南大街路西的柳泉居饭庄，原址在护国寺街西口外南侧路东，是北京有名的黄酒馆。

黄酒馆过去在北京很普遍，虽然它不像油盐店，不管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一些主要商业街上都开设黄酒馆。当年北京的黄酒馆分绍兴黄酒、北京黄酒、山东黄酒、山西黄酒四种。柳泉居卖的是北京黄酒。

柳泉居开业于何时，说法不一，有说它是明朝的买卖，有说它开业于清代早期，据《旧京琐记》一书记载，说它在清代初年，以“酒馆兼存放”“数百年矣。资本厚而信誉坚，存款取息极微，都人以其殷实可靠，往往而责息。”这段文字说明柳泉居如果没有多年经营信誉，不会有很多人都将钱存在此处。由此推断，柳泉居开业时间最晚也在明朝末年。据著名的北京史专家金受申先生讲，柳泉居由山东人出资开办，掌柜的和店伙计也都是山东老乡。前边是三间门脸的店堂，后边有个宽阔的院子，院中有眼水质清澈甘甜的井，酿制黄酒就用这眼井的水。由于水好酿出的黄酒被酒客称为“玉泉佳酿”。早年，柳泉居店内设有酒座，供客人便酌。到柳泉居饮黄酒的客人，大多数是文人墨客。后来，有些酒客喝

完酒，占着座位不走，聊闲天，有碍店中营业。因此，就停止了酒座，专门经营客人沽酒回家去喝的生意。柳泉居除酿制普通北京黄酒外，还特酿制一种名叫“木瓜北京黄”的药酒。这种木瓜北京黄专门医治风寒腰腿疼，有一定的疗效，销路很好。

进入民国后，喝黄酒的人日渐减少，很多黄酒馆生意萧条而歇业，柳泉居虽然还能维持营业，可是生意平平。解放后，合营不久就并了点。迁至新街口南大街路西的新址，改为柳泉居饭庄，营业重新兴旺起来。近年，柳泉居饭庄经营的云片鲍鱼、抄炒鱼、油焖大虾、凤尾银耳等菜肴，深得食者好评。柳泉居从名黄酒馆改为了名菜馆。

二、宝兴斋蜡铺

原宝兴斋的伙友李义回忆说：我生于清末，在我年轻的时候，蜡铺的生意正在兴旺的时候。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家还没有安上电灯，夜晚照明不是点蜡烛，就是点油灯。另外，当时北京的寺庙很多，殿堂中供桌上都要燃点蜡烛。所以，蜡铺的生意很兴隆。后来我学满徒出师，由于电灯逐渐地在北京普及，蜡铺这行日益萧条，至北京解放前夕，蜡铺就已都停业了。

李义学徒的宝兴斋蜡铺在新街口是个有名的老字号，开业于清道光年间，掌柜的叫马华堂，全铺连掌柜的共有五六个人。前柜卖货后边是生产作坊。旧北京的习俗称制蜡又叫蘸蜡，而忌说是“做（坐）蜡”，因为北京将曾答应人家可办成的事，而没办成，叫“坐蜡”。宝兴斋制蜡主要原料是羊油。首先是炼油，将羊脂油、尾巴油切成核桃块，投入大铁锅里，随后往锅里放入清水煮。工匠手持大铁杓，将锅里浮油一层层取出。羊油凝固后比牛油软，为了增加蜡的硬度，要在羊油里适量放入些牛油。

制作蜡捻（芯子），别家蜡铺都是外买蜡捻，而宝兴斋是自制。他们制的蜡捻有灯草捻和棉花捻两种。蜡捻的制作简单，灯草或棉花都将其搓成既细又紧的长条，而后用剪子剪为一尺、八寸、六

寸三种尺寸。

蘸蜡是主要一道工序。每个工匠将每根蜡捻分别缠在一支苇秆上，而后用一根竹签将苇秆串起，工匠的左手和右手各拿三根竹签，站在热油锅旁，分别将左手和右手的竹签往油锅里蘸，蘸上一层再蘸一层。蘸得要均匀。双手的竹签都蘸好后，放于支板上阴干，让学徒用小刀先将蜡的顶端削出蜡捻，后将竹签从蜡上拔出，用小刀削平。蜡烛就蘸成了。分成包包，每包都是一斤，可是支数不同，分别是 8 支、10 支、12 支、16 支。

一般照明的蜡烛都是白色的，特制的喜庆和佛寺里用的蜡烛都是有颜色或写字的。这是在最后一层时，油中加红色颜料，往白蜡上浇裹，即成红蜡烛。写字的作法是工匠用毛笔蘸胶水往蜡烛上写“寿”字或“佛”字，随着很快往上放洒金粉。

宝兴斋蜡铺除了主营蜡烛外，还兼营兑换钱币的生意。也就是为顾客以纸币换铜钱，或整钱换零钱、零钱换整钱，宝兴斋从中获得佣钱。

民国年间，虽然北京城里不论店铺或是居民大多已装上了电灯，但是在郊区，特别是偏僻的山区，还是用蜡烛或油灯照明。所以，宝兴斋依然有生意可做。可是，到了北平被日本占领后，侵略者为了围剿解放区根据地抗日政权，实施经济封锁政策，蜡烛也在禁运之内。宝兴斋的买卖无法做了，于 1940 年宣告歇业。

三、永顺染坊

染坊这一行过去在北京很普遍，因为颜料经不住风吹日晒，一件很合体的衣裳没穿两年，颜色就褪了，只得去染坊重新洗染洗染。所以当时的富户和穷家都需要它。

新街口的永顺染坊开业于光绪年间，掌柜的叫张聚魁。永顺染坊自制染料，染出的颜色艳丽、持久，所以，生意兴隆。永顺染坊的活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布铺送来的成疋白布让永顺染坊给上色，另一方面就是门市居民的零散染活。在清末民

初时，大多数染坊与踩坊是分离的，而永顺染坊带踩坊。这对顾客比较方便，染完布不必再去踩坊，在永顺就将布踩好。因为织布作坊织出的布和染坊染出的布，有绉褶，不平整。所以，必须经过踩压这段工序。踩布的方法是将染好的布平放在光平的大条石上，用一块重约一二百斤的“元宝石”（其形状似元宝）放在布面上，一个人站在元宝石上左右摇动。而且随摇动随向一个方向移动。经过元宝石的踩压，使有绉褶的布，成为平整、光泽好看的布。经过踩压的布还能使缩短之布重新涨出来。

永顺于民国二十年（1931 年），增加了股东，并增添上了洗涤业务，所以，“永顺染坊”改名“永顺公洗染店”，

洗涤业务，永顺公要求职工必须按以下工序干活。1. 翻开衣袋。凡是有袋的衣物在洗涤前都必须翻检，以查顾客遗忘之钱物。如有，要如数交还给顾客。2. 浸泡要洗之物。将要洗之衣物放入清水之中，浸泡约一个小时。3. 过高温。将浸泡过的衣物投入大铁锅中煮沸起消毒作用。4. 洗涤。洗衣物之职工要一件一件的在搓板上搓。随搓随往衣物上投放肥皂液和碱水。5. 刷领、袖。衣领和袖子处还必须用棕刷蘸肥皂液刷净。6. 晒干。7. 叠码整齐。

永顺公所收的洗涤活，每件都洗涤干净，而都干整好，按时交给顾客无误。顾客都很满意。到永顺公洗衣物的，既有一般居民一两件衣物也有各大旅店成批的床单等。

1956 年，永顺公洗染店参加了公私合营，不久就并点，其字号就不存在了。

第九章　王府井大街地区

第一节　王府井大街的得名

王府井大街地处天安门以东，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长街，北起东四西大街的西端，南与东长安街相接，全长近一千八百米。从商业上说，它发展较晚，但是从街道的出现讲，可是个古老的大街。在距今七百二十多年前，元建大都城时就出现了，而且是一条重要街道。据清代朱一新所著《京师坊巷志稿》引用元末明初人熊梦祥著的《析津志》载：今王府井大街“元名丁字街”。“《析津志》：菜市一在哈达门丁字街。”案：今王府街旁有菜厂胡同，疑沿元旧称也。

元亡，明永乐皇帝朱棣为了定都北京，对元大都城进行改建，大兴土木，建成了庄严雄伟的明代北京城。由于明代在这条街的东侧，也就是从现在的金鱼胡同至东单三条胡同，建起了“十王府”，因此，这条街就改称“十王府街”。关于十王府的情况，在《明太宗实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由于这段文字记录含混，后人将其解释为“十座王府”或“第十王的王府”。也有人说是“多数王府”。至今争论不休，尚未得出结果。

到了清代，十王府空废，雍正年间在原十王府处建造了贤良

寺。十王府虽然不存在了，但是用王府命名的地名被延用下来。并在清《乾隆京师全图》上标名为“王府大街”。到了清宣统时，这条街从南向北有三个地名，南段从东长安街至金鱼胡同叫“王府井大街”，中段从金鱼胡同至灯市口又恢复了“丁字街”的地名，北段从灯市口至东四西大街叫“王府大街”。

为什么南段王府大街又加上个“井”字，叫“王府井大街”呢？

旧北京大多数胡同街巷都有水井，但苦水井居多，甜水井很少，所以北京有“苦海幽州”之称。但是在这条街的西侧有口甜水井，现在这里还留下个“大小甜水井胡同”地名呢。由于时间很早，这两口井早已没有了。关于是一口井还是两口井，以及井的具体位置，说法不一。有人说，在今天的《经济日报》社院内有一口井，还有人说，在原工艺美术服务部前便道上有一口井。因为缺乏具体的有说服力的材料，所以，至今统一不起来。但是，这里有远近闻名的甜水井是公认的。因为有井，才叫“王府井大街”。到了民国年间，这条街曾一度叫“莫里逊大街”。莫里逊是英国人，叫乔治·莫里逊，是英国政府派来的《泰晤士报》记者，他就住在王府井大街的西侧。他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所了解。当时，大卖国贼、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心想做中华帝国的皇帝，莫里逊看穿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就投其所好，撰写文章吹捧袁世凯，为袁世凯当皇帝造舆论。袁世凯对莫里逊很感激，民国四年（1915 年），袁世凯下令改王府井大街为“莫里逊大街”。但是，北京的老百姓没有人承认它，依然叫这条街为王府井大街。1948 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所立的用英文书写的莫里逊大街路牌也被老百姓推倒，将其投进垃圾堆中。

关于这条街的中段，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最新北平全市详图》上，将“丁字街”又改称为“八面槽”。关于八面槽地名的来历也是众说纷纭。有说是喂马的草料槽，有说是饮马的水槽。

有人说，是一个槽有八面，也有人说，是八个槽。为了这个问题，笔者特意走访了久居此处的几位老人。据他们说，在这里原有一个清朝遗留下来的饮马用的大石槽，各处经过此地骑马或坐车之人，不论士、农、工、学、商都要在这饮马槽里饮牲口。所以，人称此槽为“八面槽”。这个八面槽地名就是这样来的。

北平解放后，1965年在整顿地名时，才将这条街的南、中、北三段统一起来称“王府井大街”。“文革”时，曾一度叫“人民路”。

此外，在这条街上古建筑也很多，据《宸垣识略》一书记载：明代在十王府南，建有“会同馆”。明宣德年间，在“诸王邸之南”又建三座公主府。另外在清代还建有关帝庙、葛洪庵、毗卢庵、大悲庵和天主教堂。现在这些建筑早已无存，只有天主教堂尚在，并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天主教堂是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之一，俗称“东堂”。它始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五十年（1720年），在大地震中被毁，第二年又重建。嘉庆十二年（1807年）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次被毁，两次重建。这座天主教堂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是教徒作礼拜用的大教堂。大教堂建在用青石垒起的台基上，面宽约24米，深约40米，在大门左右各开一个旁门。教堂顶建有三个拱形堡，每个堡上都立着一个十字架。

这条大街虽然是北京一条古老的街道，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在哪种文献和其他资料上，说明这条街在清宣统年间以前就是个店铺众多的商业街。因为王府井大街南段，在明清时期，街东都是王府、公主府、衙署、练兵场和寺庙，街西不是民房就是空地。只有小胡同里有小帽子作坊，所以留下了大纱帽胡同和小纱帽胡同的地名。

第二节　王府井大街北京最早的新式商业街

王府井大街虽是北京一条古老的街道，但早期它不是个商业街。王府井大街是如何发展成北京最早的新式商业街呢？

王府井大街所以能够成为新式商业街，是因为它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所以才首先发展成新式商业街。

王府井大街迤南的东交民巷，原是清肃王府、庆公府、梁公府、宗人府和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翰林院、詹事府等府邸、衙署所在地。到了清同治末年，俄、英、法、美、荷、德、日、比等国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政府与英、美、德、法、日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交民巷取得了驻兵权，从而使东交民巷变成了外国人的天下。

这些众多的外国人住在东交民巷里，虽然他们的国家定时为他们运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但日常生活所需，如理发、购置服装，选购他们喜爱的中国手工艺品等都需外部提供。当时，东交民巷的南边紧靠北京内城的南城墙，西边是狭窄的户部街，只有北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北的东单，东边的崇文门大街离东交民巷最近，来往也最方便。所以，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看中了王府井大街和东单、崇文门大街，认为如果在以上的大街上开商店做洋人的买卖，生意一定很好，最能赚到洋钱的。从清宣统年间起，在王府井大街、东单、崇文门大街上，一些新式商店、洋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开办起来。

第三节　新式商业街在王府井大街形成

在王府井大街上最早办起的商业网点是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的东安市场。此后，其他洋行、商店陆续开办。银行有中国银行东城办事处、中国农工银行东城支行、大陆银行东城支行、金城银行东城支行、新华银行东城办事处等。西服庄有惠康、陈森泰、陈振昌、大北、新新、李民新、义昌兴、中裕、震康、源泰兴、源昌祥、瑞生祥、庆丰、义兴、源泰祥、鑫锠祥、生康、明大、新记 19 家。鞋店有中原、千祥、百福 3 家。帽庄有同陞和、盛锡福 2 家。照相馆有中原、东方、五星、四维、北京、山本、同生、大东、中华 9 家。洋广杂货店有大众、新茂、华兴玉、中原（公司）、三友（实业社）、国货（售品所）6 家。电料行有信诚、一中、永成（泉记）、一成、义兴 5 家。钟表眼镜商店有亨得利、慎昌、大明（菜厂胡同）3 家。绸缎布匹庄有丽丰、谦发 2 家。西药房有中法、中央、万国、广济、宝济、华英、东耀 7 家。国药店有永仁堂 1 家。理发店有美白、时代、天添天 3 家。汽车行有桃园、忠义、捷隆、奎星、美华、天津、交通（快记）、快轮、多小 9 家。纸烟店有德顺祥、增顺祥、德生祥、华成 4 家。古玩玉器铺有荣源兴、义顺厚、立本（斋）、杨古（斋）、广源兴、宝明（斋）、协成利、和兴昌 8 家。浴池有卫生、海泉（堂）、广浴（园）3 家。茶庄有庆隆 1 家。旅店有，迎贤、东华等公寓 2 家。染坊有美华、大美 2 家。油盐酱醋店有广兴、公兴和、东亚 3 家。饭馆有承华（园）、天海龙 2 家。米面庄有华兴、泰元永、广兴 3 家。木器店（厂）有清华胜、幸福（商行）、景和义、广华、德聚兴 5 家。砖瓦灰铺有丰义盛 1 家。此外，还有印度商人开办的力古绸缎洋行，美国商人开办的福隆呢绒洋行，英国商人开办的恒信拍卖行等。

本文对几家著名的老字号做较详细的介绍：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

亨得利钟表店原名叫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自开业以来，亨得利的名声一直不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包括香港、台北）都有亨得利钟表店。仅北京就有三个亨得利，它们是前门外观音寺（现大栅栏西街）的南城亨得利，王府井大街的东城亨得利，西单北大街的西城亨得利。

创业及发展

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店，最早设在江苏镇江，开业于民国四年（1915 年），经理王光祖，号炳三，浙江定海人。

王光祖原是个裁缝，在家乡开了个小裁缝铺度日。后来，由于生意不佳，离开家乡跑到外面闯荡，在大运河、长江的一些码头，做裁缝活。一个偶然机会，他在上海给一家洋行里的人做衣裳。洋行里的人要他为洋行做广告。王光祖为了多赚钱，就在衣服前后身上挂一块有“大罗马”瑞士表图形的白布，替洋行做广告。后来他认为替人家做广告宣传，不如自己做买卖赚钱，就从洋行里不用先付款往出拿表，跑码头做起了行商的生意。

王光祖跑行商，买卖很赚钱。攒了几个钱，他就萌发了开个店铺的打算。这时，恰巧他的朋友应美康和庄涵皋也想找个地方开个买卖。于是，3 个人合资于 1915 年在商业繁茂的镇江开办了亨得利钟表商店，王光祖任经理。

当时镇江是长江、大运河的重要码头，来往船只多，街上各种店铺交错栉比。王光祖他们开设的亨得利钟表商店，又是个卖洋货的，所以，一开业就很兴隆，年年赢利。民国八年（1919 年），王光祖又在上海的广东路开办了上海亨得利，并增添眼镜业

务。为了扩充营业，他还吸收了几个股东。他们学西方洋行的样子，把商店改叫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并以上海亨得利为总店，向全国各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1923年至1948年的20多年间，先后在天津、重庆、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开设了60多个亨得利分店，由王光祖任总经理。各地亨得利分店统一由上海总店进货。

亨得利比起别家同行业商店来，商品款式既新颖，价钱又便宜，在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当时，社会上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亨得利遍及全国，钟表眼镜货色多；专修复杂难走表，信誉至上迎客人。"

店名引起的一场官司

最初，王光祖他们在为亨得利取店名时，确实费了不少心思。经过多次推敲，最后才选定了既脱俗又带洋味的"亨得利"3个字。但是这3个字，却引出了一场官司。事情是这样的：

1864年，法国人霍普在上海现延安东路开办了霍普兄弟公司，专门经营欧美侨民所需的日用品。后迁至现南京路改名"亨达利"，并改专营钟表眼镜等商品。而王光祖的亨得利在上海开业后，生意极为兴隆，并发展很快，因之引起法国人的嫉妒，以侵犯"亨达利"的店名权为由，向上海民国法院起诉。这场官司经过几次反复，最后在王光祖辩护律师据理力争下，在不畏洋人压力、主持正义的法官的公正审理下，亨得利的王光祖胜诉了。不久，亨得利在农商部登记注册，亨得利店名被政府承认。

亨得利店名引起的诉讼风波，虽然给王光祖添了很多烦恼，但在社会上却提高了亨得利的声誉，使亨得利生意更兴旺了。

北京"三亨"之设

过去北京的钟表眼镜行有"两慎、三亨、一条龙"之说。"两

慎”是，前门外观音寺和王府井大街的慎昌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三亨”就是北京的三个亨得利；“一条龙”是王府井大街的惠龙钟表眼镜公司。慎昌与亨得利是钟表眼镜行业长期竞争的老对手，在全国各地只要有亨得利，也就有慎昌。现在慎昌和惠龙都已不复存在。

1927 年，王光祖在北京前门外观音寺路北，开办了第一家分店，并派其三子王惠椿任经理。王惠椿毕业于南京华中公学，后又在上海亨得利当过三年学徒。在其父的亲自指导下，学会了一套生意经。他为人精明干练，又有文化，把北京观音寺亨得利经营得很兴隆。但是王惠椿对观音寺这个店址，并不十分满意。他又看中了王府井和西单这两个地方。当时，王府井虽然还没有大栅栏游人多，但离东交民巷近，洋人多，而且官僚、富人大都住于内城，所以，在王府井和西单设店很有发展前途。

经过一年多的托人寻找店址，王惠椿最终在王府井大街路东找到一个倒闭的店铺，并用高价把这个店铺的房屋和铺底都买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 1930 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新张开业。开业那天，王惠椿请来了北平社会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商业界的朋友，还特邀来几位小报记者，以扩大亨得利在社会上的影响。

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开业后不久，西单北大街的亨得利也开业了。

商品的洋、高、新

北京在“三亨”、“两慎”开业前，钟表业大多是以维修为主的小钟表店。亨得利在北京开业，是北京钟表行业的一大进步。因为亨得利不仅维修各种钟表，更主要的是销售西方瑞士的各种名牌钟表。有欧米伽、浪琴、劳力士、天梭、西马、梅花、罗马等名牌怀表和手表。抗日战争胜利前，怀表比手表受顾客欢迎。怀表从外形上分，有平面怀表和闷壳怀表两种：平面怀表是表蒙子

外没有外盖，看时间方便；闷壳怀表是在表蒙子外有个外盖，把表盘闷盖在内，因之称“闷壳”。这种怀表虽然比平面怀表厚、蠢，但坚固，表蒙子不易磨坏打破。从机件构造上，又分普通计时表和打簧表两种。打簧表的表心内装有一组打击发音的机件。只要扳动表壳上的扳动器，表就会发出悦耳的敲打声音，响几声，就是几点。有的还能报刻、报分。夜晚睡觉，在床头放只打簧表，一觉醒来，不用开灯，一扳动打簧表的扳动器，就能知道时间。从表壳上分，有一般钢制的，有银制的、珐琅的，还有黄金的。以上各式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货色俱全。此外，还有一种特制的“亨得利”牌子表。这种表，是30年代上海亨得利在瑞士定制的。该表都是银闷壳，表盘上刻有“亨得利”字样。这批“亨得利”表，不仅走时准确，而且外观漂亮大方，是当时的畅销货，为一时名表。

1945年前，北平市场上的手表都是小三针式，就是表盘上中心为时针和分针，下边有一个小秒针。当时，以长方形手表为流行。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经营的小三针男女手表都是瑞士名牌货。王府井大街亨得利一向以卖欧美货闻名，但是“七·七”事变后，无奈也得进日本货。当时日本生产的眼镜和钟表都无法与欧美货比，特别是手表。日本最好的表是“精工舍”牌，次之为“西其僧”牌，最次是“亚细亚”牌。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洋“游泳夜光手表”大量涌进中国市场。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的柜台里摆满了这种手表。这种表都是“大三针”式。从此，“小三针”手表被顾客冷落。

大钟不是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的主要商品。该店的大钟分挂钟和座钟两种，但不论挂钟或座钟，都是德国名牌“双箭”和“宝星”木楼钟。

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经营的眼镜，有德国的“蔡司”和英国的“克罗克斯”、“托力克”等名牌镜片。镜架有英国的白金架和黄金

架。少部分是日本货和上海产的国货。亨得利眼镜部还设有验光室，为顾客验目配镜。

除经营钟表、眼镜等商品外，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还经销留声机。这种留声机是手摇式的，都是从欧美各国进口的。

精工修理钟表

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虽以销售钟表、眼镜商品为主，但也极重视钟表修理业务。三四十年代，该店善修老表，难修之表，闻名全市。

在一般钟表店，修理工都不敢接"油丝乱"、"缺齿轮"、"断摆尖"等难修的活，也不愿修机件复杂的打簧表。有个顾客一只心爱的打簧表不走了，跑了多处钟表店，都说修不了，最后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只用了一个星期就给修好了。而且走时准确，打点报时无误，受到顾客的赞扬。还有个外国顾客，摔坏了一只劳力士手表，很多钟表店都说修不了，也是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修好的。王府井大街亨得利所以能修老表、破表，一是该店有几位修理钟表的能工巧匠，二是该店修理部组织健全，质量检查严格。过去，该店有钟表修理师傅十二三人。其中一人为"接修"，也就是修理工的"头儿"。做"接修"的人，必须技术好，只要收下的活，别人修不了，他必须能修，而且见识要广，认得各种牌子的表。"接修"坐店堂，直接从顾客手中接活，然后分给后边车间工人修。车间里分两组，一组修各种怀表和手表，另一组修大钟和留声机。车间里修好的活，交给"接修"检查验收，而后，才能交给顾客。该店规定，凡有返修的钟或表，都交原修活之人检修。修钟表的工人，都把返修活当做耻辱。谁连续出现几次返修活，就是没有被经理辞退，碍于脸面，也要自动辞柜离去。

生意经及管理

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很讲究做买卖的生意经。当时该店的顾客，都是外国人和有钱有势的中国人。所以，他们很注意门面的装修和店堂的布置。与北京传统风格不一样，亨得利店门面装有大玻璃橱窗，两扇玻璃推拉门。店堂里四周为玻璃货架，当中设两个大玻璃柜，都带着北京少见的“洋”味，使一般顾客望而却步，不敢进去。这就叫“店大欺客”。店里要求站店堂的店员，必须容貌端庄，衣着干净整齐，穿西装、皮鞋，而且必须系领带。为此着装，亨得利还给店员补助。亨得利的店员都会看人，凡是坐车来的，身边跟着随从的顾客，都要远接近送，热情招待。

亨得利的商品，虽然都是明码标价，“言不二价”，但是，他们经常以优待老顾客和看朋友的面子为由，在原定价上打折扣，让价钱。这样，既把生意做了，又拉住了顾客。有时他们针对一部分顾客“只要价钱贵就是好商品”的心理，在把店中最好、最贵的商品给顾客看了，而对方还不中意的时候，就将同样质量、同样价钱，只是外观有些不同的商品，拿给顾客挑选。但是，价钱却要得高。这样的结果往往是顾客会很高兴地把表或眼镜买走。

北京“三亨”的经理都是王惠椿。而王惠椿一人不能照顾三处，所以，他把前门外观音寺亨得利做为北京亨得利的总店，他坐镇总店，派周兴昆、俞伯衡为协理，管理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和西单北大街亨得利。店中职工待遇都是工资制和提成制，也就是固定月工资加根据每月售货额的多少提取报酬。亨得利职工除学徒外，都是上午 9 点开店门上班，下午 6 点关店门下班。在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无家的，店中提供住宿。

北京“三亨”的职工，大部分是浙江的老乡，少数是北京人。店中招收学徒，挑选极为严格。进店学徒需有两个保人，保证在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间不违犯店规，服从管理，如果出现问题由

保人负责。此外，学徒还需试用3个月，优者留用。三家亨得利共有职工七八十人，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生意最兴隆，职工也最多，有30多人。

艰难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做了约一年的好生意。从1947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北平社会不稳，物价飞涨，买卖就不做了。在北平解放前夕，王惠椿去了香港，在香港开设了香港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又在台北开办了一座亨得利分店。

1949年北平解放后，王府井大街很多店铺在人民政府扶植下，大都先后摆脱困境，开始复苏。但是，亨得利就不同了，一是王惠椿走时，已把大量资金抽去，亨得利已成空架子。二是亨得利缺少货源。因为亨得利与一般店铺不同，它是以经营洋货为主。50年代初，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手表，瑞士表当时还不能来。所以柜台空空，无货可卖。

尽管摆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职工面前的困难很多，但是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他们一方面从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解决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收买瑞士旧表，经过修理整新后，在柜台上出售，以解决货源问题。不久，又从苏联进口“飞行”、“卡马”等牌的手表出售。可是，苏联手表既大且厚，而且价格还高，因此，销路不畅。多数顾客宁愿购买整新的瑞士旧表，也不买苏联的新表。直到1953年又从瑞士进口了钟表后，王府井大街亨得利的困境才算过去。

柜台里摆上了中国手表

1956年，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成为国营企业，改名为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从此，过去为少数人服务的

亨得利转而面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得到空前的发展。1958年，天津、北京先后试制手表成功，并投放市场，从此，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手表的历史。天津手表厂采用瑞士“保铃”牌表的图样，试制成功“五一”牌手表。上海手表厂仿照瑞士“依士佳”牌，生产出“上海”牌手表。北京手表厂的设备，全是从瑞士引进的，并试制出“北京”牌手表，后改为“双菱”牌。这些中国厂家生产的手表，摆在王府井大街亨得利柜台里，前来买表和参观的人特别多。店中职工感到无限的荣耀。他们说：“我们终于卖上自己国家生产的手表了！”

改革开放中的新面貌

“十年动乱”中，王府井大街亨得利被改名首都钟表店。1980年，才又恢复亨得利老字号。但是由于不经营眼镜，改为专营钟表，故称亨得利钟表店。现在亨得利钟表店又增加金银首饰业务，于1991年改称亨得利钟表首饰店。

目前，王府井大街亨得利已从过去的一个店，发展为三个店，除本店外，还有王府井大街路东的精工牌钟表专修店和东华门大街的亨得利钟表修理部。除机械表外，大量增添了各种牌号的电子表。瑞士产的不用说，还是日本产的“精工”表和“东方”表，香港地区生产的机械、电子表。国产表除北京、天津、上海表外，还有西安、广州、深圳等地生产的各种牌号的机械表和电子表。其销售量从过去日销表几十只，发展为现在日销一千余只。

亨得利钟表修理业务过去是很有名的。改革开放后，该店提出更大地方便群众的服务方针。现在，亨得利共有钟表修理工30多人，其中特一级1人，特二级1人，特三级3人。在北京钟表业中，他们的修理技术力量最强。亨得利钟表店一方面重视商店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更重视为广大群众服务的社会效益。他们

在店堂里设了服务台，专为顾客做一些零活小修，如换衮带、换卡子、校正帽檐以及业务咨询，解答顾客的问题，很受顾客的欢迎，经常接到各界顾客的表扬信。

二、王府井大街盛锡福帽店

王府井大街盛锡福帽店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最早它是天津盛锡福总店的一个分号，开业于1937年。

盛锡福生产经营的帽子很有特色，有毡帽、小帽等中国传统帽子，还有欧美式礼帽、巴拿马草帽等适合潮流的"时帽"。因质量好，品种齐全，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欢迎。

天津盛锡福总店

解放前，盛锡福总店在天津，创办人是刘锡三。刘锡三本名占恩，号锡三，山东省掖县沙河镇人，家中世代务农。他幼年读过几年书，后因家境不佳而辍学，于是帮助父亲在地里干活。一年，家乡受灾，农田歉收，乡里人四处谋生，他也离家去青岛市一家外国人办的饭店里做杂勤。他为人勤快又好学，在饭店里因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学会了一些日常英语。不久，刘锡三离开了这家饭店，到一家洋行做业务员，负责下乡收购草帽辫。草帽辫是用来制作草帽的，洋行把它收来，运到国外制成草帽再返销中国，以获高利。

刘锡三在洋行里干了几年，对草帽辫的质量好坏、品种和产地，以及草帽的制作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他就想自己干。中国人的钱，干嘛让外国人赚去？以后几年的时间，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笔钱。民国元年（1912年），他同友人合资在天津估衣街开办了盛聚福小帽店。小店开张后，生意很兴隆，年年盈利。后因东伙发生矛盾，刘与友人分手。这样，盛聚福的买卖分到了刘锡三的手中。他决心把买卖做大些。他从东南银行得到一笔可观的贷款，又在天津法租界21号路选好店址，把盛聚福改为

盛锡福，在民国六年（1917 年）重新开张。“盛”是“生意兴隆茂盛”之意，“锡”和“福”都是取自刘锡三的名字（刘锡三的乳名叫“来福”）。1919 年，有一西方人运来一部全套电力制造草帽的机器，盛锡福用巨资把它买下，从而设立草帽工厂，自产自销，并很快在天津打开了销路。从草帽工厂设立后，盛锡福在几年之中，先后又设立了皮帽工厂、便帽工厂、缎帽工厂、化学漂白厂、通帽工厂、毡帽工厂和印刷厂等，并在天津天祥市场设第一分销门市部，在梨栈设立第二分销门市部。

从创业到民国十几年，盛锡福在当时激烈的商战中站住了脚，知名度越来越高。这是因为，富有革新精神的刘锡三，看准社会潮流，向社会推销欧美式的“时帽”。民国初年，社会上学习西方方兴未艾，很多人剪去头上的长辫，摘下瓜皮小帽，脱去长衫，都想换上适合潮流的新式服饰、鞋帽。而盛锡福仿制的精巧美观的巴拿马草帽和英、法、美式呢帽，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货。

刘锡三为了创名牌，防别人仿制冒牌，特向当时政府申请注册“三帽”商标。三帽为一顶四平硬顶草帽，一顶呢制礼帽，一顶皮制三块瓦帽。“三”也取自刘锡三之名尾字。盛锡福的三帽牌帽子，在当时的商战中，特别是在对日货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20 年代，日本商人经营的草帽在天津很畅销。为了增强竞争力，刘锡三与制帽的技术人员研究设计出用宁波细草制成的四平硬顶草帽。这种草帽不仅草细、有韧性，而且色泽鲜亮明朗。“四平”是帽顶平、帽身平、帽沿平和帽箍平，样式新颖，顾客爱戴。这种四平顶草帽投放市场后，有多少顶卖多少顶，日本草帽被人冷落。从而，盛锡福“三帽”之名，誉满津门。

天津盛锡福在二三十年代，先后在南京、上海、北京、沈阳、青岛、郑州和武汉等城市设立分店 20 多处。盛锡福三帽牌帽子还出口海外，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

萄牙、荷兰、捷克、奥国、瑞士、瑞典、挪威以及非洲等地都设有代销处。在世界列强争相向旧中国倾销各种产品、控制中国商品市场的时候，盛锡福生产的三帽牌各式帽子，却能远销国外，特别是在当时工业先进的欧美各国争得一席之地，确实是件值得一提的事情。由于盛锡福的帽子质量好，式样新，所以，从1924～1934年共获得当时各级政府奖状15个。一些社会名流曾为盛锡福题写过书额。其中有宋哲元的“名驰中外”，秦德勤的“冠冕群伦”，曹锟的“国货之光”，邹泉荪的“冠冕吾华”。由吴佩孚书写的盛锡福牌匾，一直挂到现在。

到了40年代后期，由于刘锡三年老体弱，就把买卖交给长子刘洪儒经营，他自己就回家养老去了。

北京的盛锡福帽店

刘锡三在北京开办了4个盛锡福分店。1936年，西单北大街盛锡福开业；1937年，前门大街和王府井大街盛锡福开业；1938年，沙滩盛锡福开业。这4个帽店都归其柜上大徒弟常瑞芍经营管理。

在盛锡福未进北京前，北京有马聚源、东北魁、一品、洪盛斋等知名的老帽店多家，可是经营的都是老式帽子。盛锡福这4个分店在北京相继开业后，天天顾客盈门，特别是西单、前门、王府井这三家盛锡福，因地处繁华市区，尤其兴盛。由于北京各盛锡福店的经营管理、商品进货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说的也就不仅仅是王府井盛锡福的情况，而是各盛锡福店的情况。

帽子齐全制作讲究

盛锡福的帽子，四季齐全，有春秋季的呢帽、缎帽；有夏季的各式草帽、通帽；有冬季的皮帽、棉帽、将军帽等，种类约有200多个。

1946年以前，北京盛锡福的各种帽子都由天津总号工厂供应，1946年后改由自己在北京找小帽作坊加工。天津盛锡福总号工厂生产的各种帽子，从进料、生产到出厂检查，道道有人把关，所以，每顶帽子的质量都是上等的。改由小帽作坊加工后，也是特别把住质量关，一顶劣质帽子也不准进柜台。盛锡福用小帽作坊加工是领料加工，也就是小帽作坊在盛锡福领料，按盛锡福的要求进行加工。像硬胎三块瓦皮帽很费工，如果不按工序制作，生产出的帽子不是戴上不舒服，就是帽胎变形。制作三块瓦皮帽的帽胎，一律使用新棉花，缝制后，要用棕刷子往上抹浆子，而且要把浆子透进胎里去。抹完浆子就放进火箱里烤，出火箱还要用红烙铁熨，要把帽胎熨熟了。这里说的"熟"，是制帽行的一句行话，就是外观微黄，帽胎既硬挺，又绵软。这样，人戴上不仅舒适，帽子还不会变形。继之用一层豆包布包起，豆包布外上皮面。这还不算完，还要进一次烤箱。这种制法是天津盛锡福总号的传统制法，小帽作坊加工三块瓦皮帽时也必须按此工序进行，不能马虎。

和气接待顾客

礼貌待客、和气生财，是盛锡福的重要经营作风。顾客进门，买与不买都要热情、主动打招呼，尽量让顾客买到满意的帽子。如果顾客不想买帽子，也要让其高兴地离去，以使其下次再来盛锡福。盛锡福的店堂中专有一人"瞭高"。这个瞭高的是店中的负责人，一是监督店员接待顾客的情况，并防店中出现"高买"（小偷，过去将专偷店铺商品的小偷叫"高买"），二是了解顾客的需求及解答顾客的问题。

正因为盛锡福帽子品种全，花样多，质量好，店员待客和气，所以，生意久盛不衰。

解放后的新发展

北平解放后，王府井大街盛锡福帽店于1956年参加了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同年，组建了盛锡福制帽工厂。组建自己的工厂，主要是因为北京在社会主义改造热潮中，大的制帽厂参加了公私合营，小的加入了合作社，盛锡福从而失去了加工商品的地方。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王府井大街视察，有人向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总理指示，要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产品特点，更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并建议盛锡福可以建立个加工厂。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盛锡福制帽工厂建立了起来。

王府井大街盛锡福帽店自参加公私合营后，其发展是迅速的。由于商店端正了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方向，顾客大量增加，盛锡福的知名度也更加提高，生意日益兴隆。同时，王府井大街盛锡福还有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服务的任务。他们曾给毛泽东主席做过将校呢圆顶帽。50年代，盛锡福为陈毅外长出访印度尼西亚，做了一顶金丝草草帽。60年代，周总理去莫斯科访问时戴的水獭皮帽，也是盛锡福做的。刘少奇主席去莫斯科访问，在盛锡福做了一顶美式圆沿皮帽。乌兰夫、万里等同志也在盛锡福做过帽子。朝鲜金日成首相曾在盛锡福做过一顶海龙皮帽，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做过一顶三羔皮帽。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在盛锡福做过帽子。国内外各界人士慕名到王府井大街盛锡福买帽子、定做帽子的，不计其数。

王府井大街盛锡福同其他老字号一样，在“十年动乱”中被摘下老牌匾，改为红旗帽店。1974年才重新挂上“盛锡福”老字号的牌匾。1984年，盛锡福扩建了制帽厂的厂房，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增加三帽牌的帽子产品。盛锡福还增添了旅游帽、流行小礼士帽等。目前该店生产经营的男女各式帽子400余种，年产50万顶。其中毛华达呢圆顶帽、毛涤前进帽、仿毛小礼士帽、

水獭解放式发帽、六角女士帽等获商业部优质产品奖。

目前，全国尚有盛锡福帽店9个，它们是：北京3个，天津2个，青岛、上海、南京、武汉各1个。

三、美白理发馆

王府井大街的美白理发馆开业于1928年，是北京一家老字号。在三四十年代，美白与中央、万国、鼎新、仙宫、粹华、中国等理发馆一起被称为北京理发行业的七大家。

新中国成立后，美白理发馆成为国营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近年，美白理发馆特别重视对年轻一代的培养，所以，目前美白理发馆能上岗为客人服务的，个个是能手，其中有特级理发师3人、一级理发师2人，二级理发师11人和一级美容师2人，是北京技术力量较强的理发馆之一。现美白理发馆已改名美白美发厅。

创　办

美白理发馆的创办者是何永禄。何永禄本是个剃头匠，挑过剃头挑子，也在剃头棚里干过活，后来，在理发馆里才学会了拿推子，给客人推光头、平头、大背头。

在清代，男人留辫子，女人梳头，理发就称整容行。整容的为男人梳辫子，用剃刀剃头，刮脸，剪鼻毛、耳朵毛，掏耳朵，按摩面部、背部等。民国建立后，人们开始剪辫子，剃光头，使用推子。男人留大背头、分头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剃头的学会用推子理平头、大背头等，剃头棚才改称理发馆。何永禄学会用当时理发行业中这种最现代化的推子，为客人理发，很能挣钱。所以攒下几个钱后，又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28年创办了这个简陋的美白理发馆。可是何永禄没干几年，便干不下去了。有人追忆，是因为何永禄不善经营；还有人说，是因为东伙不和。1932年，终于把美白理发馆倒给同行姓广的接着干。

这位广掌柜手艺很好，剃头、理发都行。找了几个伙计给他

帮忙，客人倒也不少。广掌柜有个儿子叫广德寿，在店里学徒。广德寿很聪明，在三年零一节学徒期间，不仅学会了剃头、理发、做女活，而且学会了店铺的经营管理。广德寿出师后不久，由于广掌柜身体不好，经常闹病，就把美白理发馆交给广德寿来管。广掌柜只是每星期来两次看看，帮助料理料理。

享　　名

广德寿接手经营理发馆后，就打算把美白办成北京一流的理发馆。当时北京的理发馆很多，但大多数设备简陋，只会做男活，剃光头，不仅不会做女活，就连给男客人理分头都不行。像中央、中国、仙宫等设备新、技术先进、男女活都会做，尤其是可为女客人电烫新颖发型的高级理发馆，当时全北京只有少数几个。广德寿与其父商量后，就立即改建店铺的门面和店堂，购置安装新型转椅、大镜子、新式照明灯、电扇等一切所需的设备。在改建店堂添置新设备的同时，到处约请技术好、会做男活也会做女活的工人。

美白理发馆重新装修后，楼上为女部，楼下是男部。美白理发馆所处王府井大街地理条件好，附近官僚、有钱之户多，其南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东边协和医院，都是外国人集中之地，因此，中外各界人士光顾美白理发馆的很多，买卖很兴隆。在三四十年代，美白理发馆男部虽然也有剃光头的客人前来，但为数极少，大多都是留分头、推大背头的客人。留分头和大背头的发型，需要用吹风机吹出发花或用火剪烫发边、发卷。当时美白理发馆女部，还有奶油烫、杏仁烫和原子烫。不过据曾在美白理发馆工作过、现已退休的何继青老师傅介绍说，奶油烫、杏仁烫、原子烫等都是多赚客人钱的一种方法。所谓奶油烫，就是在烫发药水中加点奶；杏仁烫，是在烫发药物中加点杏仁粉。总之，不管怎么烫发都必须用烫发药水。

在经营上，广德寿深深知道，要让客人来，必须技术好，理发式样新；服务态度好，干活认真；店堂干净，毛巾围布天天洗。正是由于美白理发馆注意了以上几点，客人都很满意，所以，美白理发馆很快就跃居高级理发馆之行列，享誉京城。像二三十年代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就是该店的常客之一，只要她在北京演出，每次都到美白理发。美白理发馆收费比一般理发馆高得多。就以30年代中期为例，一般理发馆男子理发收六分至1角，女子剪发收一角至二角，女子烫发最多收四角钱。而美白理发馆男子理发最少收四角，女子剪发收六角，女子烫发要收五元钱。当时理发馆流行收小费，理发烫发虽贵，但是有价，可是小费无准价，由客随便给。有钱人大多讲究摆阔气，给小费一般都比理发烫发的原价钱高。过去每年的五月节、八月节、年节，是理发馆生意兴隆的日子。特别是年节，人们的风俗是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过年前都要理发、洗澡，干干净净过年。所以，每年一到腊月二十三日，美白理发馆就开始涨价，而且一天一涨，直涨至年三十。在这期间，客人小费也给得多。每到年节是美白理发馆最忙、最挣钱的时候。

关于工人的工资，旧北京的理发馆是不用出工资雇工人的，美白理发馆所雇佣的工人也都没有固定工资，而是采取柜上与工人分成制。当时北京理发行业一般是按“三七”分成，也就是柜上分七成，工人分三成。好一点的是“四六”分成。而美白理发馆最差，是“二八”分成，柜上分八成，理发工、会计、洗衣工、锅炉工、杂勤工等分二成。小费也是如此。一天一结算，一天分一次钱。因病、因事不来干活就不能分钱。美白理发馆管工人的伙食，平日都是粗粮，窝头、咸菜。只是初一、十五改犒劳，吃顿白面，有点肉。

美白理发馆自从有了名气后，每天来理发的中外男女客人很多，而且大多数是富人，所以广德寿获利不少。理发行业除去用

电、水、肥皂等小有消耗外，可是说是无本的买卖。加上美白理发馆的"二八"分成，广德寿获利更丰。

美白理发馆从广德寿接手经营后，始终生意兴隆。即使日伪统治时期和其后的三年内战时期，物价飞涨，各业不振，但对美白理发馆的影响也不大。这是因为，理发馆不同于其他店铺，除需购买、储存少量肥皂，头油，烫发药水外，不需用其他什么货物，所以不受物价不稳的影响。而且来美白理发馆的客人，除外国人外，多是当时的军、政、警要员和富户，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这些人到时必须理发，而且不怕花钱。

发　展

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1949～1952 年）由于百业待兴，人民生活还很清苦，所以，理发行业客人少。特别是像美白理发馆这样的大店，生意就更萧条了，尤其是女部，根本没有人烫头。到了 1953 年，社会经济开始有了转机，市场也活跃起来，各行各业的工会为了给工人谋福利，每月发给每个会员两张理发票、两张洗澡票。从此，美白理发馆和其他各家理发馆一样，客人逐渐增多，生意有了起色。

1956 年，美白理发馆参加了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久，全市理发行业进行定级，根据每个理发馆的设备条件、工人的技术力量情况，分为：特级、甲一级、甲二级、乙级、丙级等多种。全北京市特级理发馆 4 个，美白是其中之一（另三家是四联、鼎新、西单第一理发馆）。规定价格为：男子理发 0.80 元，女子烫头 2.20 元。同时给职工也定了级，理发工人有了固定工资。1958 年，美白理发馆的生意进一步发展。过去烫发是电烫为主，1958 年发展为冷烫为主。当时流行发型有波浪式、电烫大花、冷烫波浪大花、菊花式和青年式等。

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美白理发馆被改

为"人民理发馆"，后又改为"北京市第二联合理发馆"。由于烫发业务被取消，理发的顾客少了，生意又走入低谷。从1979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理发行业进入空前繁荣期。1985年，美白专门开辟出美容室。由于美容已成为美白一项主要服务内容，因此，美白理发馆改名为"美白理发厅"。

四、同陞和鞋店

王府井大街路东的同陞和鞋店，总店在天津，经理是莫荫萱。同陞和鞋店是个合资的买卖，莫荫萱领的是赵宪章、赵馨山等人的东。开业于民国元年（1912年），店址在天津估衣街。开始同陞和主要生产和经营帽子，由于莫荫萱极为重视产品质量，帽子的款式，售价要低于同行，所以，开业后不久，在天津市场上打开了销路。后来又增添上了皮鞋和便鞋，虽然同陞和还称"鞋店"，但实际已是鞋帽店了。

北京王府井大街同陞和鞋店由天津同陞和总店股东李溪涛经营。开业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并设有制帽作坊和制鞋作坊。

北京王府井大街同陞和保持了天津同陞和总店创业时的好传统，作坊制做鞋帽，一是选料考究，制做鞋帽不论主、辅料都必须上好的材料，一律不用次料顶替。二是做工精细，三是款式新颖。所以，多少年来，王府井大街同陞和生产和经营的鞋帽，穿戴美观、舒适，深受北京各界人士的赞誉。

王府井大街同陞和用严格的产品检查，来牢把质量关。对不合格产品，宁可废掉也不投入市场销售。为了取信于顾客，凡在门市销售的鞋帽商品都加上"同陞和"字样。

博采众长，不断地设计出新产品，王府井大街同陞和有一部分实力较强的设计人员。店中要求设计人员，不仅要继承老产品坚固耐穿、舒适的设计方式，更要脑子灵活，信息灵通，了解顾客心理、爱好，设计出款式新颖的产品。如近年，王府井大街同陞和设计、生产出的适合北方人脚型的中跟男皮靴、男皮鞋、磨

压半跟女皮鞋、高筒女靴等新产品，曾流行一时。等别家仿制出来，他们又设计出另外的新产品来。所以，在鞋帽款式上，他们居于领先的地位。

热情服务，百问不烦，百拿不厌是王府井大街同陞和的老传统。顾客买鞋或是买帽子，既要美观、样子新，也要穿戴合适。所以，挑挑样式，穿穿试试，在所难免，如果售货员态度不好，不让挑，不让换，人家就不买了。王府井大街同陞和要求每一个上岗的售货员都必须热情服务，让拿哪双鞋就拿哪双鞋，让拿哪顶帽子就拿哪顶帽子，尽量满足顾客的要求。

此外，他们在经营中，特别注意拾遗补缺。像特大号，特小号的鞋、帽，一般店铺怕积压，占本钱不准备。而王府井大街同陞和都生产，为少数顾客的需要提供方便，别家买不到的在同陞和可以买到。这就是老字号的“不怕没人买，就怕货不全”的经营作风。

王府井大街同陞和曾改名“长征鞋店”和“前进鞋帽店”。1981年恢复“同陞和鞋店”老字号。并扩大经营皮鞋、旅游鞋、布鞋和各式时帽。工厂部更新设备，从德国等先进国家引进制鞋机械化设备，取代了老式手工生产，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以满足广大顾客对新式皮鞋的需求。

五、北京国货售品所

北京国货售品所是天津国货售品所的分店。北京国货售品所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前门外大蒋家（大江）胡同开业，不久，迁至王府井大街路东。

天津国货售品所是爱国实业家宋则久先生于民国二年（1913年）创办。他的宗旨是工业救国，向广大民众宣传国货、爱国者都穿国货，用国货；不用外国货，抵制外国货。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宋则久先生配合爱国青年学生抵制日货运动中，他自编《国货歌》：“国货好！国货好！人人全用本国货，工厂多，闲

人少！救中国，用国货。”这首通俗易懂的《国货歌》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国内社会以“购国货、用国货光荣”，“购日货，用日货耻辱”的形势下，天津国货售品所，天天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宋则久先生认为，他的提倡国货，工业救国的思想只在天津一地取得些成绩，赢得一些民众的同情是很不够的。应乘当时爱国思想高涨的形势，发展到全国各地。因此，30年代初，他在济南、北京、太原、西安、郑州、南京等城市创办“国货售品所”。

北京国货售品所经营的商品有中国农村副业生产的“土布”，河北高阳的“爱国布”，有南京生产的贡缎，苏州的刺绣，杭州的丝绸，有中国产的细毛皮货、呢绒。有各种尺寸、花样的地毯、景泰蓝、珠宝玉石、玛瑙珠翠、金银首饰等。

北京国货售品所，虽然地处以销售舶来品为主的处所王府井大街，但是，很多外国人也很喜爱中国的丝绸、地毯和珠宝、景泰蓝等工艺品。所以，顾客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买卖兴旺一时。

宋则久是个开明、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他管理商店与旧式店铺大不相同。从分店经理到售货员都是职员，进店的学徒称“练习生”。对练习生不许歧视，更不许打骂。国货售品所的工资待遇也比一般旧式店铺高，练习生进店就有工资。每天的工作时间，虽然不是八小时工作制，但，晚上关上店门后，北京有家的职员可以回家。并且每十天有一天公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在政治上进行奴化宣传，胡说什么，中日同文同种，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在经济上疯狂地掠夺，将日本的剩余工业品向中国倾销，占领中国市场，挤垮中国民族工业。因此，对北京国货售品所只卖中国货不卖日本货是不能容忍的。一是日本宪兵来店用“只卖中国货，不卖日本货是极其不友好”，用

此施加压力，使北京国货售品所就范。二是日本商人经常进店推销日本商品。北京国货售品所为了能继续存在下去，只可增添日货销售。其“北京国货售品所”店名不得不改为“北京百货售品所”。

在北平沦陷八年中，倍尝到亡国之苦。从1938年起，北京的物价就不断地高涨，货物卖出去就买不回来。因此，年年亏损。更苦的是，日伪人员经常进店敲诈勒索，动不动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人。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国光复了，人民欢欣庆幸。为了表达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天津百货售品所和北京百货售品所和郑州、南京等百货售品所先后改称“中华百货售品所”。

1956年，北京中华百货售品所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调整商业网点，北京中华百货售品所撤点，其店史告一段落。

六、大明眼镜公司

大明眼镜公司不同于当时北京专营茶、墨、水晶石的旧式眼镜店，它主要经营科学镜片的眼镜。从1937年，大明眼镜公司在郑信康主持下在王府井大街的菜厂胡同开业后，就受到具有新思想的各界人士和外籍人的欢迎。

大明眼镜公司是由上海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上海大明眼镜公司等多家集股创办的。开业时，营务上由销售柜、验光室和磨片厂三部分组成。销售柜经营的商品有白、墨托力克，克罗克斯等平光和近视镜片。各色化学架、克罗米架、黄、白K金架等。验光室有专人为顾客验光，当时用手工叉片法给顾客验光，可验配千度以内的近视和远视镜，并可验、配浅度散光眼镜。在当时，设有验光室，可验、配近视、远视和散光眼镜的，在前门外观音寺有精益眼镜公司和大栅栏里的精明眼镜行，西单有明明眼镜公司等少数几个。特别是在新式思想众多的王府井大街上，就缺少个能验光的眼镜店，大明眼镜公司开业后极大的满足了这些人的要

求。所以，大明眼镜公司天天顾客不断，生意兴旺，享名北京城。

在解放前，大明眼镜公司的职工，除极少数是北京当地人外，大多数是南方人。职工都是月薪制，住在公司里，伙食由公司免费提供。每天上午8时开业，晚7时上门停业。这个时间就是职工上班时间，其他时间由职工自由支配。每十天可休息一天。每两年，南方人可以有一个月的探亲公假。大明眼镜公司的职工管理办法，既不同于中国老式店铺的封建制的职工管理，也不同于西方式职员制。但是，从当时来说，是比较新式的。

北平解放后，1956年大明眼镜公司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商业网点调整时，将王府大街的孙孫良、晶眼，东安市场里的激石、振华、秀峰等眼镜行和亨得利、慎昌等钟表店的眼镜部都并入大明眼镜公司里，统称"大明眼镜公司"。并点后的大明眼镜公司就由菜厂胡同迁到了王府井大街营业。营业面积扩大了，验光室增至5个，车间除磨光外，还增加了镜片打眼、粘双光、电焊镜等设备，职工增至100余人。成为北京市一家大眼镜公司。

"十年动乱"中，大明眼镜公司被称为"封、资、修"，将牌匾摘下，改名叫"北京眼镜店"。1979年，改革开放后，"大明眼镜公司"老字号恢复。80年代，大明眼镜公司为了扩大营业，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它们先后从美、英、德、日等国引进电脑验光、磨镜片机等多台先进设备。从而使验光的准确度有了极大的增强。从而，对过去的"高、难"度数无法配制的眼镜，可以配制了。

"高"是眼镜的高度数。过去用叉片法验光，验到900度就算了不起的精尖技术了。1000度以上的近视或远视镜根本验不了。900度的近视和远视的眼睛度数虽然可以验出来，但是，磨出镜片，近视片像个小酒盅，远视片厚得像椭圆的小球。顾客无法戴。有了电脑验光机，不仅1000度不算什么，2000度近视和远视也验得很准确。引进的磨片机，磨制2000度的近视或远视镜片不仅可以，而且特别准确。再选用超薄片磨制，镜片度数虽高，但是镜

片却又薄又轻。顾客戴上这种镜片极其舒适。

“难”是顾客眼睛复杂，近视或远视度数既高，而且还有散光。或眼睛视物模糊不清，或看东西重影，这些都属“难”配之眼镜。自有电脑验光机，这些复杂难配之镜，大明眼镜公司都可以配。

以上这些都是老字号大明眼镜公司近年写出的新传。

七、新世界丝绸店

王府井大街路东的新世界丝绸店原名“新巴黎丝绸店”，是天津新巴黎丝绸店的分号，开业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由黄子枫任经理。

新巴黎丝绸店主要经营江南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特产的纯丝的宁绸、春绸、绮霞缎、素杭库缎、湖绉、凤凰纱、华丝葛、十两绸、八两绸、项衣绉、亮花缎等。还有山东的茧绸、大丝绸等。

新巴黎丝绸店派人在江南杭州、苏州等地采货。这种直接从江南办货不仅货物纯真、质量好，而且进价便宜。在北京就好销售。

苏州、杭州的丝绸在历史上久负盛名，中国人老少男女都喜欢它，外国人也拿它当做珍品。所以，从新巴黎丝绸店开业后，中外各界顾客进店选购各色丝绸的络绎不绝。从 1938 年开业至 1941 年，做了两三年的兴旺买卖，新巴黎丝绸店年年赚钱。但是，自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英、美、法等国绝交，发生了战争。日本在北平的占领军包围了东交民巷里美、英、法等国的使馆和兵营，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和官兵都失去了自由。从而，新巴黎丝绸店失去了一部份顾客，买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给日本人做事的警察、特务、伪军官买东西，经常不付款，因此，使得新巴黎丝绸店生意衰落，逐年赔钱。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新巴黎丝绸店的生意又有些抬高，买卖一度忙了起来。但是，不久内战爆发，物价不稳，货物上午卖出，下午就买不回来。店铺营业又陷入艰难之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新巴黎丝绸店参加了公私合营，成了人民的企业，深感自己的“新巴黎”店名，不是味儿。中国人的企业，那能起个外国首都的名字。经过斟酌才改称为“新世界”丝绸店。

旧东安市场的拆除，新东安市场的重建，由于新世界丝绸店，正在拆建范围之内。所以停止了营业，店堂拆除了。

八、萃华楼饭庄

萃华楼饭庄是以山东鲁菜驰名京城的一家老字号。萃华楼饭庄位于王府井大街北段，创办时正值北平沦陷，饮食行业极不景气的1940年。据《新民报》1938年12月27日，以“禁粮出境警局严令执行”为题：“本市自前月警察局查获庆丰粮栈及各项车贩等，私运各项杂粮出境，经讯明属实，业将私运之玉米及其他杂粮一千四百余石，全数没收充公”。这种不许粮食私运出境的政策，虽然是敌伪对解放区的封锁的办法，但是，也是北京粮食极端短缺的原因。不久，油、肉、煤炭也陷入恐慌之中。因此，从1940年至1944年，北京大多数饭庄、饭馆、饭铺等生意不振，而且有不少倒闭的店铺。惟独萃华楼在此危难之时开业，并发展起来，它凭的什么。

（一）萃华楼的菜肴色、形、味俱佳。

萃华楼采买的大肉、鱼、虾、鸡、鸭、燕窝、鱼翅等原料都是上等的，次料不管多么便宜也不用。也就是经营饮食业常说的，有好料才能做出好菜来。因此，当年萃华楼与肉市、鱼市、各大干果海味店都交买卖。货物任萃华楼挑选。

萃华楼对掌灶的厨师傅要求极为严格，不仅做菜时火候掌握的合适，而且切菜的刀工也要漂亮。曾为萃华楼创业流过汗的曲有功、吴行庆、于世杰等师傅所做的各种菜肴，看上去好看、大小菜段匀整，吃入口中，味道咸淡适中，香甜适度。特别是他们做的烩乌鱼蛋、葱烧海参、红扒鱼翅、清海燕菜、鸡茸龙须、香

蕉锅炸等成为萃华楼的名菜。

（二）萃华楼的店堂宽敞、典雅。

当年萃华楼的店堂虽是平房，但它拥有三个相连大四合院，其中前院一个大餐堂，可摆下十五六张方桌，供一百二三十人同时用餐。中院的餐堂布置得既豪华又典雅，当年一些军政界要人经常在此餐堂聚会进餐。

（三）"跑堂的"服务热情、周到。

旧北京将饭庄、饭馆的服务员，叫"跑堂的"，因为过去将餐厅叫餐堂或饭堂，服务员从厨房将菜端来，又将空盘、碟撤去，来回跑动所以称"跑堂的"。萃华楼选的跑堂的，年轻、干净利落、说话和气，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会迎合顾客的心理。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使萃华楼饭庄一开业就天天食客满堂，并逐渐地发展起来，直到今天。

九、中原公司

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中原公司是天津中原总公司的分公司。它开业于本世纪20年代晚期。中原公司是集资股份制，其股东约有上千人，设有董事会，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分公司的经理对总经理负责。分公司的人事部、财会部、业务部等负责人都对分公司经理负责。其管理制度都采用西方洋行的管理办法。北京中原公司前两任的经理是余万里、容原刚。这两个人对北京中原公司的创办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天津中原总公司和北京中原分公司的主要经营商品有布匹、丝绸、呢绒、皮毛、皮革、针织、香水、香皂、花露水、五金用品、鞋帽、钟表眼镜、搪瓷器皿、家用电器以及食品罐头、烟酒等。由于北京中原公司商品齐全，又由于公司位于王府井大街中间，游人多，营业繁忙，公司发展很快，职工从开业时30多人，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增至近200人。但是，就在公司迅速发展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年的刚入冬，由于纸烟头没有丢

灭，而引起大火将公司店堂全部吞没。后在天津总公司支持下，新店堂楼又在原地建起。重新营业也就几个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接着北平沦陷，北京中原公司的营业就走上了下坡路。这还不算完，不幸之事，一档子紧接一档子。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入夏后，华北各地连阴天雨下个不停，永定河等华北平原上各河流纷纷涨水，天津被淹，天津中原总公司大楼二楼都进了水。很多货物都被雨水所泡，损失惨重。大水退后，无力复业，北京中原分公司既拨款又拨货，在北京分公司支援下，天津中原总公司才勉强重新复业。天津总公司复业后不久，又着了一把大火。这次失火比上次被水淹，损失更重。北京分公司为了援助天津总公司重建营业楼房、筹备开业，又得拨款、拨货。连续不断地发生事故，使得北京中原公司大伤元气，营业难以振兴。由于北京中原公司，缺少资金、货源不足，所以，无法与同行竞争。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职工人数从原来的约200人，减至不足70人。

1949年北平解放时，北京中原公司已到了山穷水尽，无法维持的时候了。再加上解放后，商店的服务对象从有产阶级转向为工农劳动大众服务。但是，北京中原公司的库存货大多都是中档以上。当时又缺少资金进大众所需的商品，困难重重。最后经过北京中原公司全体职工协商同意，于1950年请求政府接办。从而，北京中原公司摘下牌匾，北京市百货公司利用北京中原公司原址，于1951年开设了“北京市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经销棉布、鞋帽、服装、百货、五金、钟表等大众商品，面向工农群众。

十、新记西服庄

据《最新北平市指南》记载：“本市自北伐成功后（1928年），各机关人员均着西服，而着中山服者亦不少。故西服庄却亦曾兴盛一时”。实际上，该书只是讲了北京西服庄行业兴盛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居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人和各洋行、外国人办的

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穿西服。因为王府井大街和东单一带是外国人和读书文化界常去的地方，故这一带西服庄多。当年，在这一带经营西服庄者多来自江苏、浙江等省，而以上海居多。并且这些西服庄多数是不销售西服等服装，而是承应来料做加工，挣顾客的加工费。

新记西服庄是上海人李秉德、李秉生兄弟二人于20年代，在王府井大街西侧霞公府开办。开始只有一间房子的“洋裁缝铺”（做西式服装的），为顾客做来料加工。由于新记裁缝铺做活手艺好，量、裁、做都很合体，而且样子款式新颖。所以，来此量裁做西服的逐日增多，生意越来越好。随着人员的增加，雇伙计，招学徒，店铺扩充，由原有的一间店房，增加了“量裁应活室”、“各种面料商品室”、“伙计做活室”等多处房屋。并将“新记裁缝铺”改称“新记西服庄”。

新记西服庄声誉传播王府井大街一带，尽管新记的加工费比别家高，但慕名登门量裁西服者还是天天不断。民国年间，是新记西服庄最兴隆的阶段，全店职工约有30来人。但是，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等国人来新记做西服的没有了，买卖开支，人不敷出。至1943年只能暂停营业。

1949年北平解放，新记西服庄以“新丰西服行”字号复业。这次复业扩充面料商品部份，虽然顾客自料加工的活还承应，但对顾客在本店选料量裁西服者，给以提前制做提前交活的优待。生意做到1956年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商业网点调整，与同行业合并，新丰西服行就不存在了。

十一、北京饭店

北京著名的北京饭店开始曾设在崇文门大街上。据一位叫邵宝元的北京饭店老职工，在一篇《忆旧北京饭店》中记载：“我从1900年开始，至1948年7月，48个年头在北京饭店服务。在旧

社会里，说不上服务，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那年正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攻到北京，在东城各处驻扎了兵营，于是酒店饭馆妓院也就应运而生。这年冬天，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有三间门面的铺房，由两个法国人开起酒馆来，一个叫傍扎，另一个叫白来地。……，不久，白来地就退股到长辛店开酒饭铺去了。于是这边又加入一个意大利人贝郎特，与傍扎合作。1901 年，小店生意兴隆，便迁到东单菜市西隔壁，才正式挂上了北京饭店的招牌。”又说：“经我在北京作事的哥哥介绍，就进了苏州胡同以南没有挂牌的“北京饭店”。那时我才 14 岁，为了生计，学着伺候洋兵，卖的是一毛两毛一杯的红白葡萄酒，下酒菜不过是煎猪排或煎鸡蛋，并不难作，到了东单，我管酒柜”。

不久，北京饭店的产权转到另一名意大利人卢苏的手中。1903 年，卢苏将北京饭店迁至王府井大街南口外迤西京汉铁路局旁的红楼中。卢苏经营了几年，1907 年卢苏又把北京饭店卖给了中法实业银行。由于当时的北京，经营新式饭店的极少，所以，北京饭店的生意日渐兴隆。北京饭店当时虽有房间 40 多间，但是远远不能满足营业发展的需要，1917 年，中法实业银行对旧楼进行扩建。新建成的北京饭店是红楼法式建筑，共七层，第一层有大厅、舞厅、西餐厅、理发室和厨房等。二至六层是客房，共 105 间。第七层是宴会厅、酒吧间等。此种建筑规模已超过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被称为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了。

1937 年，北平沦陷后，北京饭店转到了日本人手中，并更名“株式会社北京饭店”。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北京饭店。在这个时期，北京饭店曾做过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和谈”代表的驻地。

1949 年，北京市军管会接管了北京饭店。解放后，这四五十年是北京饭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根据接待海外宾客和旅游事

业发展的需要，1954 年，在北京饭店西建起了一座八层大楼，1973 年，又在其东建造了高 20 层的大楼（另外地下还有 3 层）。1985 年，在北京饭店西楼的西侧，与香港爱国企业家霍英东先生合资，共同建造一座贵宾楼。

第十章 东安市场

第一节 开始创办

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形式融为一体的，典雅、雄伟、壮观的、新的东安市场大楼已在王府井大街原址落成，不日就要迎接顾客，隆重复业了。

这座驰名中外的东安市场，从它1903年创办，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初办时是个简陋的“雨来散”市场

在清光绪末年，东安门外大街上两侧有许多小贩摆摊作生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提出疏导东安门外大街交通，将大青条石道路改修马路的计划。因此，将这些小贩都迁至一个已废弃的清八旗兵练兵场内。这个练兵场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金鱼胡同西口南侧，占地约30亩，周围有土墙，铁大门。

当时这些小贩不愿意往这里迁，因为东安门外大街过往行人多，买卖好做。这里空旷，没有人会往这里来。但是清政府的当地的地方官吏指定往这里迁，没办法只得迁来。迁来的小贩有推小车的，有担担的，随便占地，将小车、担子摆在什么地方都行，没人管。这些小贩，有的是卖豆汁、扒糕、烧饼等小食品，有的是卖铁锅、铁杓、笼屉等日用杂货，有的是卖棉布、针头线脑等生活用品，还有卖木枪、京剧花脸面具、空竹、风筝等儿童玩具的。总之，都是经营北京地方传统手工业商品的本小利微，小商

小贩。

这个练兵场改成小贩摆摊的市场后，刚开始，确实就像一些人估计那样，不仅顾客很少，就连闲逛的人都很少。干了几天，有的小贩因为几天都不卖钱，天天赔本；坚持不了，就不来了。但是，也有新来此摆摊的。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小贩们来来往往不断。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宫内一个姓王的大太监看中了这个练兵场改市场的地方，他拿钱在这个市场的东北角盖起了一个简陋的茶园，让别人替他经营。为了吉利就将这个茶园命名为"吉祥茶园"。这个茶园里经常请来一些京剧、曲艺、戏法等演员在此献艺。茶客只需付茶费，看演出不必另花钱。因此，招来很多的人到吉祥花园来喝茶看戏。当年北京人，不论男女和老少都喜欢京剧、京韵大鼓、单弦牌子曲等演出形式。但是，从清帝进关，在北京做了皇帝后，就明令内城不准建戏园。所以，内城人要看戏必须出前门去看。吉祥茶园开业后，极大的方便了家住内城的人，并且花壶茶钱就可过戏瘾。因之，吉祥茶园天天高朋满座。由此，这个市场游人多了，买卖也日渐兴隆。到这里来摆摊做买卖的越来越多。小贩们增多，他们之间争夺摊位之事不断发生，而且有时导致口角和互相殴斗。由于小贩们不断地发生争摊位互殴之事，京师内城巡警总厅鉴于此，就派人进行管理，整顿摊位，让摊贩登记。这个市场已经形成，必须有个场名，经研究，因为这个市场距东安门很近，又因为开始时是东安门外大街的摊贩，最先开辟这个市场，所以命名为"东安市场"。

东安市场发展到光绪末年时，已是北京内外城有名的繁华的大市场了。就如清宣统元年(1909年)，刊印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上写的"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作者在其这首竹枝词后，附注"各处创立市场，以供就近居民购买。东安市场货物纷错，市面繁华，尤为

一时之盛”。从这个小注我们知道，当时北京创办市场，不只是东安市场一座。还有哪几个市场，可惜，关于这方面记载很少。其他市场都是昙花一现就结束了，只有东安市场发展至今天。

虽然如此，东安市场在清宣统年间时，大多数做买卖商贩还是早晨支棚、支木板，临时设摊亮货物做生意，到傍晚拆棚拉货回家。盖简易房屋开店铺只是少数。所以，当时东安市场还是个“风来收，雨来散”的露天市场。

第二节　几次重建——形成布局有序大市场

东安市场所以能发展成为场内街巷纵横交错，店房栉比鳞次，上建铁罩棚，下道路平整的大市场，是与全市场商民同灾害的抗争分不开的。

东安市场到了民国元年（1912 年）时，许多商民已建起了店房。这些店房沿着北门两侧向南，成了东安市场的主要街道——“正街”。为了方便王府井大街过来的游客，除通向金鱼胡同的北门外，已建成了西门。由于东安市场天天游客如云，各店铺、摊商买卖兴盛，各处的商人都想方设法往东安市场里挤。这些商人都不惜出重金，托朋友拜亲戚在东安市场给寻块地方。不用说店铺，就是在正街上，找块长六尺多，宽四尺的摊位，就得用银元两千块。真是“寸金寸地”。

正值东安市场迅速发展之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功。1912 年元旦，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 月，南方和北方发生了建都南京与北京之争。袁世凯阴谋制造了“北京兵变”，因这年是夏历的壬子年，故又称“壬子事变”（这段历史前文交待过，所以略讲）。这次兵变，东单、王府井大街一带闹的最厉害。因为南方来的蔡元培等五位代表就住在东单以北的煤

渣胡同里。禄米仓里和帅府园里的驻兵纷纷出动，闯进东安市场先挨户抢，抢完就放火烧。顿时，东安市场火光冲天，成了一片火海，全场没有一户幸免。

据当年东安市场里老商户漱石眼镜行经理杜圭臣回忆：东安市场遭兵劫、火灾后，当地政府已看出东安市场是个生财的"宝地"。想将东安市场收归官方所有，不让商民重建。东安市场的商民闻讯后，各个又急又气，经全体研究协商，于民国二年（1913年）2月，选举产生了东安市场商民公益联合会。稻香春南味食品店经理张春山为会长，中兴百货店经理傅心斋、东来顺羊肉馆经理丁德贵、美香村南味食品店经理党乡洲、漱石眼镜行经理杜圭臣等四人为党委。经过他们与京师内城巡警厅驻东安市场管理处的多次讲道理力争，多方托人情想办法，才将全体受灾商民的店房的建设权和摊商摊位使用权夺了回来。

东安市场重建时，一些商人通过各种关系乘机挤了进来。新增加的商户有：会贤球社、怡生照相馆、中兴珐琅店、庆兴斋古玩店、振亚药房、志成金店、文华阁纸店、美华鑫鞋店、全素斋素菜、森隆饭馆等。规模又进一步扩大，并增开了中门和南门。新建成的东安市场生意更加兴隆。

从1913年，东安市场重新建成，到民国九年（1920年），各店铺、各摊商的生意红火六七年后，1920年6月9日夜，东安市场又一次着了大火。由于市场内店房一家紧接一家，摊位更是比比相连。而且两侧是店房，中间是货摊，整个市场没一些空隙之地。以致火势向四处蔓延，不好扑救。这次大火，经过众多消防队的抢救，除北门的东来顺羊肉馆、吉祥戏院、稻香春南味食品店和豫康东纸烟杂货店等少数几家店铺外，其余成了一片灰烬。关于这次大火的起因，盛传是，一家玩具商店因买卖亏损，欠债无法偿还，企图放火将自家店铺烧毁而了之。万没想到大火烧了大半个市场。经调查又没查到该玩具店经理放火的确切证据，只以

“不戒于火”的结论，不了了之。各受害商民只可自认霉气而已，重新筹资再建吧。

这次重建，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火措施。特别对店铺和摊位众多，密度最大的正街，这里容易起火而不好扑救。加宽道路，道中摊位紧缩，使两边行人道路畅通。两边行人道，也是防火救火之道。重建竣工的东安市场，依然以南北走向的正街为主干道，正街北端即是金鱼胡同的北门。正街之东是东街，西边是西街。与正街交叉，有三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称头、二、三道街。头道街西头就是通往王府井大街的西门。二道街和三道街的是个空场，此处是茶馆说评书、说相声、变戏法、摔跤练把式的“杂耍场”。正街的南头是“南花园”，南花园西侧开有通向王府井大街的南门。在西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中间。此外，在正街的西边，从北往南，依次是，青莲阁、畅观楼、丹桂商场、中华商场、桂铭商场等。正街南头西侧是东庆楼。南花园西边是霖记商场。在正街和其他一些主要街道上并支搭起铁罩棚。

东安市场这次建成，其规模之宏大，店铺和摊位之众多，在北京当时市场和商场中居于首位。据1933年12月统计，东安市场全场共有商户925家，其中铺户267家，摊户658家。

中国传统商品和西方洋商品，兼而有之。

东安市场里经营中国传统商品的商户，除前文已提到外，还有文信号、福丰祥、福裕、日升东、文信号、泰祥成等绸布庄，中原、瑞林、美华馨、美华丽、和顺、妙香室、瑞华号、荣华鑫等鞋庄，大鸿楼、东亚楼、东黔阳、会元馆、森隆、五芳斋等饭馆，稻香村、南味食品店，森春阳南货庄，公兴顺、公兴和、鲜果庄，庆林春茶庄，汉文阁文具店，庆兴斋古玩铺，春明、新志、华英、五洲等古旧书店，钢刀王。此外，还有卖北京地方风味的小吃摊。

东安市场从第一次失火重建到第二次失火重建，大量的进来许多经营西方洋货的店铺和摊位。如大北、宏大、青年、华北、馨

华、集成、荣发祥公记等西服庄，佳美丽、美中美等皮鞋店，森隆蕃菜（西餐）馆。生昌、明明、霞光等照相馆。此外在摊商中还有许多经营西餐餐具、照相机、望远镜、西洋钟表等商品的。

第三节　著名老字号

一、“母子店”——豫康东纸烟杂货店

豫康东纸烟杂货店在东安市场里是个不显眼的小纸烟杂货店，但名声很大，是当年东安市场里一家著名的老字号。后期，店主老掌柜刘振远故去，内掌柜带着少掌柜刘凤鸣支撑着买卖，人称“母子店”。

刘振远最早是在东安门外大街摆纸烟摊为生。东安门外大街货摊被赶到练兵场，刘振远随着大家进入了这个新建立的东安市场。当时，纸烟是个新商品，是由西方欧美商人传进来的。所以，人们都叫它“洋烟卷”。抽纸烟的客人，不是洋人就是知识界的教授、文艺界的演员、洋行里的高级职员或机关的上层人物。卖纸烟利钱大，容易赚钱，特别是经营高档的外国烟草公司生产的名牌洋纸烟更能赚钱。刘振远在东安市场就是以经营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纸烟为主，由于刘振远为人勤奋，又善于经营。没几年就发展起来，在东安市场北门内路东头一家开设了豫康东纸烟杂货店。

英美烟草公司是英美两国商人在中国合办的企业，他们在我国的上海和青岛设有卷烟厂，收山东省潍县廉价烟叶，运到工厂，雇用中国人为他们加工制造名牌的纸烟。在我国各地行销，赚中国人钱。后来，中国商人也办起来卷烟厂，有名的是两家，一家叫华成烟草公司，另一家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同洋人的英美烟草公司竞争。在竞争中都使出了各种促销的手段，做广告宣传、创牌子。当年，纸烟牌子很多，比较有名的是“红锡包”、“哈德

门”、“老刀”、“金枪”、“飞艇”、“长城”、“大粉包”、“大前门”、“品海”、“三炮台”等。

烟草公司在生产中往烟盒里放“小画片”是一种很有效的促销手段。因为纸烟，俗称“洋烟卷”，所以把这种小画片叫“洋画”。很多烟盒里都放入了洋画。而且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更吸引人。其中最让人喜欢的是“品海”烟盒里边放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洋画儿。而且“水泊梁山”洋画成套，有的人总想把一百单八条好汉凑齐，但是买了几年的烟，抽了几年的烟，总也凑不齐。另外，“大粉包”中的《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人物洋画，“哈德门”中的足球运动员洋画也都很好，招人喜欢。

豫康东的掌柜刘振远故去后，买卖就由他的夫人携其子刘凤鸣接手，买卖依然很不错。由于母亲和儿子经营豫康东店铺，所以，后来人们都习惯叫之为“母子店”。这时的母子店，虽然还是以经营纸烟为主，可是，打火机、火石、汽油、烟斗、烟丝和针头线脑等商品增多了。1956 年，豫康东参加公私合营，1958 年合店后，豫康东就撤点了。

二、东来顺羊肉馆

东来顺羊肉馆的创办人是清真教徒丁德山。丁德山家住东直门外，家境贫寒，他同他的二弟丁德富，三弟丁德贵以卖黄土维持生活。就在 1903 年，东安市场创办时，他也向发家致家的道路上起了步。

卖黄土现在的年青人可能没听过，可是在过去也算个行当。像北京城里人买了煤末子加上黄土才能摇煤球。修建住房也需用黄土与灰合在一起合成“叉灰泥”抹房。所以，过去农村人和城里无业之人，只要有辆排子车，一把铁铲就可以开张。丁德山卖黄土时，经常到东安门外大街、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来。他看东安门外大街上的小商小贩都到清八旗练兵场做生意，认为这是个

好机会，于是求亲戚借点钱买了一些摆摊用的家什，又找人借了一口铁锅小买卖就开张了。开始丁德山卖的是豆汁，因为卖豆汁用不了多少本钱，用几个大枚，就在粉房买一大铁锅的豆汁，再花几个大枚在油盐店买些淹咸菜就行了。头天开张，豆汁就全卖出去了。这对丁德山是很大的鼓励，增加了信心，决心干下去。后来又添上小米面的贴饼子。

丁德山是个不怕吃苦，肯付辛苦的人。本来在东安市场摆摊，买卖不错。他为了多赚钱，每遇春节厂甸时，他必赶去摆摊做买卖。东安市场的生意也不丢，让他兄弟经营。丁德山很会动脑筋，知道揣摸顾客心理，他常对他的两个兄弟说，要是咱们在外面吃东西，要找那干净又价钱便宜的地方吃。所以，他总是将货摊拾掇得干净漂亮，让人看着从心眼里痛快。如此，辛辛苦苦的干了两年，就积攒下几个钱。三年后，在东安市场北门不远的地方，盖了一间简易小屋，挑出了“东来顺”的招幌。为什么叫“东来顺”呢？因为他家住东直门外，是从东直门来这里做买卖的，“顺”是求事事顺心吉祥如意。

有人可能说，因为丁德山将自己的买卖起的名号好，所以，买卖才发了起来，东来顺字号才出了名。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是丁德山，就是现在的企业家，给自己买卖起字号也找好听的起。谁也不找那不好听的，不吉利的字眼。都是好字眼，吉利的字号，但是，有的就干起来，有的没干多少日子就垮台了。咱们现在还说丁德山的东来顺，为什么能干起来，享了大名？一、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东来顺的招牌挑出去后，当时主要经营的是馅饼和小米粥及简单的几样小菜。他为了降低成本，在东直门外住家不远的地方，租下一块菜地，让他母亲帮助他的妻子种菜。东来顺用自己菜地生产的既新鲜，成本又低的菜做馅饼和小菜。比买菜商的自然便宜多了。二、商品售价要比别家便宜。也就是食品质量要好还要便宜，因为东来顺的成本低，同样的食品，东来顺比别家

卖的价钱稍低些也比别家赚得多。过去，丁德山常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就来"。这就是丁德山将东来顺干起来的真谛。

1912年，东安市场第一次大火后，丁德山决心大干一番。将平房改建成楼房，并从1914年，改为"东来顺羊肉馆"，多添上几个伙计和学徒，增添上涮羊肉和清真炒菜。这次丁德山还是采取原来的办法，他在东直门外买下了几百亩土地。用一些地做牧羊的牧场，一些地种粮食种菜。涮羊肉要选用西口羊或北口羊，西口指甘肃、宁夏等地。西口羊团尾（向内卷的小尾）、骨架小、粉肉白膘、香嫩不膻，毛细长因为生长在黄河河套滩地一带，所以又称"滩羊"。北口指张家口、张北、库伦等一带。北口羊仅次于西口羊。北京的当地羊，大尾，毛粗肉糙，又膻又臊。当年，德胜门马甸是北京最大的牛、羊、马市。羊贩子从西口或北口赶来的羊群都在这里找主卖出。东来顺特别选买西口羊，将羊赶至东直门外的牧场，交给雇工牧放。只供应饲料，不开工钱，用羊粪顶代工钱。入秋，羊已喂肥，也到了涮羊肉的旺季了。并且随宰随赶，牧场备用羊不断。

东来顺羊肉片切得薄。他们把羊宰杀后剥了皮，专选用羊的最适合涮着吃的部位，如羊后腿。其他部位留给炒菜和做馅饼用。用作涮肉的羊肉要经过"压肉"才能切肉片。压肉时，先找一块干净地方，放好天然冰，上复一层席箔，把羊肉码在上面，在羊肉上再盖上油布，油布上压冰块，这就叫"压肉"。把羊肉压过一天一宿，羊肉里的血汤和杂味都吸出，这样肉挺直好切。这种"压肉"比冻肉好，因为冻肉同冻白菜一样，破坏了羊肉的组织，使其失去了嫩香味，就不好吃了。涮着吃的肉片，切得薄才能下锅就熟。关于肉片切得薄，当年以前门外肉市里的正阳楼有两位师傅最有名，他们切的肉片，是约4寸长，1寸左右宽，薄如纸，1斤要切出80片。1940年，正阳楼歇业后，东来顺将这两位师傅请

来。从此，东来顺的涮羊肉就更有名了。

东来顺的涮羊肉，不仅肉嫩，肉片薄，而且佐料全。准备的佐料有高酱油、米醋、小磨香油、酱豆腐、生芝麻酱、熟芝麻酱、韭菜花、卤虾油、辣椒油、花椒油、料酒、糖蒜、白菜头、小芥菜、咸韭菜、香菜、酸菜、粉丝、冻豆腐等。在火锅里还应放入一些鲜口蘑。顾客吃涮羊肉，过去东来顺都是先问，您是吃肥的，还是吃瘦的，或是不肥不瘦的？吃肥的，给上“小三叉”。吃瘦的，给上“上脑”。吃不肥不瘦的，就给上“大三叉”。让顾客自己挑选。等顾客快吃好了，就给上一碗绿豆杂面。绿豆杂面能吸油腻，一碗绿豆杂面既吸去火锅中的浮油，又可去掉人嘴中的油味。以上这些佐料，大多是丁德山东直门外土地生产出来的，经过加工，让东来顺使用。开始东来顺没有小型油、醋、酱油、芝麻酱等加工作坊，后来开办了天义顺酱菜园后，这些佐料的供应都由自家的店铺提供。所以，质量高，成本低。哪家同业都无法与东来顺竞争了。

东来顺到了40年代，已经是个大饭馆了，在北平城算是声名显赫的名店了。但是它还经营馅饼、小米粥、绿豆杂面等大众食品。东来顺的西边楼房里是吃涮羊肉，各种炒菜的地方，设有大餐堂和讲究的单间雅座。东边平房里摆有长平板桌，长条板凳，是一般百姓吃馅饼，小米粥大众食品的地方。

现在的东来顺已发展成有几家连锁店的大饭庄了。到东来顺吃饭的，不仅有北京人，而且有外省市人；不仅有海外华侨，而且有国际友人。并且经常有外国政府贵宾光临东来顺品尝涮羊肉。外国友人吃东来顺的涮羊肉，都给以很高评价，涮羊肉好！

三、全素斋

全素斋的创办人是刘海全，在原东安市场的南花园。因为，甭看其菜名，有“扣肉”，有“红烧肉”之名，但是原料都是素的，所以，称“全素斋”。

早年，刘海全曾在清宫御膳房当过差，学会了烹饪的技艺，特别对做素菜有两下子，很拿手。刘海全在清宫御膳房当差，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已到摇摇欲坠的时候了。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遑逃出京城到西安避难。刘海全随着宫内太监和其他夫役也离开清宫。俟八国联军撤走，慈禧和光绪回来后，刘海全因为厌恶宫内生活，所以宁愿另谋生活，也不愿在宫内做奴仆了。他为了谋生，在社会上闯出一条路，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进东安市场摆摊卖素菜的。开始在正街东侧设摊，后来才迁到南花园营业。说是摆摊，实际是找木工建造的不大的木结构小商亭。上写“全素刘”的招牌。当年，南花园是东安市场全场比较冷落处所。但是，“全素刘”用清宫御膳房的烹调方法做出的各种素菜，由于色、香、味、形俱佳，而且价钱公道，所以，天天供不应求。每天都有因买不到“全素刘”的素菜，扫兴而归的顾客。

刘海全的素菜是在家中制作而后运到东安市场销售。刘海全对素菜的质量极为重视，从选料到操作都按当年御膳房的传统方法。刘海全制作的素菜，不仅是他在摊位卖的炸三角、松肉疙炸合、素什锦、素火腿等十几种花样。实际他会做的素菜不下一二百种，可以配套成整桌的全素宴席。他做的整只的鸡、鸭、鱼、肉、对虾等，不仅形态逼真，而且味道酷似。

“全素刘”的鼎盛时期是 30 年代，当时，爱吃素菜的人很多，北京各大寺庙作佛事，信佛人家在寺庙办丧事等都要制办素席。这时的“全素刘”除每天为东安市场照例制作约 40 斤素菜，在货摊销售外，还应外请，为寺庙做全素席，为信佛人家办丧事去办厨。刘海全家就靠人多，妻子、儿子、孙子全家动手，一天到晚的忙，有的时候白天没干完，就打通宵。

但是，从 1937 年，日本占领北平后，直至 1948 年，北平解放前夕，“全素刘”的生意始终萧条，维持门市的状态。1953 年，

"全素刘"改名"全素斋"，买卖开始兴旺起来。参加公私合营后，全素斋从狭小的东安市场南花园货摊，迁至王府井大街营业，前边门市售货，后边是制作间。全素斋为了扩大经营，使远离王府井大街的人也能吃上美味的素菜，1986年后，他们除在城区设专柜外，还在通县、石景山区都设了全素斋的素菜专柜，生意越作越红火。

四、稻香春南味食品店

稻香春南味食品店是东安市场的老店铺，位于市场北门路西，是江南人张森隆于民国五年（1916年）创办的。稻香春的职工虽然有些北京当地人，但是制作间的制作糕点的师傅和前柜的售货员都是江南人。从而使稻香春加重了南方的风味。

稻香春自产自销的南方糕点杏仁酥、核桃酥、八珍云片糕、水晶绿豆糕、猪油核桃糕、大小奶油蛋糕、五香麻糕、罗卜丝饼、枣泥麻饼等别具风味，不仅客居北京的南方人爱吃，而且北方人也赞不绝口。除自产自销南方糕点外，还自产自销虾子酱油，芝麻辣酱、糟青鱼、糟鲥鱼、糟鸡、糟鸭、熏鱼、熏虾，熏肉等南京、苏州风味的酱菜。此外，每逢我国农历传统春节，稻香春特从南方运好江米，磨成细面后，做成南方的年糕，苏州式枣泥、豆沙、火腿等元宵出售。到中秋佳节时，则生产广东和苏州中秋月饼销售。

稻香春的生意从开业起，就很红火，名声传播北京的内外城。这与稻香春生产、经营南方糕点、酱菜、选料精、作工细，货色齐全有关，但是，也与经理张森隆善于交往有关。张森隆曾任东安市场商民公益联合会的会长，在市场第一次大火受灾后，为维护全市场商民的利益出过力，在市场中声望高。后来一度曾为北京市商会的理事。这些身份对稻香春的发展极为有利。

稻香村南味食品店开业后，对稻香春的营业有很大的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在此期间，由于日伪对北平

地区物资的疯狂掠夺，稻香春使用的面、油、糖等原料的缺货，物价不断上涨，致使稻香春的生意陷入困境。恰在此时，一个叫刘松泉的在东安市场内北门里路东开设了“稻香村南味食品店”。这个刘松泉原是稻香春的职工，他领了一个有钱的财东后，才离稻香春开了这号买卖。稻香村的经理刘松泉从日本三井洋行进油、糖等原料，比稻香春条件好，自设工厂，其产品也是南方糕点和酱菜。从此，稻香春与稻香村这两家同行就展开了商战。互相提高产品质量，互相降低商品售价，各不相让。稻香春为了弥补其正品商品南方糕点、酱菜方面亏损，增添了奶油冰激凌，冰砖等冷饮。稻香春的冷饮销路很好，由于有了此项收入，才能使稻香春和稻香村坚持竞争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

解放后，稻香春成了国营企业。1965年，稻香春在和平里西街开设了稻香春分店。1988年，东安市场集团成立了稻香春食品公司，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目前，东安市场正在改建扩建中，所以，稻香春食品公司在东安市场的经营部也正在筹建中。

五、森隆中餐馆和西餐馆

森隆中餐馆和西餐馆（曾称蕃菜馆）是张森隆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东安市场北门内稻香春南味食品店楼上，同时开办的。二楼是森隆西餐馆，三楼是森隆中餐馆。

张森隆开办森隆西餐馆纯是迎合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特别是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外国游客多，具有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多，所以，开办了这个西餐馆。这个西餐馆，以经营英、法大菜为主。到了北京沦陷期间，因为日本人增多，所以又增添了日本菜。张森隆极会迎合顾客的心理，即是西餐馆，就餐的客人多是外国人和具有西方新思想的中国人，所以，餐馆的设备就应一律西洋化。坐椅除了包厢式皮革高靠背椅外，就是大皮革沙发。餐桌是镀克罗姆钢架镶瓷砖桌面的长方形餐桌。因为，当年经营西餐的餐馆很少，所以，森隆西餐馆开业后，营业一直很兴隆。

森隆中餐馆的餐厅有为100余人同时用饭的大厅，还有供4至8人就餐的小间雅座。整个餐厅都是一律明、清式硬木桌椅，墙上挂着名人的书画，显得十分典雅。

中餐馆菜肴以供应江苏风味菜为主。该中餐馆擅长做松鼠桂鱼、蟹黄狮子头、金钱虾酥、松子肉等。当年森隆的江苏小吃也极受顾客的欢迎，像冬菜包、烧麦、炸荸荠、银丝卷、酥饺、八宝饭、炸臭豆腐等都是供不应求的。森隆中餐馆曾名噪一时，当年很多社会文化界名流，梅兰芳、吴素秋、侯宝林等都经常光顾森隆中餐馆。

1956年，森隆中餐馆参加公私合营，西餐馆撤消。1968年东安市场改建时，森隆中餐馆撤消。1979年，在东四北大街路东，江苏餐厅改称“森隆饭庄”，老字号恢复了。1988年，森隆饭庄改建成有二层楼房的新店堂。仍以江苏菜为主，现在的松鼠桂鱼、炒鳝鱼糊、砂锅鱼头、红烧元鱼、罗汉大虾、芙蓉蟹斗、菊花火锅、冬菜扒鸭、牛冲猴头、蟹粉狮子头是森隆饭庄的拿手十大菜。

六、五芳斋江淮饭馆

原东安市场东街的五芳斋是一个叫汪志浓的人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开办的。其店名取自上海糕团名店“姑苏五芳斋”。因为姑苏（苏州）名点糕团的原料是米粉、芝麻、桂花、松花、玫瑰花五种，故名“五芳”。五芳斋在上海是极其著名的店铺，后效仿其名者日多，20年代，全上海叫五芳斋的不下几十个。这几十个五芳斋都以经营江苏风味菜肴或苏州糕团为主。

五芳斋初开业时，以经营南方糕点小吃为主，后逐渐增添江苏风味菜肴和淮扬菜等。买卖迅速兴隆起来，成为东安市场的一家名饭馆。五柳桂鱼、清蒸元鱼、白扒鱼翅、罗汉大虾等是五芳斋的名菜。特别是以火腿丁、鸡脯丁、虾丁和香菇丁为原料的“五芳四宝”是五芳斋的创新菜，为五芳斋独家所有。

1968年，东安市场改建时，五芳斋迁至原市场北门森隆餐馆

旧址营业。现其店堂随着东安市场的改建而改建中。

七、潄石眼镜行

潄石眼镜行位于东安市场中最繁华的“正街”中间处，是当年北京市眼镜行业有名的“三杜”大爷——杜圭臣于东安市场建场初期开业的。

杜圭臣、杜杰臣、杜泽臣弟兄三个，杜圭臣行大。弟兄三人都从事眼镜业。在他们幼小时，家中贫寒，三个人都没念两年书，就都出来摆摊作小买卖。在作生意的过程中，看出卖眼镜能赚钱，于是三个人就都做起卖眼镜的生意。当年，北京的庙会、集市很多，庙会集市上游人多，买卖好做。像正月里的前门关帝庙、广安门外的财神庙、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德胜门外的大钟寺等，二月里有崇文门外的太阳宫，三月三的蟠桃宫，四月的金顶妙峰山，五月的花市东边的卧佛寺，六月右安门外的“中顶”，七月的江南城隍庙，八月都灶君庙等，这些庙会他们三个人都去赶。但是，赶庙会太累，今天这，明天那，没有长地方。后来，杜圭臣看东安市场可以天天做生意，于是就在东安市场里找块地方摆起了专卖眼镜的货摊。

杜圭臣是个急公好义，肯于为大众办事的人。杜圭臣在东安市场里开办的潄石眼镜行本是个摊位，南北长约 2 米，东西宽约 1 米多。家又离市场很近，住在西堂子胡同西口内。本来可以不用雇人，自己一人干，中午家里人给送饭就可以了。但是由于 1913 年他被推举为东安市场商民公益联合会的四个常务理事之一后，他就义务的为全市场商民服务。开会，跑前跑后，任劳任怨。在与京师内城巡警厅争得建筑权后，杜圭臣完全可以找块地方建个店铺，但他没有这样做，只在“正街”摆了个摊位。他为了继续为大家办事，雇了个伙计看摊做买卖，他整天在商民公益联合会接待来访者，并与社会各方面联系解决问题。在市场，1920 年第二次失火又重建时，家里人，亲戚，朋友都劝他乘机建个店铺。而

且还有人对他说，缺少资金我给解决。但是，最终还是没听劝，依然是在原地摆眼镜摊。他将几个建店铺的地方都让给别人了。所以，潄石眼镜行至1949年，40来年始终没有发展，还是大小不动的眼镜摊。

后来，杜圭臣的后代没有继承其业者，自公私合营后，潄石眼镜行并入大明眼镜公司后，潄石眼镜行就不复存在了。

八、“钢刀王”

过去一提“钢刀王”没有不知道的。其实这个赫赫有名的“钢刀王”在东安市场南花园不过是占地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售货亭而已。

“钢刀王”是人们送给小手工业者王万青的美名。王万青为人勤奋，头脑活，富于创新精神。他于民国初年，在东安市场南花园小售货亭卖小钢刀。他的钢刀质量属于最好的。质量虽好，但钢刀的外形老，销路不畅。而有的同业做的刀子质量不如他的好，就是样子比较新，比他的钢王卖得快，受欢迎。这对王万青是个极大的启发。王万青仔细观察东安市场其他店铺和摊位的售货情况和到东安市场的游人之身份。他认识到，东安市场的游人以外国人和思想维新的中国人居多。质量好的老式钢刀在别处是畅销货，但是，顾客变了，人家就不买。由于王万青看准了当时东安市场的潮流，认识到要做好买卖，必须革新产品外观。生产销售的小刀，不仅是能裁纸、削水果，还必须是外观漂亮、新颖，是个可欣赏的玩物。

王万青经过多次试制、试销，最后制做出长只有3寸，外形精巧、别致的小宝剑、小宝刀型的钢刀。这种新产品一上市就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生产多少卖多少，天天脱销。这种新产品除在东安市场销售外，外地各省市也来找“钢刀王”订货。后来，远销至东南亚各地，成为东安市场很有名气产品。

1956年“钢刀王”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并入王麻子刀剪

厂中。

九、东安市场的风味小吃摊

东安市场的风味小吃，既多、全而且物美价廉。这些风味小吃摊都聚在市场东街的东边，与“杂耍相声场子”杂处。

东安市场的风味小吃有罗丝转、糖耳朵、芝麻烧饼、牛舌饼、墩饽饽、炸糕、排叉、糖三角、蜂糕、豌豆黄、艾窝窝、豆面糕、豆汁、杏仁茶、面茶、油炒面、盆糕、麻花、豆腐脑、爆肚、焦圈、吊炉烧饼、蜜饯白薯片等。这其中不乏著名者。

东安市场中卖豆腐脑的以回民马最有名，人称“豆腐脑马”。他家的豆腐脑，豆腐既白又嫩。卤是用鲜羊肉切成薄片，佐以小茴香、花椒、大料、口蘑、木耳等勾出稠稀适度，味道香美的卤。豆腐脑盛在红花瓷碗内，放些卤，加些蒜泥。爱吃辣的再放些辣椒油。“豆腐脑马”还准备小火炉烤着芝麻烧饼。以备顾客买取就着豆腐脑吃。

“爆肚王”爆的牛、羊肚子最受顾客的欢迎，食者特别的多。其实过去在北京卖爆肚的人到处可见，为什么东安市场的“爆肚王”的买卖如此兴旺呢？一是肚子新鲜，因为“爆肚王”没有存肚子，天天来货，天天卖完，所以新鲜。二是拾掇得干净，牛、羊本是脏东西，如果拾掇得不干净，顾客吃到嘴里才恶心呢。“爆肚王”将新肚子趸回来，家中人一齐动手，先将肚子翻过来，用碱水泡，而后一遍一遍用清水洗个干净。所以顾客都说，“吃‘爆肚王’的爆肚放心，就是干净”。他们将肚子洗干净后，按“肚领”、“散丹”、“肚板”、“肚葫芦”、“肚蘑菇”拉下分类。在摊上卖时顾客要什么，就给爆什么。“爆肚王”的佐料也全，有芝麻酱、香油、酱油、米醋、虾油、酱豆腐、葱花、蒜泥、辣椒油等。有的顾客用爆肚下酒，有的是吃夜宵。

“豆汁何”是东安市场里有名的人物，凡是常去东安市场的人，没有不知道“豆汁何”的，也没有不去他的摊喝碗豆汁的。北京

的豆汁和天津的锅巴菜一样，是极有代表性的地方小吃。老北京的男女老幼没有不爱喝豆汁的。“豆汁何”的豆汁有固定的粉房供应，他要的是粉房做绿豆粉丝剩下的碎渣。取回家再用砂锅、槟榔勺熬成。所以，“豆汁何”的豆汁既酸又甜，而且营养丰富。喝豆汁，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喝法，有社会地位的人，在正餐后上碗豆汁喝。据说，京剧大师梅兰芳曾用“豆汁何”的豆汁招待宾客。劳动大众在吃窝头、焦圈、咸菜时，喝豆汁。

东安市场的冰糖葫芦是极富特色的

上面我说的东安市场的风味小吃是在杂耍相声场处，冰糖葫芦摊是在市场的正街与头道街十字路口处，也就是全场最热闹处。这里东、西、南、北，每边都有个鲜果摊，他们的鲜果摊，无论黑夜还是白天都点着个100度大灯泡照得明又亮。四个鲜果摊既卖应时鲜果，也卖过时货，像冬天，这里有西瓜。他们除卖鲜果外，还自粘冰糖葫芦卖。这里的冰糖葫芦品种多，过去在别的地方只能买到一般“山里红的冰糖葫芦”和“海棠的冰糖葫芦”或“山药的冰糖葫芦”。而这里除以上说的三种外，还有夹核桃仁、夹枣泥、柑桔、荸荠、葡萄、山药豆等冰糖葫芦。而且这里的冰糖葫芦果子都个大、甜，糖脆不粘牙。

十、东安市场的娱乐场所

东安市场里的娱乐场很多，有大戏园子，吉祥戏园，有票友自娱自乐、清唱的东安楼，有书茶馆，有“百戏杂陈”所谓“杂耍场”。真是屋内的，撂地的；高雅的，大众化的都有，任凭选择。

演唱京戏的吉祥戏园，丹桂茶园、中华舞台等几处中以吉祥戏园规模大，经常有名演员演出。像早年的谭鑫培、金秀山、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李万春等都曾在此演出过。

“杂耍场”，关于“杂耍”是过去老北京对相声、大鼓、单弦、变戏法、跳火圈、武术、评书等的泛称，也称“什样杂耍”。东安

市场的"杂要场"如果跟天桥比差些，因为没有天桥地方大，但是从曲种说不见得少。演员也都是名演员。像说相声的高德明、绪德贵、汤瞎子（汤金城）、赵蔼如，说评书的王杰魁、品正三、连阔如等都是当年极负盛名的演员。

十一、东安市场的古旧书铺和新书店

为什么当年的学者、专家胡适、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等社会名流时常去光顾东安市场，就是因为东安市场有很多的古旧书铺和新书店。这些书铺和书店都集中在西街、丹桂商场、中华商场、桂铭商场等处。这些地方有大小书铺和书摊约50个左右。他们经营的图书种类，有线装的古书，有新出版的新书，有字画、碑帖、文具用品，还有鼓曲唱词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在书的种类方面货物齐全。这些书包括古今中外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美术图片、世界文学名著和英、法、德、俄文书籍。

就是因为人们进入东安市场后，可买需要买的物品，可游逛，可看大戏，可看鼓曲杂耍，饿了可进饭馆吃饭，可去吃风味小吃；所以它的游客，既有清代的遗老遗少、官僚、太太、小姐，也有穿西服革履和新式旗袍绣花鞋的男士和女士；既有城市的劳动者，也有农村的富有者；既有东洋日本人，也有西洋欧美人。游人十分广泛。

第十一章　东单地区

第一节　东单的历史沧桑

一、东单地名的得名

我们说的东单，不是只指东单这个短街，而是将它周围一带地方都包括进去，如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东段、建国门内大街等都算上一起介绍。

东单原名“就日坊”。明朝在现今东长安街东口迤北处，建立一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檐下施如意斗拱，额书“就日”二字。因为此处只立一个牌楼，又因为它位于北京城东边，所以，俗称“东单牌楼”简称“东单”。从东长安街东口至米市大街，叫“就日坊北大街”或东单牌楼北大街以及东单北大街都可以。民国年间，袁世凯梦想当皇帝曾将“就日”改为“景星”。在东单牌楼的西侧，有以东单命名的“东单头条胡同”、“东单二条胡同”和“东单三条胡同”。

二、崇文门内大街的原貌

崇文门大街在元代是大都城文明门的关厢，因为元大都的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一线附近，文明门位于东单十字路口附近。明永乐年间重建北京城时，将元大都的南城墙向南移至现今的位置。从此，这条街从元大都文明门的关厢变为城内的街道。据《人海记》书中记载：清康熙甲子（二十三年即公元1685年），秋

九月，大街忽然作响爆炸，飞石伤了二百多人。开始人们认为是地震，细查原来是“其地旧埋火药，覆大石板，上土厚尺余”。据我们现在分析，可能是明代存埋的火药，遇到什么引火之物而爆炸。也可能是反清复明之人所搞的。

关于崇文门大街的规模、旧貌，我们根据清光绪乙酉（1885年）六月，朱一新编著的《京师坊巷志稿》所记述的“崇文门大街”，其街道整齐，东侧从北向南依次有观音寺胡同、羊肉胡同、裱褙胡同、麻线胡同、苏州胡同、报房胡同、船板胡同、孝顺胡同、东城根等。西侧从北向南有化成寺、地藏庵、灵祐寺、卖羊胡同、关帝庙、东江米巷（东交民巷）、西城根等。

在清代，东单、崇文门大街这一带确实没有东四地区商业繁华，但是，由于东单的东边就是举场——贡院。明、清时期，每三年一次在北京的贡院举行科举考试。全国各省的举人都要到北京应试。大多数应试的举人都住在各省各州设立的会馆中，会馆住满了，就在贡院附近寻找住处。所以，每逢贡院开考场之时，东单崇文门大街一带的居民，有的就腾出房来租给应试的举子居住，成了临时客店。贡院开科考试时，这一带的饭馆买卖最兴旺。当年，东单、崇文门大街一带大小饭馆最多。平日买卖一般，逢贡院开科考试之时，每家饭馆都做一阵子的好买卖。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庆丰堂在东单观音寺胡同，冷饭庄也。平日绝无过问者。每逢春、秋二试，举子多聚居于东单牌楼一带，值此时，该肆顿形兴盛。其时米饭每碗价三文钱，各试子因其饭价廉，遂群怀盒子菜一包（盒子菜是猪肉铺卖的各种熟肉），群赴该饭庄，专买米饭，该饭庄拒之云：非食肴不卖。于是扫兴而去，亦当年一段笑话也。”

三、东单一带遭到破坏——是八国联军的入侵

使东单拆去了东单头条胡同，崇文门大街拆除了化成寺、地藏庵、关帝庙、卖羊胡同等半壁街，形成了“东大地”的残破局

面，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后，美、英、日、法、俄、德、意、奥、荷、比、西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逼迫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造成的。帝国主义通过《辛丑条约》攫取到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在军事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

北京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辛丑条约》第七条规定：帝国主义自行派军队到北京来“保护”使馆，从而使东交民巷就特殊化，成为国中之国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交民巷周围修城墙、挖壕沟，建造军事设施。为了所谓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安全”，强令清政府拆除了崇文门大街西侧的化成寺、地藏庵、灵祐寺、卖羊胡同、关帝庙和东单头条胡同等建筑。这样，就出现了崇文门大街只有东侧一边有房屋建筑，西侧除同仁医院（因为该医院是美国美以美会的）外，大部分是空地。东单有二条和三条胡同，缺少了头条胡同。

此外，更使中国人耻辱的是在东单牌楼迤北，外交部街西口处不远的地方立起一座“克林德”石坊。这是怎么回事呢？又为什么说是中国人的耻辱呢？

1900 年，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河北兴起，6 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区，6 月 13 日，仅在半天里，就连续烧了孝顺胡同里的亚斯里堂、双旗竿英国伦敦会、八面槽的法国天主教东堂等 11 个教堂。6 月 20 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前往总理衙门（清管理外国事务的机关）与清政府商谈离京归国的事。行至东单北，路遇巡逻的清军神虎营士兵拦住盘查。克林德那里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态度蛮横，并鸣枪示威。士兵放枪回击，把克林德打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得到报告后，派军队出来，到处杀人放火。这样，更加激起了北京人民、义和团团民的爱国反帝愤怒的烈火，轰轰烈烈地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展开。由于八国联

军侵入北京和清政府的出卖，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绞杀了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后，在克林德毙命处，立起了一座“克林德”石坊。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了。由于大战中，中国政府参加了协约国的对德宣战，“胜利”后就把这座“克林德”石坊拆迁至中山公园的南门内，改书“公理战胜”四字。1949年北京解放后，又改雕刻上郭沫若亲书的“保卫和平”四个大字。

四、建国门和建国门内大街的出现

建国门的出现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北平期间，梦想长期霸占北平，并妄想以北平为基地，进一步巩固华北，进犯华南，统治全中国。日本在北平的军政当局，把北平的东郊做为工业区，建有“华北烟草厂”、“大信制纸厂”、“北京锻造厂”等，大量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为了便利城区与郊区的交通，在1940年左右，将东单观音寺以东打个豁口，称“启明”门。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启明门改称“建国门”。1958年，展宽建国门内的道路，将东、西观音寺和笔管胡同拆除。1965年，正式命名这条新路为“建国门内大街”。

第二节　东交民巷——列强统治下的洋式商业街

一、最初叫东江米巷

东交民巷是一条古老的街巷，在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上称“东江米巷”因为这里当时是个江米市，又因为其西有西江米巷，故有此地名。在这条街的西段设有，上林苑监会同南馆、詹事府、翰林院、太医院、钦天监、鸿胪寺、礼部等衙署。北侧有明朝廷存储柴薪芦苇等物品的场地，叫台基厂。

二、东江米巷被列强占为使馆区

进入清代，东江米巷里除一些衙署外，又建了几个王府。到了中后期，随着王府和一般居民的增多，东江米巷里也出现了一些店铺，如著名的内联升鞋店老字号就是清咸丰三年（1853 年），在东江米巷开业的。在此经营了 40 多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内联升店铺毁于战火，后来才迁走。另外，从清乾隆年间起，凡外国使臣来京一般安排在东江米巷中的“迎宾馆”暂住，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40 天。到了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是个战败国，外国列强开始在东江米巷设有长驻使节。至光绪十一年（1885 年），根据《京师坊巷志稿》上记载：东江米巷里有“俄国使馆，又有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比国、和（荷）国诸使馆。”

光绪年间，东江米巷也称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是从东江米巷谐音而来。在“庚子事变”（1900），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改“交民巷”为“鸡鸣街”。在专门记述光绪二十六年京师历史的《都门纪变百咏》中一首竹枝词写：“交民两字改鸡鸣，共说今名胜旧名；试把六书参体例，居然转注与谐声”。它是因为在《推背图》中有“金鸡啼后鬼生愁”的说法，所以，改交民巷为鸡鸣街，以蔑视帝国主义洋鬼子。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年，清政府被迫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除清政府向列强巨额赔款、道歉等苛刻条件外，还规定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概不准居住。

他们砌围墙将东交民巷包括台基厂在内围起来。东交民巷南边是前门至崇文门的城墙，不用砌围墙外，东边从崇文门迤西城墙起，北至东单西南角，北边从东单西南角起，西至东三座门（今公安部附近），西边从东三座门起，南至前门东侧城墙。以上

三面围墙都砌约6米高，上有城垛，有枪眼，围墙上并建有8座碉堡，东、西、北三面建有四座门。围墙外的原有的房屋、寺庙等建筑物一律拆除，便于守围墙的鬼子兵瞭望。凡穿军装的中国人不准进入使馆区。

列强在东交民巷建的就是个小城堡，俨如个“国中之国”。

三、洋式商业街

在这个东交民巷使馆区中，建有美国使馆、美国兵营、俄国使馆、俄国兵营、英国使馆、英国兵营、意国使馆、意国兵营、日本使馆、日本兵营、法国使馆、法国兵营、德国使馆、德国兵营、奥国使馆、奥国兵营等，在各国使馆和兵营中居住着大量的外国人。而且他们还雇有华人巡捕、差役等为其服务。因此，这些国家根据其对我国经济侵略的需要和其各自日常生活需要，就在东交民巷里开设银行、饭店和洋行。美国开设了花旗银行，英国开设了汇丰银行，日本开设了正金银行，法国开设了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开设了德华银行，俄国开设了道胜银行。此外，还有亨达利洋行、呐喊洋行、增茂洋行等六七个。他们为了娱乐建了万国俱乐部，里面设有酒吧间和台球室、网球场、游泳池和冰场等。六国饭店是英、法、美、德、俄和日本六个国家集资开办的。此饭店在当时北京的各大饭店中，从规模和设备讲仅次于北京饭店。在东交民巷里还有个华人办的利通饭店。有一家医院是德国人办的，叫德国医院。

光顾这些洋买卖的不仅是洋人，而且东交民巷以外的中国人也经常至此外国银行存款，在饭店里住宿。一些军阀将搜刮来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存入东交民巷里的外国银行。因为当时的东交民巷的特殊地位，中国军警不能进人。所以，一些违法的中国人有的就进入东交民巷里的六国饭店避难。如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就逃进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里藏起来。还有湖南军阀张敬尧背叛祖国，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收买，于1933年来北平与日本联系，

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南京国民政府便衣人员跟踪至北平，在六国饭店里将张敬尧打死。

四、东交民巷使馆区列强特权的废除

国民党南京政府根据1943年，分别与英国和美国签订的《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有权利，废除列强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特权，收回属于中国的财产。但是，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北平解放后，1950年1月，北京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庄严宣布在北京市内帝国主义兵营的占地一律收回，其建筑全部征用。至此，延续半个世纪的耻辱才得洗刷干净。

第三节　东单一带新式商业街的出现

东单和崇文门内大街在清代虽然是个商业街，零星的有些店铺，但是这一带的店铺以做各省举人来北京贡院应考时的买卖为主。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实施西方的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废除，贡院从此关闭。各省举人不再聚至北京应试，东单、崇文门大街一带，过去满街是读书人的繁闹景象没有了。生意萧条、店铺倒闭。

东单和崇文门内大街一带能够出现一些新式商店，较早的发展成为新式商业街，其原因与王府井大街相同，就不赘述了。前章中所介绍的北京饭店最早就设在崇文门内大街上。

比北京饭店在崇文门大街开业晚1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丹麦人璞尔生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开办电铃（话）公司。主要为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和兵营通话所设。当时的电话机很简陋，是用木板钉成的小木箱，木箱高约20厘米，宽约14厘米，厚约7厘米，木箱外面装有两个铜铃，来电话时铜铃就“当当”响

起来。因之，称“电铃”和“电铃公司”。

大清邮政总局也曾设在崇文门小报房胡同。大清邮政总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在东交民巷台基厂成立。后来由于邮政事务的不断发展，原址狭小，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迁至小报房胡同，两年后又迁至东长安街。

此后在东单、崇文门大街一带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式商店，其中外国商人办的洋行是有河野洋行（日商）、吉田洋行（日商）、加藤洋行（日商）、日清洋行（日商）、秦章洋行（日商）、渡边洋行（日商）、喜田洋行（日商），逸信洋行（德商）、礼和洋行（德商）、义利洋行（德商）、雅利洋行（德商）、永昌洋行（英商）、和利洋行（英商）、美孚洋行（美商）、文达洋行（美商）、鲁麟洋行（英商），另外还有法、德、意等国开的德国饭店、面包房。与此同时，中国商人开办的店铺，西服庄有华兴、隆兴、发昌祥、鑫华、亚新、周记、兴康、华茂等，饭店有中西、华东等。华记面包房。祥泰义商行和东单鱼市场经营的洋酒、罐头，三羊商行经营的地毯、古玩等。在崇文门大街有两家马掌铺专门为洋人钉马掌。此外还有几家挂货铺。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祥泰义洋酒罐头商行

祥泰义洋酒罐头商行原地址在崇文门大街西观音寺西口外南侧路东。开业于清末民初，创办人叫韩邦泰。

祥泰义经营的商品主要有各种洋酒、罐头、饼干食品等。当时购买祥泰义东西的除去东交民巷里各国使馆、各国兵营、各国在北京的侨民外，就是与外国人靠近的吃洋饭的一些人。祥泰义商行的货物从天津、上海的一些洋行趸来。将大批运到北京再给各国使馆、兵营和各地方要货的送去。由于祥泰义商行开业较早，

又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靠近东交民巷，从事洋酒、罐头、饼干等洋货的还很少，所以，买卖极其兴盛，年年结账后，都有几万现大洋的盈余，生意十分可观。虽然后来有几家同行开业，但是，祥泰义商行本着中国商业的老传统，不卖假货，顾客先用货后付款，大批用货祥泰义商行派人送货等经营方法，拉住了主顾，生意依然不衰。因为祥泰义商行做生意讲究信用，不给用货单位误事，所以在民国年间，祥泰义商行的长主顾有各国使馆、兵营、各洋行、饭店，还有北洋政府的总统府等单位。这个时期，是祥泰义商行的鼎盛时期。

随着社会时局的变化，祥泰义商行买卖也逐渐地衰落下去。一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政府从北京迁至南京，祥泰义商行失去了北洋政府总统府的买卖。二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沦陷，社会不稳，物价飞涨，东交民巷里欧美各国人减少，祥泰义商行买卖又趋衰落。三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宣战。日本在北平查禁欧美各国的商品。祥泰义商行因为库存英、美、法等国的洋酒、罐头等货物最多，因此，损失也最大。从此，一蹶不振，买卖年年亏本，最终坚持到1950年，实无法营业，就关门停业了。

1951年，由刘贯五、张德厚和原祥泰义商行经理韩邦泰的儿子韩子铮合资重新使祥泰义复业。这次重新开业，改营为自产自销糖果、中西糕点和南味等食品。目前的祥泰义食品店就是1951年重新复业的店铺。

二、东单鱼市场

东单鱼市场开办于清末，最早，有人在庚子年后，被拆除的东单头条胡同的东端用席箔围起卖鱼，不久，支起铁罩棚将摊位租借小贩摆摊销货用。当时，以卖鱼的摊位多，所以称东单鱼市场。在这个市场里，除去鱼摊外，还有洋酒、罐头、饼干等专供东交民巷里洋人的商品。到了日伪统治北平的时候，东单鱼市场

才又增添了蔬菜货摊及酱豆腐、金华火腿、南京板鸭等多种货摊。解放后才正式改名为东单菜市场。

三、华茂西服庄

印华亭是华茂西服庄的经理，他思想灵活，认识到干新式服装行业，必须量裁合体、样子不断地出新，才能受到顾客的欢迎，自己的店铺才能在社会上立住脚。所以，自 30 年代初在东单北大街开办华茂西服庄起，他就在西服的新式图样上，下功夫。凡是西服的图样他都搜集，见到有人穿新样子的西服，他必追根问底，问个究竟，您是买的还是定做，哪里买的，哪里做的，尺寸多大的等。由于华茂做的西服样式新颖，质量又好，所以，来华茂做西服的顾客日渐增多，其中有不少是慕名而来的顾客。开始华茂是个做来料加工的西服庄，由于生意兴隆，买卖就扩大了。在做加工活的同时，也做些商品西服在店中出售。后来又在天津开了个分号。

北平解放后，华茂改为以做女式大衣为主的西服庄，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后就并店了。

四、三羊商行

三羊商行位于东单北路西，经理叫杨德，是大学毕业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30 年代初，毕业后，就在崇文门外花市四条开了个经营地毯的小商店，生意一般。不久，就迁至东单北营业，并悬出“三羊商行”牌匾。

为什么起个“三羊”的店名呢？原来杨德弟兄三个，也就是“三杨”。所以“三羊”店名既是“三羊开泰”中国传统吉祥之意，又暗中说明我们弟兄三个，弟兄“三杨”。

三羊商行比较宽阔，门面三间，中间专门经销中国传统工艺品地毯。北边这间经营古玩、玉器、象牙、金漆镶嵌、景泰蓝、绢花等。南边这间经营鲜花、花束和花篮等。三羊商行主要的顾客是外国人。所以，在三羊商行做事的职工都会说几句普通英语，学

徒除去学习商品知识外，还要在晚上业余时间，学习英语。以便将来站柜台时，与外国人交谈做生意。

北平解放后，三羊商行已没有生意可做，不久，就停业了。

五、“东大地”的杂货市场

前文已讲了东单的“东大地”，就是光绪庚子年后，将崇文门内西侧，除美国美以美会设立的同仁医院外，其他建筑全拆，所以这里就是个空地，这一带老百姓称它为“东大地”。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东交民巷里的各国驻兵经常在“东大地”上练兵、打马球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附近的小孩有时在这里踢球，有时在这里放风筝。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过去曾嚣张一时，耀武扬威的日本人，此时，个个垂头丧气，过去威风一点也看不见了。他们准知道在中国呆不长了，必然被遣返回国，所以，他们就有人将家中的“日本大袍”（民族服装）和“带子”等拿到“东大地”放在地上卖。后来，“东大地”卖东西的越来越多。连许多中国小贩也到这里来做买卖，整个“东大地”成了个大集市。不久，在北平的日本侨民都集中到“新北京”，而后遣返回了日本。可是，“东大地”集市又有发展，卖衣服、鞋帽、钟表眼镜、搪瓷器皿、茶具杂项等，天天游人和买东西的人不断。到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城时，“东大地”曾一度用席箔圈起来临时改为“飞机场”，以做国民党高级官员逃命之用。解放后，50年代初，因为“东大地”集市货摊，人来人往，杂乱无章，有碍市容，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这里的商贩约500个迁至了东四隆福寺营业。

中 卷

外城商业街和老字号

第一章　前门地区——清乾隆年间北京商业最繁华的地区

第一节　前门城楼和箭楼等建筑

前门是正阳门的俗称，它是北京城的正门，与天安门和故宫三大殿同位于南北的中轴线上，其位置极为重要。

前门即元代的丽正门，明正统四年（1439 年）改丽正门为正阳门。明正统元年至四年，修建北京九门城楼时，正阳门除修建了城楼、箭楼外，还修建了瓮城、正阳楼和五牌楼等建筑。到了民国政府成立后，因前门出入城门的车马行人增多，经常堵塞交通。所以，才于民国四年（1915 年）改建前门，拆除了瓮城，将原来封闭的小广场，改变为开阔的场地。同时，在前门城楼的东、西两侧又各开了两个门洞，以便车辆通行。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极为重视这个具有象征北京的古建筑——城楼和箭楼。1952 年，拨款对箭楼大修。1976 年，由于唐山大地震，箭楼受损，1977 年又拨款对城楼和箭楼进行全面大修，并且将前门城楼，箭楼划入天安门广场的总体规划之中。

为了加强对前门城楼和箭楼这两座古建筑的保护，于 1988 年 1 月 13 日，前门城楼和箭楼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 年初，公开对外开放，接待中外人士参观。

第二节　前门大街

原来的前门大街很宽阔，不像现今之狭窄，街东的肉市、布巷子和街西的珠宝市、粮食店本没有。因为在明代末年时，一些商贩在“大街石道之旁，搭盖棚房为肆”（《日下旧闻考》）。后至清乾隆年间，席箔棚房逐渐改建正式房。因为“大街东边市房后有里街曰肉市，曰布市，曰瓜子店”。“大街西边市房后有里街曰珠宝市，曰粮食店”（《宸垣识略》）。

前门大街原名正阳门大街，1965年正式命名为前门大街。

关于前门，这个地名，具体地即指前门城楼和箭楼，也泛指为东边的西打磨厂街、鲜鱼口街，大江胡同；西边的西河沿，廊房头、二、三条胡同、大栅栏、施家胡同、云居寺胡同和甘井胡同等。

第三节　前门地区发展为繁华商业街的条件

北京的商业市场经济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如清乾隆、嘉庆年间人，杨米人在《都门竹枝词》上写：“晴云旭日拥城闉，对面交言听不真；谁向正阳门上坐，数清来去几多人。”前门大街、大栅栏一带，店铺鳞次栉比，市招繁多，车马人声嘈杂，它的繁华昌盛已远远超过了鼓楼、地安门和东四一带。其原因是什么，是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和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具体地分析，有如下几个有利条件。

一、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自古以来就是北京的重要古渡口。早在战国时期，沿太行山脉东麓就有一条南北的通道，这条通道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华北大平原和西北各地与北京地区

连接在一起。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和西北各地人都是沿着这条太行山通道，再通过卢沟桥渡口才能到达北京。而且当年有很多文人墨客在此也曾留下足迹，金人赵秉文在《卢沟》诗中就有：“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的句子。从卢沟桥到北京，必走进广安门之道最便捷。进了广安门都是经虎坊桥，走东北的斜街（李铁拐斜街）到前门这条古道。

二、元时，大运河的终点码头在积水潭，到了明代，“自明改筑京城，与运河截为二，潭之宽广，已非旧观”（《宸垣识略》）。从此，南来的船只，不到积水潭，只到北京城的东南角外的大通桥下。由于大运河终点码头的南移，使北京的商业中心也从元代的积水潭、鼓楼一带南迁至前门大街、大栅栏一带。

三、明朝政府很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据《明宣德实录》载；从南京迁至北京2.7万户各种手工业工匠在北京四门、钟鼓楼地，召民居住，召商居货。前门外的廊房一至四条胡同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时，前门大街、大栅栏地区一带建起来的店铺大多是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有的也销售江南的松江布，苏杭二州的丝绸，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广东佛山的铁锅，安徽的茶叶等货物。

四、前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正南大门。明、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等机关，就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外省晋京述职、办事的官员住在前门外一带就比较方便。因此，在前门外一带设立了一百四十多个会馆，如果再将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会馆算在一起，就有会馆五百多个。每逢贡院开科考试，每个会馆都住满了应试的学子，自然使“前三门”、大栅栏一带游人增多，促进这些地区的繁荣。

五、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朝初年，清政府惧怕老百姓借戏园之地纠众滋事，所以下令，京师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并对外城的戏园‘概行禁止夜唱’。”在《道咸以来朝野杂

记》上也有类似的记载："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清代中晚期京剧兴盛时期，做官的、为民的、经商的、做工的、老的、年轻的喜欢看京戏，全城要看京戏的都被吸引到前门、大栅栏来。

六、旧北京的娼院是摧残妇女的地方，明代的娼院都是官娼，设于内城。到了清代，顺治、康熙时，曾命令禁止官娼制度。但是，到了咸丰年间，娼妓在北京又猖獗起来。光绪年间，娼院在前门外以西的韩家潭、石头胡同、百顺胡同、陕西巷、王广福斜街、朱茅胡同、留守卫和小李纱帽等"八大胡同"兴起。进入民国时期，这一带的娼院，据《北京封闭妓院纪实》上统计；这一带头等妓院共45家，妓女328人，多居住在韩家潭、百顺胡同；二等妓院共60家，妓女528人，多居住在石头胡同、朱茅胡同。"此外，陕西巷、王广福斜街、留守卫、小李纱帽胡同等地的三等妓院，该书未做统计，实际妓院数和妓女数要比头、二等多得多。

虽然娼妓的兴盛是不正常，是肮脏的活动。但是，它在客观上促进了前门大街、大栅栏一带的繁荣。

七、前门大街、大栅栏一带名老店铺多，像六必居酱园、同仁堂老药铺、南聚庆斋饽饽铺、三山斋眼镜店、马聚源帽店以及谦祥益、瑞蚨祥等绸布店都在这里。多数人宁可跑远道也愿意买名老店铺的东西。

八、京（北京）奉（奉天）火车站（前门东站）和京（北京）汉（汉口）火车站（前门西站）都设在前门。前门实际上成了北京和全国各省的交通枢纽。各地到北京的游客必须先到前门，所以，前门大街、大栅栏一带客流量大，人烟稠密。

综合以上有利条件，才促成了前门大街、大栅栏地区一带的商业繁荣。

第四节　前门地区的店铺

前门大街地区北从前门箭楼起，南至珠市口附近；东从西打磨厂东口、西兴隆东口、大蒋家（大江）胡同起，西至煤市街。这个地区不仅店铺众多，行业齐全，而且每个行业都有著名的老字号店铺。下面除大栅栏另做介绍外，其他商业街与前门大街放在一起介绍。

绸布店铺有：谦祥益、益和祥、天有信、瑞林祥、瑞增祥、瑞生祥、福记、同义信、华纶、庆隆、裕顺兴、源隆祥、庆丽升、同信成，恒义昌、协成仁等。帽庄有：马聚源、盛锡福、森记、恒和等。皮货庄有：同义厚、忠兴厚、覃茂祥、天兴成等。日用百货店有：中兴、亿兆等。鞋店有：步云斋、万庆斋、祥升斋、祥元斋、恒庆斋、宝华斋、武胜斋、天成斋、集升斋、广升斋、内联升、全升斋、步瀛斋、兴隆斋、万升斋、天源斋、天利斋等。饭庄饭馆有：福寿堂、天福堂、致美斋、泰丰楼、三盛馆、同义楼、同兴居、同兴楼、天兴居、会仙居、万年居、晋阳居、丰泽园、一条龙、都一处、正阳楼、全聚德、便意坊、兴升馆，华北楼等。干鲜果海味店有：通三益、景泉涌、东鸿顺、长发祥、同聚成、崇兴号、瑞义祥、义吉成、永生源等。茶叶庄有：森泰、庆林春、正兴、正祥等。银钱业和炉房有：正通、隆聚裕丰、源丰、兴成、天聚丰、源和、隆茂源、德成、徐康、鸿庆恒、云益、乾丰等银钱业。交通、盐业、聚兴诚、中孚、金城、华孚等银号。聚丰、德顺等二十六家炉房。还有合盛永颜料铺，公兴纸铺和敬记纸庄，永增军装局，正明斋饽饽铺，合香楼香蜡铺，六必居和天章涌酱园，万昌锡器铺、三山斋、宝丰斋眼镜店、永安堂、庆熙堂和长春堂药铺、裕兴昌估衣铺以及由上海迁京的老字号正兴德等。

第五节　著名老字号

一、都一处与乾隆皇帝

驰名全国的都一处烧麦馆是一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店。

最初，它是一个姓李的山西人开设的“李记酒馆”。由于李记酒馆招待顾客和气热情，酒味醇香，酒菜实惠。尤其有当时北京独一无二的马连肉、晾肉等小菜，色鲜味美，深受酒客的欢迎，买卖越作越兴旺。乾隆十七年（1752年），农历“年三十”，酒客少，大多数店铺天一黑都关店门吃饺子过年去。可是，李记酒馆依然没关店门，做别人不做的生意。

约在亥时（夜九点至十一点），从店门外进来三个人，一主二仆。主人是文人打扮，两个仆人虽然年岁已高，但尚未留须，各打一个纱灯前后照路。这三个人被伙计引到楼上吃酒。主人模样的人，对浓香的美酒，可口的小菜及殷勤招待很是满意。他问伙计：“你们这个酒馆叫什么名字？”伙计说：“小店没有名字。”这个人看看周围，听听外面的放鞭炮声，很感慨地说：“这时候，还不关店门的，京都可能只有你们一处了吧！就叫‘都一处’吧！”

年三十过去快一个月了，忽然一天，几个太监给李记酒馆送一块写着“都一处”的虎头匾。这时大家才知道年三十来喝酒的那个文人，是乾隆皇帝。这件事，很快轰动了北京城。店里人把乾隆皇帝亲笔写的虎头匾“都一处”端端正正地挂在店中，把乾隆那夜坐过的一把罗圈椅上盖黄布，下垫黄土，不许任何人再坐，像供神一样供起来，称为“宝座”。并请来亲友、同行大大庆祝一番。从此，都一处人人皆知了。

北平解放后，为了扩充营业才从鲜鱼口迤南的旧小楼迁至现址。

二、一条龙店名的来历

一条龙羊肉馆创业于清乾隆五十年左右，至今已有二百一十年历史了。它本名南恒顺羊肉馆，“一条龙”是群众送给它的绰号美名。这个传说故事是这样的，一天光绪皇帝微服出宫，在南恒顺吃完杂面汤、芝麻酱烧饼后，没钱付账。掌柜的很大方，就让他走了。第二天，一个太监来还账，这才知道昨天吃完饭没给钱的原来是当今光绪皇帝。这件事不胫而走，很快在百姓中传开。这就是“一条龙”的来历。

三、月盛斋的五香酱羊肉

月盛斋是自制、销售五香酱羊肉闻名全国的老店铺。它是清真教人马庆瑞于清朝乾隆四十年（1775 年）开办的，原址在前门内户部街，解放后才迁至前门大街的现址。

月盛斋的五香酱羊肉所以人人都爱吃，是他们选料认真，制作精细，火候适度，酱出的羊肉，肥肉不腻、瘦肉不柴、不腥不膻，香味醇正。

月盛斋是从他的创办人马庆瑞就酱羊肉卖，但是真正成为五香酱羊肉行销全国，那是清嘉庆年间，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经营的时候。由于马永祥得到太医院太医的帮助，对原来制作酱羊肉的佐料配方进行了修改，就成了丁香、砂仁、桂皮、大料等几味主药，再加适量的酱和盐。用这个配方制作的酱羊肉，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可以促进食欲，开胸理气。马永祥并总结了他父亲制作酱羊肉的经验，他在掌握“火候”上下功夫。掌锅人，要细心观察炉火和肉的颜色。开始用旺火煮约一个小时，随时用大铁杓将锅里的浮沫撇出。用旺火煮，是去肉的腥膻，杂质杂味。而后改用微火约七八个小时。微火煨是使各种调料入味。快出锅时，要将“陈年老汁”放入锅中，以加浓羊肉的味道。此外，羊肉的好坏也很重要，月盛斋用的都是西口大白羊，西口就是宁夏银川黄河套，这里产的羊，肉嫩、味鲜美。

当年，月盛斋买卖旺季是每年入秋至来年春末。在这几个月里，每天酱多少羊肉就卖多少，而且总是供不应求，晚来的买不着。五香酱牛肉是后添的。北平沦陷后，由于西口羊来不了，所以才改酱制牛肉卖。

四、正阳楼的大螃蟹

正阳楼饭庄原址在前门外肉市，山东人孙氏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创办。后由其后人孙学仕经营。孙学仕在清末民初时，是北京商界的知名人士，曾任北京市商会会长，交友甚广。当时，军政界无论大小宴会都设在正阳楼，所以，是北京名噪一时的大饭馆。

正阳楼的涮羊肉和山东风味菜都很有名，而最出名的是大螃蟹。每年一入秋，正阳楼就添上了蒸大螃蟹。秋天的螃蟹最肥美，也叫“高粱红”。每年秋季，正阳楼都派人去胜芳采购螃蟹。他们从渔民手中专挑活螃蟹，将选好的螃蟹装在竹篓里运回北京。先喂养两天，俟螃蟹将胃中的杂物吐出，身上异味减少后，再用清水洗过，就让小徒弟用细麻绳将螃蟹几条爪和两个大夹子拴好，就放入大笼屉上火蒸熟。

正阳楼卖螃蟹按个论价，根据月份不同，螃蟹的价钱也不同。农历七月尖脐螃蟹肥，所以，尖脐螃蟹贵；到了八月，团脐螃蟹肥，因之，团脐螃蟹就贵了。这就是过去常说的“七尖，八团”了。吃鱼麻烦，防鱼刺；吃螃蟹比吃鱼还麻烦。虽然螃蟹没有刺，但肉在壳内，吃螃蟹必须先剥去外壳才能吃到螃蟹肉。正阳楼为了方便顾客，特准备了吃螃蟹的工具。有小锤子、小木板、小镊子等。吃螃蟹需用鲜姜，好米醋以去寒和提味。正阳楼用的山西好米醋，鲜姜末供客人用。

1942年，正阳楼停业。1984年，在前门外西打磨厂街恢复老字号，改称“正阳楼饭庄”。

五、通三益的秋梨膏

前门大街的通三益是一家有名的干果海味店，开业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多少年来，它以商品齐全、物美价廉赢得顾客。特别是通三益的秋梨膏，既能医治咳嗽痰喘，又能滋补身体。因此，在中外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通三益的秋梨膏是按清宫秘方精制，选当年熟、质量好、个大的北京秋梨，用水洗净。把洗好的秋梨用“擦子”擦成细丝，再用细纱布包上梨丝，挤出梨汁液。而后把梨汁液倒入一只带锡里的铜锅中，上火熬。随熬随着把蜂蜜、白糖、姜等放入锅中。熬制时，要不停地用槟榔勺在锅内搅动。熬到一定时候，再把用细布口袋装好的茯苓、贝母等药材放入锅中，继续熬到适当时候就成了。这种秋梨膏叫苓贝秋梨膏。它的功效是润肺、祛痰，止咳抑喘，安神生津，健脾养胃。它适合小孩、青年服用。久咳不愈，身体虚弱和老年人，可服用加燕窝的秋梨膏。这种燕窝秋梨膏，不仅医治咳嗽痰喘，而且滋补强身。

通三益的秋梨膏在民国时，曾注册为“醉翁牌”商标。先后在南京和青岛展览会上畅销，被南洋各地华侨抢购一空。从此，通三益醉翁牌秋梨膏名扬海外。

六、全聚德首创挂炉烤鸭

全聚德是杨寿山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开办的，原址在前门外肉市，解放后才将店堂扩充到前门大街。

杨寿山是河北省冀县杨家寨人。清咸丰初年，家乡闹灾荒，杨寿山来北京谋生。开始他在鸭房子替人家放养鸭子，学会填鸭、杀宰鸭子的手艺。后来，他离开鸭房子自己在前门大街摆鸡鸭摊。由于杨寿山的鸡鸭拾掇得干净，价钱便宜，顾客很多。杨寿山干了几年卖鸡鸭的生意，买卖很兴旺，攒了几个钱。清同治三年(1864年)，杨寿山在前门外肉市开办了个小猪肉杠，取名“全聚德”。这个小铺子不仅卖生猪肉，而且烤小猪，烤炉肉，卖鸡鸭。

当时，米市胡同的便宜坊的焖炉烤鸭买卖正兴隆，每天客人都挤破了门，烤鸭供不应求。杨寿山善于动脑，他试图用烤小猪的挂炉来烤鸭子。经过多次试，挂炉烤鸭获得成功。杨寿山用挂炉烤出的鸭子，色香味都不次于焖炉烤鸭。

全聚德的挂炉烤鸭取得成功，为其今后名扬中外打下基础。

七、会仙居首创炒肝食品

炒肝是北京的风味食品，首先生产和经营这种美味食品的是小店会仙居。

会仙居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内路南，是刘永奎于清同治元年（1862 年）开办的。

会仙居是个只有一间小楼的酒馆，卖黄酒也卖白酒。刘永奎和他妻子两个人经营这小酒馆。后来，生意做得不错，夫妻二人忙不过来刘永奎就把他兄弟刘喜贵叫来帮忙。光绪元年（1875 年）刘永奎病故，买卖由刘喜贵继续经营。刘喜贵善于经营，会作买卖。他为了扩充营业，就将在饭馆学过徒会作饭的两个儿子找来，于是会仙居就添上了炉灶，一个人掌灶做酱肉和白水杂碎，一个人烙烧饼和火烧。

白水杂碎是用猪肠、猪肝、猪心、猪肺等猪下水，洗干净，猪肠切成寸段，猪肝切片，猪心切丁，猪肺切条，佐以花椒、大料、小茴香、盐等做成。会仙居从添上白水杂碎、烧饼、火烧后，顾客更多了，生意日渐兴隆。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会仙居的生意兴隆，有人照会仙居的样子，在其附近先后出现了两三个既卖酒又卖白水杂碎的小铺子。会仙居受到了挑战，买卖大受影响。但是，刘喜贵不甘示弱，他与他的两个孩子又研究试生产出“炒肝”。由于炒肝是当时人们从未听说过新食品，又由于炒肝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所以，品尝炒肝的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很快兴旺起来。“会仙居炒肝”名扬全城。

八、黑猴儿的故事

解放前，前门外鲜鱼口内有两家“黑猴儿”毡帽店，在他们店前各摆着个约三尺高的方凳，上坐个楠木雕成，外涂大漆、火眼金睛的黑猴，黑猴双手捧着一个金元宝。这就是闻名全城的“黑猴儿”帽店。

鲜鱼口内的这两家“黑猴儿”帽店，一家是杨小泉帽店，另一家是田老泉帽店。先开的是杨小泉帽店，他开业于明朝末年，他专门自做毡帽销售。这个杨小泉好养猴，他养个红眼睛黑毛猴。这个黑猴通人性，白天在店里帮助他拿出物品，夜晚给他守夜。由于杨小泉养猴出了名，所以，不论同行，还是顾客都叫杨小泉的帽店为“黑猴儿”帽店。后来，杨小泉和黑猴先后死去，杨小泉的后人杨少泉为了招揽生意，就请了个巧手木匠，仿照黑猴的样子做了个木制黑猴摆在店门前。这就是“黑猴儿”帽店的来历。

后来，在杨少泉的“黑猴儿”帽店旁边，有个叫田老泉的也开了个毡帽店，而且也在店门前摆了个黑猴坐在高方凳上。从此，两个“黑猴儿”帽店开展了长期的“商战”。

解放后，一个“黑猴”不知去向，另一个“黑猴”现藏于首都博物馆中。

九、亿兆百货店的出名

亿兆百货店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由长春堂药店经理张子余投资 1.8 万元开办的。是当时北京有名的百货店。亿兆百货店派人在日本大阪和我国上海都设“坐庄”（办事处），直接从这些地方进货，而且多是名牌，它还包牌子，如当时日本名牌“双美人雪花膏”、“丽德雪花膏”、“狮子牙粉”，上海的“墨菊牌”和“狼狗牌”线袜，“三花”毛巾，“双妹牌”雪花膏等，都由亿兆包牌子。由于亿兆资金雄厚，货源充足，所以，买卖兴隆，而且也成了名店。

十、大北照相馆重视相片质量

大北照相馆开业于民国十一年（1922 年），创业人是赵雁臣。大北照相馆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成了北京有名的店铺了。

赵雁臣将大北照相馆经营起来成为当年北京最著名的照相馆，其经营之道是重视相片质量，不合格的相片不交给顾客。大北照相馆对相片质量检验非常严格。相片不管大小，都由赵雁臣亲自检验。一次，修版工修一张四寸相片，不仔细，照片底片的人脸上有一个小黑点没修掉，赵雁臣发现后，把修版工叫来，叫他重印，重修。

大北照相馆重视相片质量，这是大北成为名店原因之一，其二是投顾客所好，结合社会潮流增添新项目。北京在二三十年代，京剧是人人所爱。大北为了招徕顾客，就收买了一批旧戏装。顾客可以在大北照青衣、老生、小生、花脸等剧照，而且戏衣和化妆等免费。此外，在大北还可以穿他们的结婚礼服，拍结婚照。

还有一些其它原因，不过以上两个方面是大北成为名店的主要原因。

十一、几家民信局

在我国传递公文信件的机构自古就有，如古时候设的驿站就管传送公文信件换马和食宿的地方。不过这都为国家政府准备的。老百姓的信件只能靠“鸿雁捎书”请顺便捎带了。

北京私人民信局在清代中期就出现了，据民国初年，《北京商会会员录》中，在前门外打磨厂中记有：“胡万昌、三义成、协兴昌、福和、福兴、义兴、立成、聚兴几家民信局。”他们专门投送私人信件。不过他们各专走一个方向，而且还是不定时携信件去投送。也就是不可能只有两三封信，就派人去送。只能收到一定数量的信件才可能派人出发送信。又据齐如山先生早年写的《信局》一文：“每信远者当十钱两三吊，近者五六百文，外有货样或小包，亦不加钱，实为社会极为方便之组织也。”

据《光绪东华录》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设邮传部，分设船政、电政、路政、邮政四司。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京设立了邮政总局。1937年前，打磨厂里的几家民信局陆续停止营业。

十二、福寿堂饭庄

饭庄在旧北京是属于最上等的饮食业，不像现今"饭庄"那样，只有一间门面，店堂内有几张客桌，能供十来位客人就餐，就称饭庄。旧北京的饭庄，一般都有两三套四合院，能供几十人同时就餐。大些的不仅房间多，还设有戏台，可供演戏。过去的饭庄都以承办喜庆宴会，包办酒席为主，零星散座就餐者是少数。

据当年曾在福寿堂做过茶房的老人王德贵回忆：民国年间，北京有饭庄四十多家，前门外打磨厂的福寿堂是开业较早的有名的大饭店。

（一）有名的大饭庄

旧北京有两个福寿堂饭庄，一个是前门外打磨厂的福寿堂，另一个是内城金鱼胡同的福寿堂。这两个福寿堂是一个东家。

打磨厂福寿堂开业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前，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因为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福寿堂曾放映过电影。当时北京还没有电影院，一个外国人携带一部无声电影片，租福寿堂戏台放映。这是北京较早的一次电影放映。从这件事说明打磨厂福寿堂最晚在光绪二十八年就已开业了。

福寿堂是山东人开办的，几个股东都是山东人。掌柜的有多人，民国初年的掌柜叫李少山。这位李掌柜很能干，在他管理福寿堂期间，生意曾兴旺一时。

福寿堂饭庄规模大，前门在打磨厂，后门在后河沿，四合院有四五套，并建有戏台，可容几百人看戏。当年，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工商大户都讲究吃"庄子"，喜庆大事，将亲朋众人请到大饭庄欢聚，摆上几十桌酒席，吃完饭就看戏班唱戏。前门外一带店

铺多，是各地商人聚集的地方。所以，福寿堂的客人以大商人为数最多，像同仁堂乐家、瑞蚨祥孟家、五老胡同盐商查家以及马聚原帽店、天宝和三阳金店等大买卖，一般都在福寿堂设宴请客办事。

这些大商人在福寿堂办事，都请来戏班演戏助兴。像当年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金秀山、王瑶卿、余叔岩、侯喜瑞、梅兰芳、马连良等都在福寿堂演过戏。民国初年，一富商在福寿堂办寿诞，请客大摆宴席，并请来很多名演员演出堂会。其戏码依次是：开场戏由时慧宝演出《大登殿》，第二场是龚云甫的《沙桥饯别》，第三场是陈德霖、王瑶卿、龚云甫和贾洪林合演的《雁门关》，第四场是周瑞安演《艳阳楼》，第五场是于连泉（艺名小翠花）和荀慧生（艺名白牡丹）合演的《双摇会》，第六场是俞振庭与九阵风合演的《青石山》，第七场是梅兰芳与王凤卿合演的《武家坡》，大轴是杨小楼演出的《安天会》。戏从中午十二点开锣，直演至深夜三点多钟才收场。

民国二十年（1931 年），在福寿堂饭庄又有一次大型的堂会戏。这场堂会戏也都是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开场戏是青年武生演员李万春和毛庆来演出的《武松打店》，第二场是铜锤花脸金少山的《御果园》，第三场是青衣尚小云和荀慧生的《虹霓关》，第四场是老生余叔岩的《珠帘寨》，第五场是老生王凤卿、青衣王瑶卿、老旦李多奎、小生姜妙香合演的《探母回令》，第六场是武生杨小楼、架子花脸侯喜瑞、花旦小翠花合演的《战宛城》，大轴戏是青衣梅兰芳演出的《天女散花》。

（二）山东风味

北京是清政府所在地，民国政府成立也曾将北京定为国都。因此，北京是首善之地，全国各省在北京为官、经商的人很多。饮食风俗，口味各地都不相同，北京的饭庄、饭馆有做江南人喜欢吃的四川菜、湖南菜、淮扬菜；有做北方人爱吃的山东菜、山西

菜和直隶菜的。福寿堂是山东人开的，菜肴是山东风味。

福寿堂的菜以鸡、鸭、鱼、肉最拿手。其次，烩海参、清蒸燕窝、鱼翅也很有名。福寿堂做的鸡身上的菜，花样很多，如红烧鸡、黄焖栗子鸡、三鲜鸡、桶子鸡、熏鸡、烧整鸡、肥卤鸡、炒辣子鸡、炸八块、宫保鸡丁、芙蓉鸡片、炸鸡胗、软炸鸡丁、五香鸡等三十多样。鸭的做法也很多，有清蒸整鸭、红烧鸭块、糟鸭块、烩鸭条、川鸭肝、酱鸭胗、拌鸭掌等二十多样。鱼的做法在福寿堂的厨工，花样既多，味道又好。最有名的是“四做鱼”和“清蒸鱼”。四做鱼就是选一尾肥大的活鲤鱼，分段四种做法。鱼头做成“红烧鱼头”，中段肉多，厨工师傅用刀将肉片下，做成“糟溜鱼片”，鱼尾做个酱汁鱼尾”，第四做是用鱼的内脏，洗净，拾掇干净，做“烩鱼胗”。清蒸有清蒸鲫鱼和清蒸鳜鱼之分。这种清蒸鱼，肉嫩、汤鲜、色泽清淡，风味极美。其次，福寿堂做的五柳鱼、炒鳝鱼丝、家常炖鱼、清蒸甲鱼等也独具风味。福寿堂在肉菜做法方面，更有研究。在肉菜上主要是猪肉，有酱肉、酱猪肝、清酱肉、炒肉片、溜肉片、焦溜肉片、软溜肉片、炸丸子、溜丸子、四喜丸子、红焖肘子、水晶肘等几十样。

福寿堂饭庄虽然设有散座零卖，接待少数客人，但主要是承包宴席，少者一二十桌，多者几十桌，上百桌。成桌酒席，好的是“鱼翅席”、“鸭翅席”，就是席面中有鱼、鸭、翅等食品。其安排一般是：“四干、四鲜”，四干有瓜子、核桃、桂圆和花生点为常见；四鲜有苹果、鸭梨、蜜饯水果和樱桃。先上四干、四鲜是让客人一边品茶，一边吃干鲜果品。喝完茶，将干鲜果品的残碟撤去，就上酒，上“四冷荤”。四冷荤，福寿堂一般有，松花、酱肉、拌鸭掌和干炸丸子四样，供客人下酒用；喝过酒就上炒菜、上饭（主食），炒菜福寿堂一般是六样，有溜丸子、炒肉片、糟溜鱼片、软炸鸡丁、烩虾仁、糟鸭块。炒菜上完，随着就上“六大件”或“八大件”。福寿堂的六大件是烩海参、清蒸鸡、焖鱼翅、

红焖鸭、烩莲子和蟹子汤。再加上两鸡丝和江米鸭子就成了八大件。

普通席面是没有鱼翅这种高档菜，也没有四干。

福寿堂也应出去的买卖，就是客人在自家办事宴请亲朋好友，或商人在会馆中开会。福寿堂承包酒席，派出厨工、携带家具、应用的原料，前往顾客家中或会馆中制做。当时，前门外一带各地的会馆很多，福寿堂经常应各地会馆的买卖。

（三）被迫倒闭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北京建立了伪政权，并疯狂地掠夺物资。北京的各种货源奇缺，特别是米、面粮食，油、肉更是缺少，市场上很少见到。因此，饭庄、饭馆等饮食业货源缺少，营业十分困难。福寿堂经常购不进所需的各种原料，被迫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倒闭了。

十三、万昌锡器铺

锡器北京俗称锡拉器具。清代时，北京的居民普遍地使用锡拉器具。由于锡拉器具用处广泛，所以，在北京前门、东四、鼓楼等繁华商业街上锡拉铺很多。清末民初时，万昌锡器铺最负盛名，是当时北京的名店铺。万昌老掌柜张子忠的侄子张继志对笔者讲述了万昌的店史。

（一）创办

万昌锡器铺坐落在前门外西打磨厂街路北，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前，掌柜姓王，大徒弟姓张，叫张子忠。

王掌柜是直隶沧州吴桥人，善于打制各种锡器，手艺好，做出的活也好。王掌柜的大徒弟是直隶香河县人，他父亲在通州南边的马头开了个小酒饭铺。一年，王掌柜担着担子路过马头，在这个小酒饭铺打尖吃饭。王掌柜与小酒饭铺的张掌柜谈的很投机。张掌柜就对王掌柜说，您一个人担着担子到北京去干活作买卖，人

单又累，我想托您将我这个儿子带去跟您学个手艺，路上也可以替您担担子。就这样，王掌柜就收下了这个大徒弟。

王掌柜带着这个十四五岁的徒弟来北京后，就住在前门外一座关帝庙里。师徒俩白天担着担子沿街揽生意，给居民修补锡器和铜器活。由于王掌柜活做得仔细，修理的残破锡器和铜器，整旧如新，又由于王掌柜讲信用，说什么时候交活就准时交活，不耽误顾客使用。并且修理费又公道，所以，他就拉住了常主顾。干了几年，王掌柜的大徒弟也就将手艺都学会了，而且活干得又快又好，赛过他的师傅。两个人比一个人强多了，每天挣的钱除了吃喝还有剩余。又干了两三年，王掌柜托人在打磨厂（今西打磨街）西头路北租了间房子，从此就不下街了，干起坐商了。开始店铺没有字号，后来因为他们以自产自销各种锡器为主，所以将店名取叫"万昌"。但是，不久就遇上了"庚子事变"，王掌柜将买卖交给他的大徒弟，自己就跑回家乡避难去了。俟北京战乱平息后，这个张姓大徒弟捎信才把王掌柜叫来。王掌柜深感大徒弟用生命保护店铺之情，从此，应承万昌买卖有他一份，算师徒二人合伙的买卖。民国初年，王掌柜和张掌柜的后人都到万昌学手艺。张掌柜的儿子叫张子忠，他为人很聪明，手艺学得好也会经营。后来，王掌柜和张掌柜因年老先后回家乡去养老，买卖就交给张子忠和王掌柜后人去经营。在这个时期，在前门大街路西又开了个万昌分号。不久，二人发生了矛盾而分手。张子忠分得万昌本号，王掌柜后人分得分号。

（二）昌盛

万昌锡器铺是前边为店，后边为作坊，自己作坊里制做生产，产品除在自己的店门市销售外，还批发给其他杂货铺等经销。

当时万昌号生产经营锡器商品有：

生活日用品：锡水壶、锡茶壶、锡茶缸、锡水烟袋、锡烟合、锡酒壶、锡水盆、锡罐、锡缸、锡盘等。

佛堂用品：锡蜡千、锡果盘、锡供碗、锡香炉等。

此外还有笔桶、笔架、文具用品盘等制品。

万昌号的锡器用品所以享誉京城，这与选料真实、质优，加工精致，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是分不开的。

首先说原材料，万昌号总是不怕花高价，进云南的高锡。它的特点是质地硬度强，色泽银白，发亮。用高锡制做出的用品，使用到多久，都不会变形，光亮如白银一样。因为当时有一些锡器铺，图省钱，用次料。他用的是铅，冒充锡。这种铅制做出用品，一是色泽黑、暗；二是使用几年就变形。蜡千会弯曲，壶会凸凹不平。

万昌号作坊制做工艺十分考究，熔化锡料，首先是去掉杂质，再倒出所需薄厚的锡板备用。第二道工序是，裁料。第三道工序是，用裁出锡板打制各种器品。再将接口处焊牢，而且接口不露痕迹。最后一道工序是刻出各种图案。并在各种器品的暗处，刻上“万昌”二字。

顾客买去带有“万昌”字号的锡器，不管到什么时候，器品变形，材料发现不是高锡的，拿到万昌号来，都管退换。尽管万昌号卖的锡器制品，价钱比市价贵得多，但是不少顾客还是喜欢买万昌号的。特别是中等以上人家都以使用“万昌”锡器为荣。到现在不少寺庙佛殿供桌上，摆着蜡千、供碗等锡器，还是当年万昌制做的。

（三）衰败

“万昌”的锡器品在清代晚期，享誉京城一时。清亡，进入民国后，万昌号的锡器用品就走向衰败之路。因为万昌号的锡器产品，一是家庭用品；一是寺庙和家庭中佛堂用品。可是清亡后，进入民国，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生活的传入，北京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庭的锡器用品与新式的搪瓷用具及磨制的玻璃器皿相比，显着陈旧。所以，万昌号的锡器从畅销，变为滞销。清政府提倡佛

教和道教，北京城内，城外寺庙和道观到处皆是，中等以上居民家中都有佛堂或佛龛，万昌号的锡蜡千、供碗等器物，销量极大。自进入民国，新式学堂大量设立，青年人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破除了对佛、道的迷信。寺庙、道观停止建设、不少人家中的佛堂、佛龛逐渐减少。因之，万昌号生产的佛、道所需的锡器制品，销售不出去。从而万昌号的生意逐渐地越作越不景气。

（四）摘匾

四五十年代的北京市场，钢精铝制品开始走俏，进入60年代，塑料制品又兴旺起来。所以，万昌的锡器制品与上述新式产品比，价钱贵，款式明显着落伍，顾客不喜欢。1956年公私合营后，万昌本号分号合并，打磨厂的本号撤消。到60年代后期就摘下万昌的牌匾，改为铜器修理部了。

十四、三山斋眼镜店

三山斋眼镜店位于前门外西打磨厂街，由河北省深、冀县人刘、张、李三姓合资创办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取名“三山”，其含意一是三家合伙做买卖，好比三座大山，店铺定会永久的兴旺发达。二是，三山斋生产经营的眼镜片都是山中开采出来的晶石眼镜，没有玻璃制的假货。所以取“三山”之名。

三山斋眼镜店向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信誉着著，驰名全城。因之，营业经久不衰，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与其它眼镜店合并后才摘下牌匾。

（一）自产自销

自产自销，前店卖货后作坊制做是三山斋在当年眼镜行中独有。三山斋设有磨光和做镜架作坊。作坊中磨的镜片，白光镜片是用水晶石磨成，这种镜片又分平光养目镜片、老花镜片和近视镜片三种。代色镜片有茶晶石镜片和墨晶石镜片两种，这两种镜片都是养目镜。三山斋有专人去采办晶石，他们从苏州买水晶石，从库伦（今蒙古共和国的乌兰巴托）采办墨晶石，从山东崂山采

办茶晶石。三山斋的镜架作坊里一些人专做玳瑁架，另一些人专做白铜卡子架。玳瑁架是用海中的玳瑁壳做成的，白铜卡子架是装在无边镜片上的。工匠将镜片打出眼，再将白铜卡子架的梁和腿分别铆在一定位置上。以上这两种式样的镜架在1912年前，深受八旗贵族和各级官吏、富家大户的欢迎。

三山斋的眼镜盒是从外边镜盒作坊订购的，其镜盒是用鲨鱼皮做成的扁筒盒，盒上还穿有一根带珠石装饰品的小绳。戴眼镜的人可以将镜盒系在腰间带子上。

随着社会潮流的发展，1912年民国成立后，欧美西方的新式眼镜传入中国，三山斋也进行革新，玳瑁架和白铜卡子架被新式化学镜架所取代，铁胎黑绒眼镜盒取代了鲨鱼皮扁筒眼镜盒。

（二）货真价实

三山斋的眼镜货真价实，售出的各种各式眼镜不但镜盒上印制着“三山斋”的字号，并都开具保单，保证镜片质地是纯正的“晶石”。无论眼镜戴至多久，一旦发现问题镜片有假，不仅保退，还受罚。因此，三山斋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很多人还以戴上一副三山斋的眼镜为荣耀。所以，当年三山斋每天店门一开，顾客就络绎不绝。有购买普通养目水晶石眼镜的一般顾客，也有购买高档茶、墨晶石眼镜的清政府的官吏和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有买一般平光水晶眼镜的，也有买老花镜的。但在众多顾客中还是以社会上层人士居多。在1949年前，这些社会上层人士都讲究戴一副大镜片的茶镜或者墨镜。像清代的王公大臣、各省巡抚、督军和民国时期的军阀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徐世昌等人都与三山斋交买卖，戴三山斋的眼镜。

在三山斋眼镜店站柜台招待顾客的店伙计，既要和气耐心，百挑不烦，又得深通业务，能识别眼镜的真假，会装配眼镜能修理。卖眼镜不像卖一般商品，种类多，区别大，像老花镜或近视镜都需要对光。在当时尚没有验光设备，需要卖眼镜的店伙一副一副

的给顾客试戴。茶、墨晶石眼镜讲究很大，一副茶、墨晶石眼镜大小尺寸、颜色深浅和匀不匀，有花没花，有棉没棉（镜片上棉花状之物）以及花和棉的位置等都有区别，差一点等级就不一样，售价就不一样。它与古玩玉器差不多。

（三）严格店规

三山斋眼镜店对店伙、学徒管理严格。不要“三爷”是它的店规，三爷是少爷、姑爷和舅爷，这三种人不好管理，起破坏作用，所以，三山斋多年以来不收三爷。

此外，三山斋的店规还有，上至吃买卖（人力股）掌柜下至学徒都不许在北京立家（三山斋店伙都是河北深、冀和枣强县一带人）都必须住在店里。平日无事不许在外边留宿。有事出店门必须向掌柜打招呼。平日身上不许私自带钱，用钱向账房支取。站柜台必须梳洗干净，穿长衫；与客人交谈有礼貌，接钱递货讲究轻拿轻放；同客人产生矛盾，无论有理与无理都不许与客争辩。

（四）并店摘匾

三山斋眼镜店进入民国年间后，生产一天不如一天。因为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镜片和新颖轻巧的镜架传进北京，北京相继开办了精益、大明等几家专卖洋货的眼镜公司。三山斋的茶、墨、水晶石眼镜受到严重挑战。这种手工磨制、价格又昂贵的茶、墨、水晶石镜无法与机器磨制的用科学方法生产的镜片，而且又美观漂亮、价钱又便宜的西方洋货竞争。因此，买卖年年萧条，至1949年时已无法支持，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1958年与东方和精明六家眼镜店合并，改名“晨光眼镜店”，从此三山斋这家老眼镜店结束其店史。

十五、永增军装局

位于前门外打磨厂（今西打磨厂街）路北的永增军装局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曾是北京兴盛一时的大企业，永增军装局在北京、天津、沈阳、西安、上海等城市有机器厂、链带厂、

徽章厂、木材厂、轧钢厂、银号、钱庄、绸缎庄、皮货洋货店等四十多个联号，职工七八百人。

（一）从小帽店起家

永增军装局的创业者是河北省深县人封永修。他十五六岁来北京，在崇文门外一个制帽作坊里学徒。出徒后，就自己生产、串店推销各式棉袷帽子。由于封永修做的帽子工精价廉，所以，帽子供不应求，生意十分兴隆。后来，封永修与一个叫高增源的合资在前门外开了个帽铺，取名“永增合帽铺”。“永”字代表“封永修”，“增”字代表“高增源”。开业后，不久就赶上了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店铺被火烧光。封永修和高增源无奈只可各回各的家乡。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德、法、俄、日、意、奥、比、荷、西班牙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撤走，北京恢复了平静。封永修又回到北京，他通过向朋友、乡亲和交买卖者各方面告借，筹集到一笔资金，在前门外打磨厂西段路北重操旧业，开办了一个小帽店，将原“永增合”改为“永增”。

封永修善于经营，产品讲究质量，极重视“永增”牌匾字号。因之，永增帽店在社会上赢得较高的声誉，买卖做得很红火。

（二）改业军装生意

清代光绪末年，清政府新军练兵处换上一个叫王士珍的官员，这个人与封永修是老相识。封永修通过王士珍的关系，承应了一小批军装，交活后结算获利很丰。从而封永修于1908年将永增帽店改为永增军装局，门市不零售，专应成批的大买卖。

由于永增军装局开办的最早，当时在北京是独此一家，又由于封永修善于社会交际，他在北洋军各派系中都有熟人。因此，永增军装局做了不少大宗军装订货，买卖发展很快，“永增军装局”在北京有很高的知名度。特别在军警界，无人不知北京有个永增军装局。

（三）永增的鼎盛时期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至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这二十多年是永增军装局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北京设有百十多工人干活的军衣厂和生产军刀、军剑和军用装备的铁工厂和皮件厂以及老羊皮厂、制革厂、染厂、绣花厂、银器厂、绦带厂、中衣厂、轧钢厂、料器厂等凡军队所需的士兵军装、军帽、军鞋，军官服、战刀、指挥刀、佩剑、战马鞍，行军帐篷、行军床、水壶、水桶、饭盒等一切永增都能生产，满足供应。永增为了承揽外地驻军的买卖，在天津、西安、沈阳、太原、青岛、上海等地都设有办事处及工厂、店铺。封永修除开办军装局外，还开办了多茂钱庄、永增合银号、永增绸缎洋货店、益茂绸缎店、永裕粮店、永寿棺材铺等，共四十多个买卖。封永修本人与军政界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要人都有私人来往。在民国时期，封永修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地位极显赫。

但是，也是在民国时期，军装业出现了数十家中小军装局，打破了永增军装局独此一家的局面。1912 年以后，在北京相继有人开设了永昌隆军衣庄、华昌军装局、位诚军衣庄等二十多家，另外天津也有人开办起专应军队装备的企业“军装局”十几家。这些同业的出现自然夺走了永增军装局的不少的买卖，但是，由于封永修善于用人，会经营管理，在与同行业竞争中始终是个优胜者，是军装行业的首户。

军队用军装被服有季节性，秋季订购冬装，冬季订购夏装。所以，军装局没活时机器不动，但是，应下的活就是急要的，限定日期交活。因之，军装局用人多，没活时工人不干活也挣工钱，军装局就得赔钱。用人少，但是一旦应下几千、几万套军装就忙不过来。永增军装局的办法是，店铺和工厂的管理人员都是固定的长期工。一少部份技术工人是长期工。大部份工人有活来，没活走的临时工。临时工都是计件工，不管做什么活都是做一件给一

件钱。永增军装局的临时工可分三种，一是不带机器和工具；二是带缝纫机和工具，这种临时工除挣做活工钱外，另按月发给机器钱；三是不到厂子做活，而是将原料拿回家做，做好交活，这种也另外发机器钱。

由于永增军装局用固定的长期职工管理，带动大多数临时工干活的制度，节省了开支，少添设备，而且还能保质按时完活不误工期。

（四）永增军装局衰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伪统治北平。日本军队的军装被服都统一由日本驻华北军事机关发放。永增军装局和北平其他军衣庄只能承应伪军、邮政、铁路等军装和制服，或承做一些门市零活。永增军装局买卖萧条，封永修死后，其子封心传接手管理，永增军装局的生意更加不景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永增改营制造劳动防护用品。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1958年并点，“永增”牌匾摘掉，永增军装局的历史告一段落。

十六、天有信布店

天有信布店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街路北，是山东昌邑人高姓于清道光年间（1841—1850年）开办的。天有信和前门外大栅栏的天成信是北京两家最早经销洋布的店铺。它的店史比北京“八大祥”之一的瑞蚨祥绸布店早得多。天有信从开业起，至1942年歇业，是北京绸布业极有影响的大户。在民国年间，天有信经理高伦堂曾任北京布行商会会长，北京总商会董事。他和瑞蚨祥共同掌握着北京绸布行的大权，左右着绸布业的行情。本文有些资料是高伦堂后人高守信提供。

（一）开办天有信布店

山东省的昌邑地区是历史上著名的棉纺织业之乡，当地人不少是经营布业的。昌邑高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纺织和推销棉布为生的。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前，高家（其名已无可

考）就从家乡昌邑往京师贩运布匹。这种昌邑棉布面宽只有一尺二寸，每四十八尺是一匹。布丝密厚、结实、耐穿，售价便宜，因此，很受北京人的欢迎。昌邑高家干了几年，买卖很赚钱，为了长期在这繁华的城市干下去，于是托人在前门外鲜鱼口街路北找了个小铺子开办了“天有信”小布店。不久，又在前门外大栅栏里开办了“天成信布店”。

（二）经营洋布

洋布是对土布而言，中国各地纺织出的棉布都是木机人工，厚，面窄，称之为土布。欧美包括东洋日本的棉布，是机器纺织，薄，面宽，称之为洋布。洋布在中国市场上出现前，没有土布之说。从洋布运进中国后，人们就把中国人自己织的棉布，叫“土布”。据清乾隆年间所绘的《乾隆南巡图》上，当时正阳门外大街有一家店铺前，其“市招”上就写有“洋货”二字。说明，洋货早在十八世纪时，北京市场上就出现了。当时的洋货以杂货、纸张居多。洋布在北京市场上出现是在道光年间（1821—1850年）。天有信和天成信这两家布店是最早经营洋布的店铺。不过，当时的洋布并不受人的欢迎，因为，虽然洋布花样新颖，色泽好看，价钱又便宜，可是不耐穿，没有土布结实。如道光二十五年刊印的《都门杂咏》上写：“绵袍洋布制荆妻，颜色鲜明价又低；可惜一冬穿未罢，浑身如蒜伴茄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城内蓬勃展开，他们反对洋人传教士、反对“二毛子”（中国教徒），反对洋货。天有信和天成信是经营洋布的店铺，此时，天有信和天成信早已分开经营，天有信归原创业者高家长子经营，天成信由次子掌管。天有信的掌柜思想开朗，善于跟着潮流走，他看当时北京到处反对卖洋货，使用洋货，就自动将铺中所存洋布都搬出，当众烧毁。可是，大栅栏里的天成信在义和团火烧老德记大药房时，一起被大火吞没。

（三）天有信的兴隆

时间到了清末民初（1908—1915年）时，天有信由高伦堂经营，买卖兴隆一时。当时，天有信名为布店，实际绸缎、布匹、呢绒、细毛皮货全都经营。像杭州产的宁绸、春绸、库缎、绮霞缎，苏州产的十两绸、八两绸、盛仿绸、亮花缎，山东产的绵绸、大丝绸、茧绸等。河北高阳白布、市布、标布，江南的夏布，山东昌邑产的蓝、白布。北京清河产的毛呢，江苏南通产的褡裢绒，天津产的松紧绒。细毛皮货有河套的滩羊皮、水獭、灰鼠、狐皮等。洋货有德国礼服呢，法国的法兰绒，东洋日本布等，各种绸缎、呢绒、布匹、皮货俱全。

另外，此时的天有信已不是店堂狭小的小布铺，已建成外有高墙大铁门，门内是个宽阔院落，上有铁罩棚，店堂在院落里面。从外看不像店铺，倒像个深宅大院的府门。

天有信在民国年间，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曾提倡国货，大卖爱国布。

河北省高阳一带，在历史上农村家庭纺织业就很发达，后来市场为洋布垄断，所以，高阳一带的纺织业濒于破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大战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战争，无暇控制中国市场。因而我国的纺织业乘机兴起，尤其是高阳布发展很快，当时的高阳布被称之为"爱国布"。店铺卖高阳布和市民穿高阳布都是爱国的表现。天有信在不卖洋布，提倡爱国布中，在社会上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受到人们的尊重，后来不久，布行商会改选时，高伦堂被同行推选为会长。1932年又被北平市商会推选为常务董事。

天有信的顾客很广泛，上有官员大户，下至平民百姓，每天买东西之人络绎不绝。生意十分兴隆，是民国时期北京布业之中首户。

（四）天有信倒闭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来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北平的疯狂掠夺，物价不断上涨，货币贬值，工农业破产，人民失业，各业萧条。天有信也失去了往日之光彩，门前冷落异常。又由于战乱，南北交通受阻，外省货物来不了，本地织染业作坊等又相继停止生产，所以，货源缺少，投机商屯积居奇，使得买卖不好维持。天有信全店职工六七十人，工钱、伙食连年亏损，负债累累。最后，至 1942 年，只得宣告歇业而倒闭。

十七、敬记纸庄

清宣统元年（1909 年）刊印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上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的：“七十老翁姜赞堂，广罗佳纸自西洋；兴隆街里兴隆象，发达生意敬记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东西洋纸张的店铺。

当年北京纸张行业有纸庄、南纸店、京纸铺和纸马铺之分。经营西洋纸者都称纸庄。以南纸店销售南方所产之纸为主，并代销各种毛笔、墨盒、图章及字画等商店。京纸铺所经营的为北京当地纸作坊和北方各省生产的纸张。纸马铺以销售各种神纸、朱笺挂钱等物。以上四种，以纸庄历史最短，它是于清光绪末年才在北京出现。

（一）姜赞堂开设敬记纸庄

姜赞堂是山西省人，十几岁时来北京进一家纸店学徒，满徒后就在这家纸店中“跑外”。所以，联系人多，行中人认识得多，了解行情。1898 年“戊戌变法”前后，洋纸大量输入中国，开始进入上海，继之到了天津。当时，北京开办的报馆所用的报纸要去天津购买。姜赞堂很有经商头脑，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在北京开一家专营洋纸的纸庄买卖定会兴隆。但是他无钱没有资金计划不能实现。不久，有个姓王的家中富有愿意出资做东家，让姜赞堂开办纸庄。

姜赞堂领了王姓的东后，就在前门外兴隆街路北找了一座有

十几间房子的院落，于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1899年），敬记纸庄开业。刚开业时，敬记纸庄经营对象都是北京的大小纸铺、杂货铺和报馆等大批用纸单位，不做零售买卖。敬记纸庄主要从天津洋行进东、西洋纸，有报纸、洋宣纸、铜版纸、道林纸、洋毛边纸、粉连纸、洋高丽纸、复写纸等多种商品。由于当时北京经营洋纸的只敬记纸庄一家，所以开业后生意就十分兴隆，凡是卖洋纸的店铺都与敬记交买卖从敬记进货。

（二）敬记纸庄的发展

纸业同行看到敬记纸庄经营洋纸买卖好做，遂之效仿，清末民初时北京陆续有前门外粮食店的永太和纸庄，纸巷子的成记纸庄，前门外打磨厂的福隆纸庄以及西河沿的福生祥纸庄等开业。这几家经营洋纸的纸庄开业后，敬记纸庄虽然失去独霸北京洋纸业的优势，但是，姜赞堂会经营善管理，所以敬记纸庄买卖依然很好，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

姜赞堂会用人，爱惜人材。敬记纸庄的会计、副经理、跑外的采购和推销等骨干人员大多是本柜学徒出身。在敬记纸庄的学徒一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字写得好，能算的，姜赞堂就让其做会计工作；办事沉稳、有心计，就让其当分号经理独掌一摊；善于言说，脑筋灵活，会交际，就让其跑外去采购或去推销；办事老成的去管库房。敬记纸庄的职工待遇比一般店铺好，经理、副经理、分号经理、副经理、会计和一部分跑外的一般都“吃买卖”，就是有人力股。1937年前，一般职工每月的工资可挣十元左右。每天伙食都是白面大米，顿顿有肉，六人一桌四菜一汤。逢初一、十五吃犒劳。年终根据总账，一年的买卖赚钱多少分花红。正是由于敬记纸庄待遇好，买卖赚钱多少与职工利益有紧密关系，所以大多数职工都努力工作。

敬记纸庄在经营上，一是严格遵守信誉，卖出的商品牌号真实，保证质量；二是价格比市价低廉，一令纸低几分钱也要低，而

且当时不收款，逢节过年时算账收款。敬记纸庄发展至民国年间，为了多做外省市的营务，先后在天津、上海、西安、绥远等地开设分号。此时敬记纸庄已经发展为享誉大江南北的大纸庄了。

（三）敬记纸庄的衰败

1937 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由于欧美等国的纸张受阻，日本产的东洋纸又都由日本商人所垄断，敬记纸庄洋纸货源短缺，为了维持营业只得增添当地手工作坊纸和江南等地产的各种宣纸支撑门面。

营业不振，买卖一落千丈还不算，对敬记纸庄更大的打击是，日伪统治当局以“屯积大批西洋纸，操纵物价”的罪名将当时经理李荫泉押进监狱，并将存货全部没收。为了营救经理李荫泉出狱，敬记纸庄又用去一批巨款。此后，买卖进入困境，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敬记纸庄生意又有了转机。1956 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敬记纸庄按行业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 年在全市调整商业网点时撤点，敬记纸庄的历史从此告终。

十八、广利成衣铺

旧北京居民大多数穿中式长袍、小褂、马褂衣裳，穿着西装者是少数。而且无论有钱的官僚、商人，还是一般百姓都是自己买衣料，不是家中妇女给缝制，就是花钱让成衣铺裁剪缝制。很少有人去买现成的成衣，所以，当年北京成衣铺虽多达数百家，但大多数都是两三个职工的小铺子。

（一）广利成衣铺是南城有名的成衣铺

位于前门外草厂七条横胡同的广利成衣铺是个有七八个伙计、学徒的较大成衣铺。该成衣铺是李荣于民国初年（1912——1915 年）开办的，由于广利成衣铺做活细，衣裳式样新颖，因此，在前门外一带较有名气。

广利成衣铺的铺掌李荣很重视衣裳活计质量，他每一件活都亲自验收，不合格的都退给伙计进行反工修理。他要求量裁衣裳要随顾客体形，缝制既要坚牢，又要仔密，针脚如“鱼子”状，正面看不出针脚。沿边既要平直又要粗细一样，还要柔软。纽扣盘花则要新颖匀称。此外，还要使沿边的配料与衣裳的主料色彩搭配。广利成衣铺做衣裳都是因人而异，根据顾客的年龄、性别、职业、爱好裁剪缝制。

广利成衣铺量裁缝制衣裳不墨守成规，善于学习创新。北京在30年代，流行着一种新颖的女旗袍，这种新颖女旗袍领子比旧式旗袍小；袍身比旧旗袍随体、大卡腰、小开襟；旗袍袖子也比旧旗袍好看。改革女旗袍样式的是朝阳门内老君堂的双顺成衣铺试做成功的。这种新式女旗袍很受当时一些妇女的欢迎。后来一些成衣铺也试着缝制，广利成衣铺为顾客剪裁缝制新式女旗袍是较早的一家。李荣托朋友家女眷属到双顺成衣铺做了一件旗袍，取回来拆了进行研究，从而学会了量裁缝制新式女旗袍的技术。在1937年前，前门外一带只有广利成衣铺一家应接新式女旗袍的活，所以，天天顾客满门，活做不完。在北京的南城，当年广利成衣铺是同业中最负盛名的一家。

（二）广利成衣铺的罢工风潮

广利成衣铺的学徒没有工钱，铺中只管饭吃，管住宿。伙计工钱不固定，是分成制，为“二八分成”，就是每个伙计干活一个月的收入总数铺中得“八成”，伙计自己得“二成”。铺中管吃管住。伙计想多挣钱就得不论白天和黑夜多干活，所以，伙计很辛苦。

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北平的物价平稳，广利等成衣铺中的伙计生活尚好，平均每月能挣十来块大洋。但是“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北平的物价不断高涨。因此，广利等成衣铺中的伙计所挣的工钱就无法维

持生活了。到了1940年，北平的物价更加膨胀，伪联合货币贬值。而广利等成衣铺的伙计分成制工钱没变，伙计们忍无可忍，掀起了罢工的风潮。据伪政府档案材料《外一区警察分局长李锐报告呈解煽惑成衣工人罢工之柳兰亭等》案记载，1940年4月8日，草厂七条横胡同广利成衣伙计柳兰亭有煽惑成衣工人罢工情事，随将其一并带案。……据称，成衣失业工人柳兰亭、王海庭、于振亭、李敏芝意图破坏、团体怂恿全市成衣工人于4月8日罢工。”

柳兰亭原是广利成衣铺伙计，他曾要求铺掌李荣提高工钱，要求1元钱的活铺中得7角，伙计得3角。而李荣同意1元钱活铺得7角5分，伙计得2角5分。没有谈妥，柳兰亭等几个就停工离开了广利成衣铺。至4月初，柳兰亭、王海庭、于振亭等人四处串连，前门外一带的和茂永、德义祥、文记、明记等成衣铺伙计也都停工不干活了。此次成衣工人罢工不是几个成衣铺之事，而是全市成衣工人一次统一罢工行动。后经敌伪警察局进行分化瓦解，将柳兰亭、于振亭、李连奎、康仲三、白耀增、陈国尧、何庆祥、王鸿祥、霍世镐、马有、袁金章、王凯亭、从文教、李华等人拘捕才将这次成衣工人罢工镇压下去。

（三）广利成衣铺宣告歇业

广利成衣铺的罢工风潮最后虽然平息了，但是，生意大不如过去兴隆。一些手艺好的伙计离开了，老主顾也不来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内战爆发，物价继续高涨，居民生活无法保障。从此，广利成衣铺生意日趋恶化，最后至1948年亏损过多，只得宣告歇业。一家著名的成衣铺就这样结束了其店史。

十九、天章涌酱园

天章涌酱园位于前门大街路东五牌楼底下，是河北省人李姓创办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左右。早年它与六必居、天源、天义成和宝瑞酱园齐名，是北京五大酱园之一，俗称“天章”。

北京的酱园，由于使用原料和酱制方法的不同，分为几个派

系，有的宗法河北保定的方法用黄酱为主要原料，酱出的菜味道较咸，酱香馥郁适口，天章涌就是这种“老酱园”。还有一种以甜面酱为主要酱渍原料，酱制的菜，咸中有甜，此种称“京酱园”，天源就是其中之代表。除此还有“南酱园”，是南方苏州和杭州一带酱园酱制的甜中有咸味的酱菜。北京过去多为从南方运来经销，没有专营店。

（一）天章涌酱园开业

从食品口味上，北方人都喜欢吃咸，所以，过去北京开办老酱园者多。天章涌掌柜在没有开设买卖时，曾在东四牌楼一家老酱园学徒。他在学徒期间十分尊敬师傅，并处处留心。不到三年他就将酱园中的活，全都学会了。满徒后继续在这家酱园里干活。干至他二十五六岁时，认识了一个姓查的盐商。当时这个盐商买卖做得很大，全城多数酱园都与他交买卖，用他家的盐。这个盐商看这位李姓年轻人，不仅酱菜的手艺好，而且为人诚实、肯干。因此，盐商查某愿意出资让李氏开个酱园。他们选的地址就是当年北京最繁华，店铺鳞次栉比，行人众多的前门大街。

天章涌酱园店铺宽阔，前店卖货后边有个大院子，院子里到处都是酱菜用的大缸。店前门面是个木结构的大牌楼，上书“天章涌酱园”五个大字。此外，在旁还挂着一个2尺余长、1尺宽黑大漆油的木幌子，上书金字“酱园”两个大字。

（二）以酱菜质量优引来顾客

天章涌酱园从开业后就讲究商品的质量，到了清末民国年间，掌柜的换上了李荫平，他更注意酱菜的质量，因此，天章涌的店名大振，生意更加兴隆，天天顾客盈门。

天章涌酱园的掌柜李荫平经常对店铺学徒伙计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就来”。他抓质量的办法是，一要聘请个技术高，经验丰富的酱园“掌作”，就是制做酱菜的头儿。李荫平不惜多花钱都要请个手艺好，又能干的酱菜作坊的带头人。二要选料

精，天章涌在北京东郊有一块自种的菜园，派人在这里栽种所需要的蔬菜。天章涌自开菜园，不仅可以保证蔬菜的高质量，而且又可以减低成本。过去有句俗语，叫做“快马也赶不上青菜行”，青菜的价钱在早、中、晚一天之内涨落不定。天章涌除自种蔬菜外，而且还根据每种酱菜的口味不同及其特色外购蔬菜。像制做黄酱必用京南庞各庄和马驹桥所产的粒大、饱满、色黄、含油量高的大黄豆。制糖蒜必派人到京西长辛店一带生产的“白皮六瓣”蒜。这种白皮六瓣蒜，八九头就是1斤，而且嫩，腌制的糖蒜头大、漂亮、好吃。又如酱莴笋必进西南郊种的青笋，这种青笋不仅颜色翠绿好看，而且做出酱笋味道鲜美。三要精工细作。天章涌酱制酱菜主要使用黄酱。所以，天章涌制作黄酱极为讲究，他们的制法是，将50斤大黄豆用水洗干净，而后放在水中泡胀，再上锅蒸熟。出锅俟凉后，加入二分之一的白面用碾子碾碎用脚踩实，用竹刀切为长方块码放至木架上，俟其发酵刷去浮毛后，放到大缸中。按原料二分之一的比例加盐，加倍的比例兑清水。原料俟泡碎就过细筛筛。此后，伙计必须每天四次用酱耙翻倒，由春二月至到夏八月暑伏时才算制成。含水份多的叫“稀黄酱”，水份少的叫“干黄酱”，俗叫“老坯”。天章涌的黄酱质量好，味道好吃。过去北京人好吃炸酱面，都讲究买“天章”的黄酱炸酱。

正由于天章涌多少年来，一贯本着选料精、纯正，制作讲究的生产作风，因此，在市场上赢得很高的信誉。除了干稀黄酱外，像酱八宝菜、酱萝卜、酱茄子、酱黑菜、酱桃仁、酱黄瓜、酱疙瘩、酱莴笋等都是天章涌的名产品。

天章涌在经营上，以薄利多销与同行业进行竞争。天章涌的掌柜李荫平常说“一分利常在，十分利垮台。”所以，天章涌在众多竞争者中，长胜不衰。

（三）合并撤点

1949年新中国建立，1956年天章涌酱园参加了公私合营，

1958年全市进行商业网点调整，天章涌与同行业合并，从而摘下了“天章涌”的招牌，结束其店史。

二十、瑞林祥绸缎庄

瑞林祥绸缎庄创办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是山东省章邱县孟家经营的，最早店址在前门外西荷包巷。后又在前门大街开办分号——瑞林祥东记绸缎庄。俟前门瓮城拆除时，瑞林祥总号并入分号，统称“瑞林祥绸缎庄。”1958年撤点。

（一）瑞林祥创业

在清代，山东章邱一带地方大多数人家除了种地，不是从事纺织大捻布（当地土布）生产，就是做贩卖布匹，绸缎的生意。这个地方姓孟的是个大姓，孟姓人家也多从事布匹和绸缎的买卖。原瑞林祥的创业者就是山东章邱家乡干大捻布生意的。将棉花发给农家纺线，线纺成，又将线发出去织布；布织成该浆的浆，该染的染。这些都是发给加工费即可。开始将这些大捻布运到济南去贩卖，生意很是兴隆，后又运到北京来卖。大约在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清咸丰皇帝死，同治继位，北京有许多店铺遭劫，不少买卖没法干倒闭了。因此，这个孟姓商人乘机在前门西荷包巷倒过来一家关门店铺的铺底，开办了瑞林祥绸缎布匹洋货庄。当时瑞林祥除零售和批发大捻布外，还兼营洋布、绸缎等货。由于当时战乱已过，社会比较安定，又由于前门荷包巷是出入前门必经之地，车马行人多，商业繁盛，所以，瑞林祥开业后，生意就很兴旺。而且“瑞林祥”的店名很快为北京居民所知。

（二）瑞林祥与“八大祥”

过去在北京有“八大祥”之说，是八家经销绸缎、布匹，店名中有个“祥”字的店铺。关于这八家店铺的名字说法不一样，有的说是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店、瑞蚨祥皮货店、广盛祥绸布店，廊房头条的谦祥益绸布店，珠宝市的益和祥绸布店，打磨厂的瑞生祥绸布店，前门大街的瑞增祥绸布店和瑞林祥绸布店等八家。有

的说八大祥都是山东章邱孟家开的，它们是，大栅栏的瑞蚨祥，廊房头条的谦祥益，珠宝市的益和祥，前门大街的瑞增祥和瑞林祥，打磨厂的瑞生祥，东四的东升祥，西四的丽丰祥等八家。

以上两种说法都有瑞林祥，而且瑞林祥在八大祥中还是开业较早的一家。据1942年11月《立言画刊》一篇“北京之八大祥”文记述：“山东孟家祥字号，创始于同治年间，最初只有两家，一在前门西月墙（西荷包巷）瑞林祥，一在东月墙（东荷包巷）谦祥益，营业阔大，兼营粗细洋土布匹，绸缎。此后，瑞生祥在打磨厂西口路南开业。到了清光绪初年，瑞林祥在前门大街路东，鲜鱼口南侧开办分店“瑞林祥东记”，谦祥益在珠市口北口路西开办分店“益和祥”，瑞生祥在前门大街路东，打磨厂南侧开办分店“瑞增祥”。

至于赫赫有名的瑞蚨祥，开业是较晚的。它开业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但是，它后来居上，在激烈地商业竞争中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商品齐全，接待顾客和气热情，因此，生意蒸蒸日上，发展很快，瑞蚨祥店名世人皆知，成为八大祥之首。

（三）瑞林祥的衰败

瑞林祥的衰败有两个原因，一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中，瑞林祥老店和分店“瑞林祥东记”都遭火灾。俟事变后，瑞林祥经多方筹集资金，建房办货重整店铺，老店和分店又重新开业。二是民国四年（1915年），拆除前门瓮城。因为当年，进出前门的行人、车马，经常拥挤不堪，交通堵塞难行。民国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善前门的交通，解决瓮城道路堵塞问题，在当时内务部长朱启钤主持下，拆除了瓮城，打开了出入前门的障碍物。但是，随着拆除前门瓮城，店铺众多，商业繁盛的东、西荷包巷也就不存在了，瑞林祥老店被迫与分店瑞林祥东记合并。这次拆店房搬家对瑞林祥是一次重大损失。有以上两次事件，瑞林祥从此衰败下去。

瑞林祥与瑞林祥东记合并后，实际上分店已就不存在了。由于资金不足，商品不全，因此，已无法与同行竞争，只能维持门市。后来，瑞林祥曾兼营汇兑。一次因给人家汇兑一笔巨款，其款被外埠一家店铺吞没，填补了亏损，而受了牵连。由此，瑞林祥为了弥补亏空，民国十年左右，孟姓就将瑞林祥卖在了段范五的名下，继续用"瑞林祥"字号营业，直至1958年全市调整商业网点时，撤消为止。

另外，打磨厂的瑞生祥和前门大街的瑞增祥早在民国二十一、二年时，就先后倒闭停止营业了。此时，八大祥中能与瑞蚨祥竞争，互相抗衡的，只有谦祥益一家。在北京，谦祥益始终竞争不过瑞蚨祥。但是，在天津瑞蚨祥却没有谦祥益声望高，买卖兴旺。

二十一、庆林春茶庄

前门大街的庆林春茶庄原是福建人林子训于民国十五、六年（1926年或1927年）开办的。因其所处地域位置好，是商业繁华大街，又因预备货色齐全，所以，开业不久，很快就成了北京有名的茶庄。

（一）从摆茶叶摊到开三个茶庄

林子训虽然生长在茶乡福建，但他来北京时，学的并不是茶叶行。在民国初年，无业，为了维持生计，在老乡帮助下，不用拿本钱在前门外廊房头条里摆了个茶叶摊。一天早出晚归，虽然很辛苦，但是顾客很多，买卖很兴隆。干了几年，赚了些钱。当时廊房头条里有个劝业场（现新新服装店处）里边店铺众多，游人顾客也多，买卖好做。林子训托人在这里找地方，打算开个小茶叶铺。恰巧，有个小铺子亏了本要关张。有朋友介绍林子训就将这个小铺子倒了过来，约在民国六年（1917年）开办了第一个茶庄，"庆林春茶庄"。

取名"庆林春"三字是有讲究的，"林"是他的姓，"春"字有两个含义，一是茶树春天生的芽最嫩最清香，二是冬去春来万

物萌发生长繁茂，人们都用它蕴育其事物的兴盛。“庆”就是庆祝之意。联起来就是，庆祝林子训开办的茶庄事业兴盛。

劝业场开办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原名叫“京师第一劝业场”，是要达到“劝人兴办实业，振兴国家”之目的。主要以推销国货土产品为主，也销售少量舶来品。场内既有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各种手工业品，又有日用百货，各种杂项，风味小吃，台球室，游艺室，后来三楼上又开设了评剧、相声曲艺等娱乐活动。在劝业场里既可选购所需要之物品，又可吃、喝与参加娱乐活动。开业后，兴旺一时。庆林春又是在劝业场内游人必经之处，所以买卖兴隆，获利甚丰。俟第二年春天，林子训又在北京内城的王府井东安市场内三道街开办第二个茶庄——庆林春。

东安市场开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占地宽敞，场内分正街，东街，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和南花园等商业街。场内店铺、货摊鳞次栉比，百货、鞋帽、服装、首饰楼、中西药店、南北食品店、大小饭馆、戏院书馆等样样齐全。与劝业场相比，不仅地方大，店铺货摊多，而且档次高。庆林春茶庄在东安市场开业后，其生意之兴旺远远超过了劝业场内的庆林春茶庄。后来，林子训就用从以上两个庆林春茶庄赚的钱在前门大街路东，五牌楼东侧开办了第三个茶庄——庆林春。

林子训开买卖很重视选择店址，他开这三个茶庄都在繁华地区，而且一个比一个位置好，所以，生意好做，买卖兴隆。

（二）茶叶品种齐全

林子训作买卖以货全应酬门市，他说，会作买卖的人都是货色齐全，他们说，不怕不卖钱，就怕货不全。前门大街庆林春卖茉莉花茶多，其他品种茶叶虽然卖的少，有的甚至几天卖一斤，但是林子训都叫店伙准备。庆林春的茶叶除茉莉茶外，他们有，龙井、碧螺春、屯绿、白毫银针、普洱、武夷岩、祁红、滇红等几十种。顾客买什么都有，买不缺。

庆林春的茶叶不仅齐全，而且有特色与别家不同。林子训虽然不会拼配茶叶，但他不惜重金聘来拼配茶叶能手，负责庆林春后厂的茶叶拼配。庆林春的茉莉花茶颜色清淡，味醇杀口而且有后劲。这种口味深受顾客的欢迎。

（三）善于用人

在人们的印象中，过去的店铺伙计、学徒活累，挣钱少，吃得次。可是庆林春与一般店铺不同，林子训比较开明，他深知店中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对店中好，为店里出力。所以，林子训告诫他的后人，当掌柜后不要亏待店中的伙友和学徒。前门大街庆林春开业后，没几年的工夫，林子训由于劳累过度，得病后各处求医，医治无效，故去。前门大街庆林春由其女儿林连慧管理。林连慧遵父命宽待伙友。不仅伙友月工资相对比较，多于其他一般店铺，就连学徒每月发一些零用钱。到新年（春节）“说官话”时，按一年的出力大小，成效如何发给“馈送”。每天三顿饭都是大米、白面等细粮，六个人一桌，三个菜一个汤。每月初一、十五两天改善生活吃犒劳。年节，尤其是春节从腊月十五日至正月十五日，天天有酒有肉。

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6 年三个庆林春都参加了公私合营。不久，劝业场停办，劝业场内的庆林春随之停业。60 年代中期，东安市场改建，场内的庆林春也不复存在。近年，前门大街东侧，庆林春所在地段进行商业街改造，因之，庆林春也被拆除。现其分店，前门大街路西的庆林春继续营业。

二十二、老正兴饭庄

前门大街路东的老正兴饭庄是 1956 年上海迁京的一家老字号。

老正兴是浙江宁波人蔡正仁和卓仁兴两人合伙，于清朝同治六年（1867 年）开办的。当时叫“正兴馆”，取蔡正仁的“正”和卓仁兴的“兴”。馆址就在上海九江路大陆商场内。开业时只是个

专卖“咸肉豆腐”、“炒肉百叶”、“炒鱼粉皮”和“肠汤粉”等地方风味食品的小饭馆。由于正兴馆善于经营，食品选料精细，制做讲究，售价便宜，待客热情，所以后来逐渐地发展起来。而且成为“餐馆之王”。

（一）从饭摊起家

清代同治年间，上海还是个刚刚兴起的城市。在中英鸦片战争前，上海只是个小渔村。1842年中英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了对外通商口岸。从而中国人和外国人大量地涌进上海，各种商店在上海设立，经济很快发展起来。正兴馆的两个掌柜都是饭馆学徒出身，有一手的好烹调技术；又由于正兴馆材料选得真实，饭菜色、香、形都好；在经营上本着经济实惠、薄利多销的方针，顾客花钱不多，可是吃得却很好。所以，吃饭的客人起来越多，生意十分兴旺。小饭摊就建起了铺面房，成了正式饭馆。

（二）享誉江南

上海这个新兴的城市，发展很快，从各地，特别是江、浙人到上海谋生的人很快。当时上海人多饭馆少，个个饭馆和饭摊都拥着很多吃饭的客人。正兴馆的买卖更忙了。有几个从正兴馆学好了手艺，到外边做起了饭馆的生意，他们也把买卖叫做“正兴馆”。后来，陆续有正兴馆的学徒效仿在外边做买卖，挂起“正兴馆”的招牌。上海在清末民初时，就有“正兴馆”十几个。真是渔目混珠，真假难辨。开在大陆商场内的蔡、卓两家合伙的正兴馆，为了使众多客人知道，这里才是最早的老正兴馆，请大家不要认错了门，所以，他们就将“正兴馆”改叫“老正兴餐馆”。这一办法确实真起作用，吃饭的客人都找上门来，天天店堂中客人拥挤不堪。你会改名添字，别人也会改名，时间不久，上海滩上就出现了叫“老正兴餐馆”的买卖。随着那些叫“正兴馆”的也陆续改字号，挂出“老正兴”的牌匾。到了40年代，上海滩有老

正兴一百四十多家，真是老正兴满上海。

上海滩这么多老正兴，虽然它们的经营作风和烹调手艺有高有低，但是多数掌灶师傅都学自一门，菜肴的风味大致相同。它们经营的都是以苏州、无锡等地江苏风味菜肴。而后发展为“上海菜”。因为苏州、无锡一带江河、湖泊多，上海又是黄浦江的入海口，鱼、虾、蟹等河鲜海味多，所以，老正兴的上海菜，以鱼、虾、蟹等原料为主。菜的特色是讲究形态美，味道既咸又甜，油大而不腻。由于老正兴的上海菜人人爱吃，享誉江南，被称为“餐馆之王”。

老正兴的拿手菜很多，其中主要有“青鱼下扒划水”、“红烧青鱼肚”、“煎糟青鱼”、“冰糖甲鱼”、“雪菜川塘鲤鱼”、“蛤蜊鲫鱼汤”、“油爆虾”、“炒蟹黄”、“油酱毛蟹”等二百多个品种菜肴。老正兴用的青鱼都是太湖中的活鱼。这种太湖活青鱼，肉嫩、鲜。其他的虾、蟹和甲鱼也都用活物。

（三）迁来北京

一百多家老正兴在当年的上海滩名噪一时，可以说，要吃饭必进老正兴。但是，时间到了40年代晚期，由于我国不断地战乱，上海物价飞涨，经济衰退，百业凋零，众多的老正兴餐馆生意萧条，有的年年亏损，无法支持就纷纷倒闭。1949年时，一百四十多家老正兴餐馆就只剩下几家了。上海解放后，仅存的几家老正兴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又开始兴隆起来。

1955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同志陪同下，到一家老正兴餐馆品尝上海菜。他们叫了爱吃的“青鱼下扒划水”和“虾子海参”等几个名菜，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吃的很好，说“老正兴的菜名不虚传”。

周总理回到北京后，他想到北京有很多的江南人，他向北京有关负责人建议，北京也应搞个老正兴，让江南人也时常吃到家乡菜。1956年，经过北京服务局和第一商业局与上海政府有关负

责人洽谈，决定上海西藏路以东四马路的“老正兴”与上海“大西洋西餐馆”合并，同年迁来北京。同来的并有几位手艺好，经验丰富的烹调师、面点师和服务师，技术力量和服务力量都很好。

老正兴迁来北京时，开始在前门大街路西，就是现在大栅栏东口北侧，现在存车处之地。经营面积很小。店堂虽不大，但慕名而来就餐的人却很多。生意很红火。由于经营面积小，店堂狭窄，不能满足更多顾客品尝上海菜，所以，1959 年就迁至营业面积宽敞、店堂明亮的该街路东的新址。

1985 年老正兴餐厅进行大规模的翻修、改建，营业面积扩大为五百平方米，由一个“大众餐厅”一个“宴会厅”和五个“小宴会厅”组成。同时可接待三百位客人用餐。同时老正兴餐厅改名为“老正兴饭庄”。老正兴不仅店堂翻修、扩大了，而且菜肴也从过去四百多种，发展到一千多种。其中的贵妃鸡、八宝鸡、鸡骨酱、清蒸甲鱼，松鼠桂鱼，冰糖甲鱼、大汤王鱼、枸杞鱼米、无锡脆鳝、清炒鳝糊、醉蟹、清蒸蟹、芙蓉蟹斗、油酱毛蟹等菜肴，被中外客人称为老正兴饭庄的名菜。

二十三、万庆和五金商店

万庆和五金商店旧址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现东兴隆街）路北，1956 年合营后迁至今址前门大街并改名“前门五金商店”。

万庆和原是河北省枣强县几家铁商合资于民国四年——六年（1915 年—1917 年）共同开办的，领东经理（资方代理人）叫郑全。主要经营铜铁五金的原材料和一些工具等商品。

（一）前门和崇文门一带是五金行业的集中区

北京的五金行业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变法”后，出现的新行业。在此以前，北京虽然很早就有以山西人经营的铜、铁、锡业，但是经营的都是用中国传统土法冶炼打造出来的一些铜铁器。如居民日常所需的铜器皿，寺庙供佛用铜、锡器具，农民耕种用的铁制农具等。戊戌变法后新出现的五金行业，操此行

业者以河北省枣强县、冀县人为多数，经营的多是以欧美和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来的用新式方法生产的钢板、白铁板、钢管、锅炉、水暖等五金材料及锉、锯条、量尺和生产机器等工具。

在清末及民国年间，崇文门外大街、打磨厂、木厂胡同、茶食胡同及前门大街一带，出现了万和成、义信成、公聚德、万庆和、万庆成、万盛号、同和祥、恒泰、正信隆、元法成、同泰、天泰、长泰、永泰、广裕、仁丰、义丰、大兴昌、信义龙、玉盛、巨盛、正兴中、永兴、德顺成、吉元成、义全兴、三合公、三义成、兆丰、裕丰等百余家大小五金商店。五金行业为了维护同行业的利益，为了在商业市场上进行竞争，于民国十二年（1923 年）组建五金行公会，会址设在崇文门外大街五十四、五号。推万和成掌柜邸占江为会首。在《五金行公会碑》上明确说明建立公会的目的："帷自清末以迄民初，关税尚未能自主，厘徵更中外悬殊。彼时崇关主者，无暇顾念商艰，又复就重移轻，摧残剥削。或苞苴未至，即指斥扣留，难获蝇头，动成雀角。以致业斯业者，同感如虎之苛，乃议亡羊之补"。因之，成立了五金行公会。同业者公推邸占江及义信成的马汇田、公聚德的孟玉兴等人代表同业上书主管机关，据理以争，得到当局批准，将例外苛罚一律剔除，并且修正合法税率十数项。他们深感群策群力之效应，因而，于民国十二年（1923 年）拟具规程，成立京师五金行同业公会。

（二）万庆和开业

万庆和经理郑全也是河北枣强人，早年入万和成五金商店学徒，三年零一节学满徒后正是民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学习欧美是当时最流行的新潮流。一时间新式楼房在北京内城建起，仿照欧美使用新式机器的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建起。这些工厂大都是小型的织布、织袜、造胰、电镀和铁工厂等。因此，五金商店营业都极兴隆，用货的客户多，只要报下营业，买卖开了张，没有赔钱的。在这种一片繁盛的形势下，郑全离开万和成，有几个

铁业老乡凑钱就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路北开办了万庆和五金商店。

万庆和刚开张时只有一间门面，连郑全在内共有四五个人，几千元钱的资本。当时，也确实资本多能干，资本少也能干。万庆和作买卖的办法是，让客户看好样品，讲好价钱，他们就从其他有货的五金商店进货，俟结算后客户付了款，他们再给那个五金商店的钱。万庆和做了几年的没本的买卖，做到民国十一年至十三年（1922—1924 年）时，店房门面就扩充为三间，后边还有存货的库房，伙计、学徒以及厨房大师傅共有职工三四十人，资本翻了几番。买卖大了，万庆和派人直接去天津、上海外国洋行订货。他们从洋行订的货既有钢板、瓦棱铁、钢管、锅炉、水暖用件等大五金，还有洋钉、铁丝、橡胶、油毡等小五金及杂货。万庆和门市零售，但主要是大宗批发。

万庆和的职工大都是河北枣强老乡，学徒没有月工资，到年终可得几元钱的“馈送”。店伙月工资也只有十几元钱，年终时还可根据一年出力大小，得到馈送几十元到一二百元。万庆和的伙食也和其他店铺一样，免费供职工两顿饭，可是万庆和与其他店铺不一样的是，他们的伙食好。不仅天天有白面吃、炒菜，而且经常改善伙食。在当时从穷苦农村来的学徒和伙计，他们有的在家一年都吃不上一顿白面，吃万庆和的好伙食就很满足，所以，肯于为万庆和出力。到 30 年代，万庆和已是个大店铺了。

（三）万庆和改名前门五金商店

1956 年万庆和参加了公私合营，在 1958 年全市调整商业网点时，万庆和与新民、元法成、德茂、明德、先锋等十几家五金商店合并，迁至前门大街路东营业，统称“万庆和五金商店”，由裴世昌任经理。

合营后，资金、人员和机构相应的雄厚和扩大了。进货渠道主要从专营五金的公司进，公司没有的产品才可从厂家采进少量。

“文革”时，万庆和改名前门五金商店。近几年，由于商店加强对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了售货员道德和业务素质，商店的服务有了极大的改进。为了便利顾客，商店实行函购订货、代客托运，送货上门，缺货登记和拆零售货等服务项目。1989年，1990年至1991年连续三年获“重合同守信誉”市级先进单位称号。1988年至1991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区“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1990年被评为区“亚模”商店，区级服务工作样板商店。1991年被评为区级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二十四、森泰茶庄

位于前门大街，珠市口迤南的森泰茶庄是一家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它是安徽省歙县人王森泰（字复斋）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开办的。该茶庄多年来，以在安徽、福建产茶区自采自制，茶叶色清淡味久，售价便宜，深得各界茶客的欢迎。营业经久不衰。

现在该茶庄继续在原址营业。

（一）北京茶叶市场为安徽、福建人所垄断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北京居民每日开门后的七件大事。北京人讲究喝茶，官员、名流、学者、大学教授等社会上层人士以及贩夫、走卒等社会下层之人都喜欢喝早茶，饭后一壶茶。用茶待客更是北京人多少年来留下的一种礼节。

正是由于北京人爱喝茶，所以，茶叶市场始终繁盛不衰。茶叶产于江南，以安徽、福建、浙江最有名。过去在北京经营茶叶者大都是安徽、福建两省人。在清代中期以前，方、张、汪、吴等安徽、福建四家茶商垄断着北京的茶叶市场。后来又出现了安徽王家，山东孟家，也就是北京六大家茶庄。方家开的是景隆、宝源、泰昌等茶庄，张家开的是鼎盛、源成、张玉元等茶庄，汪家开的是汪正大、汪裕兴、馨泰等茶庄，吴家开的是吴德泰、吴鼎裕等茶庄，王家开的是森泰、利泰、和泰茶庄等，孟家开的是鸿

记茶庄。

（二）森泰茶庄名噪全城

以上所讲的六大家茶庄都是资本雄厚，直接派人去江南采办茶叶。森泰茶庄开业后，每年农历清明节前就有专人去安徽采茶，货办齐运至福建。因为福建盛茉莉花，要在福建薰茶。森泰在福建当地租房屋、雇佣工人加工薰制，先用火烘炒，第二道工序人工用手搓卷茶叶，第三道工序将茶叶放花荫处晾晒，第四道工序还是上火炒，第五道工序再晒。经过这几道工序制出的叫“素茶”也称“茶坯”。一般茶商都是买这种素茶去自己薰制。而森泰不然，是自己炒晒素茶，再薰制。其法更细，更要手艺，其法是，一，先用筛子分出粗细；二，挑取去茶叶中的一切杂质；三，上火烘烤，将茶叶放入竹笼中，下边用小火以使干热；四，加茉莉花薰，方法是一层茶叶，放一层茉莉花，以此多层都放入木箱中封严，经过一昼夜为第一遍薰。普通茶薰两遍即可，高级茶要如此薰五六遍方可。五，将薰好的茶中没有味的茉莉花取出，再放入一些新花，这叫“提”。而后装箱往北京运。此时已到秋后了。

森泰将薰制好的茶叶运至店中后，还要过粗细筛子分等级。一般用四种粗细不同的筛子将茶叶分成“高、中、次、碎末”四个等级。高、中等级的茶叶还需要不断地用鲜茉莉花提。森泰有人天天去北京南郊的黄土冈——花乡买茉莉花，为薰好的茶叶换花提味。

由于森泰茶庄自从南方采办茶叶，成本低，他们既门市零售，又向同行业批发。森泰茶庄门市零售的各类各级茶叶，他们一方面重视茶叶的封严保味，店堂中的茶罐、茶箱随启开随盖盖，一方面卖小包茶时，每一小包放入一朵茉莉鲜花，以增茶叶香味。

森泰茶庄卖的茶叶条叶既小、匀、整，泡出茶汤呈淡黄色，香味浓持久。一般第一遍水无味，从第二遍水出味可喝至第四遍都有香味。而且森泰茶庄的茶叶，无论花茶还是红绿茶比其他茶庄

的都便宜一个等级。因此，招来众多的顾客，天天客人盈门。民国初年，森泰又在前门大街珠市口迤北开办第一个分号“利泰茶庄”，不久又在安定门大街开办第二分号“和泰茶庄”。此后，相继在崇文门外小市口开办第三个分号“广泰茶庄”，在京西蓝锭厂开办第四个分号“万泰茶庄”。其声誉和生意盛极一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北铁路交通受阻，安徽、福建、浙江等南方产茶区的茶叶要通过海轮运至天津再转至北平，费用加大，茶叶的成本增加。又因为北京货价不稳，各种货价不断上涨，影响了森泰茶庄的生意，买卖很不好作。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

1956年森泰茶庄参加合营，从此其货源由北京茶叶公司供应。现在的森泰已是北京尚存的老茶庄之一。

二十五、庆仁堂药铺

庆仁堂药铺过去在北京共有四个，就是崇文门外大街的庆仁堂参茸庄，前门大街的庆仁堂药店，东四北大街的庆仁堂药铺，虎坊桥的庆仁堂西栈。它们俗称“东庆仁”“南庆仁”“北庆仁”和“西庆仁”。

庆仁堂是个合资的店铺，领东掌柜是中药业有名的王子丰，最先于民国元年（1912年）前后，开办了东庆仁，买卖经营得很兴隆，此后又相继开办了南、北、西三个庆仁堂及阜内大街的大和堂、山西大同的庆仁堂等药铺。成为北京民国年间，中药业四大家（其他三家是同仁堂、鹤年堂和千芝堂）之一。

（一）发愤创业

王子丰在十五六岁时就进一家药铺学徒。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能吃苦、勤奋肯干，在三年零一节学徒期间，后店的药材加工炮制和前店的接待顾客，看方抓药都学会了。出徒后就在店中作了一名普通职工。由于王子丰业务熟练，工作干得很出色，掌柜的就让他去干“跑外”（采购和推销）的工作。跑外使王子丰认识

了很多的人，其中就有吴霭亭。吴霭亭对王子丰很欣赏，认为王子丰精明、干练，有魄力，又守信用，是个干事业的人才。当时吴霭亭手中正有一笔钱，计划开办个药铺，因此，就与王子丰商定，吴霭亭出资，王子丰当领东掌柜。于是就将崇文门外大街，买卖作亏损的千芝堂药铺倒了（买）过来。

千芝堂经王子丰的经营，生意很兴隆，买卖做了起来。但是，后来吴霭亭和王子丰东伙因故意见不和，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王子丰辞柜离开了千芝堂。

王子丰在千芝堂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王子丰为人刚强，决心干一番事业让世人看看。由韩、徐、孙、刁家积资，王子丰领东筹办买卖。并在崇文门外大街，花市上二条胡同西口外南侧处找到一座已倒闭的店铺。经过筹备于民国元年春（1912 年），择吉开张，店铺取名“庆仁堂参茸庄”。“庆仁”其寓意是，韩、徐、孙、刁四家出资者和店中掌柜及所有店伙都是讲仁讲义之人，两字合起为庆贺仁义之人聚于一起，买卖一定兴隆。当年北京经营药材的分“药局”专以批发，不零售；“药铺”专以门市零售为主，北京药业行称药铺者为多数；“参茸庄”要比药铺高一等，表明资本雄厚，以经人参、鹿茸、牛黄、麝香、阿胶等贵重药材为主。王子丰将买卖称为“庆仁堂参茸庄”就是要比千芝堂药铺高一等。

（二）经营有方

王子丰每年岁末，要将四姓股东请到店铺来，向股东报告一年的经营情况。买卖盈亏。请股东查阅账目，验看库房。提取“红利”。店铺的一般管理都由王子丰负责，不必通过股东。

王子丰为庆仁堂几号买卖的总掌柜，各店都派有负责的掌柜。各店的掌柜与账房记账的先生都是“吃股”之人。每年岁终各店掌柜要向王子丰报告店铺一年的情况。

王子丰要求学徒很严格，在三年零一节期间内，无故不准回家。除新年闭店门休息五天外，平日没有休假日。不准留长发，一

律推平头，在店堂里必须穿长衫。对掌柜、先生、师兄有礼貌。王子丰要求学徒必须练习书法，打算盘，学习、背诵《汤头歌》和《药性赋》等药书，以掌握中药的基本知识，为以后干好药行买卖打下基础。

学徒满徒后，一般都留在本店中当店伙。店伙和学徒一样，吃、住都由店中免费提供。店中有专人理发师傅按时为店伙和学徒理发，由店中付款。店伙的每月工资很少，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月工资约三、四元钱。王子丰为了刺激店伙多出力，多卖货，将店伙的利益与店中营业好坏连在一起，店伙除固定月工资外，还有“提成”工资。按营业额的百分之一或二提取。这种办法，是庆仁堂生意兴隆，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庆仁堂进货、后柜加工炮制等，在千芝堂中已介绍了庆仁堂因与千芝堂大同小异，主要进质优之药材，加工炮制本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经营之本，提高药材的疗效，取信于社会。本篇就不重复了。

（三）改为国营

1946年至1948年，我国处于内战时间，北平的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几号庆仁党同其他行业一样买卖极不景气。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逐渐地得到恢复。庆仁堂参茸庄和庆仁堂药店为了便利患者、广开业务，聘请中医大夫来店“坐堂治病”，进行医药联合。患者就地求医，就地抓药，这种办法，既方便了患者，也有利于大夫，更有利于庆仁堂自己。从而使庆仁堂营业逐步地活跃起来，增加了销售额。

1956年，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庆仁堂在这次高潮中也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全市进行商业网点的调整，一条街同行业多的店铺进行撤点和并点；少的增点。崇文门外大街药店多，庆仁堂参茸庄就撤了点。1966年，“十年动乱”时，前门大街庆仁堂药店改名“复康药店”。1989年恢复老字号“南庆

仁堂药店”。

二十六、合盛永颜料铺

合盛永颜料铺坐落在前门大街路西，是山西太谷人孟姓于清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六年间（1870—1890年）开办的。

（一）合盛永的开办

合盛永颜料铺的开办人孟掌柜是个能吃苦耐劳又有事业心的人，他开这号买卖付出了许多血汗，走的是艰难之路。他家祖辈都务农，他十四五岁时家乡一带大旱，农田颗粒无收。为了生存他与乡亲从太谷徒步走到北京，投奔亲戚。后在一家颜料铺学徒，满徒后就留在柜上先站柜卖货，后又出去“跑外”推销货物。由于他勤快，又善于联络人，所以，每年就属他卖货多。他在柜上干了几年，可是铺中掌柜为人刻薄，柜上工友不仅工钱很低，而且又舍不得给大家吃，每天伙食很坏。因之，这个孟掌柜就辞柜不干了。离开这家颜料铺后，就去“跑合”。就是作不用本钱的生意，从熟识的颜料铺拿些颜料样品往外推销。买卖做成他从中获利。这个孟掌柜做了几年“跑外”的生意，手中攒下些钱。打算找个地方开一号买卖，恰巧，前门大街路西有个关门的店铺，有中人介绍孟掌柜就将这个店铺倒了过来，开办了这号合盛永颜料铺。

（二）合盛永的兴隆发展

合盛永开张后，生意很好，年年赢利。买卖作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这年正是庚子年，在北京义和团运动兴起，史称“庚子事变”。这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放火烧了卖洋药的大栅栏里的老德记大药房。火向四周发展，大栅栏全街被烧。并延及珠宝市、前门大街、观音寺、廊房三、二、头条等处。大火共烧了两千余家店铺，可是只有合盛永颜料铺幸免。因为火起后，各店铺之人只顾逃命，不去救火；而合盛永的伙计、学徒没有逃跑，他们与孟掌柜齐心救火，才将店铺保住。1901年，事态平静后，孟

掌柜又将右邻被烧无力重建的店房买了过来，动工扩建合盛永店铺，并在店铺房顶上立了个“天祐之”的小石牌，以说明合盛永在“庚子事变”中没被大火所烧。但是，十分可笑的是，这个孟掌柜将由于全铺伙友奋力救火，才使合盛永在大火中保存下来，是人力；而他却说成“天祐”。

进入民国成立后（1912 年），孟掌柜年老多病，就回家乡太谷去养老。其子孟达斋接任为合盛永掌柜，生意兴隆发展为北京一家名店铺。

（三）经营管理

合盛永颜料铺店堂宽阔，门面三间，前门在前门大街，后门在珠宝市。店门外除“合盛永颜料铺”的牌匾外，还挂着两排彩色幌棒。每排幌棒各六根，每根长一尺多，比大擀面杖稍粗些，从上往下涂着蓝、黄、红、绿、黑五种颜色，并饰有金花，描着金线。这种店幌是旧时颜料铺特有的。店外彩牌上还写着：“泾阳黄蜡”、“四川白蜡”、“镀金水银”等广告牌。

合盛永颜料铺的人员，从掌柜至伙计、学徒都是山西太谷一带的人。学徒期限是三年零一节，在学徒期间，没有工钱，店中只供食、宿，家中供四季衣服、被褥。伙计也是由店中免费提供吃、住。不许无故在外边住宿。伙计的月工钱只有五、六块钱。虽然工钱少，但是每一个伙计依然是兢兢业业，为店中卖力的干活。这是因为当时找个事干不容易，如果不好好干，被店中辞退，同行业再也不会用。又因为合盛永有年终“说官话”的店规。说官话一般都在农历腊月三十，吃完年饭，掌柜的坐在账房里，从学徒至伙计一个个被叫到掌柜的面前。对每一个人在这一年中的表现，进行总结性的谈话，有的表场，有的批评。并送给奖金——“馈送”。这种馈送多的可得一、二百块银元，少的也能得到几十元钱。对一年中不好好干活的人，也是在说官话时辞退；如伙计不愿意继续在合盛永干了，就在与掌柜说官话时，辞柜不干了。合

盛永有一店规是“东辞伙”一笔抹；“伙辞东”一笔清。东辞伙是店掌柜辞退伙计，伙计在店中的长支（就是欠店中的钱）不管多少，都不要了。如果伙计辞柜不干，那要欠店中多少钱都要还清。

合盛永颜料铺经营的商品很齐全，有各色颜料，桐油、大白粉、血料、水胶、鱼鳔、猪皮鳔、白黄蜡、水银等国产品。还有调和漆、砂纸等舶来品。

合盛永颜料铺的顾客很广泛，北京在1949年前，人民的生活普遍很苦，家庭妇女洗衣裳时，经常用从颜料铺买来的“煮蓝”或“煮青”给褪色的旧衣掌染色、套色。合盛永每年销售的煮蓝、煮青等颜料最多。合盛永的学徒每天都有几个人在后边做颜料过秤，包包的活。煮蓝和煮青供给民用的，都要包成每包二钱的颜料。合盛永每到五月节、八月节和旧历年时，这种小包的煮蓝和煮青卖的特别多。因为每逢年节，居民们都要穿上洗得染得干净、漂亮的衣裳。所以，合盛永每逢年节都要多派几个学徒赶包颜料包，以供应门市销售。

合盛永除供应居民颜料外，它与染坊、营造厂、木厂、家具厂等都交买卖。合盛永有“跑外的”（推销员），带着各种商品样子，到染坊、营造厂等处推销商品。合盛永在1937年前，是生意最兴隆时期。当时的掌柜李重华善于社会交往，当时很多染坊、木厂子等都与合盛永交买卖，用他们的颜料、桐油等商品。

（四）生意衰落、撤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物价飞涨，居民生活困难，购买力低；染坊、木厂子等企业也没有生意。所以，合盛永买卖走向衰落。另外，欧洲的颜料等断了货源，虽然日本货多，但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这也影响着合盛永的买卖。

1949年新中国建立，1956年合盛永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年改为染料化工公司的门市部，后撤点。

二十七、公兴纸店

现在前门大街有一家经营文化用品、乐器、体育器械的大型商店——前门文化用品商店，其前身就是过去北京著名的公兴纸店。

公兴纸店是刘敬魁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开设的，当时除经营各种国产纸张与洋纸外，还代卖毛笔、香墨、砚台等文具。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1958 年附近几个小纸店并入，改名“公兴文化用品商店”。1966 年改为现名。

（一）创办和遭灾

刘敬魁是河北衡水人，家中务农，年少时曾在家乡读过两三年的私塾。长到十三四岁就来北京一家纸铺学徒。北京在民国年间前，纸张行业是个大行业。从业人数多，纸铺遍布全城各处。纸行分纸庄、南纸店、京纸铺和纸马铺等几类纸庄，主要经营舶来品洋纸；南纸店是以经销江南所产的宣纸及各种图章墨盒、字画等商店；京纸铺是北方人开设，以经营各种银花染纸、东昌等纸张为主的店铺。此外还有销售各种神纸及朱笺挂钱的“纸马铺”。刘敬魁所在的铺子是“京纸铺”。这家纸铺买卖规模很大，不仅有零售，而且还做大量批发的生意。刘敬魁满徒后，就在柜上搞批发。行里人熟，而且人际关系又好。他干到光绪二十五年，有几个人与刘敬魁商量，想合伙开一号买卖。恰巧前门大街路西，大栅栏东口外南侧一家店铺，买卖干不了啦，刘敬魁托人说合，把这个铺底倒了过来。经过一段筹备，就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春开业了。取名“公兴”，其意是合伙的几个人都出于“公”，买卖定会干好，生意一定兴隆。公兴纸店的大掌柜为刘敬魁。

公兴纸店开业不久，农历五月二十日，义和团的团民火烧老德记药房。殃及大栅栏整条街和观音寺，煤市街，廊房头、二、三条，珠宝市，前门大街等商业繁华街，公兴正在大栅栏东头，所

以也未能幸免。新开业的公兴纸店虽然存货不多，但是纸张是易燃物，在大火中店房和货物都被毁。

（二）重建和兴隆

庚子事变后，第二年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外国侵略撤走后，北京恢复了平静，北京人重建被毁坏的家园。刘敬魁等人经多方筹措，在亲友帮助下，借来一笔资金，在原地建起了一座二层楼房的店铺，公兴纸店又重张开业了。

公兴纸店重张后，刘敬魁他们商量决定，在三方面下功夫把买卖做好。一是要进好货，价钱便宜的货。货的质量好又便宜，才能受到顾客的欢迎，畅销。公兴纸店派人去名纸的出产地采购。玉版宣、虎皮宣、南宣、竹纸、毛边纸、元书纸及金银箔等都产于江南，他们就派人到南方去办货。高丽纸以河北迁安县产的最好，质地柔软、洁白，有韧性。公兴与迁安高丽纸手工作坊有交往，由迁安进高丽纸。东昌纸是山东东昌府的名产，他们与东昌府造纸作坊有订货关系。草纸产于山西大同，公兴纸店特派人去大同订货。北京造纸作坊生产的银花纸、花素纸及豆纸，可称上等，公兴就直接从这些纸作坊中进纸。到了民国年间，公兴也添上了洋货，但数量很少，以报纸为主。

由于公兴纸店办的纸张都是名产品，而且又直接从产地进货，所以，货好，还便宜。

二是公兴有几个跑外的，专门跑北京的一些店铺，推销店铺所需的包货纸及旧式账本。这些店铺用纸是当时公兴纸店销售的一大宗。公兴与这些店铺交买卖，都是赊销，年底结算付款。

三是公兴纸店很重视门市零售，顾客进店不论买多买少都是热情招待，就是买一个铜元的豆纸，也一样对待。前门大街是北京有名的繁华商业街，行人多，平日买卖就很忙，一遇每年的夏初、冬初和农历新年时，公兴就更忙了。夏初，天气渐热，家家户户都要糊窗户，换冷布，糊卷窗，以便使屋里通风；冬初，天

气慢慢变冷，各家又需将冷布撕下，改糊高丽纸，以保室内的温暖。农历新年是我们民族最隆重的节日，家家都要庆贺。不论富人，还是一般居民都要贴“对子”（春联）、糊窗户、裱糊顶棚和墙壁。由于公兴都卖的是名纸，所以，远近居民都到公兴来买纸。

公兴纸店卖的毛笔、香墨、砚台和镇尺、仿圈都是一般商品，只能供店铺写账和学生练习书法所用。

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时，公兴纸店已名扬京城了。

（三）学徒和伙计

公兴纸店的学徒和伙计大都进河北省的衡水、枣强、深县一带的人。学徒都是由亲戚、朋友、同乡介绍而来。所以，都与掌柜的有一定的关系。学徒期限为三年零一节，没有工钱，店中管饭、管住，只是在年终时，得几块钱的“馈赠”。伙计大都是本店的学徒，月工钱很低，只几元钱。他们主要靠年终的“馈赠”。每年年终时，掌柜的要与每个学徒、伙计谈话，这叫“说官话”。在说官话时，掌柜的根据每个人的一年工作情况，出力大小，为店铺创造的利益多少，决定馈赠的多少。多者可得大洋二、三百元，少者也能得到几十元钱。但是，懒散或犯店规的学徒和伙计，也是在说官话时辞退。这些被辞退之人，一般同行业都不会雇用，只能回家去种地，所以，学徒、伙计平日都守着自己的饭碗，不敢疏忽。都勤奋地干活。

（四）合营和发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6 年公兴纸店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 年公兴与几个文具纸店合并，取名“公兴文化用品商店”。1966 年改名“前门文化用品商店”。现在这个商店不仅经营纸张、文化用品，还经营乐器、体育用品等。是北京目前较大的文化用品专营店之一。

二十八、祥聚公清真饽饽铺

过去在北京大多是汉民饽饽铺，而清真教饽饽铺为数不多，当

年最负盛名的清真饽饽铺是前门大街路西的“祥聚公”。(过去将糕点俗称饽饽)。

祥聚公开业于民国元年(1912年)为合资企业，管事掌柜是王殿文。当时祥聚公虽然自己没设后厂，但是门市所销售的饽饽都是由掌柜王殿文另外一个叫裕成斋的饽饽铺专点供应。裕成斋是王殿文用五斤香油，五斤红、白糖，五斤白面，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前门外石头胡同创办起来的。因此，很多人都叫它“三个五”。

(一)开业

过去北京的商业街以前门外一带最繁华，店铺鳞次栉比，车马行人往来如梭。不仅有名的“东四、西单、鼓楼前”等商业街不如它，而且现在北京最繁荣的王府井大街也不能与前门外相比。所以，作买卖的人都想在前门外找个一席之地。王殿文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企业家，很知道做生意必须有个好地方。裕成斋买卖开业后，虽然生意不错，但是发展慢。恰巧，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前门大街大栅栏东口南路西，有一家店铺亏损倒闭了。王殿文托人想把这家店铺的铺底倒过来，经过协商，店主基本同意，但是，房主提出，王殿文开饽饽铺他要投资入股方可。因此，店名叫“祥聚公”。“祥”祝生意兴隆，吉祥，“聚”股东相聚，要互相公平对待。

(二)兴隆

祥聚公占据的位置是很好的，王殿文知道要把买卖做好，做出店名，还必须重视饽饽质量和热情待客。

王殿文亲自抓饽饽的质量。首先用重金聘请有经验、手艺好的掌案人(做饽饽的头儿)。其二是制饽饽采办精良的原材料，当年仁和碾房磨的白面细，西红门小磨香油味醇正，虽然价钱昂贵，而祥聚公也订它们的货。糖和其他果料全都一律用名特产品，如红白糖祥聚公都花高价买上等货，核桃要西山一带的大个薄皮核

桃，蜂蜜进槐花蜜，选密云小枣，西山的玫瑰花，山东的鸭梨，深州的蜜桃，金糕张的金糕。就连鸡蛋祥聚公也都有专点提供。其三是严格遵守操作程序进行生产，从合面、拌果料，到最后上炉烤，都是认真不苟。在饽饽行业有“三分做七分烤”之说，它是说明，前几道工序做得不管多么认真，多么好，最后炉火没掌握好，火大，烤焦了；火小，不熟。所以，饽饽作坊的手艺人，除去掌案的外，炉工最重要了。祥聚公请的掌案人和炉工，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好手艺人。其四是加强质量检查，次货不上柜台。尽管祥聚公后案生产，有好手艺的掌案人和善看火候的炉工，但是，王殿文也不放松对饽饽的质量检查。每炉饽饽出炉后，都经王殿文亲自检查后，才可上柜台出售。一年八月节十分忙，特别是月饼生产供不应求。由于赶制月饼，一次有二百多斤的月饼，质量稍差，如果在门市出售，顾客不会发现。但是，王殿文坚决不让卖，宁愿受损失，也不欺骗顾客。他说，我们“祥聚公”三个字是由饽饽的高质量才换来顾客相信的，才上门买咱们的饽饽。不好谁买你的，骗人就是自己砸自己的牌子。

饽饽产品是有季节的，过去北京人，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饽饽。像正月十五日吃元宵，二月二“龙抬头”吃太阳糕，三月籐罗开花时，要吃籐罗饼，五月端午节时粽子和五毒饼，六七月天热时都吃祛暑的绿豆糕，八月中秋节时，家家都吃红白月饼，九月九北京的风俗“登高”吃花糕，冬月天气寒冷时，有钱人家吃芙蓉糕，一般人家吃“缸炉”（做饽饽试火时做的外表糙粗，破边的饽饽，但质量好）。以上这些饽饽祥聚公都按时生产，按时供应。此外，年节，穆斯林把斋、开斋和走亲访友都讲究吃大、小八件和用其送礼。祥聚公生产的小、大八件在北京南城很有名。

祥聚公生产和销售的各式清真饽饽，选料精，投料足，做工讲究，风味独特，因此，深受回汉等民族顾客的欢迎。像当年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侯喜瑞、尚小云、李洪春，中医外科医生

赵炳南等都经常光顾祥聚公。一次，马连良去上海演出，春节没能回来，特给祥聚公来信，点名要桂花板糕、排叉等饽饽。祥聚公接信后及时派人装匣寄去。

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祥聚公的生意十分兴隆，为了发展业务，便利永定门一带居住的顾客购买祥聚公的饽饽，他们又在永安门内先农坛附近开办了一座祥聚公分店。但是，到了“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从此，直至1949年，祥聚公的生意就处于生意不振，买卖萧条时期。1954年，祥聚公本店、分店与裕成斋三处合并，统称“祥聚公”。1956年参加了公私合营。“十年动乱”中，祥聚公的招牌被摘掉了。1984年，“祥聚公”的牌匾在前门外鲜鱼口街内挂出，他们请来了原祥聚公的老职工指导生产，按照传统生产工艺生产各式糕点。

现在祥聚公在鲜鱼口街的门市部已撤消，1993年又在崇文门外磁器口迤南的广渠门内大街设了门市部。厂部设在左安门外饮马井。职工人数由过去几十人增至四百人左右，其中生产技术人员二十人。现在生产的糕点有70多种，其中新品种有40余种，并且年年试制新品种。年产量已过千吨。现在祥聚公除在糕点产品质量上提高外，还在产品形式、图案及装璜包装方面进行革新，以适应各层次消费者的需要。祥聚公现在除广渠门内大街门市部外，还在全市多家食品店、副食店设专柜，并远销至山西、河北、吉林、西安等地百余家。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组委会特指定祥聚公为穆斯林各国运动员餐厅提供中西糕点月饼20个品种，获得好评。亚运会穆斯林运动餐厅摆放着用糖制成的大蛋糕“九龙壁”艺术造型，也是祥聚公提供的，它是由祥聚公曾获得全国“长城杯”西点大赛特等奖获得者张玉勇技师制做的。深受与会各界中外人士赞赏。

二十九、合香楼香蜡铺

旧时在官府、民间盛行祭祀天地、神佛时，高香、蜡烛是必用之物。所以香、蜡行极为兴盛。北京从金代海陵王天德五年（1153 年），正式建都以后，相继经过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王朝的首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迷信神佛，并利用神佛麻痹老百姓，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在北京大建寺庙，只关帝（关羽）庙，清代时就有一百多座。所以，有人说，“明修长城，清修庙”。

北京在清代，不论是为官的还是为民的，除极少数人外，烧香拜佛是其日常生活中一件大事。北京从正月（一月）至腊月（十二月），月月有庙会。中等以上人家，家中都设有佛堂。根据社会的需要商人和手工业者到处开办香厂、蜡厂和香蜡铺。在民国元年（1912 年）以前，北京的香、蜡行是个大行业。进入民国以后，由于科学的发达，神佛在众多居民中淡薄了，烧香拜佛之人日渐减少。香、蜡行逐渐衰败。众多的香厂、蜡厂和蜡铺倒闭，本文介绍的合香楼就是北京当年一家极为有名的香蜡铺。

（一）合香楼的兴旺

合香楼香蜡铺坐落在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路西，约开业于清代中后期的咸丰（1851—1862 年）年间，是前店后作坊。清光绪时又在前门外珠宝市路西开设“合香楼”分号。

香、蜡行的主要市场在庙会上，合香楼开业时正是北京庙会繁盛时期。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日各地都有寺庙开放，接待香客烧香拜佛。当年北京的城乡到处都有小关帝庙、土地庙、火神庙等，这些寺庙一般都是每月初一、十五日开庙。除此之外，每月都有一两处香火旺盛的著名寺庙开庙，正月里最多，有前门关帝庙，广安门外的财神庙，西便门外的白云观等开庙，关帝庙初一开一天，财神庙初二开一天，而白云观从初一开庙至十九日共开十九天。二月是左安门内的太阳宫开庙，三月是东便门内的蟠

桃宫"三月三日蟠桃会"开庙，和三月二十八日朝阳门外东岳庙东岳大帝诞辰开庙，四月是京西的金顶妙锋山的娘娘庙从初一开至十五日，而且是昼夜不停地有香客烧香。四月二十八是药王诞辰，北京的五大药王庙都开庙。此外，五月里的卧佛寺庙会，六月里有中顶庙会，七月的江南城隍庙庙会等。这些庙会上，赶庙会的商贩很多，卖什么的都有，而以卖"高香"的最多。

合香楼生产的香种类很多，而主要产品是三种，一是线香，因为细似粗线而故名，俗称"高香"，专供信佛烧香祭祀用。二是鞭杆子香，由粗长似鞭子之杆故名，此香既为居民燃香计时而用，又为丧葬"接三"晚间送丧时点燃。三是杷兰香，为富有人家薰居室而用。蜡烛生产是合香楼的次要产品，因为销售量远比不了香的销售大。合香楼的香和蜡烛在门市也零售，但主要是批发。各地的杂货铺和庙会上的小贩一般都与合香楼交买卖，买合香楼的香和蜡烛。合香楼高香和鞭子香销售至北京城乡各镇，还远销至北京附近各县。生意兴隆一时。

（二）做香工人罢工

1943年3月，北平沦陷时期合香楼曾发生一次劳资纠纷，工人停工不干活要求增加工资。

当时合香楼的铺掌柜叫李仲三，前店卖货有四五个人，一个管账先生。后边作坊有做香工人十二人，由一个叫孟文英的工头带着干活。做香工人都参加了香行行会，这是个全市的组织。香行行会领导称"会头"。这个香行行会是维护工人利益替工人说话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北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华北沦陷区的疯狂掠夺，各种物资奇缺，伪币贬值，物价不断飞涨，而工人的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不断上涨细数。特别是香行工人更苦，合香楼做香工人活忙时，一天干十二三个小时活，合香楼不管饭，工人自己做饭吃，每天工洋伪币6元4角5分，干一天给一天工洋，下雨不能生产干活停发工洋。香行行会召集

北京各香铺做香工人开会，要求各铺给工人增长工洋。合香楼做香工人要求每天工洋2元5角，如不增价，由本铺管饭吃。如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就不干活。因为当时的季节正是做香的好季节，所以，合香楼铺掌李仲三无奈同意了工人的要求，给工人增加了工洋，工人复工干活，一场风波结束。

（三）合香楼被社会淘汰

清末，特别是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地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每次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为结局。因此，使得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提出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革内政的主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行“戊戌变法”。变法虽然失败，但，废除旧学制，删去四书五经的孔孟之学的教学内容，设立新学堂学习数理化等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是大势所趋。在光绪后期，一些新学堂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相继设立。由于青年人学习了新的科学知识，破除了封建迷信。从此，逐渐地烧香拜佛之人不断减少。合香楼等以生产经营香、蜡烛为业的店铺开始走下坡路。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上没有人再公开去寺庙给泥胎偶像烧香礼拜了。合香楼也宣告关门歇业了。

三十、同丰酒店

同丰酒店位于前门大街路西，大栅栏东口外北侧。开业年代不详，笔者知道这家酒店在三四十年代，是北京南城一家很有名的酒店。

同丰酒店店堂是上下两层楼房，楼下虽然是个两间门面，但，进门不足五尺就是长长的柜台，柜台外既没凳子也没桌子。顾客进门就对店中伙计说：“给我来一碗”！于是伙计就用蓝边白瓷茶碗给打上满满一茶碗白酒，顾客站在柜台边，什么酒菜都不吃，就将一茶碗白酒饮入肚中。有的顾客是自带花生米或别的什么酒菜喝酒，多数顾客都是干喝酒，不吃菜的。

当时，北京的酒店是既零卖酒，就有桌凳供顾客坐下慢慢饮，而且还准备多种可口的酒菜供顾客下酒。惟独同丰酒店既没有坐的地方还不卖酒菜，顾客进门站在那就干喝，喝完就走，让坐下休息一会都没地方。但是，一天顾客不断，生意还十分兴隆。这与同丰酒店酒的质量好有关系。

三十一、二十六家炉房

炉房原本是手工业作坊，他们用坩埚熔化散碎银子，铸成大小不同的元宝和用大夹剪将大块银子夹碎。后来逐渐发展成代存和放贷银两的店铺。

二十六家炉房是指前门外珠宝市内，聚丰、德顺、同元祥、聚义、益泰源、源丰、复聚、增盛、万聚、宝元祥、聚增、全聚厚、万丰、万兴、裕丰、宝丰成、祥瑞兴、谦和瑞、宝兴、德丰、恒盛、裕兴源、聚泰、恒康、增茂、聚盛源炉房。

清末，北京经营炉房者很多，而以珠宝市的二十六家炉房信誉昭著，与官府、钱庄、金店等都有交往。这二十六家炉房虽都是私人开设，但是由于它们都在户部备案，所以称之为“官炉房”。光绪年间，这二十六家炉房实际上左右着北京的金融行情，全市大小店铺在早晨开业前，都必须到珠宝市查看银、钱比价的水牌，而后才能开店门营业。否则无法营业。如《都门纪变百咏》上记载着：“庚子事变”大栅栏、珠宝市大火，“祝融虐焰上干霄，金店银炉（炉房）一例烧。百万商民齐束手，市廛景象太萧条。”致使全市的银号、钱庄、当铺，一律停业。后来，户部给这二十六家炉房拨款，帮助才得复业。

进入民国后，由于银元的增多，炉房日趋衰败，最终在社会上消失了。

三十二、正通银号

正通银号是由王继堂投资4000块银元于民国六年（1917年）在前门外珠宝市路东开业。主要经营银元与铜钱和硬币与纸币的

兑换，从中获利。后又增加资本6000元，以此扩充营业。

旧中国由于黄河失于治理，所以，经常决口，洪水泛滥成灾，冲毁农舍和农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到处流离失所，死走逃亡。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办发行“黄河救灾奖券”，简称“黄河奖券”。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建设公路，发行“建设奖券”。正通银号取得了推销“黄河奖券”和“建设奖券”的业务。关于老百姓购买黄河奖券还有个买奖券发大财、开买卖的传说故事。前门外大栅栏里有个张一元茶庄，说这家买卖的掌柜就是用一块钱买了一张黄河奖券，得了个头彩，才开了这个张一元茶庄。所以取名“张一元茶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正通银号遂告停业。

三十三、福云楼猪肉杠

福云楼位于前门外粮食店中间路西，是山东荣城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天开办的。

福云楼开业时卖生猪肉，也有自制些熟肉卖，后来福云楼做的酱猪头肉出了名，买的人很多，这以后就不卖生猪肉了，专酱制猪头肉销售了。福云楼的酱猪头肉是以外表颜色油光漂亮、味道香醇、肥肉不腻、瘦肉不柴，所以顾客爱吃。福云楼酱猪头肉所以受到广大的顾客欢迎，是与他们选料精，酱制讲究分不开的。他们专门选用京东一带喂养的肉嫩皮薄的鲜猪头，将毛去掉，洗干净，下锅用清水煮，先去其腥味，而后从锅中取出。再用薄片刀再将毛根和杂物刮干净。接着用力将猪头劈为两半，入锅煮至七成熟时，脱去骨头。酱制才要手艺，先在大炒锅用油煸炒白糖使其变为红色，随即就将猪头肉放入锅中上色。俟将猪头肉颜色上得均匀后就入另一只锅中投入花椒、大料、小茴香、桂皮、葱、姜、食盐等作料，先用旺火煮约一个小时，再改用微火煨约两个小时后出锅，猪头肉就算酱制好了。

前几年，福云楼这个老字号还存在，但现今再到粮食店已看

不着它的踪迹了。

三十四、谦祥益与益和祥绸缎庄

谦祥益是山东章邱县旧军镇孟家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在前门外东月墙开办。当年前门的东、西月墙是店铺众多的商业巷子，东月墙卖荷包的多，叫“荷包巷”，西月墙卖帽子的多，叫“帽巷”。统称“东西荷包巷”。

谦祥益在家乡山东济南就是经营寨子布（土布）的，在北京也是以经营寨子布为主。因为这种寨子布，布厚结实耐穿，售价又很便宜，所以生意很兴隆，谦祥益之名也很快驰名京城。但是，由于“荷包巷”街道很窄，店铺的店房都窄小，谦祥益的店铺也不大，买卖不容易扩大发展。于是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在前门外珠宝市北头路西开设分号“益和祥”。后又在民国初年，在鼓楼前，后门桥北侧开办第二个分号，即谦祥益北号。

民国四年（1915年），为了改善前门瓮城出入的交通堵塞问题，在当时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下，拆除了瓮城，除关帝庙和观音大士庙外一律拆除。帽巷和荷包巷自然在拆除之内。谦祥益也必须拆迁，于是，谦祥益在前门外廊房头条路北，将聚泰德干果店的铺底倒了过来，大兴土木，建成店门前有小广场，上有高大铁罩棚，店堂宽阔，布置典雅，货架有序的大店铺。此时，谦祥益和分号益和祥、谦祥益北号都是从以经营寨子布，改以经营苏州、杭州的丝绸、罗纺，南京的缎子为主。谦祥益总号主营大宗批发，兼门市零售。益和祥主要是门市零售。

清末民初，谦祥益的主要商战对象是大栅栏里的瑞蚨祥。由于瑞蚨祥所处的大栅栏在当时北京城是最繁华的商业街，所以，谦祥益的生意始终略逊于瑞蚨祥。可是在天津，瑞蚨祥敌不过谦祥益，谦祥益为首。

解放后，1953年谦祥益迁至其分号珠宝市的益和祥中，合并后统称“谦祥益”。后又改称北京丝绸商店至今。

三十五、花汉冲香粉店

花汉冲位于前门外珠宝市路西，是开业于清代初年的老字号。最初是卖香串的店铺，后来增添了脂粉等商品。

旧时，北京妇女梳头洗脸，修饰所用的化妆品有洗脸的桂花猪胰球，玫瑰碱，涂脸的锭粉、胭脂粉，抹嘴唇的胭脂饼，梳头的桂花油等。

花汉冲是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由于花汉冲自产的各种香粉选料精良，制做认真，香气持久，味正，白的洁白，红的鲜红。因之，驰名京城，在光绪年间，花汉冲的胭脂饼和窝头粉等化妆品曾供应清皇宫内使用。

花汉冲的胭脂饼是用上好的棉花，像絮被子一样，把棉花絮在一个小碗大小的铁模子里，再倒上适量的胭脂水，用一个铁杆压紧，取出风干。这种胭脂饼可以长期保存不坏。是妇女涂口红的最好的化妆品。锭粉是用锡粉加香料，和水调成浆糊状，用一个小漏斗，漏在纱布上，晒干，做成比荸荠还小的窝头形。因此，锭粉俗称"窝头粉"。用水泻开，涂于脸上，既白又香，为旧时北京妇女化妆的佳品。清皇宫的妃嫔和有地位的贵夫人，是用奶调泻窝头粉，并加冰糖，这样擦在皮肤上，显得滋润和光彩。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香水、口红、香脂、香皂等西方化妆品传入北京。花汉冲的香粉市场被挤占，生意日渐萧条，所以，早在1937年北平沦陷前就停业了。

三十六、德兴永金箔铺

德兴永金箔铺又叫德兴永锤金作，其铺址在前门外东河沿路南。

德兴永金箔铺创办于清顺治年间。其铺长张氏是江苏省苏州人，在明代时被征入京城服役。到了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颁布了"免直省省京班匠价，并除其匠籍"的政策。过去工匠到京师为封建政府服役，人身不自由的枷锁被解开了。这个苏州籍的

锤金匠人，就在前门外东河沿找了间房间，并从家乡将他的儿子找来，一起干起了锤金箔的活。

黄金箔在明、清两朝用途很广泛。像皇宫的三大殿，皇陵的建筑，各种寺庙都使用金箔。还有如首饰楼做包金首饰也用金箔，药铺、喜轿局、杠房、鼓铺、戏装铺等都离不开金箔。所以，这个张氏的锤金箔的活很忙，并逐渐地站住了脚。后来，由于来往业务的需要，才起名叫“德兴永金箔铺”。并招了几个学徒，扩充了营业。德兴永招学徒的条件，一是身体健壮，因为身体不好抡不起十几斤重的大铁锤。二是头脑灵活，能做巧活。三是手脚干净，金箔是贵重金属，一点都不能丢失，一点碎金片都不能私自带在腰里。一旦发现手脚不干净，立即解雇，严重者要送进官府论罪。

德兴永名为金箔铺，实际是主要给清政府和寺庙做加工活。他们干活使用的工具很简单，就是一块大平整的石头，两把大铁锤，一把小铁锤，一把铁夹。但是，工艺难度很大，没有高超技艺是干不了的。因为是要将一两黄金经锤打，要锤出 4 寸见方的黄金箔 2000 余张；锤出 3 寸见方的黄金箔 2500 余张，其薄如蝉翼。他们的具体操作是，两个（或三人）为一对，有经验手艺好的师傅做指挥，左手用大铁夹夹着黄金，右手执一把小铁锤指挥。抡大铁锤的人站在大石旁，师傅的小铁锤敲在什么部位，抡大锤的就打在什么部位。而且不紧不慢打出节奏来。

清亡后，德兴永金箔铺的生意就衰落下去，约在北平沦陷时期就歇业了。

三十七、复顺斋的五香酱牛肉

五香酱牛肉经营的复顺斋是与经营五香酱羊肉的月盛斋齐名的老字号。

复顺斋开业比月盛斋早，是清真教人刘复顺于清顺治年间在前门外门框胡同开办的。虽然只有一间门面，而且所处的门框胡

同文极狭窄，但是地处商业繁荣的前门大街，游人多，生意好做。特别是复顺斋的酱牛肉外观呈油光的深红色，入口松软，肥肉不腻，瘦肉不柴，醇香而挂口。每当下午酱牛肉出锅时，肉香四溢，食客闻香而至，争购新出锅的五香酱牛肉。当年京剧名演员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侯喜瑞、李万春等都是复顺斋的老顾客。

新中国成立之后，复顺斋一度从门框胡同迁至粮食店街北口路东继续营业。后店铺多次易匾，70 年代时终于停业了。而其店名并没被老北京人忘却。

三十八、六必居和严嵩

前门外粮食店街的六必居酱园是全国驰名的老字号。人们都传说，其店堂内悬挂的“六必居”牌匾是明朝时严嵩所写。

关于严嵩给六必居写匾有种种传说，最普遍的是，在严嵩没做官以前，闲居在北京，时常来六必居喝酒，与六必居的掌柜和伙计都很熟。店里人听说他写得一笔好字，掌柜子求他写了此匾。当时严嵩还是小人物，所以没落款。另一种说法是，六必居的匾是严嵩做大官以后写的。据说，严嵩爱喝六必居的酒，严府时常有人到六必居买酒。店掌柜想用严嵩的社会地位以抬高六必居的身价，就托仆人想法请为六必居写块匾。男仆就去求女仆，女仆又去求夫人。夫人知道严嵩不能为一个普通店铺写匾，就天天在严嵩面前反复练写“六必居”三个字。严嵩看夫人写不好，他就给写了个样子，让夫人照着样子去练。于是严嵩手书的“六必居”大匾就这样写成了。因之，没有题名。

三十九、长春堂避瘟散

长春堂药铺原址在前门外长巷头条，解放后才迁前门大街现址。长春堂是以自制销售闻药避瘟散而闻名的。

长春堂开业于清乾隆末年，创业人是孙振兰。他本是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郎中。后来开办长春堂店铺后，专门制作闻药销售。买卖传到孙振兰的孙子孙三明经营时，孙三明信奉道教，曾在房

山县一个娘娘庙受过戒，当了火居道士，因之，人称孙老道。

民国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进行军事侵略，攻占我国的领土，一面进行经济侵略，向华北各地倾销剩余商品。日本药“仁丹”和“宝丹”在北京大量销售。长春堂为了抵制日货，在药师蔡先生帮助下，经过反复研制，最后，炮制出新闻药——避瘟散。由于这种避瘟散具有香、凉，祛瘟消暑的效用，自投放市场后，很受各界人士的欢迎，终于取代了独霸北京市场的日本宝丹。成为夏季畅销货。当时在北京曾流行“暑热天，您别慌，快买暑药长春堂，抹进鼻孔通心肺，消暑祛火保安康”的顺口溜。

孙老道过世后，其内侄张子余接手经营长春堂，事有凑巧，张子余也信奉道教，他曾出家在白云观，是个火居道士，所以，人称其为张老道。张子余为人精明，又善于社会交际，长春堂在他经营时，发展很快，不仅北京的大小百货店、杂货铺、茶叶铺等都代销长春堂避瘟散，而且在天津、太原等处设有长春堂分店。因此，长春堂成为北京的名店铺。

四十、源顺镖局

源顺镖局是清光绪五年（1875 年）在前门外西半壁街开办的。开源顺镖局者叫王正谊，人称“大刀王五”。

王正谊是河北省沧州人，他从小就喜欢练习武术。成年后，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器也都学成了。由于他喜用大刀，又由于他在盟兄弟中（有说师兄弟）排行老五，故得此“大刀王五”的美名。

前门外一带是清代北京商业最繁华的地区，所以，镖局都设在这一带。在清代前期，前门外约有几十家镖局，到了清末尚有七、八家镖局存在。像西河沿的东光裕镖局，粮食店的会友镖局，布巷子的自成镖局，狗尾巴胡同的同兴镖局，打磨厂的东源成镖局，西半壁街的源顺镖局，西珠市口的福源镖局等。镖局的顾客主要是大店铺，镖局为大店铺武装护送货物。因为在火车没出现

前，交通不便，路上又不安宁，经常有强盗出没。商人长途运输货物，为了安全大都请镖局运输。所以，镖局实际是武装运输业。操此业者不需有大量的资本，只要精通武术，有运货物的车、马，储存货物的房屋，在江湖上朋友多就行。

源顺镖局的大刀王五，早年闯荡江湖，广交天下英雄豪杰。这就是他创办源顺镖局的主要资本。现在尚存的前门外西半壁街13号院就是原大刀王五的源顺镖局的旧址。据大刀王五的后人介绍，源顺镖局正门原是个朱漆的大门，其右侧悬挂一面杏黄旗，上书“源顺镖局”四个大字。门道东墙上高挂“德容感化”金字横匾，西墙上高挂“义重解骖”金字横匾。大门里还有“尚武”、“济贫”两小块匾额。这几块匾都是北京城的老百姓赞誉大刀王五“轻财重义、济困扶危”的精神所挂。整个镖局有前院、后院和西跨院、共30多间房屋。前院有大车棚、马和仓房，王五的家属和财房、存放贵重货物的地方都在后院，西跨院是众镖师练武的场地。练武的场地上摆放着刀、枪、剑、戟等长短兵器和石锁、砂土口袋等练武所需之器械。

据一位当年曾在源顺镖局当过镖师已故老人刘殿元讲，在清道光年间，前门外施家胡同一家镖局应大栅栏广信号绸缎庄之邀，同店中伙计去南京办货。回来时，镖车在半路上被一伙强人给劫了。这家镖局所保之“镖”（就是货物），为什么丢了呢？因为镖局保镖是分镖路的，也就是有的镖局对保定、正定、邯郸等一带道路熟，这一带绿林朋友又多。因之，他们就保南路镖。有的镖局对宣化、怀来、张家口一带道路熟，这一带绿林朋友多，就保此路镖。保东路镖的镖局和保西路镖的镖局也是如此。一个镖局所走的路线，什么地方有强人不仅清楚，而且还要与他们有来往交朋友。他们来北京办事，镖局要热情招待，吃饭、住宿镖局都得包下来。临走时还要送回去的路费。由于有这种关系，镖局走镖时，镖车或驴马上只要插着写有镖局字号的镖旗，当地强人就

不会拦劫。按镖行和江湖上的规矩，镖车逢山，遇树林都要喊"镖趟子"，各镖局都有自己的喊法，一般都喊"喝唔"或"喝唔喝唔。"镖局喊"镖趟子"以告诉山中或林中的朋友我们要借路而过，感谢让路。江湖上最忌不喊"镖趟子"偷偷而过的。而为广信号绸缎庄去南京接货的镖局，丢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保南路镖的。因广信号给的钱多，又仗着镖局有几个武艺高强的镖师，所以就把这趟买卖应下来。开始，镖师曾打退了两股强人。无奈，路人强人越聚越多，终因寡不敌众，最后把镖丢了。

源顺镖局虽然北路镖也保过，但他们以保河北、河南、陕西等地，也就是保南路和西路镖为主。因为这些地方大刀王五的江湖朋友多，路好走。所以，源顺镖局所保之镖从未出过事。一些大店铺宁愿多花钱也找源顺镖局为他们运货，因之，源顺镖局全体三四十人，一年到头总是忙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北京城内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大刀王五义愤填膺，英勇地反抗侵略军。在前门外护城河边与敌人战斗时，中弹而牺牲。

大刀王五被害后，源顺镖局就没有人掌管了。又由于京奉、京汉火车线建成后，商人运货大都由火车站托运。从而源顺镖局的生意被铁路夺去，大约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源顺镖局就歇业了。

第二章　大栅栏

第一节　大栅栏的由来

明朝推翻元朝，所接收的北京城，是人口大量减少，店铺倒闭，满目荒凉，到处是凋敝的地方。特别是大都丽正门外一带，更是荒凉。元朝时，店铺、商业中心在现今的积水潭和钟鼓楼附近。明朝政府为了恢复和繁荣经济，在北京很多地方建房造屋，建立“廊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建立商业街。在一本名叫《人海记》的书中写道：“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今前门外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各地的廊房之街名先后更换了，而“今正阳门外廊房胡同，犹仍此名”。当时，大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中，开设的店铺都是前店卖货，后院设作坊制造产品，店铺的主人大部分是外地迁来的手工业者。明《宣德实录》就记有“二万七千户”手工业工匠从南京迁到北京来，长期落户。他们经营靴鞋、帽子、球皂、制香、刺绣、荷包、丝织、挑花、熔炼金银等手工业品。经过七八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明孝宗弘治年间，据《瓠翁家藏集》所记：“生齿日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客。”也就是说，人口大量繁殖增多，店铺的货物装得满满的，城内居民已满，很多人只得住在城外关厢。到明朝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7 年），前门外大街及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商业街已形成。在这里，汇集了江南的锦缎、三梭布、

纸张、瓷器，以及其它地方的药材、茶叶、干果、海味、香料、桐油、染料、生铁等物品。

明朝统治者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以防范人民的反抗，实行监视人民、控制人民的专制特务统治出名的。在明朝初年就成立了特务机关“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用以监视朝廷官吏和老百姓言行。凡是计谋反对封建皇帝之言辞都被称作妖怪的言语和大坏大恶的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特务，经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巡逻，如果发现他们认为是可疑的人，就立即逮捕，送交锦衣卫或东厂、西厂去审问。

从明正统（1436—1450）年间，农民的赋税、徭役逐渐加重，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农民无法继续在家乡耕种田地，纷纷扶老携幼离开故土，成群结队地外出寻找生路，形成“流民”。来到北京的流民只有少数人能找到工作，大部分流民只能沿街乞讨，有的甚至冻死饿死在街头。

由于北京流民增多，为了便于“厂、卫”特务对这些流民进行监视和北京兵马司巡捕对“盗贼”的追捕，明朝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6 年）在北京内城的大街小巷设立栅栏。

清王朝建立后，清朝政府在政治上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因之，不断地激起北京人民的反抗。据《国史安亲王岳东传》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年）冬，京师有自称三太子朱慈璊者，伪署广德元年，纠众京城内外，举火作乱，擒其党于鼓楼西斜街及灯市口。”朱慈璊的真名叫杨起隆，他乘云南吴三桂起兵反清之机，在北京组织人民和八旗贵族的家奴，秘密进行串联，准备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以恢复明朝为号召，自称明朝的朱三太子，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年号为“广德”。并商定用白布裹头，红布披身为标记，在北京内外城同时放火起事。杨起隆和齐肩王焦三、护驾指挥朱尚贤、阁老张大、军师李柱、总督陈继志、提督史国宾、黄门官王

镇邦等人经常在鼓楼西街、明朝降将周全斌家中秘密聚会。他们计划十二月（农历腊月）十三日五更（过去一夜分五更，五更即快天亮时）举火起义。正在积极准备时，十二月十一日，周全斌的儿子告了密，清朝派兵包围了周家。在此紧急时刻，杨起隆决定提前起义。他们人数虽少，但面对强敌，全无惧色。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了。齐肩王焦三、护驾指挥朱尚贤、阁老张大、军师李柱、总督陈继志、提督史国宾等数百人被俘，惨遭杀害。杨起隆突围逃出北京后，继续进行反清活动，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被俘后遭到杀害。

杨起隆起义是较大的一次反清斗争，除此之外，在北京还有闻香教、白莲教、无为教等秘密活动的反清宗教组织，给清朝统治者以很大的威胁。以上这些反清斗争，虽然都先后被镇压了，但对清统治者确是极大的震动，使他们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一面用“怀柔”的办法，放宽政策，下令停止圈占农民的土地，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缓和他们同广大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矛盾；一面又加强对人民的防范，特别是对京师的城防更为加强，命令九门提督（管辖北京城的军事长官）加派军队，守卫城门，“守卫巡警”、“分讯巡缉”、“分讯”就是按驻地进行巡查缉捕人犯。为了加强北京内外城的治安，从清雍正七年（1729 年）到乾隆年间，城内街道胡同处处建起栅栏，共有 1746 处，每处栅栏都有出入的门。起更（掌灯）时关栅栏门，“有奉旨差遣及紧要军务，应及时启门”，其它人等一律不准通行，全城实行宵禁。

当时建起的栅栏大都采取民办官助的方法，各街巷胡同各自筹资，官方给以帮助指导，购置材料，雇用工匠修造。廊房四条东口和西口，建立起来两座木栅栏，既坚固又高大，同其它处建起的栅栏都不一样，因此，人们都叫它“大栅栏”。日子一长，其原名廊房四条就被人忘掉了。我们可以查阅明清时留下的方志和地图来证实这个问题。明朝人张爵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写

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上记载正西坊有："廊房四条胡同"，近来出版的《明北京城复原图》上在廊房头条、二条、三条胡同南也绘有"廊房四条胡同"。而在清朝人朱一新和缪荃孙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合写的《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却只记有"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廊房四条"不见了，出现了"大栅栏"名称。在《乾隆京城全图》上，把《明北京城复原图》的"廊房四条胡同"处，也改绘为"大栅栏"。这完全说明，大栅栏原叫廊房四条是无疑的。

廊房四条东、西口这两个大木栅栏在清光绪庚子事变中，被大火烧毁，以后又建起两个高大的铁栅栏，民国年间铁栅栏门被拆走，东口的大栅栏铁框子直到解放后才被拆除。

第二节　大栅栏的发展

大栅栏和廊房头条、二条、三条这四条商业街为什么能够成为北京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呢？这和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明朝的大内，就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就在前门内不远之处，而且中央政府的工、户、礼、兵、刑、吏六部也设在前门内大明门的东侧。因此，各地官员到北京朝见皇帝和去六部办事，住在前门外附近就显得比较方便。到清朝建立后，大内和六部没有变动，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因此，各省、各州县设在北京的会馆也大都建在前门外东、西两则。会馆虽然不是旅店，但要给本省、本府、本州县来北京办事或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提供食宿，起着招待所的作用。此外，会馆还和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清时，北京的商业、手工业兴盛，外省人在北京经商的很多，所以商业带有很强的地方性。像山西人在北京经营颜料、干果、杂货业；山东人多经营米面、饭馆业；江浙人多经营广货、银钱业等。这些地方商人为了维护同乡、同行业的利益，都结成行会，以便同外乡、外

行业竞争，所以也建立会馆。据《朝市丛载》上写："省有省馆，府有府馆，县有县馆。"据不完全统计，清朝末年北京有会馆近四百个，而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外，就有会馆约三百个。除会馆外，前门外一带"寄寓客商"的旅店也特别多。清朝末年，京奉（北京至沈阳）火车站、京汉（北京至汉口）火车站又都建在前门外，所以，前门一带流动人口多。由于以上原因，使大栅栏和廊房头条、二条的商业逐渐繁华起来。

大栅栏发展的原因。在清朝初期，廊房头条、二条、三条的商业区要比大栅栏繁华。从清朝的雍正、乾隆年间以后，大栅栏的商业区又超过廊房头条、二条而发展繁华起来。大栅栏的商业为什么会超过廊房头条、二条，发展成繁华的商业街呢？其一是廊房头条、二条处在一个高岗上，我们从廊房头条、二条的北面和东面观测，很明显看出，从西河沿东口，经珠宝市往南是个爬坡之势。如果站在前门外大街往西看廊房头条、二条，这两条胡同不仅要比前门大街高 1 米多，而且胡同比大栅栏窄约 2 米。廊房头条东段南北宽不足四米。在明、清及民国初年时，北京的街巷胡同除前门外大街是用青条石铺的路面以外，其它街巷胡同的路面大多是土路，道路坎坷不平。廊房头条、二条不仅爬高坡，而且胡同又窄，这对当时用毛驴和轿子代步的顾客来说，去廊房头条、二条里买物品就受到一定限制。廊房三条胡同的条件还比不上廊房头条、二条，它是死胡同，只有西口，没有东口，全长 120 多米。大栅栏这一条街的地势条件比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就优越多了。它不仅街面比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宽，而且它的东口和前门外大街的路面，处于一个水平线上。大栅栏是从前门外大街往西北经杨梅竹斜街至琉璃厂；往西南经观音寺街、李铁拐斜街至虎坊桥的交通要道。所以，顾客到大栅栏买物品既感到方便又感到好走，这是大栅栏超过廊房头条、二条发展起来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是从清朝中期起，廊房头条、二条、三条的商业向单一行业发展。在廊房头条里，除去清末和民国时开设的天宝、三阳金店、谦祥益绸布店和劝业场外，其余就是华美斋、文盛斋、秀珍斋等二十几家专门制做和销售宫灯、纱灯的灯笼铺，因此，过去廊房头条被称之为“灯街”。廊房二条原来也是个多种行业的商业街，原来先后开设了三盛兴、恒盛兴、聚丰厚、德源兴、永宝斋等二十多家专门经营珠宝玉器的店铺，所以，过去廊房二条有“玉器街”的美称。廊房三条本来就是小巷，街里除全兴盛、德利斋两三家珠宝玉器铺外，余下几家是银号（银钱业店铺）。由于廊房头条、二条、三条的单一行业的发展，又由于宫灯、纱灯、玉器、银号等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宫、王府、贵族、官僚、富商等少数社会上层人物，同广大劳动人民无缘，所以胡同里冷冷清清。大栅栏就不一样了，它向着多种行业与综合商业发展，大栅栏里有经营高级贵重商品的金店、银楼、绫罗绸缎、高级皮货的店铺，也有经营普通平民需要的布匹、鞋帽、荷包、针线、药材、烟叶等商品的店铺。所以，去大栅栏的顾客，既有贵族、官员、大商人等富有之人，也有城市平民、乡村农民等一般之人。

其三是大栅栏里名老店铺多。据《帝京岁时纪胜》一书记载：在大栅栏里著名的店铺有“制丸散膏丹之秘密的‘乐同仁’，金银首饰的‘敦华楼’和‘元吉楼’，‘彩缎绫罗’铺‘广信号’和‘恒丰号’。”在《日下旧闻考》上还记有：“宋家靴”也在大栅栏里。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记载：北京有名的饭庄“衍庆堂”和著名的饭馆“同兴居”都设在大栅栏里。此外，还有著名中药铺“育宁堂”、老帽店“东兆魁”、绒线铺“长和厚”、靴鞋店“一品斋”等。“乐同仁”就是著名中药铺乐家老铺，现称同仁堂。

由于大栅栏里有这些著名的老店铺，给大栅栏提高了声望。大栅栏的街名自然也被传开了，反过来，由于大栅栏街名的响亮，到大栅栏来的人多，也为大栅栏里的店铺生意兴隆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国十年（1921 年），一个天津人在大栅栏东口路北开设了“有福来”烟店。这是大栅栏街内最小的买卖，店堂东西长约 4 米，南北宽也就 1 米多，就是这样一个小买卖，由于大栅栏里游人很多，所以买卖很兴隆，店主也发了财。

其四是大栅栏里戏园多，为大栅栏的繁华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朝初年，清政府惧怕老百姓借戏园之地纠众滋事，所以下令，京师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并对外城的戏园“概行禁止夜唱”。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也记有“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属于大栅栏内者五处；曰庆乐、曰庆和、曰广德、曰三庆、曰同乐轩。”另外还有一处“大亨轩”。此外，在大栅栏附近，门框胡同内有同乐轩、粮食店街北口有中和戏园。以上这几个戏园建造和开业的时间约在清嘉庆至光绪年间。除前门外肉市里的广和楼戏院外，这几个是北京较早的戏园了。由此可见，大栅栏是京戏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繁华的扬州大码头观看了昆曲的演出。乾隆很喜欢昆曲文雅的唱词，悠扬动听的唱腔，载歌载舞的脱俗表演形式。因此，乾隆回北京时，就把昆曲带了回来，让昆曲演员在宫中演出，供皇帝、后妃及八旗贵族欣赏。

昆曲进入北京后，弋阳腔、梆子腔、二黄调等先后也来北京演出。这些地方剧种进入北京后，繁荣了北京的文化生活，深受北京群众的欢迎。最受北京人欢迎的，还是安徽的徽戏。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左右，安徽有名的三庆徽班来北京演出。虽然徽戏的唱词不像昆曲唱词那样文雅，但它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徽戏文戏、武戏全有，尤其是连台的《三国故事》戏，更受人们的欢迎。三庆徽班很快就在北京唱红了，它在前门外的广和楼、方壶斋等戏园，连演连满。不久，北京又出现了春台、四喜、和春三个徽戏班，同三庆徽班合称“四大徽

班”。

徽班在北京走红时，湖北的楚剧（就是汉剧）也来到北京。楚剧演员唱的是西皮调，徽戏唱的是二黄调，虽然他们唱腔不同，但是唱词和戏路基本相同。因此，楚剧演员和徽戏演员，经常搭班同台演出。时间一久，两个戏种的演员互相交流学习、融合，并吸收梆子等其它剧种的优点，从而形成“皮（西皮）黄（二黄）”戏，这一新的戏种就是“京戏”。

京戏形成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在清咸丰至民国初年人——震钧写的《天咫偶闻》一书中找到答案：“国初（清初）最尚昆腔戏”“后乃盛行弋腔，俗称高腔。”“道光末，忽盛行二黄腔，其声比弋则高而急，其辞皆市井鄙俚（即一般俗词），无复昆弋之雅。后来，同治中又变二六板。”这里说的“道光末”而后就是咸丰。京戏形成于咸丰年间。清同治、光绪年间，大栅栏各戏园十分繁忙，天天有演出。当时，有京戏演员“十三伶”的出现。这十三个京戏名演员是：程长庚、卢胜奎、张二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朱建芬、杨鸣玉、时小福、余紫云、郝兰田、刘赶三等。继之而起，在大栅栏各戏园中经常演出并演红的有：杨小楼、金秀山、龚云甫、梅兰芳、余叔岩、高庆奎、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李万春等京戏名演员。

民国六年（1917 年）一天，一位不出名的青年演员“白牡丹”（荀慧生的艺名），在大栅栏里的广德楼戏园演出《小放牛》。由于荀慧生扮演的村姑，天真活泼，舞蹈身段优美，唱腔悦耳动听，表演传神，深受观众的赞许。当时，京戏名演员杨小楼也去看戏，杨小楼对荀慧生的表演很是赞赏。民国八年（1919 年），恰杨小楼应上海天蟾舞台的邀请，到上海演出。杨小楼为了加强演员阵容，取得好的演出效果，就特请名家谭小培、尚小云及荀慧生同往。荀慧生在杨小楼等名演员的扶植下，在上海的演出很是成功。最后，荀慧生成为京戏的“四大名旦”之一。这件事也说

明，京戏名旦荀慧生的走红，是从大栅栏里的广德楼开始的。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要“丁国服”，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戏园要停止演出。大栅栏里各戏园只好暂时关门，大栅栏里马上行人见少。宣统元年（1909 年）宣统皇帝登基，大栅栏里各戏园恢复上演，各名角轮流在庆乐、三庆、广德、大亨轩等演出。同年，喜连城科班应广德楼之邀请，在广德楼演出。该科班在广德楼演出到民国三年（1914 年），在五年演出期，雷喜福、侯喜瑞、康喜寿等学生正在科中，他们在广德楼舞台上天天参加演出，《战宛城》、《捉放曹》、《空城计》等三国戏是他们经常演出的剧目。通过在广德楼戏园的演出实践，后来他们都成了名演员。到 30 年代，京戏演员李万春组建了鸣春社科班，长期在大栅栏里的庆乐戏园演出。在庆乐戏园这个舞台上，锻炼出李桐春（现在台湾）、李庆春、吴鸣申、张鸣等许多名演员。

大栅栏里的戏园是我国京戏形成的重要场所，它为京戏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演员。由于大栅栏里有这样几个剧场，有不少名演员在此演出，也为大栅栏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大栅栏到了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街里饭馆、饭庄、烟店、药铺、靴鞋店、绸缎店、干鲜水果店、洋广杂货店、绒线帽店、戏园等应有尽有，店铺林立，麟次栉比，热闹非常。正如《都门杂咏》中所描述的：

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萧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响自鸣钟。

大栅栏里买卖全，绸缎烟铺和戏园；
药铺针线鞋帽店，车马行人如水流。

第三节　大栅栏里逛花灯

大栅栏里平日就人流如潮涌，到农历正月十五日这里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真似人的海洋。

农历正月十五日也叫元宵节或灯节。《帝京岁时纪胜》上说："十四至十六日，朝服三天，庆贺上元佳节。"上元佳节就是灯节。我国人民将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称中元节，十月初一日称为下元节。在灯节期间，前门大街、东四牌楼、西单牌楼、琉璃厂都有灯市，店铺里的商品任顾客挑选购买。那几天，到处放花炮，放合子，十分热闹。夜晚，东四、西单、花市、鼓楼等处，各店铺争挂花灯招引人群观看。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挂花灯以"正阳门之东月城下（原前门东西各有月墙）、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为最"。北京人正月十五日有逛大栅栏看花灯的民俗，以清朝同治年间到民国年间为最盛。灯节期间，特别是正灯日（正月十五日）人最多。当天，人们很早就把晚饭吃好，天一黑，北京四九城（指皇城四个门，内城九个门，其意为全城）的人，扶老携幼，结伴纷纷向大栅栏涌来。大栅栏里各个店铺，门前都挂花灯，种类有纱灯、宫灯、冰灯等。花灯上有的画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有的画着才子佳人谈情说爱的故事，还有的画着风花雪夜的景色和高山大川的景物。其中以冰灯的兔子最吸引行人。大栅栏里从东口至西口，人山人海，人们不能抬腿迈步，只能互相拥挤着，向前移动。从傍晚掌灯开始，至深夜方能逐渐地散去。有人为逛大栅栏观花灯编歌：

"大栅栏里观花灯，冰灯纱灯分外明；

人群拥来又挤去，只见人头乱摆动。"

还有人数说大栅栏里的花灯好看，曾作如下描述："正月十五上元节，大栅栏里闹花灯，全城男女老少都来到。长胜魁的冰灯

明又亮，玉兔像卧又似跑，聚庆斋饽饽灯画得好，祥义绸缎店铁门上全是灯，瑞蚨祥要和祥义比高低，云香阁的大红蜡有三尺，广盛祥门前挂的是旋转不停的走马灯，同仁堂本是下洼子门，药王采药灯济众生。店店铺铺都挂新花灯，纱灯宫灯冰灯个个明又亮。从东口直逛到街西口，逛灯逛得丢鞋又撕袄。”

大栅栏里各店铺正是利用正月十五逛花灯时机，大作广告宣传。谁家的花灯好，谁就能招来更多的围观之人，谁的店铺也就更出名。

第四节　火烧大栅栏

大栅栏正在繁荣发展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由于大栅栏里老德记大药房是专卖洋药的店铺，义和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火烧了老德记，大火殃及全街，整个大栅栏毁于大火。

北京的义和团主要分“☰”（八卦的乾字）和“☵”（八卦的坎字）两部分。乾字团用黄布包头，上写有“☰”字样，坎字团用红布包头，上写有“☵”字样。义和团是以“坛”为单位，有的一条胡同是一个坛，有的几条胡同是一个坛。坛的领导称大师兄、二师兄。坛与坛之间没有领导关系，各自独立活动。当时，在前门外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和珠宝市等街巷胡同都建有义和团的“坛”。大栅栏店铺里的学徒、伙计、以及作坊中的工匠和看家护院的。有的就参加了义和团。大栅栏街内坛址就设在庆乐戏园中。

大栅栏街里中间偏西路北的老德记洋药房，是戊戌变法（1898 年）时开业的，是专卖洋药的店铺，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中，虽然店主把“洋”药房已改成“大”药房，但店中的大批洋货还

在继续出售，终于引起了义和团的愤怒。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1900 年 6 月 16 日)，大栅栏坛的义和团大师兄率领团民，手持长枪、大刀围住了老德记。事先一个团民带着引火之物藏在里边，负责接到暗号后点火。大师兄在店门上划了个符咒，说声"着"，就看大火在老德记的店堂里燃烧起来。霎时间，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大火很快将老德记店铺吞噬了。由于当时大栅栏里的店铺都是木结构建筑，建筑周围又存有易燃物，所以，大火很快向四周燃烧。加上那天又有风，一会儿工夫，全街店铺、门脸皆着了火。大火很快又向煤市街、观音寺街、廊房头条、二条、三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东荷包巷、西荷包巷及前门箭楼、城楼燃烧，烧了一天一夜，共计烧毁店铺约四千余家。在《都门纪变百咏》上对这次大火有这样的记述：

"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

向渠闭火多奇术，为底神灵误主张。"

这段话中的"烬咸阳"是指项羽、刘邦楚汉相争时，项羽率兵打进咸阳（现西安）一把火烧了三个月的故事。原来，义和团自称能放火，也能闭火，但这次却闭不了火，原因是念咒放火、闭火都是假的。

第五节　大栅栏里大卖"爱国布"

在 1919 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大栅栏里的爱国商人，曾发起一次卖国货、抵制洋货，大卖"爱国布"的活动。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山东"等口号，并号召商界不卖日货，提倡国货，大栅栏里的爱国商人积极响应。瑞蚨祥、广盛祥、祥义、天成信等绸布店，有的主动把日货交出烧毁，有的不收购日商的货物。老德记、四箴、华美等专

卖外国货的大药房也不得不关上店门，停止售货。恒义是家洋货店，而且是较早的从外国进货，以批发销售外国香水、香粉、针织品等货发家的店铺。这次，柜台里也摆上了北京生产的手工业品，以及毛巾、粗线袜子、腿带和上海产的墨菊牌和狼狗牌袜子、三花牌毛巾、双妹牌雪花膏、花露水及汗衫等国产货。当时，大栅栏里卖的国货，特别是河北省高阳县一带产的高阳布，很受群众的喜爱，销售量大增，人们称之为“爱国布。”

高阳县在河北省保定的南边，这一带历史上农村家庭纺织业就很发达，是我国农村男耕女织的典型。特别是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无暇控制中国的市场，因而高阳织布手工业乘机发展起来。这种“爱国布”虽然没有洋布那样细薄，但比其他土布要好多了，布面织得既平整，花色又齐全。织这种“爱国布”的除高阳县外，还有清苑、蠡县、任丘等县，约有四百多个村庄从事织布业。当“爱国布”开始摆在大栅栏的瑞蚨祥、广盛祥、祥义、天成信等店堂中时，顾客争相购买。此时，人们以穿“爱国布”、使用国货为荣，以穿洋布、使用洋货为耻；店铺也以卖国货为荣，卖洋货为耻。

由于大栅栏里多数店铺提倡国货，在前门外大街、廊房头条以及其它地方的店铺，也增添了高阳的“爱国布”。

第六节　沦陷期间的大栅栏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制造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不久，侵华日军占领了北平，并对北平实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

日军占领北平后，日本宪兵、特务、翻译、伪治安军、伪警察在大栅栏里胡作非为，到戏园看戏不仅不给钱，还经常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一次，几个伪治安军去广德楼戏园看戏，就因为座位偏后，他们就非要占前边观众有票的位置不可。茶房（戏园

内伙计）央告说："长官，人家有票不能赶人家，您下次来，给您留个好地方"！那几个伪军却说："他们花钱买票了是吧，我们没买票，老子不买票，还要坐好地方！挪也得挪，不挪也得挪"！说着举手就打人。他们有的抄茶壶，有的举板凳，有的扔椅子，边打边骂，茶壶、茶碗满处飞，观众乱跑，顿时戏园里乱成一团，使戏演不成了。他们砸完后扬长而去，演员和观众只得自认倒霉。在北平沦陷期间，日本宪兵、特务、伪军、伪警官在大栅栏戏园里打人和砸戏园是经常发生的事。

日本宪兵、特务、伪治安军、伪警察不仅在戏园看戏不给钱，在店铺里买东西，也照样不给钱，不让拿就打人。一次，一个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去大栅栏老九霞鞋店买鞋。他挑选了一双优质皮鞋，拿起就走，店里伙计忙满脸陪笑地说："先生，您还没给钱哪！"这个翻译马上瞪起眼睛说："你不认识我，我去哪买东西给过钱"！这伙计又说："您等会儿！我跟掌柜说一声，您再拿走。"这翻译一听更火了，把鞋一摔，过去就打了这伙计一记耳光。这样，掌柜子出来，忙一边陪礼一边说："您别生气，我们这伙计是新来的，不认识您，"这样才算完事。

当时，伪北京警察局特务科有一个特务叫刘汉，他自称"小老虎"。这个家伙，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依仗着自己是特务到处买东西不给钱。他在大栅栏里，去戏园看戏，不买票；去瑞蚨祥买绸缎，不给钱；去厚德福饭庄吃饭，不给钱。大栅栏里各店铺都认识他，也都恨他，又不敢得罪他。一天，他去大栅栏精明眼睛行，买几块火石，他买好东西后，学徒马凤才跟他要钱，他却说："你给开张发票！"马凤才说："您买几块火石，还用开发票。"他说："不开发票，就给我送到广德楼戏园的'弹压席'去。"北京解放前，各戏园里都设有"弹压席"，它是专为当地军、警、宪、特等维持戏园的秩序所设的位置。刘汉让送到"弹压席"去，就是说，我是"官人"。而这位从农村来的老实学徒，害怕卖货不收

钱，掌柜知道不答应，就回答说："我们这没有人，不能送"。这一下，刘汉可火了，瞪起眼睛，手拍柜台大骂："给你脸，你不要，你不认识我是谁吧！告诉你。大栅栏谁不认识我小老虎，北京市警察局特务科的刘汉！"说着就给马凤才一个满脸花，打得马凤才的脸上出现五个手指印。这时，马凤才又怕又后悔，怕掌柜子知道，后悔不应跟小老虎要钱。店里的人都过来解劝，说"我们不认识您，请您多关照，给您送去。"小老虎仍怒气不消地边打边骂："跟你们没关系，今天让他认识认识我，走！跟我走！"马凤才被小老虎带到大栅栏西口煤市街派出所。一进派出所门，马凤才先挨了一顿打，尔后又被逼着跪在地上，马凤才被折腾一个够后，小老虎说："这次认识了吧"！马凤才回店后，师兄弟们关心地问长问短，而掌柜子却狠狠地说："给我惹事"，马凤才差点被解雇。

日本商人凭借着日本政府独霸着中国的海关，日本商品大量地涌进中国市场，涌进北平，涌进大栅栏各店铺。日本的白玉霜香皂、白兰皂、"都の花"一号皂、霍为脱透明皂、双美人雪花膏、狮子牙粉、开士米毛线，钢精制品，各式眼镜架、眼镜片、花洋布、缎面绉，以及各种药品，除同仁堂等少数店铺外摆满了大栅栏的各个店铺。我们的民族手工业，特别是北平的手工业产品被排挤出大栅栏这个市场。北平手工业作坊纷纷破产，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这就是日伪时期的北平大栅栏。如果说"七·七"事变前大栅栏还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话，那么到了"七·七"事变后，大栅栏就已经完全沦为殖民地经济了。

第七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大栅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国民党军队还没有来到，北平的秩序和治安还是由日军和伪军负责。正是在这特殊的情况下，在庆乐戏园发生一起伪治安军开枪打死鸣春社

戏班青年老生演员李鸣祥的事件。

一天，庆乐戏园晚戏还没有开演，一个伪治安小军官带着四个伪军来戏园看戏。他们来到票房（售票处）点名要买五张前五排正面的戏票。可是，当时就连前十排的票也已卖出，给他们五张十排的戏票，他们嫌远；后来，又给他们前五排两廊（旧戏园分正面池座，左右两廊座）他们又嫌偏，非要前五排正面座不可。票房卖票的向他们好言解释说："前面的票已经卖出，请您凑合点吧！"那个伪治安军小军官一听就火了，大骂："老子非要前面的不可，你们瞧不起人"，说着拔出手枪来。这时，庆乐戏园的一个人说："长官，别生气"！这个伪军用脚一踢，抬手用枪就朝票房射去。卖票的一闪，子弹打在墙上，又反弹回来，可巧，鸣春社戏班的青年演员李鸣祥，从后台来票房找人，刚一进门，就被反弹回来的子弹打在脸部的眼下。李鸣祥用手捂着伤口就往后台跑，有人说，子弹在里边哪，得去医院看。但到了医院，还没来得及医治，这个青年演员就死了！

国民党政府接收北平后，由于政治腐败，内战战场上连连惨败，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1946 年至 1948 年的北平市场一片混乱，物价不断上涨。大栅栏里各店铺原来是日本货占领的市场，当时变为美国货垄断的市场。由于物价一天三涨，投机商十分活跃，虽然北平国民党政府多次发生平抑物价法令，但物价依然上涨。所以，大栅栏各店铺的生意更是萎缩不振，前景暗淡，人民生活困苦，怨声载道。

在买卖萧条、营业日渐衰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大栅栏里的张一元文记茶庄又着了一把大火。那是 1947 年，张一元文记茶庄忽然后楼起了火，火势越烧越大。店里的职工和学徒一边救火，一边打电话通知消防队。等到消防队来了，却不慌不忙先向店铺要钱，提出拿钱就救火，没钱不救。结果，这把大火给张一元文记茶庄烧得只留了个前槽门脸，而后边房屋烧个精光。

正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得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当时，在庆乐戏园演出的李万春戏班中，有一个叫傅士钧的，是一个爱国的正直青年。在日伪统治时期，他仇恨日伪，盼望中国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盼来的却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使他感到很失望。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身上。他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参加了当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外围组织，以庆乐戏园为点，得到了情报就向组织提供。

在 1947 年夏季的一天，有人找傅士钧，要他想办法，营救一位被捕的同志。这位同志就是前北京市副市长赵凡同志，当时化名徐连仲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他以买卖“大人头”为掩护，一天，在永定门一带正买卖（大人头）时被捕。傅士钧接受任务后，就找庆乐戏园的郭玉斌给想办法，因为郭玉斌负责戏园前台的事，经常和军警界打交道，认识一些人。郭玉斌问他：“这个人现在押在哪”？傅士钧说：“听说在南城缉查所，”郭玉斌就到南城缉查所，找熟人一打听，说是个八路军政治犯，早解往北平警备司令部了。郭玉斌和傅士钧来到警备司令部，找一个叫王所长的人，这个王所长因为经常去庆乐戏园执行任务，负责弹压戏院的秩序，跟郭玉斌混得很熟。郭玉斌问王所长：“这里可关着一个叫徐连仲的人？”王所长问他“打听他干什么？他是共产党，八路军。”郭玉斌说：“他哪是共产党，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做小生意的。”王所长说：“你不要管！”

第二次，郭玉斌同傅士钧又去警备司令部找王所长，请求释放徐连仲。一见面王所长就问郭玉斌：“徐连仲不是共产党你敢作保吗？”郭玉斌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保！”这样，郭玉斌在保证书上签了字，就把徐连仲保了出来。不久，徐连仲就离开了北平。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不久，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北平已处在

解放的前夕。一天早上，郭玉斌去傅士钧家。刚进门，就被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拦住，问郭玉斌："你找谁？"郭玉斌说："找傅士钧"。这样，也把郭玉斌扣住了。原来是一个姓张的地下工作者被捕，因为经不住严刑拷打，做了可耻的叛徒，把傅士钧供了出来。傅士钧在监狱中，任凭敌人如何审问，如何拷打，就是说："我是戏班的，在大栅栏庆乐园演出，别的事都不知道。"最后敌人把他腿打断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士钧和郭玉斌都被救了出来。傅士钧治好伤，被安排在吉祥戏园当经理；郭玉斌还是回到庆乐戏园工作。

第八节　大栅栏里学徒的苦难生活

人人都知道，大栅栏店铺多，热闹繁华。店铺里的伙计、学徒穿得也很整齐，招待顾客总是笑脸迎，笑脸送。实际上在解放前，掌柜、经理和伙计、学徒的生活有天地之别，掌柜和经理在天上，伙计和学徒在地下。大栅栏里每个店铺的掌柜、经理都是锦衣美食，整天身不动，膀不摇，茶伸手，饭开口，处处样样都由学徒侍候。夏天屋中有电扇、冰桶（在木桶里放天然冰），冬天住暖屋，手有手炉，脚有脚炉。清末民初时，一般四、五口人之家，以每月生活费五元银圆（每元银圆为七钱二白银）计算，每年合计生活费四十两二钱白银。可是，同仁堂乐家弟兄四个，每家每年从同仁堂领取一万两白银，还不够花的。再看看他们家里人穿什么？吃什么？据说，当年南京同仁堂经理乐笃周家，他的夫人金银首饰不说，只身上穿的衣服，就十几个大箱子放不下，家里吃饭有厨子，出门有赶车的，还有看门的，跟班（主人出门，下人跟随侍候）的，奶妈子等人。同仁堂乐家在北京的房产，内外城都有，无法统计。瑞蚨祥的经理也是如此，虽然孟觐侯不是瑞蚨祥的财东，只是个领东的掌柜，但他也发了财，非常富有。这

两家都是大栅栏里的大买卖。而大栅栏里做小买卖的掌柜经理的生活也不差，就以大栅栏里只有一间门脸的精明眼镜行的掌柜来说吧。他本是个小贩出身，向来花钱很吝啬，但他也是经常下饭馆，并且每顿饭后都吸大烟，冬天穿礼服呢面、水獭领子的皮大衣，夏天绫罗绸缎。这样的生活，大栅栏哪个店铺的伙计和学徒能同他们相比呢？

解放前大栅栏学徒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呢？下面就以大栅栏精明眼镜行的学徒生活为例。

大栅栏精明眼镜行的掌柜是剥削学徒发的家。最后成为北京眼镜行业的首户。从它开业到北平解放前夕共计二十多年，店中常用学徒为五、六个人，一个学徒用五年，先后用了三十多个学徒。他为什么爱用学徒呢？一是学徒省钱，因为在学徒期间，没有工钱，二是学徒听话、好使唤。学徒刚一出师，快挣工钱了，就把老学徒挤兑走，再换上新学徒。

精明眼镜行用学徒，必须是掌柜信得过的，有可靠的介绍人作保，保证学徒在店内劳动三年零一节，中途不得退徒；如果中途退徒，要赔三年零一节的饭钱。在学徒期间，必须听从掌柜、师哥的使唤，不听者，掌柜或师哥可以任意打骂，家长不能袒护。另外还规定，在学徒期间，无故不许回家，店中管饭，衣被自理，有病自己回家医治，好了再回来，有违此规定者由中保人承担责任。所以来精明眼镜行当学徒的人，都是由介绍人（中保人）陪同，家长带领，到店中拜见掌柜和各位师哥。精明眼镜行的掌柜，采取封建家族制的带徒方法，学徒一律叫他"二叔"，因为他行老二，叫他媳妇为二婶。他认为，这种宗族的称呼比师徒的称呼更进一层，便于对学徒的使唤。在这个店中当学徒可真不容易，刚一入店门，就什么都得干。上边几个是师哥，他们说什么，让你干什么都得唯命是从地去干。早晚搭拆掌柜和几个师哥的床铺，并把铺盖放好，收拾好，给掌柜和几个师哥盛饭、倒茶。在掌柜和大

师哥面前是不能就坐的，只能恭恭敬敬地侍立在一旁。早晨天刚亮就得起来，晚上关店门要等到半夜十二点左右，躺下睡觉得深夜一点钟。早晨，开店门就营业，师哥负责接待顾客，学徒则要站店门后给顾客开门。顾客坐下等待拿眼镜，学徒则要站店门给顾客点烟倒茶。学徒还要负责去跑作坊，取送修理活件。据该眼镜店一学徒说，他们就愿意出去，作坊大都在琉璃厂。在店中，从早晨七、八点钟到晚上十一、二点钟，不出那间小屋子，人都给闷死了，出来一走动，可见见阳光，吸点新鲜空气是最快乐的事了。掌柜家里有事，学徒也得管。精明眼镜行的规矩，每年岁末，厨房师傅做年菜时，还要为掌柜家中带做出来。有一年天很冷，滴水成冰，掌柜叫一个小学徒往他家里送馒头。这个学徒，左右两手各提着一个装满馒头的大竹筐，从大栅栏到琉璃厂东口的笤帚胡同，这一趟，就把这个学徒的双手冻坏了。此时又正值是年岁之末，顾客多，店里忙，不能去医治，这个学徒只能请假出去一会，到油盐店买点辣椒面，到晚上关店门后，把辣椒面放在热水盆里煮。就是因为不能及时医治，冻手成疮，他向掌柜请假回家治病。掌柜却怒容满面地说："你太娇气，我过去比你手冻得还厉害哪，也得干活呀！""边干活，边医治吧！"就是这样，没给假，还得干活。

解放前，大栅栏里晚上要比白天人多，因为大栅栏里的几个戏园都有夜戏。人多，店铺的买卖就忙，学徒也最累，最难熬。那时的店铺没有天刚黑就关店门的，最早也要晚上十一点关门，精明眼镜行所以关门晚，因为当时的夜戏，都要到夜十二点才散戏。精明眼镜行的掌柜说，散戏时人最多，有买卖，所以必须到散戏后才许关店门。这样精明眼镜行的学徒，每天工作长达十八、九个小时，没有星期日，只是旧历年初一、二、三放三天假，加上伙食不好，学徒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哪受得了这种劳累呢？况且还要经常挨掌柜的打和骂。这种学徒生活，并不是精明眼镜行

一家，其他店铺学徒也大致类似。所以，在过去大栅栏店铺学徒中，他们暗地唱着这样溜口辙：

“学徒的未曾开口泪涟涟，尊声列位听我言，我十五岁来学徒。太阳未出我先起，夜晚十二点才可睡。平日没有休息日，只盼年节休三天。白天给掌柜师哥盛饭打脸水，为顾客开门倒水又点烟。掌柜的不给工钱还不算，动不动不是骂来就是打。你说我们学徒的可怜不可怜！”

过去，精明眼镜行里每两、三年就要死一个学徒。这种情况，家长不安，学徒的更不安。掌柜的为了使大家安心干活，给他赚钱，就假惺惺地请来一个装神弄鬼的风水先生。这个风水先生东看看，西瞧瞧，就说：“你们这里所以常死人，是犯了‘五鬼门’之忌了；要不死人，必须把这‘五鬼门’改了。”后来，把五个门改成三个门后，店里依然死人。现在，他们有的人有所悟地说，过去死的师兄弟，现在看来都是肺病死的，过去也叫痨病。过去工作太累，营养又不良，还有不得病的？我们没得病，活到现在，真是万幸！

在那个时候，大栅栏店铺的职工被雇用的情况主要有四类，以精明眼镜行为最普遍最刻薄的一类。第二类是店铺雇用学徒每月给以极少数的工资，每年还要多少长点钱。一般是刚入门的学徒，每月工资 3 元 6 角（1937 年以前），尔后每一年增加 2 角，直至长到每月工资 8 元止，这要在该店干 20 多年才可达这个数目。最好的一类是，不管学徒还是伙计，干到一定年限，干得好，可以吃股份（就是年终结算，从利润中提取股份应得的红利）。这种吃股份的虽然是极少数的店铺，但它给人以希望，瑞蚨祥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同仁堂的办法与这三类都不同，同仁堂最早曾用学徒，从清朝同治年间店中出现因学徒抓错药被判罪后，就再也不用学徒了。同仁堂的职工月薪最高 2 元，最低 3 角。此外，以每人营业额多少提成，营业额多的多提，少的少提，所以职工都非常关心

买卖好坏。

“说官话”是大栅栏里每个店铺在年终时都要做的一件事。“说官话”一般都在旧历年的除夕进行。所谓“说官话”，就是店铺的掌柜或经理，逐个找店中的伙计、学徒谈话，馈赠多少钱，决定来年的去留。每逢到“说官话”的时候，伙计、学徒就都提心吊胆，如果从掌柜屋中出来的人笑容满面，甭管馈赠多少，定是被留下来了，如果从掌柜的屋中出来的人，低头不语，愁眉苦脸，这就是吃完散伙饭，要卷铺盖回家的表情。

第九节 著名老字号

大栅栏经历庚子大火后，各店铺经过恢复和重建，大多数店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重新开业。从清朝末年至北京解放前夕，大栅栏里路北从东往西的店铺主要有滋兰斋糕点铺、晋昌果局、有福来纸烟店、文魁斋糖葫芦铺、天成信绸布店（1937 年“七·七”事变后改公益厚大烟馆，后改为大同洋行）、东鸿记茶庄、聚兴烟店、聚庆斋饽饽铺、瑞蚨祥绸布店、二妙堂冷食店、庆乐戏园、吴德泰茶庄、同济堂中药铺、盛祥新衣庄、聚兴烟店、厚德福饭庄、晋阳会馆（义善水会在此）、广盛祥绸布店、凤翔金店、豫丰关东烟店、一品斋靴鞋店、大香宾饭店、广生行化妆品行、老德记大药房、瑞蚨祥皮货店、美华鞋店、香云阁香蜡店（1937 年改为朝鲜人的冰棍房）、西鸿记茶庄、瑞蚨祥西号、老九霞鞋店、大昌源鞋店、××酱牛羊肉铺、广德楼戏园、永顺和干果铺、屈臣氏药房、永和茶汤铺、聚顺和干果铺、永利果局。大栅栏里路南从东往西的店铺主要有长和厚绒线店、逸民药房、长盛魁干果店、四箴药房、精明眼镜行、东兆魁帽店、天惠斋鼻烟铺、及时钟表店、恒义钟表洋货店（1948 年改东方眼镜行）、协盛祥新衣庄、宏仁堂药铺、德昌帽店、瑞蚨祥货栈、步瀛斋鞋店、华美药房、三

庆戏园、三盛荷包店、张一元文记茶庄、东方鞋店、同仁堂乐家老铺、达昌眼镜行、聚文斋帽扇庄、欧美大药房、聚明斋帽扇店、德隆皮货店、老美华鞋店、云香阁香蜡店贸栈、××银号、华盛顿钟表行、生大漆店、达仁堂药铺、大观楼电影院、兴顺纸烟行、白敬宇眼药房、远东帽店、万顺果局、信增钟表行。

在大栅栏街内的祥义绸布店、聚庆斋饽饽铺、瑞蚨祥绸布店、瑞蚨祥皮货店、厚德福饭庄、豫丰关东烟店、一品斋靴鞋店、老德记大药房、屈臣氏药房、长和厚绒线店、长盛魁干果店、精明眼镜行、东兆魁帽店、天惠齐鼻烟铺、步瀛斋鞋店、张一元文记茶庄、同仁堂、宏仁堂、达仁堂以及大观楼电影院等二十多家店铺都是驰名北京的老字号。

一、同仁堂药铺

（一）为御药房供应“供奉”

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浙江宁波府人，在明朝永乐年间来北京谋生。最初这位姓乐的在北京以摇串铃走街串巷行医和代卖小药维持生活。到了清朝初年，其后代乐尊育进了清宫太医院，当了一个出纳文书吏目（管理文件材料的小差使）。这样，就为后来同仁堂的创办及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清康熙八年（1669年），乐尊育之子乐梧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大栅栏路南开办了同仁堂药铺，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使同仁堂有了一定的发展。同仁堂的大发展是从雍正年间为清朝宫廷御药房供应“供奉”（为清御药房供应中药，当时称“供奉”）开始。同仁堂有了为皇宫“供奉”药品这个靠山，既为同仁堂提高了社会声望，也为同仁堂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同仁堂和御药房打交道，都是先领药款，尔后才交货。这种预领官银，加强了同仁堂的经济实力和资金周转，实际上是为同仁堂提供了无息贷款。

（二）四大支

同仁堂药店是北京著名的老药店，历史十分悠久享誉海内外。

达仁堂和宏仁堂药铺也是乐家人开的，但它不是同仁堂的分号。它们的来历是这样的：清朝末期乐家繁衍为四大支，就是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兄弟四个。同仁堂由这四大支共同管理，规定每支每年从同仁堂领取一万两银子。另外还允许他们在同仁堂寄卖自家所制的丸、散、膏、丹等药品。当时，同仁堂店中的职工，大多数都是非亲即友，所以职工也分派别，不是乐孟繁的人，就是乐仲繁的人，不是乐叔繁的人，就是乐季繁的人。他们在向顾客推销药品时，都争着向进店买药的顾客介绍自己的所依附者所寄卖的药品。这种寄卖制损害了同仁堂的公共利益，而且造成店中的混乱，给同仁堂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来，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民国十年（1921 年），乐孟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民国十七年（1928 年），国民政府从北京迁至南京，乐孟繁支的乐笃周在南京开设了南京“同仁堂”，破坏了四支“家族协议”，引起其他三支的共同反对，争吵不休。最后，使得乐笃周的哥哥、当时掌握北京同仁堂大权的乐佑申被迫辞职，才算了结。

前后总计，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二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三）炮制讲究

“都门药铺属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歧黄难别味，笑他

若个术通神。”这是清代文人对同仁堂的赞誉之词。同仁堂的驰名，虽然和清代御药房有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同仁堂一贯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经营方针。过去同仁堂炮制紫雪丹时，古法要有金锅银铲，可是同仁堂没有金锅，他们就收集乐家眷属的金首饰约100两，放在锅中与药料同熬，使金元素入药，提高疗效。同仁堂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该存放的必存放，绝不偷工减料。像虎骨酒和再造丸炮制好后，都不是马上就卖，而是先存放，使药的燥气减少，以提高疗效。虎骨酒制成后，要先放在缸里存两年，然后再卖。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才能卖。这种做法，不仅增加成本，而且还要多占用设备，多占库房。因此，一般药铺没有条件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都是现炮制现卖，这样药的疗效自然比不了同仁堂。

（四）自我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中，以同仁堂最会做，最有办法。清代，北京城里每年二月要掏沟一次。这里说的沟，是北京的地下泄水沟。掏沟时，全城臭气熏天，污泥堆积，行人很是不便，尤其是夜晚，不留神，就会跌倒在污泥堆中，弄得遍身臭泥。因此，在每逢掏沟时，同仁堂就派人在掏沟的地方，挂灯为行人指路。每到天黑以后，到处是一片漆黑，白纱灯上写有“同仁堂”三字，不仅方便了夜间的行人，也使人们对同仁堂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仁堂还有一种送药宣传法。清代，读书人会考在北京，北京又是顺天府衙所在地，乡试也在北京举行。每届会试和乡试时，各地应试之人云集北京，住在各省、各府、州、县会馆中。同仁堂利用这个机会，派人拿些防伤风感冒、帮助消化、祛水土不服的平安山药，到他们的住所，赠送给那些应试之人。虽然同仁堂拿出一笔钱，但通过那些应试之人，把同仁堂名声传到全国各地。

此外，同仁堂还利用做社会救济慈善事业机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北京无职业的穷苦大众很多。冬天，北风呼啸，穷人身上无衣，肚中无食，很是难熬。同仁堂每到冬天都在前门外打磨厂、珠市口、崇文门外磁器口、崇文门内史家胡同等地设粥场，施舍棉衣，救济穷苦百姓。在旧中国，人死了都要弄口棺木装殓埋葬。有钱的人，弄口杉木、柏木的好棺材也很容易，可是穷人弄口薄皮棺材也不容易。同仁堂抓住这个机会施舍棺材。同仁堂施舍棺材简单方便，只要有人证明确实是买不起棺材，有人介绍，就可去领一口棺材。同仁堂做这些社会慈善事业，目的就是扩大自己的影响。

（五）爱国企业家

在北京沦陷期间，同仁堂药铺在抵制日本商人的控制、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有两件很突出事情使人不能忘怀。

第一件事发生在1939年。日本的大商人知道同仁堂是北平很有影响的大买卖，企图控制同仁堂，派人和乐家联系，要在同仁堂投资入股。当时负责同仁堂事务的乐达义先生（乐松生的父亲）是个爱国的企业家，为人正直，很有正义感。他深知，这不是同仁堂乐家一家的事，而是维护民族利益，还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大问题。他认为，自己不能成为乐家的败家子，民族的罪人。所以，他拒绝了日本人在同仁堂入股投资的要求。然而，这个日本大商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不断给乐达义施加压力，乐达义没办法，只好通过朋友，找到当时北平的大汉奸王荫泰，请他帮助疏通。乐达义花了很多的钱，才使日本商人没有挤进同仁堂里来。

第二件事发生在1939年夏天，当时，日本人的避暑开胃药“仁丹”在北平很畅销。同仁堂为了抵制日货，他们组织几位老药工，翻阅药书，经过多次研制，最后炮制出以牛黄、珍珠、麝香、蟾酥为主药的“六神丸”。这种六神丸，对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对患有咽喉病的人，有特殊的疗效。这种药的主治和功能，远远

超过了日本的仁丹，因此销售很快，成为当时轰动北平的名药。不仅中国人患咽喉病，喜欢服同仁堂的六神丸，就连日本人也千方百计地抢购六神丸。他们有的把抢购来的六神丸，运回日本或运到南洋各地转手高价出售，有的把六神丸珍藏起来，以备救急之用。由于同仁堂的六神丸对咽喉疗效高，销路畅，1942 年一个日本商人想用高价，收买同仁堂六神丸的配方，他多次找同仁堂乐家人提出要求，但都遭到严辞拒绝。

（六）公私合营后大发展

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经理是乐达义的儿子乐松生。他为人奉公守法，开明能干。1952 年“五反”时，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1956 年乐松生带头参加了公私合营。

解放前，乐松生的伯父乐达仁曾试图改进中成药的制造科学之路，但没有成功。1953 年，同仁堂在北京大学的帮助下，试制银翘解毒片、黄连上清片、女金片成功。后来又相继制成舒肝片、藿香正气片、祛暑片等，大大方便了顾客。

二、瑞蚨祥绸布店

瑞蚨祥绸布店、瑞蚨祥绸店西号、瑞蚨祥皮货店和东鸿记、西鸿记茶庄都是山东孟记的买卖。瑞蚨祥绸布店被称“八大祥”之首。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时，北京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登内联升，腰缠四大恒”的顺口溜，就是说戴帽子讲究戴马聚源的帽子，穿衣服讲究用瑞蚨祥的绸缎和皮毛做的衣服，穿靴鞋讲究穿内联升做的靴鞋，腰中带着东四牌楼四大恒字号钱庄出的钱票才最光彩、最体面。(现在除“四大恒”没有外，其它三号俱在)。

（一）瑞蚨祥的创办

瑞蚨祥绸布店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创业者是山东孟雒川。最早孟雒川随父亲在山东济南经营大捻布（一种农村土布）的生意。后来在济南开设了瑞蚨号布店。“瑞蚨”是什么意

思呢？据说，孟家用这两个字时，还有一段故事呢。孟雒川的父亲虽然是个商人，但他粗通文墨，好交文人做朋友。他认为，什么“兴隆”、“天盛”、“庆福”等店名都太俗气，不可取，他在给自己的买卖起店名前，特意做了一桌酒席，邀几位好友来作客。在吃饭时，他站起来，一揖到地，请大家为其店铺起名。大家你说一个，他说一个，最后就选中“瑞蚨”两个字了。

在古代传说有一种虫子叫“青蚨”。它比蝉稍大些，能招来铜钱。后来人们索性把青蚨当做铜钱的代名词。“瑞”是祥瑞，给人带来吉祥。用“瑞蚨”为店名，既不俗，又可预祝自己的买卖“招财进宝”。孟雒川是很能干的，他父亲死后，他就把济南的瑞蚨号改为瑞蚨祥了。他还想把买卖做大些，决定到北京来。他认为济南再好，也比不了北京。北京人多，买卖好做。开始，他先派店中工友孟觐侯和一个学徒，用大车运了一批大捻布到北京做试探性销售，结果大捻布在北京很受欢迎，很快就卖完了。从此，他就做起贩运大捻布的买卖，而且买卖越做越好。恰巧，这时大栅栏一家店铺，亏损不能经营下去了。孟家就用大价钱把这个店铺买了过来。经过一番筹备，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就在光绪二十一年正式开业了。此后，孟家在民国初年又先后在大栅栏里开办了四个买卖。

（二）与同业商战

旧中国，工商业之间竞争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特别是在同行业之间尤其。过去有“同行是冤家”之说，大栅栏各店铺之间也是如此。不管哪个店铺，为了生存发展，就得招来顾客，要引来顾客，就得和同行业者竞争，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商战”。瑞蚨祥很重视商战，它们知道，在商战中要取得胜利，就得了解对方，了解顾客，了解同行业情况。瑞蚨祥为了了解同行业情况，经常派人到各店铺，以顾客身分调查它们的商品质量、行情，便于自己给商品标价。凡一般商品，瑞蚨祥的标价都略低于市价。但

紧俏商品，就适当地提高。瑞蚨祥为了多销售，它们在北京首创“礼券”。当时，社会风行探亲访友和馈赠礼品的习俗，瑞蚨祥的礼券既方便了送礼者，也方便了受礼者，因之大受社会各界欢迎。

大栅栏这条街，每天人流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是块“寸金之地”。在廊房头条里的“八大祥”之一的谦祥益，曾想方设法挤进大栅栏里来，而瑞蚨祥就千方百计阻止它进来。民国初年，大栅栏里一家店铺要出倒（倒卖给别人），谦祥益知道消息后，到处托人，花多少钱也要把这个买卖弄到手。而瑞蚨祥通过同仁堂，先把这个店铺弄到手，开了东鸿记茶庄，还是没有让谦祥益挤进来。

瑞蚨祥同它东邻的祥义竞争更为激烈。这里有一段瑞蚨祥同祥义比罩棚的趣事。由于祥义的东家是清宫太监小德张，后台硬，经济实力强，所以它处处要和瑞蚨祥比高低，从商品销售到门脸的装修，它都同瑞蚨祥攀比。原来两家都是普通的小门脸，后来，瑞蚨祥在店门前圈了个小院，并装上个大铁门，很是气派。很快，祥义就把店前小院的砖墙拆去，花大价钱打造个镶有花饰、涂绿漆，既漂亮又大方的铁墙、铁门。接着，瑞蚨祥又把店前的普通罩棚改成可升可降的铁罩棚，祥义看瑞蚨祥弄了个铁罩棚，也找工匠装了个活动的铁罩棚，而且比瑞蚨祥的铁罩棚升得还高。现在，祥义的花棚栏铁墙和罩棚及瑞蚨祥的铁罩棚都尚在。

（三）瑞蚨祥提前参加公私合营

瑞蚨祥从开业后，一直生意很兴隆。但是，“七·七”事变后，瑞蚨祥就走向下坡路。1949年，北平解放后，瑞蚨祥又中兴起来。1954年，瑞蚨祥提前参加了公私合营。

三、天蕙斋鼻烟铺

天蕙斋鼻烟铺创办于清朝道光年间，是北京一家少有的行业和店铺，它在满、蒙各少数民族中，在清朝贵族中，在京剧界，在汉族的武术界和劳动人民中，很有名望，没有不知道天蕙斋鼻烟铺的。

什么是鼻烟？顾名思义，可能有人会说，是用鼻子闻的烟吧。确实不错，是用鼻子闻的。但这种鼻烟是怎么来的，它又为什么能够盛兴一时，可就少有人知了。鼻烟是来自西洋。在清朝顺治年间，西洋人来中国把这种烟进贡给皇帝，先是在宫内传看闻，以后传到各大王府，最后才传到民间。由于皇帝闻它、贵族闻它，所以才广泛地传开。说起来，鼻烟和茶一样，也与文化有关系，不仅与文化有关系，而且还与艺术有关系。装鼻烟的烟壶就是一种文化艺术品。鼻烟壶有多种多样，有白玉的、翠绿的、红玛瑙的、珊瑚的，还有在玻璃里内画的。现在很多名贵的鼻烟壶都作为世上珍品，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

天蕙斋鼻烟铺是北京最有名的鼻烟铺。它不仅是个鼻烟铺，而且还是个京戏界人士传统技术、联系事宜的重要场所。在京戏界中，除去女演员，都喜欢闻鼻烟，都和天蕙斋有关系，如著名演员谭鑫培、杨月楼、杨小楼、金少山、侯喜瑞、余叔岩、马连良、李万春、李洪春、丁永利等都是天蕙斋的老顾客。特别是李洪春和丁永利老先生更是天蕙斋的常客，一坐就是一天，在天蕙斋为学生说戏，在天蕙斋为同行说合事情。过去，天蕙斋的老人，常传说当年谭鑫培亲自去天蕙斋买鼻烟的故事。那是在清朝末年一天天快黑的时候，一辆十分讲究的轿车从大栅栏西口进来，驶到天蕙斋门前停下，从轿车里走出来一位清瘦的老先生，头戴小帽、身穿长袍，外套坎肩，足登布底鞋，走进天蕙斋。天蕙斋的杨掌柜，一看是谭老板，马上迎了上来，说："谭老板！"这时，谭鑫培从身上拿出一个鼻烟壶，说："掌柜的，您给装点！"街上行人一看是谭鑫培，就围了上来，都想看看"伶界大王"、赫赫有名的"谭叫天"的真面貌。事后，谭鑫培到天蕙斋买鼻烟之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到大栅栏来等着看谭鑫培的人更多了。此后天蕙斋鼻烟铺之名，不仅闻鼻烟的人知道，不闻鼻烟的人也知道了。

鼻烟在清代曾盛兴一时，但是，进入民国后，由于纸烟的出

现，鼻烟就被人冷落了。北平解放后，天蕙斋的生意更加不景气，1970 年天蕙斋的字号就不存在了。

四、马聚源帽庄

马聚源帽庄，最初只是个自产自销的小帽摊，使用新料好料，工艺考究精细，营业逐渐兴隆起来。后来，创业者马聚源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在前门外鲜鱼口开办了马聚源帽庄，主要经营官廷需要的缨帽和富人戴的高级帽子。清末时，马聚源帽庄被誉为北京帽业之首，很多人都以能戴一顶马聚源的帽子为荣。

（一）创办马聚源帽庄

创办马聚源帽庄的人叫马聚源，他是直隶马桥人。父亲是贫苦的农民，父母带着他们弟兄四人种着三、四亩贫瘠的土地。风调雨顺的时候，这几亩地的收成也不够全家人吃的，父亲在农忙时忙完自家的活外，还要去给人家打短工、干杂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父亲给四个孩子起名字，大的叫聚财，老二叫聚源，老三叫聚茂，最小的叫聚盛，取“财源茂盛”吉利之意。聚财长到十六、七岁，身体强壮，帮助他父亲干活，是他父亲的好帮手。老三、老四还小。聚源长到十四岁，念过两年书，认识几个字，在他们家算个“秀才”。父亲不想让他落在农村，想办法也要让他进北京学个手艺，将来好改换门庭。马聚源有个远房舅舅在北京当裁缝，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正月，他父亲带着他进北京投这个舅舅。他舅舅给他介绍到崇外花市附近一家小成衣铺学徒。马聚源勤快能干，很受掌柜的喜欢。可是他进铺刚一年，小成衣铺就破产了。由于掌柜的喜欢他，就把他送到前门外三里河附近状元桥的一个做帽子的作坊学徒。这个小作坊是个连家铺，掌柜的和他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连马聚源共有三个学徒。掌柜的不仅手艺好，而且为人也和善；可是内掌柜却是个刁女人，对待马聚源很刻薄，就知道让干活，稍一停歇不是打就是骂。马聚源为了学好手艺，只能处处忍耐，起五更睡半

夜，小心作事。刚来的头一年，买东西，作饭，哄孩子，搭铺，拿夜壶等什么都干。这个掌柜的做活很认真，马聚源在掌柜的严格管理下，不仅学会了制做各式帽子的手艺，也学会了管理作坊的方法。他从中领悟到，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恪守信誉。马聚源三年零一节的学徒生活结束后，又帮助掌柜的干了两年。后来，由于家境实在不好，无奈，不得不离开掌柜的，出去单干。

马聚源离帽子作坊后，托人在东晓市找了一间小房住下。凑几个钱到市上买了些日用的东西，一面自制帽子，串打磨厂、花市一带的客店，向各地的老客推销；一面给帽店做加工，日以继夜的苦干，这样，到了年底算账，除了还债尚余几两银子，他很高兴。第二年，他就上了两个徒弟，并在前门外鲜鱼口摆了个小帽摊。当时，鲜鱼口一带是商业集中区，买卖林立，行人如梭。由于马聚源做的帽子质量好，价钱便宜，日子一长，来他这里买帽子的人越来越多。这样，马记帽摊就出了名。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恰巧鲜鱼口中间路南一家小帽店关闭了，马聚源经中人说合，把该店的铺底倒了过来。经过简单的装修，选了个好日子，帽庄就开张了，用他自己的名字，就叫“马聚源帽庄”。

（二）马聚源帽庄易主

虽然马聚源帽庄只有一间门面，是个小帽庄，但是天天顾客满门，生意异常兴隆。一天，清政府一个姓张的大官的手下人在马聚源帽庄买了一顶帽子，戴了一些日子，发现马聚源的帽子不仅做工精细，而且用料真实；后来，这个张官员知道后，也派人到该帽庄买了一顶帽子，从此，马聚源就和这个张官员交上了买卖。不久，经这个张官员的介绍，马聚源应下了为清政府做缨帽的生意。马聚源帽庄就从一个普通的小帽庄发展成为清政府做缨帽，专为贵族官僚服务的“官帽庄”了。

由于生意兴隆，买卖忙，使得掌柜的马聚源劳累成疾。帽庄的事只得交给本柜出师的大徒弟李建全来经管。马聚源回家养病，

延续了十几年，最后病体加重亡故。马聚源死后，由于马家的后人没有经商的，所以，想把买卖收了，在家乡多买地盖房。这个消息让那个张官员知道了，他不肯让这样的好买卖倒闭，于是出钱把马聚源帽庄买下。

买卖归了张姓后，他自己经营不了，便将马聚源帽庄的全体职工都留下，并给几个能干的职工吃股，依然叫李建全当掌柜。因为马聚源帽庄早已是人皆知，改名子对营业不利，所以，依然挂着“马聚源”的牌匾。为了进一步发展马聚源帽庄营业，李建全又把马聚源帽庄旁边一家破产的店铺买了过来，随后大兴土木，建成个前边是三间门面店堂，后边是生产作坊的大帽庄。为了宣传，为了招揽生意，挑了个黄道吉日，大请宾客，庆祝马聚源帽庄重张之禧。张姓的同僚友好，同业都来贺喜。有人送来“重张之禧”，有人送来“陶朱事业”，有人送来“范蠡再世”等贺喜的红幛子，前后热闹了三天。马聚源帽庄从张姓接手后，买卖更加兴隆了，因为张姓交往广，有钱有势，不管商业还是军政界都同他有往来。顾客增多了，尤其是军政界的顾客骤然增多，从此，马聚源帽庄进入全盛时期。

（三）马聚源的帽子料真工精

马聚源帽庄的帽子所以驰名北京四九城，其主要原因，一是选料真实，用新料好料，不用旧料次料；二是制做工艺精细认真。在清代，马聚源帽庄当时主要商品是政府所需的缨帽和贵族富户所戴的棉、夹、纱等瓜皮小帽。缨帽的缨子，宜选用西藏的牦牛尾为好。牦牛尾做出的缨子，丝絮匀顺，怎么弄也不乱。染红缨子的染色，则以用西藏出产的藏红花为好。藏红花染的缨子，颜色鲜艳永不褪色。这两种原料，尽管产地远，价钱贵，马聚源帽庄不惜舍近求远。马聚源帽庄做瓜皮小帽的缎子，专门从南京正源兴缎庄进货，别家的不用。缎子分元、顶、王、铭、洪五等。马聚源帽庄要用最上等的元素缎。这种缎子做成的帽子戴到什么时

候也不出油渍。永远光亮好看。帽里也用新布，帽口用南方的暑凉绸缉。就是做帽胎的袼褙也要用粗新布。由于马聚源帽庄绝不用次料旧料敷衍，从而取信于顾客。在工艺制做上也不马乎。制做帽胎最费工夫，工人先把胎坯放在木模上，刷上浆子，而后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烫胎。烫时，随烫随冒火，但不会烧着。这样，烫好帽胎颜色微黄、挺鼓、不变形；用手按下，起手帽胎就鼓起，帽胎既有弹性又有韧性，这是马聚源帽庄独创的新工艺。

进入民国时期后，马聚源帽庄的主要产品——缨帽停止生产了，它以瓜皮小帽和将军盔（也叫四喜帽或风帽）为主要产品。这种将军盔是冬天御寒挡风之帽，它上面是棉小帽，下接左、右、后三片，垂到肩背上的棉护颈，好似武人的头盔一样，因之，叫将军盔。小帽和将军盔上都有小帽疙瘩。马聚源帽庄在钉帽疙瘩时，也同它家不一样，就用三针，既简单又结实，像缺个点的“六”字，人称之为“马三针”。到三四十年代，它除了经营传统小帽和将军盔外，又增加了海龙和水獭的三块瓦帽、土耳其皮帽以及各式美式呢帽等。

（四）马聚源帽庄迁进大栅栏

1949年，北平解放，马聚源帽庄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热潮中，参加了公私合营。马聚源帽庄在1958年全市商业网点调整时，从鲜鱼口迁进大栅栏。1966年“十年动乱”中，马聚源帽庄被斥之为“四旧”，牌匾被摘下，并入东升鞋帽店中。1986年，马聚源帽庄虽曾一度恢复老字号牌匾，但不久，又并入大栅栏里步瀛斋鞋店中继续营业。

五、内联陞鞋店

老北京曾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陞，腰缠四大恒”的顺口溜。当时人们都以穿一双内联陞鞋店的鞋，引为荣耀。从这个顺口溜中，可以知道马聚源、瑞蚨祥、内联陞和四大恒是过去北京最著名的老字号。

（一）履中备载

“内联陞”是赵廷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在崇文门内东江米巷（东交民巷）创办的。

赵廷是河北省武清县人，家里务农。他十几岁从家乡来到北京，在东四牌楼一家鞋铺学徒。他聪明、能干又肯吃苦，所以学得一手好活计。出师后，得到清政府一个官员的帮助，筹资白银万两，开办了这座内联陞鞋店，取名“内联陞”，“内”指皇宫大内，“联陞”意即穿了我店的靴鞋就可步步联陞三级。当时人们都迷信，愿意听吉祥话，“内联陞”这个字号很迎合这些人当官的心理。

内联陞开业后，生意很是兴隆。文官武将，大小官员，不少人都到内联陞购买和订做朝靴和便鞋穿。内联陞的买卖兴隆。不仅是它的字号好听，更主要的是它家做的朝靴、便鞋，选用材料好，做工考究，穿着舒适好看。内联陞做清政府官员的买卖，一般的小官吏都是亲自来店铺订做购买；而那些中、高级官员，一般都是派人来，叫内联陞去人为其量尺寸试样子。内联陞为多做这些官员的买卖，拉住顾客，它们将凡是在它店里做过或是买过朝靴、便鞋的政府小大官员的姓名、年龄、靴子或便鞋的尺寸、家庭住址、特殊爱好都记入专门账中，这个账，叫做“履中备载”。有了这个履中备载，根据其中记载，派人将靴或鞋送去，准保合脚。这种办法，不仅店铺省事，而且也省去顾客很多时间，顾客也很高兴，主顾也就拉住了。另外，在当时内联陞的靴鞋经常做为礼品，馈赠亲友或下级送给上级。内联陞有了履中备载，大大方便了送礼者，因为买了靴或鞋管保受礼者称心满意，从而内联陞也能多做买卖。

（二）内联陞三迁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北京烧光、抢掳无恶不作，内联

陞店铺毁于火。内联陞被迫迁至灯市口迤西的乃兹府（今灯市口西街）重新开业。这是第一次搬迁。

内联陞迁至乃兹府经过几年的建设、整顿，生意逐渐地恢复起来，但是，又逢民国元年（1912 年）的壬子兵变，即袁世凯阴谋制造的北京驻军兵变。内联陞又遭受其灾。店经理赵廷气愤而死。其子赵云书继业接手经营，将店铺迁至前门外廊房头条开张营业。这是第二次搬迁。

1943 年，赵云书辞世，其子赵佩衫继任内联陞的经理职务。赵佩衫接任内联陞经理时，也正是内联陞生意不景气，走下坡的时候。但是，内联陞渡过了几年困难时期，1956 年参加了公私合营。不久，从廊房头条搬迁至大栅栏，这是第三次搬迁。

（三）鼎盛时期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等生前最喜欢穿内联陞的千层底布鞋。1962 年，郭沫若还特写诗称赞内联陞的布鞋：

凭谁踏破天险，
助尔攀登高峰；
志向务求克己，
事成不以为功。
新知虽勤摩挲，
旧伴每付消融；
化作纸浆造纸，
升华变幻无穷。

内联陞的千层底布鞋，还受到一些国际友人的钟爱。美国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在离任回国时，特意在内联陞订做了两双布鞋，以留作纪念。

千层底布鞋，具有透气好、易吸汗、轻便的特点，因此，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穿它。到内联陞买千层底布鞋的，有北京的顾客，

有外省市的顾客，还有海外的顾客。

现在内联陞不仅生产经营民族传统的布鞋，还生产和经营男女各式新潮的皮鞋。从店铺规模、职工人数和营业额上，都是内联陞发展史的鼎盛时期。

六、张一元文记茶庄

张一元文记茶庄，是安徽人张文卿开的第三个店铺。张文卿开的第一个店铺叫张玉元茶庄，在花市大街，第二个叫张一元茶庄，在前门外观音寺街。张一元文记茶庄开业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过去，北京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张一元茶庄的掌柜张文卿是用“一元钱”开的买卖，所以叫“张一元”。为什么一元钱就能开个大茶庄呢？一些人相传，张文卿的家里本来很穷，一年家乡又闹灾荒，所以来到北京，投亲不着，住在一个破庙里。一天，他在街上闲遛，走在前门外珠宝市正通银号前，看到该店正在销售“黄河奖券”，他就用身上仅有的一元钱买了张奖券。结果他中了头彩，得了一笔巨款，他用这笔钱开了张一元茶庄。但根据时间推算这不是事实，这只是当时推销奖券的人编造出来的一种宣传罢了！因为推销黄河奖券是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的事，而张一元文记和张一元茶庄的开业都远远早于卖奖券的时间。张文卿所以取名“一元”是取意于“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说法，以祝他的买卖像一元开头那样，永远兴旺发达。1956 年，花市大街的张玉元茶庄和观音寺街的张一元茶庄撤销后，大栅栏里的张一元文记茶庄才改叫张一元茶庄。

七、厚德福饭庄

厚德福饭庄创办在清光绪年间，其基址原来是衍庆堂饭庄。厚德福菜肴是河南风味，拿手的是熊掌菜为北京闻品。厚德福鼎盛时期是在民国年间袁世凯当政时。这是因为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爱吃河南家乡的饭菜。传说（政治笑话）他经常在厚德福宴请宾客。他的手下人，投其所好，也都时常把宴席设在厚德福。说起

袁世凯爱到厚德福吃饭，这里还有一段袁世凯讨厌元宵的故事呢。有一年元宵节前，袁世凯穿便服来厚德福吃饭。坐的车停在大栅栏东口外，他想遛一遛，看看街景，几个护兵穿着便衣，尾随后边。走到厚德福门口，没有进去，想到西边看看，当走到茶汤铺时，听见茶汤铺的小学徒高声叫卖“元宵，山渣、枣泥元宵”的声音。他听这声音很是刺耳，从心里不舒服。他心里有鬼，他的权力，大总统的头衔，是他用狡诈和阴谋的手段窃取而来的。他知道人民都反对他，他把“元宵”误听为“袁消”了。于是，他回府后命人把卖元宵的拘捕起来，并下令元宵一律改叫“汤元”。不久，有人编了个歌谣讽刺袁世凯：

“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吃汤元。汤元、元宵一个娘，洪宪皇帝命不长。”

八、步瀛斋鞋店

步瀛斋鞋店是一家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店，清朝初年的店址在前门西荷包巷子。清朝时，前门外城楼和箭楼之间，东西各有一半月形的城墙，叫月城。在东边的叫东月墙，在西边的叫西月墙。东西月墙下搭着很多小房或芦棚，有许多店铺，游人众多，是当时的繁华街市，这个街市东边叫帽巷，西边叫荷包巷。当时荷包用处很广，可装钱、烟、槟榔、针线等。在《都门杂咏》上有描述“东西巷”一首竹枝词，词中写道：

“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

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

当时的步瀛斋只是个占有一间小店铺的买卖。店主是做靴鞋的匠人，带一个小徒弟，边做边卖，因荷包巷来游人很多，买卖越做越好。由于步瀛斋做的蟑螂肚薄底快靴，质量好，穿上舒适、结实，很受一些练武、善扑营（中国式摔跤，清政府有善扑营机构）的人欢迎。清末，步瀛斋迁入大栅栏里，改营千层底布鞋、妇女穿的绣花缎子鞋和各式皮鞋，买卖更加兴隆，成为北京有名的鞋铺。

九、一品斋鞋店

一品斋鞋店也是个老店铺，它开业于明朝末年。开始只有一个掌柜带着两三个学徒，是个边做边卖的小作坊。门脸也小，前面只有一间门脸，后面是个做活的小屋。一品斋既做武人和衙署衙役穿的薄底靴，也做劳动人民穿的“洒鞋”和“双脸鞋”。洒鞋分两种，一种叫“搬尖洒”，另一种叫“长脸洒”。这种洒鞋，鞋面前有“八”字形的皮条，鞋面上缝成若干菱形图案，鞋底是加厚的，用麻绳纳成的布鞋底，耐踢碰，坚固。双脸鞋的鞋面上，也缝有两条皮脸，不过是平行的，鞋底是布的千层底。洒鞋和双脸鞋都结实耐穿，是一品斋鞋店名牌产品，一品斋鞋店到民国以后，薄底靴停产，主要生产洒鞋和双脸鞋。1956 年合并商业网点后，一品斋鞋店撤销。

十、育宁堂药铺

大栅栏里的育宁堂药铺曾是和同仁堂乐家老铺齐名的买卖。这家育宁堂原来和同仁堂一样，也为清宫御药房提供药品，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有很多避讳的习俗，像皇帝的名字，不管人名或物名都不能用。清道光皇帝的名子叫“旻宁”，所以，当时药铺里“清宁丸”因“宁”字是避讳之字，就改叫“清麟丸”。“二母宁嗽丸”改叫“二母安嗽丸。”由于“育宁堂”的“宁”字也犯讳，尽管后来改叫“永安堂”，清宫御药房还是停止了该铺供奉药品的经营。从此，该药铺买卖一落千丈，在咸丰年间被挤垮了。

十一、大观楼电影院

大观楼电影院的前身是“大亨轩茶园”。过去戏园就叫茶园，以卖茶为主，看戏不用花钱。这个大亨轩茶园常演戏，据齐如山写的《京剧之变迁》上记述：“旦角曹福寿常演于此，极能叫座。”清末，地方恶棍马子衡到大亨轩看戏，同别人争吵，马子衡行凶打死了人。宛平县（当时北京为顺天府管辖，前门大街东为大兴

县，西为宛平县）来人拘捕，此案轰动一时。大观楼建于民国六年（1917 年），是北京最早的影院。当时的电影，只有影，而无声。清末常进宫为慈禧太后演戏的“伶界大王”谭鑫培，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戏曲片《定军山》就是在大观楼首映的。大观楼放映电影，轰动了北京城，许多人都争着来看无声电影。

第十节　大栅栏获得新生

1949 年，北平解放了！这座古老的城市获得了新生，社会主义的阳光照进了大栅栏。

北平的解放，使大栅栏里各店铺的伙计、学徒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他们有的高声歌唱，有的流下激动的热泪，有的互相拥抱，他们盼望多年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49 年 2 月 3 日，是解放军入城的日子，大栅栏各店铺里的伙计、学徒，除一部分在店堂中照常营业外，大部分手执自制的“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小旗，很早就拥到大栅栏东口外，等待着解放军的到来。大约到 10 点多钟，一队队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前门大街由南向北，徐徐行进。大栅栏的伙计和学徒同北平的广大市民一同欢呼，一同和解放军战士握手。

但是，在大栅栏里各店铺的掌柜、经理以及资方代理人，却有的恐惧，有的不安，有的惑疑，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知道了共产党并不分他们的店铺，不分他们的财产，而是保护民族工商业，扶植民族工商业，这才把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在北平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大烂摊子，大栅栏等主要商业街内有的店铺倒闭，有的虽然还没倒闭，但也已经奄奄一息了，到处是工人失业、百业凋零的状况。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

流，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也就是一般说的“四面八方”政策。因此，北京的工商业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开始得到复苏，大栅栏各店铺的生意又开始兴隆起来。

大栅栏里各店铺的伙计、学徒，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学习阶级觉悟逐渐提高，他们认识到伙计和学徒都是阶级弟兄，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他们都渴望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会。1949年8月前后，同仁堂和瑞蚨祥的职工，首先建立工会。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其他店铺的职工也都按行业先后组建了工会。大栅栏里各店铺的工会，为了加强团结，交流经验，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51年春又成立了大栅栏街的联合工会。工会成立后，伙计和学徒都有了靠山，再也不受掌柜、经理的打骂了，工作有了保障，而且待遇也在逐渐提高。过去在大栅栏流传的“学徒学了三年半，挨打受骂不挣钱。掌柜说声买卖不太好，让你回家住几天”的事情已成过去。各店铺的伙计和学徒，在党的“四马分肥”（就是店中的盈利，一份上缴国家税收，一份留作店中的公积金以发展生产，一分由资方提取，一份为劳方的工资）的分配政策中，他们的工资待遇都有明显的提高，生活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四马分肥”政策是从1953年至1956年在大栅栏等商业店铺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政策。在这些年中，大栅栏一般职工的月工资都在五六十元左右，骨干职工工资高达八九十元，学徒进店也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并且严格规定一律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有一天为休息日，超过工作要给加班费，并且完全废除了封建半封建和资本主义的雇用制，禁止打骂学徒。工会每月都发给职工、学徒一定数量的电影票和理发洗澡票，还组织职工、学徒上夜校，提高文化知识，组织文娱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这一切变化，使大栅栏的伙计和学徒们深深地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这幸福的今天。当时，大栅栏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共产党是太阳，照到大栅栏里，大栅栏里明又亮。过去掌柜子拿我们当牛马，平日动不动，不是打就是骂，今天我们跟掌柜子一样，同桌吃饭，同桌开会，有工会给我们做主，他再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一天工作八小时，过去从来没听说过还有星期天，学徒的过去哪领过工资，这样的好日子都让我们赶上。

第三章　崇文门外大街地区

第一节　崇文门外大街历史沧桑

一、崇文门城楼和箭楼

提起崇文门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它是北京城“前三门”之一。崇文区的得名就来自崇文门。崇文门在元代大都城时叫文明门，原址在今东单附近。文明门俗称哈达门，据《析津志》记载：“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后来又称“哈达门为哈德门”。这个哈德门的俗称，在民间一直延至现在。民国年间名牌香烟“哈德门香烟”就是用哈德门命名的。

1368 年，元灭亡，明代建立。明代将大都路改称北平府，并元大都城进行改建。北面城墙向南缩约五里，南城墙南移约二里。永乐元年（1403 年），改北平府为北京。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 年）十月，“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京师九门城楼”。工程从正统二年正月开工，至正统四年（1439 年）四月竣工。修建了九门的城楼、月城、箭楼、石桥、牌楼等。并改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齐化门为朝阳门，平则门为阜成门。

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是京城的南大门，被称为“前三门”。“正阳”象征封建王朝似太阳一样国势旺盛，其东的“崇文”表示“文治”，西边的“宣武”显示“武功”，用此以宣扬其治国方针。

崇文门的城楼、月城、箭楼等一组建筑现已荡然无存。崇文门城楼的原址就在今崇文门饭店和哈德门饭店之间稍北处，月城的东月墙从哈德门饭店起，西月墙从崇文门饭店起，往南至东打磨厂东口外北侧的箭楼处汇合。前面是护城河的石桥。崇文门的城楼、月城和箭楼等建筑规格、形式与正阳门的城楼、月城、箭楼都相似，就是规模都矮小罢了。崇文门城楼高 25 米，连城台通高约 40 米。楼宽 28.7 米，深 14.4 米，上下两层，面宽 7 间，进深 5 间。从明正统年间建成，后又不断修葺，始终保持着这组建筑的完整。但是到了清光绪末年，由于修建铁路，将京奉路从左安门西侧破城墙引进京城，在崇文门外，凿东、西月墙，铁路在崇文门城楼前穿月城而过。崇文门箭楼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时，被八国联军所毁，战火息灭后，未能及时修复而倾圮。月城是在本世纪 40 年代中期拆除。剩下的城楼于 60 年代末拆毁。

二、崇文门外大街沿革

崇文门外大街从明代起，至北京解放前，有时称为崇文门大街，有时称为崇文门外大街，有时还称哈德门大街。清乾隆《京师全图》上记为“崇文门外大街”，《京师坊巷志稿》上记为“崇文门大街”。老百姓则呼之为“哈德门大街”。1965 年才正式命名为“崇文门外大街”。

原崇文门外大街，北从崇文门城楼起，南至蒜市口（今广渠门内大街），是个“丁字”街。1976 年，打通了南端的道路，使崇文门外大街直接向南延伸至天坛路。1996 年，再次施工，现在已将该大街由 22 米展至 70 米，行人便道和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用护栏隔开，并架天桥和挖地下通道，以便行人通过。一条平坦、宽阔、现代化的大街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三、镇海寺等建筑——有关“淘（掏）气（砌）”的神话传说

提起崇文门外大街上的庙宇首先应说月城的关帝庙和镇海

寺。清王朝尊奉关羽，把关羽当做护国之神，所以到处大建关帝庙。北京城九门每个门的月城内都建了个关帝庙。崇文门月城内的关帝庙是在清末修京奉铁路时拆除的。关于崇文门的镇海寺还有个神话传说呢，在明代修崇文门外护城河石桥时，桥墩修起来就让水冲倒，怎么也修不起来。工匠们正在无办法时，发现一个梳着冲天杵的小孩在工地玩，工匠们就对小孩说，你还不回家，我们的桥墩修不起来，要找你家去。小孩还是不走。工匠们又问他，你叫什么呀？小孩回答："淘（掏）气（砌）"。说完，小孩就不见了。大家都说这小孩是神仙下凡，用淘（掏）气（砌）来点化我们。于是工匠们一边掏水一边砌，就将桥墩修起来啦，石桥也建成了。当年还说，崇文门石桥底下是个海眼，所以用个大铁龟压住海眼，以免发大水。在民国年间刊印的《最新北平市指南》一书上记："铁龟在崇文门外桥东北角下，其大如车轮然，相传崇文门桥下为海眼，故置此龟以镇之，其言凿凿，殊无凭信，然此龟今则仅存其盖矣"。崇文门月城小庙镇海寺也是为镇海眼而建。以上这些都是愚昧、科学不发达的表现。民国初年，镇海寺还在，但已无香火，和尚将一部分寺房租给做松花蛋的居住。此处做的松花蛋很受欢迎，并声誉远扬。崇文门外大街另一座庙，是泰山行宫，《宸垣识略》上记载："泰山行宫在蒜市口，明天顺年间建，有万历间太常寺少卿徐富、庶吉士姜逢元二碑"。此庙在民国初年时，是个盐店。

过去崇文门外大街南端有个特殊的建筑警钟台，老百姓叫它望火楼。警钟台是消防队用来监视火情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建警钟台，第一台在北新华街，第二台在东四，第三在西四，第四台在崇外蒜市口，第五台在南新华街。崇文门外蒜市口（崇文门外大街）的警钟台就建在今崇文区老年教育协会的西侧。高约 20 米，是用木方子建成。底座四边各长约 6 米，越往上越狭小，顶端是一间约 8 平方米的小木屋，外涂红色。小屋下悬一铜铃，消

防队员轮流在小屋中向四外瞭望，一旦发现火情，就拉动系在铜铃上的绳子，铜铃击响，下边的人就知有火情，出发救火。虽然这种报火警的方法现在看来很落后，但在当年还真起过一定作用。

四、广兴园戏园——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加入喜连成科班学戏的地方

在清代时，北京的戏园不仅前门外一带多，而且崇文门外大街也有，大街西侧的东茶食胡同里广兴大院（现名广兴胡同）路北就有座广兴戏园。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记载："戏园，当年内城禁止，……崇文门外木厂胡同之广兴园"，为当时南城著名戏园之一。广兴园戏园是清代光绪年间，京剧著名花旦演员俞玉芹等人集股创办的。戏园前是个小广场，存轿车、马匹很方便。当年，名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梆子演员侯俊山、田际云，评剧演员李金顺等曾在此演出过。因此，广兴园戏园盛极一时，戏园前的小广场，天天车水马龙。

据《马连良与马派》一文介绍："1909 年马（连良）先入喜连成科班。那天正是腊月寒天，有 6 个幼童于北风凛冽中，在北京木厂胡同内东茶食胡同广兴园的院子里静候考试，当时喜连成科班正在此演唱白天戏，一会儿出来了几位主考老师，其中就有萧长华先生"。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就是在广兴园步入其京剧生涯的。

第二节　崇文门外大街商业发展的条件

崇文门外大街过去在"前三门"中，仅次于正阳门，是店铺林立，车辆如梭，行人众多的繁华街道。这条大街所以繁华，是大街东侧的花市集是各种手工业产品销售之处，城区百姓和东南郊一带的农民都至此采办生活必需品，为崇文门外大街的繁荣

提供了条件。二是，也是在上文前门地区商业街中讲过的，南北大运河终点码头从积水潭南移至大通桥下。崇文门外大街和大通桥的距离比前门至大通桥近3里，所以，对崇文门外大街的商业发展影响更大。其三，就是北京九门总税务司设在崇文门外大街。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45年），令顺天府委佐贰官一员于正阳门外税课司，崇文门宣课分司监收商税”。到了明“弘治六年（1493年），令崇文门宣课司商税，止差主事监收，不必御史巡查”。自此，崇文门税课司就成了总管北京九门进出货物的总衙门。止税课司就设于大街之东，花市上三条西口外南侧（今门牌28号），1949年前是北平市外三区区公所所在地，1949年后，北京市七区人民政府也曾设于该处。60年代，原清代建筑拆除，改建为现代式楼房，一度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招待所。1996年，崇文门外大街展宽马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招待所拆除，原崇文门税课司衙署旧址已无处寻了。崇文门税课司从明弘治六年（1493年）设立，经明、清、民国三代，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撤消，前后共437年。由于这个税课司署长期设在这条大街上，因此，多少年来崇文门一带经常发现“马迹车尘互接连”的繁闹的局面。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这条大街成为繁华的商业街，但是以上三个条件是主要的。经商之人，开店铺做买卖选择店址是个极其要紧的问题。正因为崇文门外大街条件好，所以，各地商人纷纷至此投资设店，于是这条大街也就成了宝地。

第三节　崇文门外大街的商业发展

下面列举一些著名店铺并介绍几个比较集中的行业。

中药业在崇文门外大街一带比较多，像著名的老药铺万全堂、千芝堂和（东）庆仁堂都设于这条大街上。此外，还有天汇、天

成、隆盛、益成、久大、惠丰、永增、汇记、三益、集成、同盛、万方、协泰、义泰、得有、方善、盛兴、福记、仁兴、振兴、广源、信义、庆和、祥泰等药栈。这20多家药栈虽然不在崇文门外大街上，但都分布在距崇文门外大街咫尺之远的打磨厂、喜鹊（喜悦）胡同、花市上头、二条里。药栈与药铺不同，药铺主要以零售为主，药栈是药材的大宗批发，不做零售的买卖。药栈还接待各地药商住宿、存货并供他们在药栈中做生意。因为崇文门外附近药栈多，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控制北京药材市场的天汇、天成、隆盛和益成四大家都设于此，故崇文门外有北京药市之称。

崇文门外大街南端（原蒜市口处）有北京酒市之称。据《旧京琐记》上记载："酒行在崇文门外，向来为二十家，皆领有商帖者，凡京东、西烧锅所出之酒皆集于是。近日凋零，不及十家矣"。《旧京琐记》的作者夏仁虎是清末民初人，书中所记之事也都是这一时期他的见闻。据民国八年（1919年）酒行商会会员录上有：泰和、天裕、永益、聚隆、天顺、永隆、永亨7家了。这与《旧京琐记》所记相符。当年，全城不论大饭庄、饭馆、酒缸等都至崇文门外大街这个酒市来趸酒。另外在酒行集中的这段路上，夹杂着有几家油店、碱店和盐店。

过去北京的五金行和铜铁局子，除少数几家散在东四、西四等处外，大多数集中在崇文门外大街和前门外大街一带。而以崇文门外一带居多，并且都是大户。如当年北京著名的万和成、万庆成、义和成、三益泰、万丰泰、信昌号等20多家五金行都在崇文门外大街一带。由于这一带五金行家数多，所以京师五金行同业公会就设于这条大街上。据《京师五金行公会碑》上记：民国十二年（1923年），成立京师五金行同业公会，"办公地点辗转借居"。后来，考虑崇文门外一带会员数居多，所以，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购置崇外大街五十四、五两号市房一所"定于会址。万和成经理邸占江为首。铜铁局子都聚于崇文门外大街西侧的茶

食胡同东口内。铜局子有三四家，铁局子有十几家，其中的义顺成、广泰和、裕丰等是铁局子的大户。

五金行是以经营新货、洋货为主的商店，有的商店直接从洋行订货，大、小五金都经营。铜铁局子是以经营旧货为主，它们大都是旧货市——晓市进货。每天拂晓前，伙计、学徒每人背个牛皮扁方大袋子，里边放杆大铜盘秤。在晓市上用极低廉之价，从打小鼓的手中收货。他们无论收成品还是残品，都用秤称，按斤数付钱。

在崇文门外大街上还有个瓜市和蒜市。具体地址在茶食胡同东口外往南至东柳树井（珠市口东大街），北段是瓜市，南段是蒜市。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每天上午大街两侧，郊区农民在北段设摊卖瓜，南段卖蒜。因此，民间将北段称“瓜市”，南段称“蒜市口”。

崇文门外大街的茶叶铺有吴鼎裕、荣泰、恒和、久大4家，其中以吴鼎裕资本最雄厚，买卖最大，它是北京有名茶叶吴姓的买卖，在南方产茶区设有茶场，自己有专人在茶场薰制。崇文门外有几家大煤栈，四合顺、成兴顺、德丰元、泰昌义和鼎昌等。特别是四合顺、成兴顺、德丰元三家它们都设在崇文门外东侧城根铁道旁，直接从京西门头沟运煤，买卖以大宗批发为主。

崇文门外大街的上四条胡同西口处是棉线店集中之处，这里有德祥益、德泉、道德成、顺记、裕泉合、天聚源，再加上瓜市的广德成、义兴德、磁器口的万源等线店共9家线店，是北京的棉线市。织布厂和织布、织带的小作坊都买他们的棉线。

颜料铺有全顺昌、同茂义、义升公等3家，鞋铺有兴隆斋、三顺斋、玉顺斋3家，钟表铺1家。

油酱坊有大生、北聚泰2家，饭馆有恒盛、泰山和域华楼3家，羊肉铺1家叫荣祥成。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老二酉堂书局

老二酉堂书局在崇文门外东打磨厂街中间路北，约开业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 年）。“老二酉”三字，取自秦始皇时一个人为了躲避官吏搜书，在湖南沅陵县境内的大酉山和小酉山的山洞中藏起大量的书卷，并在此读书的传说故事。“老二酉”其含意是藏书众多。

老二酉书局不仅经销各种古版书籍，而且用木版自己印制《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六言杂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等八旗官学和私塾学生用书及习字的红模子，仿影和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等书法字帖。

陈荫棠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时当了老二酉堂书局的掌柜。他曾在清政府中当过一任小官，有文化，善思考。从他当了掌柜后，老二酉堂的生意很见起色。在陈荫棠接手老二酉堂以前，买卖很不景气。因木版字刻得不好，印出的书字迹不清，买老二酉堂书的顾客越来越少。

陈荫棠首先是抓书籍的印制质量，特从山东请来刻制木版的能手。书籍要印制得好，除刻制木版外，墨汁质量好坏也很要紧。老二酉堂使用的是松烟墨汁。热河（承德）的兴隆县有一种松树是制作松烟墨汁的上等材料。老二酉堂不怕路远不怕多花钱也派人从兴隆往北京运这种松木枝。将松木枝放在壁火炉里燃烧，烟通过烟筒散出烟灰，这种烟灰称“云烟”。而后将云烟放入大铁锅中，并投进适量的胶水，注入清水后，随用木棒搅拌，随点火熬。熬搅至烟与水都溶解一起时，就倒入大缸中。加盖封严，储存，要经过三伏天发酵后，才可使用。这样制成的墨汁印出的书，字迹

经多少年都是乌黑，永不褪色。

印制木版书籍是个专门技艺，重要的是刷墨一定要均匀。陈荫棠不惜用重金，请来两位有经验的木版印刷师傅负责印制。

要保证书的质量选择纸张也极重要。印刷用纸老二酉堂都是用毛太纸或毛边纸。这两种纸价钱虽贵，但纤维长有韧性，经久不变质。

其次是抓销路。老二酉堂销售对象主要是城乡各地私塾学房的学生以及部分八旗官学的学生。老二酉堂通过"串学房"的小贩将各种书籍送至学房中卖。老二酉堂对待"串学房"的小贩，留的利润比别家书铺优厚，并且是先卖后归书款。因此，很多"串学房"的都愿意卖老二酉堂的书籍。

因为陈荫棠曾在清政府中供过职，所以结交了不少的官员。他认识一个专管"玉牒"（皇族家谱）的官员，他通过这个官员，承应下为清宫印制玉牒的业务。印制玉牒由清宫造办处领御版宣专用纸，这种御版宣纸是由清宫监造的，纸的纤维长，韧性强，色泽洁白，存放多久也不褪色变质。老二酉堂为清宫印制玉牒，不仅得到一大笔可观的加工费，而且还赚下大量的御版宣纸。这种纸在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在清末一张长 8 尺宽 6 尺的御版宣纸可值 4 块银元。老二酉堂利用这些御版宣纸印制了一批《论语》、《孟子》、《诗经》、《史记》、《资治通鉴》、《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等古籍。由于这批古籍纸张好，印制精美，定价虽高出市价几倍，可是天天顾客盈门，不久就被抢购一空。

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变法"起，老二酉堂的买卖就逐步地走向下坡路。因为清朝皇帝光绪接纳了变法维新的建议，要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考试的制度，在北京设立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废旧学，兴新学。老二酉堂印制、经销的《三字经》、《百家姓》及《四书》、《五经》等旧学所需的课本读物必然受到冷落，销售不畅。特别是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迫于形势，假装维新，推行“新政”，下诏停止科举，同时，北京的八旗官学、宗学都改为新式学堂。老二酉堂的业务就更受到影响，印制出的《三字经》、《四书》等库存大量积压，卖不出去。由此造成资金周转不灵，发生危机。

老二酉堂掌柜陈荫棠眼看社会形势发展对他们不利，为了应付时变，积极寻找新的出路。筹集资金，一面印制《针灸积成》和《针灸大全》等医学书籍，一面承印《宪书》（当时称皇历）和日历，极为畅销。没有多久，就还清了外债，中兴企业。

老二酉堂的职工，不论后边作坊的工匠，还是前柜的账房记账先生、接待顾客的售货人员，大多数是本书局的学徒出身。老二酉堂招收学徒，一要识字有一定的文化，二要身体健壮。因为书局整天跟书打交道不认识字哪行；印书的木版存放几屋子，天天搬动，身体不好也是不行。刚进门的学徒先学制墨汁，印制书籍。这套本事学会了，选那仪表好，说话乖巧的到前柜卖书。到老二酉堂学徒都要有可靠的介绍人，学徒在学徒期间出现什么违反铺规的事都由介绍人负责。

在北京，虽然从1905年以后，官学相继改为新式学堂，但散在北京内外城各街巷胡同的私塾学房依然存在。私塾学房的老师还以《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和《五经》为课本。这时在北京是新学、旧学并存，这种情况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因此，老二酉堂的《三字经》等书籍还是照样经售到1949年。从1949年，不仅《三字经》没人买了，就连《宪书》因为书中多处有求签卜卦等封建迷信的内容，不允许出售了。使得老二酉堂无生意做，1958年老二酉堂并入古旧书行业中，老二酉堂从此成为历史。

二、宝文堂书铺

宝文堂创办于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原址在崇文

门外东打磨厂街东口路南，开始是个印刷、经营账本的账簿铺。清同治四年（1865 年）改营图书成为宝文堂书铺。主要编辑出版城乡广大群众喜读的通俗读物及历书。1980 年迁至东四八条胡同继续营业。

（一）宝文堂账簿铺

宝文堂开业时，由于印制的账簿质量好，价钱又便宜，顾客很多，做了一阵的好生意。可是，宝文堂卖出的账簿不是现款，都是赊销，到年节清账。最初几年宝文堂到期就能收回款项，但是到了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后，中国社会经济不断衰落，物价不稳。因此，宝文堂卖出去的账簿，钱收不回来，造成年年亏损。维持几年，最后负债太多，无法经营就于清同治四年（1865 年），将铺子卖给了广西人刘永和了。

（二）宝文堂改为书铺

刘永和接手后，依然用宝文堂字号，但是，改营编辑、出版、发行各种通俗图书的业务。最初宝文堂书铺很简陋，编辑、印刷、装订、出版、发行就是三四个人干。他们不分编辑、印刷、装订、出版和发行之间的界限，什么忙就干什么。宝文堂的读者主要是城市、农村的粗通文字的一般百姓。所以，宝文堂出的图书都是文字通俗，并且大多采用说唱形式，故事性强，篇幅短小，售价低廉的小册子。多者百页，少者只有十几页。像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所编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喻世明言》，俗称“三言”，是从 17 世纪（明末清初）以来，我国各阶层群众最喜欢读的小说集。宝文堂将“三言”中每个故事出一本小书，使读者读着方便，定价低廉，一般读者花钱不多，有能力购买。

宝文堂书铺最兴隆时期是民国时期（1912——1937 年），编辑、出版物多；通过革新，又采用了新式印刷机具。

1912 年，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民国政府废除了清王朝皇权

专制统治政策，对人民思想的禁锢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放宽，新闻、出版事业乘机得到发展。宝文堂正是利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此时的掌柜已换上了刘小亭，二掌柜崔兴炎。他们编辑、出版了《姜太公钓鱼》、《武王伐纣》、《汉高祖斩蛇起义》、《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火烧战船》、《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大破铜网阵》、《包文正出世》、《三下南唐》、《常遇春大闹武科场》、《取金陵》等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古代历史故事图书。在这些书籍中，虽然有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的糟粕东西；可是书中更多的是，向读者渲染了明君、忠臣、好人受人喜爱；昏君、奸臣、坏人受人谴责的是与非，善与恶的观念。

在编辑、出版历史故事小册子图书的同时，也编辑、出版了一批反映新人新事的小册子图书。像《新劝人方》、《抗日十字箴言》、《大战喜峰口》、《九·一八事变》、《二十九军大刀杀鬼子》等，这些通俗读物为读者指明了前进方向，唤起人们赶快团结起来，保家救国。

印制《历书》——（旧时俗称“皇历”，又叫“黄历”。）是当年宝文堂一项赚钱的业务。民国时间，《历书》是由天文台编纂，宝文堂从天文台取得编好的版样后，印制发行。这种《历书》在当时发行量极大，因为在每年农历十二月，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每家每户都一定要预购一本明年的《历书》。买《历书》可以说是人们生活中一件大事。旧时的《历书》虽然长仅25厘米，宽15厘米，书中不仅记载着年、月、日、时及春、夏、秋、冬24节气，还印着求卜算命等宣扬封建迷信的东西。因而，受人们的喜爱，并将它当做行动的指南。

宝文堂出售图书，其门市零售有限，主要是通过小商小贩走街串巷，下到城郊农村去销售。并大量地运至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察哈尔（河北省一部分）、热河（承德市）等地贩卖，销路

很广。

购进进口洋设备，采用铅字印刷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后，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我们国家的古法木版印刷与西方的铅字脚踏印刷机相比就落后多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宝文堂托人在上海买了两台东洋脚踏印刷机，以及所需要的铅字。由于宝文堂使用新式印刷机，使得它们的业务得到很大的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宝文堂散落在各地的图书和赊购出去的书款收不回来。因此，造成宝文堂债台高垒。此时刘小亭因病辞世，刘善政接任做了宝文堂的掌柜。

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非法的统治了北平。因为宝文堂出版过抗日救亡的小册子，日本宪兵曾到宝文堂搜查，但是，宝文堂事先早有准备，他们什么也没搜着。他们将掌柜刘善政带到日本宪兵队审问，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最后没审出结果。宝文堂在外边又走门子托人，才将刘善政救出。

（三）宝文堂的中兴

宝文堂从日本鬼子侵占北平后，生意实际就处于停顿状态。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理（这时之称）换上了刘玉铮。在新时期，新思想影响下，开始编辑、出版、发行歌颂工、农、兵等劳动大众的文艺作品。1953年改为国营，与通俗读物出版社合并，但对外还保留“宝文堂”之名。“文革”时，宝文堂被斥为“四旧”撤下牌匾。1980年，宝文堂在东四八条胡同恢复了营业，并依然以普及文化历史知识为主旨，近几年又大量出版了《施公案》、《小五义》等通俗小说，远销海内外各地。

三、吴文魁笔铺

坐落在北京崇文门外大街路西，开业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左右的吴文魁笔铺，是旧时驰名北京全城、专门生产、供应学生习字用笔的店铺。

（一）吴文魁笔铺的创办

吴文魁笔铺的掌柜叫吴文魁，河北人，自幼在一家笔铺学手艺。出师后，筹资开办了这个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的笔铺。

吴文魁创办这个笔铺曾付出很大的辛苦。吴文魁在学徒期间，不仅学会了做笔的手艺，而且还学会了接待顾客，善于做买卖的本事。他出师只有十七八岁，人虽小，可是很志气。当时有几家笔铺作坊约他去帮工干活，他都谢绝了，决心自己要开一号买卖。他托人在崇文门外瓷器口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一个人又做又卖。他将做好的小楷毛笔和中楷毛笔用蓝布包好，去串学房卖笔。过去，北京的学堂和私塾等老师都重视对学生的书法教学。刚上学的孩子每天得描一篇红模子；大一点的孩子每天用仿影写一篇大仿；中等以上的学生每天照着法帖临摹一篇大仿，三行小字。所以，纸、笔、墨、砚等书写文具用量很大。另外，当时大多数店铺都用毛笔记旧式账。毛笔销路广，生意好做。吴文魁制作的大、小楷毛笔质量好，售价又比较便宜，因而，顾客都喜欢用他的毛笔。

吴文魁辛辛苦苦地做了几年的好买卖，积攒下几十两银子。于是托人在崇文门外大街路西，东茶食胡同东口外北侧，找了一间筒子房开办了这个吴文魁笔铺。

（二）吴文魁笔铺品种全、质量好

吴文魁笔铺前店售货，后边作坊制作，自产自销。吴文魁笔铺品种齐全，制作认真。该笔铺不仅生产制作学生使用的普通毛笔，也制作社会各界人士使用的大、中、小楷狼毫毛笔、“抓笔”、“提笔”和“对笔”等。并且还代销“天然如意”、“龙门”等香墨、砚台、墨盒、镇尺、仿圈、笔帽、笔架等文具。

吴文魁笔铺经营至1912年民国建立后，又增添生产销售狼毫、紫毫、兼毫和羊毫各品种的毛笔。吴文魁笔铺在制作上，一是选材真实，二是制作认真。狼毫毛笔是用黄鼠狼尾巴的毛，以冬天黄鼠狼尾巴毛最好，毛“锋”最丰富，用这种毛制成的笔最

好用。吴文魁笔铺就是特选这种黄鼠狼尾巴毛制笔。紫毫是用一种紫色野兔的毛。兼毫是说用两种不同的毛制成的笔，叫“兼毫”。如先用紫毫做成笔的内芯，而后在紫毫内芯的外面裹上一层白羊毫，这种笔叫“七紫三羊毫”。羊毫毛笔是普通笔，吴文魁做这种羊毫笔，不是用普通羊的毛，而是特选江南湖州产的羊。这种湖州羊毛做出的笔，软、硬皆有，弹性好，书写自如，笔头压下可以自己挺起。

吴文魁笔铺作坊工匠有明确的分工，做笔头的专做笔头，做笔杆的专做笔杆。做笔头的工匠面前放个净水盆，供做笔头用。工匠把原料在水盆沾湿用细线将原料捆牢；而成品由有经验手艺好的师傅修整笔坯，捡去多余之毛，最后将每个笔头修整成，“尖、齐、圆、健”才算合乎标准。尖，就是笔头要有细尖，可以书写细笔道；齐，就是将笔头捻开，毛都是齐的；圆，就是笔体要圆；健；就是笔锋要刚健。做笔杆的工匠，不仅将杆修整成“光、直”好看，还要在杆上刻上“中楷羊毫”笔名及“吴文魁记”店名字样。

吴文魁笔铺的前店，除门市接待顾客卖货外，还有专人在外边推销。吴文魁笔铺与全市大小纸铺都有生意交往，纸铺都经售吴文魁笔铺制作的各式毛笔。一般都是先销售，后结账付款。此外，吴文魁笔铺与外地商人也有商贸往来，他家的毛笔远销河北、山西、河南各地。

吴文魁笔铺职工并不多，在生意最兴隆时期，前后共约十几个人。前店售货只占一两个人，“跑外”推销用两三个人，其余都在后边干活。铺中职工大都是本铺学徒出身。吴文魁笔铺都收十四五岁的青年人铺学徒，学徒期限为三年零一节。先在作坊学做笔，而后选精明者到前边卖货或跑外推销。学徒期间，只在铺中不用出钱吃饭、住宿，没有工钱。每至旧历新年能得到掌柜送钱一两块钱。“耍手艺的”（工匠的俗称）每月可挣三四块钱至七八

块钱不等。年终有“馈送”。根据一年的买卖好坏，一般情况，“馈送”多的能得一二百块钱，少的可得五六十块钱。

（三）吴文魁笔铺撤点停业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是用毛笔书写，但是，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变法”起，新式学堂逐步建立，学生开始用铅笔和钢笔书写，毛笔使用渐少。到了本世纪 40 年代，店铺也都改用新式账簿，记新式账簿必须用钢笔，因此，毛笔的使用范围又缩小了。吴文魁笔铺生意日渐衰败。

在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建立时，内外城的私塾学房还依然存在。学生还要天天用毛笔练字书写。直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私塾学房有的并入新式学校之中，有的自动停办。从而吴文魁笔铺生产出毛笔卖不出去，买卖无法维持。1956 年公私合营时，吴文魁笔铺撤点停业，职工并入文化用品部门。

四、万全堂药铺

万全堂药铺位于崇文门外大街路西巾帽胡同南侧。

有人说，万全堂是北京开业最早的药铺，一般说它开业于明永乐年间，距今 500 多年了。在万全堂内挂着一副民国十五年（1926 年）的对联，上联是：“万国称扬誉广三千世界”；下联对：“全球景仰名垂五百年”。

更有人说，万全堂药铺最早是同仁堂乐家开办的。乐家原籍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明代永乐年间定居北京，开始以走街串巷，摇串铃行医卖药为主。行医卖药生意很好，几年时间积下几个钱，就在崇文门外大街开办了这座万全堂药铺。到了清代康熙八年（1669 年）才在前门外大栅栏内路南开办同仁堂药铺。后来，乐家一位姑娘出嫁时，将万全堂做为陪嫁品，送给了姑娘。此后，万全堂曾几易其主，最后长期由山西省临汾人经营，直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

不管怎么说，万全堂是北京一家老店铺。曾引起著名历史学

家邓拓同志的关注，邓拓同志在50年代，多次亲临万全堂，对这家药店的开办，经营方式及与同仁堂的关系进行调查了解。可惜，还没等邓拓同志做全面深入地研究，“十年动乱”就爆发了，此事只能作罢。

笔者接触万全堂是从70年代末开始，十几年间，时断时续，曾走访过万全堂的韩姓股东和几位老职工，搜集到一些有关万全堂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只限于口述的轶闻遗事，没有可靠的文字材料，所以都未能解决该店的几个主要历史问题。可喜的是，近日笔者在崇文区档案馆查阅到万全堂献出来的、该店珍藏至今的《合同》、《房产红契》、《房产卖契》等几十件可贵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该店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我国商业史的难得的史料。

（一）创办时间和与同仁堂的关系

万全堂药铺开业于明永乐年间，是北京最早的老店铺，是同仁堂乐家把该药铺当做姑娘的陪嫁，赠了出去。

以上这种说法是后来人传说的，没有什么根据。传出这种说法，可能是不明真相的人误传，也可能是万全堂的经营者为了抬高自己店铺的社会声誉，做的虚伪宣传。这是过去商人做生意常见的事情。

那么，万全堂药铺究竟开业于何时，与同仁堂乐家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有什么关系？

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万全堂开业的时间。这在清乾隆四十九年乐毓秀的《立补税房契》里写的很清楚。现将该《立补税房契》全文抄下：“立补税房契生员乐毓秀原有祖遗康熙年间红契，自置盖房一所，门面五间，接檐五间，两厢房陆间，上房五间，后厢房陆间，后上房五间，伙房四间，共计三十六间。此房坐落在崇文门外大街路西，现开万全堂药铺。缘上年八月内将房契押借草厂二条胡同张学礼。本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张姓住房延烧，将

此契一并焚毁无存。今备价赎回，无契。愿遵例赴县补税照，依原价银一千五百两整。如有虚捏并另有红契及典卖不清等情，同保人一面承管。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乾隆四十九年，立补税契人

乐毓秀

保人刘天祐

知底人张学礼”

此张“补税契”写的很明白，“乐毓秀原有祖遗康熙年间红契自置盖房一所”。“现开万全堂药铺”。这说明此房是同仁堂乐家，清康熙年间买的。万全堂开业不能早于康熙年间，晚也晚不了乾隆四十九年。

乐毓秀是同仁堂乐家第七代人，乐礼的后人。从同仁堂乐家的历史上看，虽然同仁堂乐家在清雍正年间，已开始供奉御药房。但是，后来屡经变迁，多次衰败。嘉庆年间，乐家只剩下孀妇乐郑氏带着两个侄子乐云书和维岳。乐家为了保住同仁堂这块匾额，于嘉庆十年十一月，将万全堂卖给姜姓名下。现有《卖房契》一纸可做佐证：“立卖房契人乐云书等有祖遗东万全堂药铺铺面房屋一所，坐落南城崇文门外大街路西，门面五间，楼檐五间，前后正房拾间，前后厢房拾贰间，伙房四间，共三十六间。愿卖与姜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银二千两正，当日收足。自卖之后，任从开设生意，过户税契，并无搅阻，亦无它碍，两相情愿，永无异说，恐后无凭，立此契照。外红契一张，并附又照。

嘉庆十年十一月　日　立卖房契人乐云书

婶乐郑氏

弟维岳”

从此卖房契可以看出，万全堂药铺是同仁堂乐家后代卖给姓姜的，并非是送给姑娘，做为陪嫁的。姓姜的是山西省临汾人，将该药铺房产买去后，继续用万全堂字号经营中药。

（二）重订店规，买卖转亏为盈

万全堂药铺从乐姓转到姜姓手中，到清光绪二十一年，山西韩姓又入了股。从此万全堂改由姜、韩两姓合营，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加入公私合营。万全堂在这60年经营中，营业不断地发展，而且成为北京中药业一大户。其原因是与万全堂建有明确店规有关。

嘉庆十年买万全堂药铺的叫姜承斋。嘉庆十四年，姜承斋又投资装修店铺。但是，买卖做至同治十二年，山西韩姓在万全堂入了股。当时姜姓一股，本银八千二百两，韩姓八股，本银一万二千两。据万全堂光绪二十一年《合同》上记，生意做了22年“姜姓因伊家（指韩姓）银数股分太多，众口难调，不愿合伙，将生意尽归并于韩晋堂名下，原作本银八千二百两正，从中提清，永无瓜葛。”姜姓愿撤股，万全堂买卖完全归韩姓经营。由于姜姓与韩姓不仅都是山西临汾同乡，而且还有近亲关系，所以，韩晋堂认为“意气相投，不忍分手，复行合伙。韩晋堂立本银一万五千两正，姜声远立本银五千两正，共合立本银二万两正。”可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店规，各股“有提无增”。就是每个股东都是任意从万全堂里往出提钱，所以本银年年渐少”。至光绪年间仅存本银八千六百五十两正，其中铺底占银伍千五百两正，核之实本毫无几何，以致生意获利艰难。于光绪二十年遇有善价，众东商明，将房屋售出得银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两正，从中提出银五千四百两正，以充实资本，家具铺底作银一百两正，下余之银众东按股分讫。各出情愿，具无异说，自从以后，虽每年加出房租一款，而资本充实，铺中却免借贷之累。以今较昔有盈无亏。”这段文字是《合同》记载的万全堂买卖亏损，二万资本，只剩八千六百五十两了。后来将房屋卖出，才充实了资本，使买卖转亏为盈。并且在《合同》中规定：万全堂“生意系姜、韩两家合伙，外姓不得擅入。其账一年一清，二年合账，有提本者均按六扣清除。”接着又记“祖

遗六扣之规，清除不得藉词在家具铺底内扰攘，故违祖宗之成法，启众人之公愤。”这里说明，万全堂为什么亏本，是因为店规不明确，有些股东随便从店中支出钱款。以致本银逐年减少，最后二万两银子的本银，只剩下八千六百五十两了。

万全堂各股东接受了经营亏损的教训，为了振兴生意，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初一日，各股东签订《合同》。《合同》明确规定，“姜宅归为一股合立本银二千五百两正，韩宅归为八股合立本银六千一百五十两正，共合立本银八千六百五十两正。”此《合同》“柜存一本，各执一本。老合同交回存柜，以凭稽考，谨将各宅花名并条规开列于左：

韩十宅除提实立本银二千一百两正；

韩正甫除提实立本银八百两正；

韩德务除提实立本银五百两正；

韩鹤亭除提实立本银五百两正；

姜冲霄除提实立本银二千五百两正；

韩干园除提实立本银五百两正；

韩碧川除提实立本银六百两正；

韩金轩除提实立本银五百两正；

韩辑五除提实立本银六百两正。

条规开后：

一、入本者均按六厘支使，不得长支；

一、东家亲友、本族不得在铺中骚扰主事，间有铺中闲居者要依铺中规矩，不须无故挑斥，违者执合同人一面阻当（挡）；

一、东伙用丸散药均按门市钱庄合算，不折不扣；

一、二年一合账，定于三月初一日期；

一、二年合账之期，务须东家来铺，以便稽查一切，每家来往的盘费银五十两。如不遇账期分厘不给，若一家有数人来铺，来往费亦祗（只）银五十两；

一、经营生意伙友议定二年半回家一次，祇（只）准在家住半年，来往盘费银五十两，如不应回，告假者，盘费自备；

一、经理人年至七旬，准其告老，每年使辛金二百两，免其谢之。若七十以下者，仍照旧章，倘百年以后，照告老之辛金原数留三账，同中议定，不得更改；

一、凡有本者，各执合同一本，作为执照，不准指合同借贷、质押于人，倘有此事，作为废纸无用，公（共）同商定，不准故违；

一、伙友回家只需支半年修金，不准多支，如查出有多支者，管账付银者按数赔罚；

一、诸伙友议定，酬劳按月支使，不得徇情，任意长使，如查有长使者，管账人按数赔罚；

一、铺中伙友无论银钱不准支使，倘有徇情，借给者；东家一经查出按每月二分扣息，惟托经理人是问。如长支稍有不清者，同中人、在经理人辛金内扣除；

一、每月月清，限一季内，韩、姜两家各捎一册，若夏月无便脚时，秋时捎去。”

万全堂的这个《合同》，先介绍了姜、韩两家合伙经营万全堂药铺的起始，以及生意亏损的原因。签订《合同》以扭转亏损。这个《合同》订得很详细，从各股投资数目，至分红的厘数；从东家来北京的路费支使，至东伙在柜上用药交费，不折不扣的规定；从柜上管事人年老退归故里的待遇，至一般伙友回家探亲的规定；从严禁用《合同》借贷抵押，至伙友在柜上借款、长支的管理的条规等。这个《合同》是我国旧店铺在管理方面很难得、很典型的材料。万全堂药铺从订了这个《合同》后，买卖从此兴旺起来。

（三）生意兴隆，建立分号

开店铺作生意，首先是内部的管理，股东是一家店铺的核心，股东各行其是，店铺杂乱无章，伙友就无法管理。买卖虽然兴隆，

也会衰败的。万全堂药铺从光绪二十一年定立《合同》后，各家股东、经理人韩雨苍和帮事人（副经理）刘瑞卿等人的严格执行、遵守，使万全堂很快地兴旺起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万全堂《新绛支店合同》上写：万全堂虽然历史悠久，兴旺发达，但“仅此一域尚无分设”，“思我乡偏僻，每苦难得良药，遂于民（国）十年（1921年），决意分设支店于临汾。民（国）二十年（1931年），分设支店于新绛。又于民（国）念三年（1934年），临汾支店重新建筑，竭力扩充。而近年来，营业渐趋稳固，惟临（汾）、（新）绛两号未立根账，似与商规不合，若长此以往终非善策。为求永远基础计，特由北平总号万全堂出国币五千元作为临汾支店资本。又出国币二千元作为新绛支店资本。”由此证明万全堂自光绪二十一年签定《合同》后，店规明确，使万全堂营业发展起来。

（四）药材真实，炮制讲究

万全堂药铺是前店后作坊炮制。万全堂在经营方面“以信实为宗旨”，也就是材料真实，炮制讲究，提高药物疗效，取得社会信誉。

万全堂进药材的原则是，不怕价贵也要进质量好的货。所以，万全堂采购药材是多方面的，它们有专人当采购员。在北京同当时的汇丰、天汇、隆盛等大药栈有交往；每年逢春、秋两季祁州药王庙药市时，到市上大量采购各种药材。因为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药材集散市场，南北药材商人都赶这个市场，货全、货多。

药材好还要加工细，万全堂药铺的“汤剂饮片，丸散膏丹”俱全。

汤剂饮片简称“饮片”，就是草药。从药行和祁州药材市场采购进来的药材，需经过加工才能卖给顾客。药材要经过挑选，过筛子筛，而后该用刀切的就切；该蒸的就蒸；该炒的就炒。如半夏需用清水、石灰、矾等几道工序加工，放49天才能使用。又如

何首乌、大熟地和山萸肉等，需用黄酒反复上屉蒸，蒸到内成糖才合格。像黄芪必须挖去黑心部分，并用刀切成斜片。总之，万全堂所出售的各种饮片都是精细按古法加工，一丝不苟。

丸、散、膏、丹是经过认真炮制的成药。万全堂另设“丸药”作坊。也包括炮制膏药、药酒和散剂。丸、散、膏、丹，这种成药的疗效，首先得说药方，万全堂搜集了很多的古方和民间验方。其次是药材，最后才是加工炮制。万全堂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了，可以说条件具备，因此，万全堂出售的牛黄清心丸、二母宁嗽丸、牛黄抱龙丸、追风膏等几十种疗效好，为患者所称道的中成药。

万全堂铺中售药处，有查柜一人，他在柜台外边活动，顾客进店他招待顾客。柜台外摆八仙桌一张，左右各有一把椅子，等着抓药的顾客可在此休息。查柜一项主要责任是检查顾客的药方，查对所抓药品，以防止错误。伙友给顾客抓配方剂，每味药各包个小包，包内另放个小方纸，上印该味药的药名、药性、主治等文字介绍。可供顾客了解和核对，药方与所抓之药是否相符；并为顾客提供药品知识材料，以学习和鉴别大夫处方的优劣。

（五）参加公私合营

万全堂药铺从清康熙年间开业以来，历经兴衰、沧桑。在乐家经营期间，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和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两次失火。重新修建后，生意依然兴隆。有人说，“火烧旺地”，实际是万全堂处的地理位置优越，当年的崇文门外大街店铺鳞次栉比，游人如梭，是北京商业繁华大街之一。而且北京九门总税务署又设于此，更加重了地域的优势。

1956 年，万全堂参加了公私合营。从此，万全堂就结束了私人经营的历史，转入国家企业。

五、千芝堂药店

千芝堂药店原名千芝堂药铺，它是取铺藏有千万支仙药灵芝

之意。原址在崇文门外大街路东，1991 年迁至前门大街。千芝堂开业于清乾隆十年（1745 年），是北京一家有名的老字号。其首业人已无可考，只知到了光绪七年（1881 年）一个叫吴霭亭的用二千两白银将千芝堂的铺底买了过来。从此，千芝堂开始兴旺起来，发展成为北京中药业四大家（另外三家是同仁堂、鹤年堂和庆仁堂）之一。

（一）在商业竞争中发展

吴霭亭将千芝堂买过来后，他自己没有亲自经营，而是聘请一位既懂药材炮制，又精于买卖经营的王子丰替他管理。这在旧商业店铺中，吴霭亭是千芝堂的东家（铺东），王子丰是千芝堂的领东掌柜子。王子丰精明能干，千芝堂在他的管理下，买卖做得很有起色。特别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庚子事变”中，做了一个时期的买卖，赚了几笔大钱，为千芝堂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北京城内战乱，有钱人为了避难就将家存的人参、鹿茸等贵重药材卖给药铺，千芝堂以极便宜的价钱买下不少这样的货。俟战乱平息后各种货物都恢复了原价，千芝堂就发了大财。

王子丰自认为对千芝堂的发展有功，产生了骄傲，从而与东家吴霭亭发生矛盾并发展到无法调和，最后王子丰一气离开了千芝堂。

王子丰离开千芝堂后，不久，就领了个财东于民国元年（1912 年）左右，特意选在千芝堂的北边，崇文门外大街路东开办了庆仁堂参茸庄（后来俗称东庆仁堂）。从此，千芝堂与庆仁堂两家展开了无休止的商业竞争。表现为：一比门面，千芝堂是三间门面开间，两层楼，描梁画栋，金碧辉煌；庆仁堂也是三间门面两层楼，油饰得里外一新。二比经营，多招顾客，多做买卖。王子丰利用他在中药业中的交往广，大量收购质量好，价钱又廉的药材。并在药材炮制上下功夫。而且在门前挂出“本庄采购各地名贵药材，精心炮制，定价低廉，初一、十五收价减半”的广告牌。

千芝堂从王子丰走后，掌柜换上吴受臣。吴受臣也是个会经营善管理的人，他在庆仁堂这个强有力竞争者面前毫不示弱，利用店铺历史久，经济实力雄厚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的企业。民国四年（1915 年），千芝堂在前门大街，珠市口迤南开办了南山堂药铺；王子丰也于民国六年（1917 年），在南山堂的南侧开办了庆仁堂药店（后俗称南庆仁堂）。后来，千芝堂又在阜成门内大街开办琪卉堂药铺，王子丰紧跟不放，也在其侧开设了大和堂药店。千芝堂与庆仁堂之间的竞争甚是激烈，就连千芝堂在山西大同开办南山堂分号，王子丰紧跟不放，追了去开办了大同庆仁堂。不过两年之争始终不分胜负，并且都在竞争中发展。

（二）药材真实，炮制讲究

千芝堂所以能够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同它的药品质优、疗效显著有很大的关系。

千芝堂是自己采购药材，自设加工作坊炮制“丸、散、膏、丹”。进货是从三个方面，一是从祁州庙会药材市场进货。祁州庙会就是河北省安国县的药王庙会。多少年来，这个药王庙每年春、秋两次开庙。届时，全国各地的药农、药商都赶这个庙会，所以，药品齐全。千芝堂每年都派人赶祁州庙会，在市上采购药材。这是千芝堂一条主要进货的渠道。二是派人分赴全国各地选购名优药品。三是从本市大药栈进货。后两个方面都是在祁州庙会没有买到的药材，临时补购。千芝堂无论从哪里进货都是不怕多花钱，选购质优的货。

千芝堂经营的药品，不论“汤剂饮片”还是“丸、散、膏、丹”，都是认真加工炮制，以提高疗效。汤剂饮片就是中草药，草药是要经过加工才能出售的。如半夏需经过用清水、石灰、矾、甘草、生姜等几道工序，全部工序前后需 49 天才能完成。又如天麻、玉金、元胡等都需用刀切成薄片才能在煎煮时充分发挥药效。中成药“丸、散、膏、丹”的炮制十分讲究。千芝堂一是讲究配方，

只有配方合理才能有疗效。千芝堂的中成药不是用古方，就是用民间验方。二是选料真实、质优。三是一丝不苟地遵照古法炮制。药材该切的切，该炒的炒，该蒸的蒸，该存放的存放，认真炮制。所以，千芝堂的中成药疗效好。特别是二母宁嗽丸、羚翘解毒丸、暖脐膏等为顾客称赞。

千芝堂在利用做社会慈善事业的同时，广泛宣传自己以提高千芝堂在社会的声誉。过去每年入夏，千芝堂都在店铺门前搭起一座高大的遮阳席棚。席棚下设有桌凳、大盆的暑汤及消热祛暑的小药供路人休息与解渴救急免费服用。得其利者自然感激千芝堂，其他人也敬佩千芝堂的济世风格。

千芝堂药铺对外经营既有门市零售，抓方剂、卖成药，又有批发。门市顾客以东南城居民为主，也有远道慕名购药之人。批发的对象多是城乡的小药铺，也有外埠的一些药商。

（三）转成国营药店

千芝堂是个殷实的买卖，自吴姓接手后，年年生意兴隆、赢利。每年盘货时都打“厚成”，就是各种药材都按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倍或几倍记价，如1元的记为5角，甚至更少。所以，从账本上看千芝堂的资产不多，实际库存极丰，资金都打在“厚成”里，资金很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千芝堂参加公私合营，后转为国营千芝堂药店。1958年本市调整商业网点时，北京市药材公司定千芝堂药店为本市剧毒类药品及特种药品的供应点之一。

近来，崇文区人民政府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特决定对崇文门外大街，西花市大街西口以南地区进行改造，千芝堂于1991年迁至前门大街营业。

六、东乐园澡堂

东乐园澡堂位于崇文门外东草市（今广渠门大街）路南，是河北省定兴县人徐会友于清光绪（1875——1908年）年间开办的，

是本市澡堂业一家历史悠久的店铺。1973 年，改成温泉热水井供顾客洗浴，改名“崇文区温泉浴池”。

（一）简陋的东乐园澡堂

今天的浴池在 1949 年前，都称澡堂。澡堂业是个本小利微，极其辛苦的行业，从事此业者过去都是河北定兴人。东乐园澡堂只接待男客人洗浴，没设女浴池。开业时设备很简陋，只有房屋几间，浴室中有一大水池供客人洗浴，室内地方窄小，热气蒸，臭味薰，使人喘不上来气。休息处，在墙壁四周设衣箱供客人放衣物，前面有长条大板凳。来洗浴的多是附近手工作坊的作坊主和一般从事体力劳动者，还有左右大车店的车夫等人。东乐园澡堂的从业者除掌柜徐会友外，只有烧火工一人和招待客人的伙计两三人。掌柜徐会友也不闲着，他自己管钱写账，并在堂内招呼伙计招待客人。东乐园每天都是天刚亮池中水必须烧热，太阳从东方升起就开门迎客人。这正与东乐园门框上贴的楹联“金鸡未唱汤先热，玉板轻启客早来”一样。关门晚，每天都在夜 11 点钟左右。伙计辛苦，而待遇极差，伙计虽然在柜上不用花钱吃饭，但是天天都吃窝头咸菜。并且没有工钱，主要依靠洗澡客人赏给的小费为收入。小费并不全给伙计分，掌柜的要扣去三成，余下的七成让伙计分。

（二）东乐园澡堂的发展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北京崇文门外一带也有了电灯和压水机井，使得东乐园有所发展。东乐园澡堂翻建店房，将窄小的店堂扩充可容五六十位客人躺下休息的铺位。浴池由原来一个水池改为既有温水又有热水的四个水池。店房中装上了电灯，店后水井改为压水机井。伙计增多了，有了管账的先生、看池工、搓澡工、理发工、修脚工和洗衣工等。这样，洗澡的客人来东乐园洗澡，搓澡、修脚、理发一次都可办到，就连身上脱下的脏衣服交给伙计，等客人洗完澡，在铺位上睡个觉就可穿上洗完的干净衣服。

东乐园地理位置好，是东郊过往客商至崇文门和前门等处的必经之处，又因为当年草市附近手工业作坊和大车店多，所以天天客人满堂。在民国年间（1912 年至 1937 年），东乐园在北京东南城一带算个有名的大澡堂。买卖兴旺，年年获利，民国二十年（1931 年），徐会友又在前门外三里河（今珠市口东大街）开办了东乐园的联号“西乐园澡堂”。

东乐园的每个伙计对来洗澡的客人都是热情招待。客人刚进门就有伙计满脸陪笑地高声：您来啦，里边请！里边看座！”客人洗完澡出来，看池伙计忙给客人用毛巾擦背，随后拿一块大浴巾给客人披在背上。客人回到自己的铺位上伙计赶快递过来热毛巾请客人擦脸，客人如要喝茶水伙计很快就给沏壶茶水。到饭时，客人不走伙计还管到饭铺叫饭。

东乐园对待泡澡堂的客人也一样热情。

澡堂业就是个客人极其广泛的行业，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这些人到澡堂来，有的就是为了干净干净洗个澡，有的并不是为了洗澡，而是为了讲生意，做买卖；为了买房子置地谈条件；为了帮助别人解决纠葛等。还有一种人是到澡堂里来躲债，欠人家的钱而到澡堂边洗澡边休息睡觉，躲避债主要债。东乐园澡堂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直至 1949 年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工商业萧条，居民生活苦，所以每逢年节，在东乐园众多洗澡的客人中，有一部分从早晨开门到晚上始终都不走，洗了睡，睡了洗。饿了让伙计去给叫饭，直等到东乐园晚上 11 点钟时，伙计高喊：“各位明天再来，静堂啦！”他才无奈地离去。

东乐园的客堂门上有这样一幅楹联，上联写“身有贵恙休来洗”；下联对“酒醉年高莫入堂”！“贵恙”指的是身上患不干净的外疮，请您不要进澡堂洗澡，喝醉酒的人和年岁大的人请也不要来。但是，这样的客人一旦来了，东乐园不但不拒绝还千方百计

为他们提供方便。为身上长疮的客人找个大木盆请他们洗疮，为酒醉和老人找个离浴堂近的铺位以便洗澡方便。

东乐园的位置好，交通方便，“温热四池”设备好，接待客人热情，所以买卖兴旺，经常浴客满堂。

（三）改为崇文区温泉浴池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东乐园加入了公私合营，成为国营企业。1973年地下温泉热水井开凿成功，改名崇文区温泉浴池。对身患风湿性关节炎、腰腿病、各种皮肤病的客人洗浴及治疗提供了条件，自开放以来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每天可接待千人洗浴。

1990年，浴池重新翻建成二层楼，一层供客人洗浴，二层设为旅馆。生意更为兴隆。

七、鸿泰轩酒铺

鸿泰轩酒铺位于崇文门外西唐洗泊街路北，是王德贵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开设的。虽然当时北京的大小酒铺到处可见，但是这个鸿泰轩酒铺，以它的酒质好、味醇香，下酒小菜齐全，赢得顾客称赞。尤其是他家的小酥鱼，色、形、味都好，名扬北京外城一带。后来，顾客都将鸿泰轩的铺主王德贵叫“小鱼王”。可是，时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货源奇缺，无法继续营业而倒闭。

（一）学手艺

王德贵祖辈久居北京崇文门外，是个老北京。父亲是勤行人，王德贵弟兄二人，哥哥叫王德山，他是老二。弟兄幼小时只念过两三年的私塾，认识几个大字，在十四五岁时就去学徒。他们俩人都学的是茶房。王德贵的师傅是前门外取灯胡同里同兴堂饭庄的茶房头。王德贵每天跟着师傅白天去同兴堂干活，收活还要去师傅家侍候师傅，帮助师娘干家务活。同兴堂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大饭庄，不管厨房中的红案（掌杓炒菜），白案（做米饭面食），还

是茶房几个饭庄中的主要业务部门都有几位好手艺师傅。茶房在当时饭庄中，不仅是端盘子端碗，摆台招待顾客，而且还要通晓婚、丧、嫁娶等各种风俗礼节，会做莲子八宝粥、蜜饯、水果等各式冷荤小菜。王德贵为人勤快又好学，所以在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间，学会了应该学的手艺，特别对茶房所做的冷荤小菜，不仅都会做，而且很有特色。

（二）开办鸿泰轩

王德贵出师后，在北京各大饭庄做了两三年的散活后，就与哥哥王德山在崇文门外红桥路西经营酒铺为主。买卖虽然很好，但是他哥哥王德山事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从不与王德贵商量。天长日久哥俩就产生了矛盾，不断地吵嘴，最终于民国九年（1920年）俩人分家单干。

王德贵从祖居的东半壁街的笔杆胡同搬出，迁到南河漕路西的破房里。不久，恰巧西唐洗泊街路北有一家小杂货铺关张，铺底要往外倒。王德贵知道后，就托人把这个店铺倒了过来。但王德贵经过一个阶段筹备后，正准备开业时，他哥哥王德山带着几个人不容分说，就把铺子给砸了。他不许王德贵在此开买卖，他说离他的酒铺很近，夺他的买卖。后来经过亲朋给他们调解风波才算平息下去。经过这件事情的纠缠，拖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才正式开业。铺名“鸿泰轩”，取生意兴隆，鸿大，泰和之意。

当年的西唐洗泊街、水簸箕下坡、葱店前街、后街、法华寺街一带，是“东晓市”，就是打小鼓的天不亮摆摊卖货的地方，人很多，热闹异常。鸿泰轩开业后生意就很好，天天酒客满门。鸿泰轩是个一间门面的桶子房，前面看着窄，但是店内宽，铺子里可摆六张酒桌，可同时招待客人20来位。职工四五人。王德贵也跟着干活，他管收酒，管做酒菜。鸿泰轩收的是“私酒”。当时市场上有两种酒，一是完税的酒叫“官酒”；另一种是不完税，偷着卖的“私酒”。但是私酒要比官酒好。私酒不仅兑水少，而且价钱

便宜。王德贵很会验看酒的质量，一是看酒的色泽，色要清澈；二是闻；三是用火点燃，将酒倒入小酒盅里，划根火柴点着，火灭剩下的就是水。所以，王德贵收酒，酒不好不要。王德贵做的酒菜有，五香小花生、炸花生仁、玫瑰枣、炸排叉、香椿豆、麻豆腐、五香豆腐干、开花豆、辣白菜、饹支饹、小酥鱼等。

鸿泰轩的小酥鱼是选寸半长的小鲫鱼，拾掇干净，码放在砂锅里，放入葱、姜、蒜、花椒、大料、小茴香、白糖、醋、酱油、料酒等佐料，先用旺火煮约半个小时，改用微火煨，快熟时再放盐。这种小酥鱼，酥、甜、酸、咸，味道鲜美，不仅肉酥，连鱼刺都酥，可入口吃。当年，连北京内城的客人也慕名到鸿泰轩喝酒，品尝小酥鱼。

鸿泰轩的酒客多，生意兴隆，是与该铺的酒好，小酥鱼好吃有关，另外也与鸿泰轩职工待客热情，服务周到有关。夏天给客人预冰碗，供客冰酒；冬天给客人温酒。并且可以赊欠记账。

（三）鸿泰轩倒闭

鸿泰轩从1922年开业，到1937年，做了十几年的好买卖。“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物价不断飞涨，日本统治者疯狂地掠夺华北的各种物资。并将米、面等控制起来，酒也被统治起来。所以，鸿泰轩无法继续维持营业，最后于1938年倒闭。这样，鸿泰轩“小鱼王”就成了过去。

八、六合粮店

六合粮店位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的榄杆市（现广渠门内大街），是山东人徐彦臣于清光绪年间（1898——1908年）领东开办的。经营米面杂粮，并自设碾房。在本世纪20—30年代，发展成为北京有名的大粮店，全店职工40多人，库存粮经常在几千斤。曾兴隆一时，后在北平沦陷、日伪统治时期，生意衰败，于1940年歇业。

（一）六合碓坊

六合粮店是由六个山东粮商合资开办的店铺，故称“六合”。徐彦臣是六合粮店的领东掌柜，他善于经营管理，很会用人，因此，六合粮店在当时北京众多粮食行业中，生意做得很活跃，买卖发展很快。六合粮店开始是个只做加工粮食的“六合碓坊”，专为满清八旗人碓碾“老米”。当年清政府时，满清宗人府按月发给八旗人钱粮禄米。这种禄米是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存放在粮仓中。北京朝阳门内的禄米仓就是专存禄米的地方。清政府宗人府在禄米仓存储的禄米都是发陈年老米，存新米。年年都是新米顶陈米，所以，旗人从禄米仓中领出的禄米颜色都呈深红色，故称“老米”。这种老米必须经过碓碾将稻壳、糙皮去掉才能做饭食用。六合碓坊就是专应加工老米的生意。他们用人工脚踏石墩碓碾老米，收取加工费。一般不收现钱，用扣留加工米顶替现钱。由于六合碓坊加工活干得干净，收费又较低，故此，到六合碓坊加工老米的顾客很多，买卖做得很兴旺。六合碓坊所以兴旺，是因为六合碓坊将扣留的老米经过加工后在店中高价售给汉人。老米比普通大米香，好吃，当时汉人吃不到老米，所以，他们愿意多花钱也买老米吃。故此，六合碓坊做加工老米生意获利厚，买卖发财。

（二）改名六合粮店

清宣统三年（1911 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清政府被推翻。八旗宗人养尊处优，不劳而食，按月领取钱粮禄米的制度被废除了。六合碓坊加工老米的生意没了，因此，就不得不改变经营业务，从事门市经售米面杂粮的生意，改称“六合粮店”。

六合粮店是后边设有碾房加工粮食，前店销售。他们有专人跑粮食市，从粮食市采购小米、小麦、黄米、黄豆、高粱、黑豆、红小豆、绿豆等杂粮，并有人到各种粮食产地直接采购。六合粮店后边碾房加工磨制伏地白面，自磨小米面，玉米面和荞麦面等。六合粮店自磨的小米面是用糜子米和黄豆磨成，其比例是，100 斤

小米面用60斤糜子米加40斤黄豆，细磨、细筛仔细加工。蒸出窝头香甜好吃，顾客欢迎。六合粮店自磨玉米面是用100斤黄玉米加20斤黄豆。由于六合粮店自磨的伏地白面、小米面、玉米面和荞麦面等都用当年的新粮，好吃，所以，顾客多，买卖忙。

六合粮店的内部管理很有章法，每二年股东分一次账，领东掌柜下请帖将各位股东请来，查账、验库存货物。掌柜向股东报告两年的经营情况，店伙的表现及今后打算等。

当时六合粮店的伙计、学徒劳动强度大，活累，每天干的都是笨重的扛粮食包，打粮斗，赶牲口磨面。因此，六合粮店收的学徒都是山东省乡村来的十四五岁身强力壮的孩子，学徒期限是二年，比一般店铺三年零一节要少。学徒在学徒期间，吃饭、住宿六合粮店都管，衣服、被褥由学徒家里自备。没有工钱，每月只给一些零钱，买双袜子。伙计每月工钱一般七八元钱（1937年“七·七事变”前）。此外，在年底结账时每个人可得到六七十元至百元的“馈送”。在伙食方面，六合粮店对伙计和学徒很宽厚，每天三顿饭准有一顿白面，而且初一、十五日吃犒劳，就是改善伙食，吃粉条炖肉，伙计可以喝酒。所以，伙计和学徒都肯为六合粮店出力。六合粮店从民国九年（1920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这近20年是其生意鼎盛时期，全店伙计、学徒从不足10人增至40多人。每天门市买粮食的顾客络绎不绝，崇文门外一带的店铺和手工作坊大都与六合粮店交买卖。六合粮店与这些工商业者交买卖，都是先吃粮，俟年节算账付款。六合粮店年年盈余赚钱，使店名大振。

（三）六合粮店歇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六合粮店和全市其他粮店一样买卖走向下坡路。

因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为扩大其侵略战争就疯狂掠夺我国华北的物资，在其占领的广大农村实行“烧光、杀光、抢

光”的政策，使得华北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到了1939年，北平的粮食市场粮食奇缺。12月中旬，伪政权下命令“实行计口授粮”按户籍人口配给口粮。1940年初，华北各地又干旱无雨，农田缺水歉收，因此，北平发生了粮荒。日伪统治者不顾和平居民的死活，照样抢掠粮食，责令粮店用库存的各种杂粮与发霉的坏粮、麸皮、米糠等物混在一起磨面，美其名“混合面”卖给居民。六合粮店库存的粮食早已卖光，也无奈磨“混合面”在门市出售。1940年下半年，由于店里已无颗粒之粮，六合粮店最后无法只得遣散伙计、学徒回家，买卖停业。

九、大顺米面油盐店

大顺米面油盐店是北京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店，它是山东省迟姓粮商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2年）在崇文门外平乐园（现名珠市口东大街）开设的。最初只是个小粮店，伙计、学徒几人，到了清末民初（1900——1915年）时，大顺小粮店发展为北京有名的米面油盐都经营的大店。店中伙计、学徒四五十人。此时并开办了合增、合增永和合盛三号米面油盐联店。买卖做大了，迟掌柜就将大顺米面油盐店委托给王乐亭经营。

（一）创业

大顺米面油盐店创业时曾走过一段艰苦之路。当年北京的粮食行业多是山西省人经营，其他省区人不好插足。山东迟姓粮商开办大顺粮店是担着很大风险的。因为大顺粮店不仅买卖小，门面只有一间，店伙三四个人，存粮少，而且受到山西籍粮商的排挤。但是，这个迟姓粮商不怕困难，不怕辛苦，自己亲自下乡采购粮食。运回来，让伙计、学徒细磨细筛，仔细加工。粮食新，好吃，而售价又比较便宜，所以，顾客都愿意买大顺粮店的粮食。大顺粮店逐渐地发展起来，买房子兼并相邻的店铺，到了清末民初（1900——1915年）时，前边店堂已扩成四间大门面，后边有几十间房，一个大院子，伙计、学徒增至四五十人。由于买卖兴旺发

展，又为了扩大经营相继在崇文门外三转桥开办了合增米面油盐店，在东花市大街开办合增永油盐粮店，又与他人合资在崇文门外兴隆街开办合盛粮油店。

（二）改为米面油盐店

代理迟掌柜经营大顺粮店的是本柜学徒出身的王乐亭。这个人头脑灵活，善于经营，他接手后，就增加了油、盐、酱、醋、咸菜和青菜等日用商品，将粮店改为米面油盐店。

大顺经营的粮食有大米、小米、黄米、高粱米、伏地面、小米面、玉米面、荞麦面、黄米面、黄豆、红小豆、绿豆、黑豆、芝麻等。大顺的粮食除在本市粮食市购进粮食外，还派人去西北、东北和河北省一带粮食产地采购粮食。大顺后边设有磨房，请有磨倌专门负责碾磨粮食。大顺的磨倌是个磨面的好手，一般磨工磨面麸皮出的多，净面出的少。而这个磨倌磨面，多出净面少出麸，而且面又细又白。

大顺还请了位磨香油的师傅。这位磨油师傅手艺好，同样分量的芝麻他磨的香油既香出油又多。磨香油最重要工序是炒芝麻，火旺芝麻炒老了，不仅出油少而且没香味，腻人。火小了芝麻炒得嫩，虽然可以多出油，但是没香味。只有将火候掌握不旺不小，才能炒出香味四溢的好香油。大顺的磨油师傅善于观察火候，经他手炒出的芝麻磨出油和芝麻酱醇香好吃，很受顾客的欢迎。

大顺腌咸菜的“把式”也是有经验的好手。每年农历秋分节气后是大顺腌菜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忙，他们腌菜的品种既有一般居民常吃的腌雪里蕻、芥菜疙瘩、熟疙瘩、罗卜干，还有酱八宝菜等。

大顺米面油盐店的顾客很广泛，既有附近居民，也有饭庄、饭馆和店铺厨房到此办货。居民都是零星小买，可是大顺对做这些小买卖极为重视。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铜板币、纸币和银元同时在社会上流通。铜板币俗称铜子，一枚大铜子是20文，

1 枚小铜子是 10 文。5 个大铜子是 1 吊，四吊六，即 23 个大铜子兑 1 角钱纸币，46 吊，即 230 个大铜子兑 1 元钱。当时经常有顾客拿一个大铜子要买两三样东西，遇见这样的小买卖大顺的伙计也一点不慢待，热情接待。大顺的店规是店伙、学徒不管有理还是没理都不能与顾客顶嘴吵架，如发现不守店规与顾客争吵，第一次训斥，第二次就辞退。由于大顺待客热情，买卖很兴隆。大顺与饭庄、饭馆和一般店铺交买卖都是先用米面油盐等货物，赊销记账，年终结账付款。

（三）撤点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大顺的买卖日趋萧条。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他们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到处疯狂掠夺物资，特别是粮油等都被日本侵略者控制起来。所以，市场上米面油极匮乏。到了 1939 年，北平就发生了粮荒和油荒，日伪政权对北平居民实行按人口配给制。1940 年各粮店遵日伪政权之令，向居民出售用麸皮和发霉的粮食混合磨制而成的“混合面”。大顺也磨制这种混合面卖给居民。

此时由于粮食奇缺，粮店没有粮食卖，造成众多粮店纷纷倒闭。大顺虽然也没有粮食可卖，但是它尚有盐、酱、咸菜、青菜等销售，所以，还可维持营业。

1945 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市场上粮食有所增加，价格回落。1947 年内战爆发，粮食价格又继续暴涨。这段时间，大顺生意依然不景气。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6 年大顺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 年在调整商业网点时与其他店铺合并，大顺字号撤销。

十、王四海家庭包办酒席的兴衰

王四海家庭包办酒席在二三十年代，曾享名一时，为北京南城一带知名度很高的家庭菜馆。

王四海家庭菜馆在崇文门外茶食胡同，后迁至南侧的河泊厂。王四海 14 岁拜北京茶房李师傅为师，学会了摆桌上菜和做蜜饯水

果、八宝饭的手艺。后来又跟北京四大名厨之一的贾厨学烹调的手艺。贾厨不仅煎、炒、烹、炸火候掌握得好，做出的菜色、香、味各具特色，而且刀工也讲究。他切的肉和青菜，大小、薄厚都相当匀整。分量掌握也准确，投料不用秤，只凭手抓，想抓多少，准抓多少，不差分毫。王四海学习很下功夫，贾厨的本领都让他学去了。

清末的北京各大饭庄，不仅在饭庄内承应喜庆宴会，而且也外出包办酒席。到了民国年间，一些大饭庄的名厨，办了多赚钱而辞柜，去做承包酒席的买卖。像当时有名的黄厨、刘厨、张厨以及王四海的师傅贾厨等，都是受欢迎的家庭承包酒席者。张厨专做戏曲界的买卖，刘厨主要承包政府官员的宴会，黄、贾二厨多应大商人的喜庆宴席。王四海这时已是贾厨的主要帮手，掌勺、切菜、端菜摆桌都干。20年代初，贾厨病故。不久，王四海自己干起了包办酒席的生意。开始，生意很不景气，不用说平日没人订酒席，就是最忙的“大好日子”他也没买卖。但王四海没灰心。一次，经朋友介绍他应了一户为孩子办“洗三”的十桌酒席。这家是北京有名的大盐商，交际广，认识人多。王四海知道要是将这号买卖做好了，就会打开局面。所以，王四海下大力气要把这号买卖做得像个样。没资本就去借钱，炊具不够，就去租。到日子，王四海自己掌勺，并请来几个很得力的伙计帮忙。北京的习俗，过去孩子洗三，往贺者都是女客。女人喜欢吃清淡、外观漂亮的菜肴。王四海投其所好，头一道菜，先上了四碟鲜果：一碟削成荷花状的苹果，一碟蜜饯红果，一碟削成菊花形的荸荠，一碟蜜饯海棠。随着上了一壶绍兴酒、一壶红葡萄酒。这四碟果品，不仅香甜可口，而且色彩缤纷十分好看。满桌女客赞不绝口。第二道菜是四盘炒菜，炒虾仁、滑溜里脊、溜鲜蘑、溜鱼片。这第二道菜也很对女客的口味。尤其对炒虾仁和溜鲜蘑齐声喝彩。第三道是大菜，黄焖鸡、糖醋鱼、清蒸鸭、四喜丸子。最后是一个

烩海参。王四海这次买卖，不赔不赚，可是却赢得了主人和客人一致好评。从此以后，上王四海家订酒席的雇主日渐多起来。后来，前门大街、东四、西单等地一带的商家、富户办事都愿意订王四海的酒席。

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王四海包办酒席的生意很是兴盛，他的名字同行里无人不知。这时期，经常有五六个手艺好的厨工长期给他帮工。他还专从江西景德镇订做了20桌带有“四海”字样的蓝花瓷器。铁锅、炒勺都用广兴的“二道线”产品。各种调料都有专门店铺供应。鸡鸭由便宜坊送，猪肉专门从东四牌楼的肉市进货。燕窝、银耳、海味等由前门外通三益定期供应。王四海包办酒席，选料精，不用次货；做工细，讲究刀工、火候；饭菜做得色、香、味俱佳。平日里，为老人祝寿，为孩子办洗三、满月来他家订两三桌酒席的不断。遇到娶媳妇、聘姑娘办事人家多时的“好日子”，王四海就应接不暇了。

王四海的生意兴盛了，但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平。从此以后，北平的各行各业一片萧条。尤其是饮食业更是一蹶不振。北平有名的大饭庄、饭馆——天寿堂、福寿堂、庆和堂、便宜坊、春元楼等不是关张歇业，就是奄奄一息、苟延残喘。因为日伪对粮油鱼肉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大饭庄、大饭馆的买卖都无法维持，像王四海这样家庭包办酒席的生意就更不好做了。由于物价不断暴涨，进货成了困难。“七·七”前，一袋“福兴”牌或“兵船”牌、“炮车”牌白面（一袋40斤）约2元。到了1940年1斤白面就涨到2元。战前，猪肉（带骨肉）1元7斤，1940年涨到3元1斤；普通白酒1元3斤涨到4元1斤。此外，煤柴也涨了几十倍。由于物价一天一个行情，王四海也不好应买卖。今天应了，明天物价涨了，应的买卖也就赔了。还有，王四海的主要顾客是商人。商业大多数生意不振，所以，办事订酒席的人就寥寥无几。因为没有买卖，王四

海的伙计，有的去摆烟摊，有的去拉洋车，有的去跑小市买卖破烂。王四海为了生计，开始把铜锡炊具拿到当铺去典当。可是到期没钱赎，又去“小押”卖当票。日子一长，当卖全空。没办法，王四海和他的妻子分头串亲戚投朋友蹭饭吃，今天在这家蹭一顿，明天那家蹭一顿。当时哪家也不宽裕，让他们吃一次两次，第三次人家就不让吃了。王四海的两个孩子去拉洋车混日子。后来，王四海沿街乞讨。1940 年冬，王四海身上无衣，肚中无食在一个纷纷扬扬的大风雪天中，他绝望地投井自杀了。

在北平兴盛一时的王四海家庭包办酒席菜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而家破人亡。

第四章 花市大街地区

第一节 花市大街的沿革

一、明代称神木厂大街

东花市大街和西花市大街，过去统称花市大街或花儿市。这条街是北京历史悠久的街道，也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花市大街在明朝时，叫神木厂大街。据明代人张爵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崇北坊”里有“神木厂大街”的地名。入清后才改称“花市大街”。

关于“神木”和“神木厂”的设置史书上有记载。据《明史》记载：明朱棣即位，计划将都城定在北京。因此，永乐四年（1406 年），“帝将营北京，命礼取材川蜀。礼伐山通道，奏言，得大木数株，皆寻丈。一夕，自出谷中抵江上，声如雷，不偃一草”。这种讨好皇帝，谎报奏章，使朱棣非常高兴。“天子以为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而后把这几株大木也当神一样供奉起来。俟北京城建成后，于永乐二十年（1422 年），在文明门（崇文门）外建神木厂，将几株大木放置此处。因为神木厂在此，故此街就叫“神木厂大街”。

时至清代，清政府把神木厂的几株“神木”移至广渠门外。在乾隆十五年（1750 年）《乾隆京师全图》上，神木厂改称“花儿市街”。这说明神木厂最晚在乾隆十五年时就改叫“花儿市街”了

二、热闹的花市集

神木厂大街为什么改叫花儿市街？在明末清初时，在花儿市街附近居住着许多以做纸花、绢花为业的家庭小手工业者。他们有的一个人干活，妻子一边带孩子做饭，一边帮助丈夫做下手活。有的雇用一二个学徒或伙计，有的外发加工活，而后加工组成全花。这些做纸花、绢花的小手工业者，因为住家都离神木厂大街附近，所以，他们每天早上都到神木厂大街设摊卖花，日子一长就成了个“花市”。据《燕京岁时记》一书记载：“所谓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花有通草、绫绢、绰枝、摔头之类，颇能混真。”

在花市和花儿市街形成、出现后，后来又出现了个“花市集”。据《宸垣识略》记载：“火神庙在花儿市，明隆庆二年建，为神木厂悟元观下院，有万历间右通政李琦碑。本朝乾隆四十一年重修。每月逢四日，自庙前至西口开市。”“每月逢四”是农历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日，火神庙开庙时，有庙市。在庙市上，有卖农具的、卖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卖土布的、卖鞋帽的、卖各种风味小吃的等小贩都来摆摊卖货，游人也多，十分热闹。这种每月逢四的花市集，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北京的解放前夕。清末民初时，花市集发展到其鼎盛时期，一是范围扩大了，每逢花市集时，整条花儿市大街都摆满了各种货摊。二是在花儿市街东段增辟出鸟儿市和鸽子市。像麻雀、黄鸟、点子、玉翅、凤头等鸟、鸽在市上买卖。在花儿市街西段，小巷黄家店处出现卖鲜花的。三是每年从农历腊月十四日起，就“连集”了。就是从腊月十四日起，至腊月三十日，天天有集。这是花儿市街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因为每年一进腊月，就快到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迎接新年，都在准备过新年的年货。花市连集，除去平日集上的货摊外，此时就添上了卖年画和卖春联及其他年货的货摊了。游人一天比一天多，最热闹、游人最多的时候，真是摩肩接踵，拥

挤不堪。

三、花市大街的店铺

以上说的是花儿市街上的集市情况，集市上的货摊都是开集时摆上，收集时就散去了。关于花儿市街上的店铺，也是从无到有，逐渐地多起来的。特别是在清初时，内城的灯市散去后，花儿市街上的店铺就多了起来。据《宸垣识略》书中记："灯市向在东安门，今散置正阳门外及花儿市、琉璃厂、猪市、菜市诸处"。花儿市街上店铺最多，商业最繁盛时期，是从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趋于衰败了。

民国年间至北京解放前，花市大街及其他附近地区店铺有鸿业、启元、张玉元等茶庄，德兴、福源长等干果店，通泉、南义泉等线店，恒源、泉成等纸店，聚兴隆、谦益隆、协成升、庆和隆、广源祥、纶昌、庆春和等布店，兴隆、东明祥、泰来栈等布百货店，庆福斋、裕顺斋等饽饽铺，上义栈、鸿远栈等瓷铁庄，双天成、双大成、双天盛、天元成等烟袋铺，天合成、万元号等绒线铺，全聚、毓成、义信、德元声等首饰楼，德寿堂、济生堂、沛仁堂等药铺，英秀斋、新隆、玉珍斋等钟表店，大有蔚油坊，畅怡园澡堂，青山居、三友轩和蒋家书茶馆等。

第二节　著名老字号

一、鸿业和启元茶庄

鸿业茶庄和启元茶庄是北京南城两个先后有名的大茶庄，这两个茶庄都坐落在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西头路北。鸿业茶庄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失火后，无力复业倒闭，后铺底倒给天津启元茶庄。1941 年天津启元茶庄在鸿业茶庄的旧址开办分店——北京启元茶庄。

（一）鸿业茶庄

鸿业茶庄开张后，以销售茉莉花茶和珠兰花茶为主，而且多是一般价钱低廉的茶叶。

北京人历来喜欢喝茶，社会上层人士爱喝茶，下层之人也有天天喝茶之好。崇文门外花市一带店铺众多，商业繁茂，但顾客大多是北京东南城郊之手工业者、农民和一般劳动大众，这些人都喝低档的花茶或茶叶末。鸿业茶庄经营者根据花市一带的顾客特点，就多准备中、下等的茶叶在门市销售。在民国年间，鸿业茶庄的"高末"是极受一般劳动大众欢迎的。高末是高级茶叶末的简称。

过去北京的茶庄分两类，一类是派人去江南产茶区直接办货，另一类是从当地或天津的茶商手中进货，鸿业茶庄属于第二类。鸿业茶庄门市销售不仅一贯是薄利多销，而且店堂内设有饮茶桌，顾客可以坐在店堂内一边歇息，一边品茶解渴。这种作法特别是对远道而来的顾客和体力劳动的赶车人或拉车人都是极大的方便。鸿业茶庄零整都卖，三斤五斤卖，一两分成十小包的，买一包的也卖。当时的北京居民习惯买小包茶叶，不仅那些提笼架鸟之人到鸿业茶庄买一小包"高末"以便去茶馆里沏茶喝，拉车和作小买卖的买一小包茶叶回家喝，而且就连那店铺掌柜和中等人家到鸿业茶庄买二三斤茶叶也都要小包茶叶。过去居民家中都有瓷茶碗，里边放的都是小包茶叶。所以，鸿业茶庄的后柜整天有几个学徒包小包茶叶，以供应前柜销售。

鸿业茶庄自开业至 1937 年"七・七事变"前，生意一直很红火。但北平沦陷后，南方茶叶货源紧缺，货价上涨，买卖不好作，生意萧条，1940 年冬季不幸又遭火灾，因而无力复业，经中人介绍将残存的店房及一些货物家什卖与了天津启元茶庄经理卞敬涵。

（二）启元茶庄

卞敬涵将鸿业茶庄的铺底倒过来后，经过房屋整修，筹备就

绪，遂于1941年开业，取名“天津启元茶庄”。正经理是任润田，副经理是刘润波。

启元茶庄的资本雄厚，徒弟、伙计也多，约有60多人。各种茶叶由天津总号供应，物源充足。任润田和刘润波又善于经营管理，所以，启元茶庄自开业后，始终兴旺不衰。

任润田和刘润波在经营管理启元茶庄上很有办法。在当时的旧店铺中，启元的学徒和伙计的人数不算少了，可是他们管理有序。全店分前店售货柜，简称“前柜”，后店拼配柜，简称“后柜”。管金钱的称“账房”。前柜的负责人称前柜掌柜，后柜负责人称后柜掌柜，账房负责人称账房先生。这是当年启元茶庄的三大职能部门，他们各负其责。

前柜既负责门市零售，也负责“跑外”去推销茶叶。门市招待顾客，启元茶庄的店规很严，站柜台的人必须梳洗干净，穿长衫纽扣整紧，对待顾客有礼貌。清闲时可以坐下休息，但是，顾客进门必须立即站起笑脸相迎。“跑外”的伙计出去推销茶叶时，也要梳洗干净，穿上长衣才可以。

后柜既负责茶叶的拼配、包小包茶叶，也负责向天津总号要货。拼配是将从天津总号运来的茶叶进行分类，该用茉莉花提味的就提味。一般的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包小包茶叶的活最累，他们有的裁纸，有的用木版印刷，有的就包包。

前柜卖货很重要，后柜虽然不直接接待顾客，但是茶叶的味道好坏，颜色正不正，顾客欢迎不欢迎，后柜起着关键性作用。此外，后柜还要源源不断地供应货源。

账房先生虽然只是一个人，但是他控制着启元茶庄的经济命脉，每天的售货金额和进货付款都经账房之手。此外，库存和伙房的事也由账房先生经管。

在门市经营方面，他在继承原鸿业茶庄薄利多销、以销售“高末”等大众化茶叶为主的经营方针外，还努力创出启元茶叶条

匀、色淡、味浓、口脆的独特特色。而且增添上绿茶、乌龙茶等上等茶叶，以满足社会各方面不同顾客的需要。并且派“跑外”的伙计向全市各大小戏园、电影院、浴池、茶馆、杂货店等开拓市场，推销小包茶叶。

任润田和刘润波会用人，不仅是人尽其才，而且还善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启元在花市大街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都开集市，游人多买卖忙。每逢花市和年节时，启元都吃犒劳，每天两顿饭都是白面炖粉条肉，就是平日伙食也不错。当年启元茶庄学徒没有工钱，伙计月工钱也不多。住宿和伙食启元免费供应。工钱虽不多，但伙食比别家店铺好，自然学徒、伙计就愿意出力干活。

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启元茶庄参加了公私合营，成了国营企业。现在已成为北京南城茶叶行仅有的老字号之一。

二、协成生布店

协成生布店位于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它是由河北饶阳人李姓出资8000银元，刘雅如领东于民国初年（1912——1914年）开办的。当时有职工20多人，后增至近百人。最初主要经营装粮食的口袋、被套和马褡子（农民肩上放的布口袋）及土白布等商品。后来，发展成为花素布匹，洋布土布，丝织绸缎等商品齐全的有名的大布店。

（一）经营有方

协成生布店的东家、掌柜刘雅如和伙计、学徒都是河北省饶阳、献县、蠡县和肃宁县一带的人，在布行中属河北派。

协成生所以能发展成为有名的大布店，是它的经营有方。概括地说，是货色齐全，质量上等，和气待客，方便顾客等。协成生进货，既有河北高阳的白布、市布、标布、双葛丝，山东昌邑的蓝白布、塞子布和大庄布，北京的爱国布，湖南和江西的夏布等，还有日本和欧洲各国进口的花素洋布。既有苏州、杭州的丝

绸纱罗，还有进口的呢绒等洋货。协成生进货不怕价钱高也要进上等产品。他们有专人常驻外地收购各种布匹。并且直接从工厂订货。协成生讲究做买卖要“和气生财”，顾客进门不论买多买少；买与不买都是热情接待。过去，协成生店堂里没有拦柜，摆着八仙桌和椅子，各种花素布匹和绸缎都整齐摆放在四周的货架上。顾客进门，站柜的伙计主动的笑脸相迎，向顾客打招呼，请顾客坐下，学徒的献茶、点烟。而后才问，您打算用点什么，做衣裳还是做被褥？顾客看商品由学徒的给取来请挑选，不合适再让学徒的去取。不管顾客挑选多少次，伙计都是和颜悦色，不许露一点不耐烦。顾客买与不买，走时伙计都要送到店门口，并说，您下次来。协成生做买卖一切都给顾客提供方便，从营业时间上，太阳一出来就开店门，晚10点才关店门。遇顾客买得多或是老主顾协成生都可派学徒送货到家。

协成生虽不是每种商品都标明价钱，但是他们店堂中挂着一块“商品行情”牌，在上面将店中的主要商品都写明每尺价钱。此外，他们在货品上都系着一小布条，上写着只有本店人才知道的“暗码”。这个暗码是“春暖观鱼跃秋高听鹿鸣”，春是一，暖是二，观是三，鱼是四，跃是五，秋是六，高是七，听是八，鹿是九，鸣是十。如每尺一角二分八，就写“春暖听”三字，每尺六分三，就写“秋观”二字。协成生用暗码标价，是防同行业者来刺探商情，这是商战的一种手段。

用“老尺加一”拉买卖。协成生做买卖向来是童叟无欺，言无二价，但是为了多做买卖拉主顾，使顾客感觉协成生的布便宜，就用“老尺加一”的办法卖布。过去北京有“老尺”和“新尺”之分，老尺比新尺稍大些，他们卖布不仅用老尺，还每十尺加放一尺。顾客花十尺的钱，在协成生能买十一尺布。

协成生很讲究做买卖，经研究顾客心理，物美价廉是当年顾客买东西的共同心理。协成生掌握这种心理就将普通白布每尺的

售价，定的比市价稍低，所以，顾客都说协成生的布便宜。实际上那些紧俏货还比别家贵呢。

（二）管理得法

协成生布店的买卖越做越好，也和它的管理得法有关。协成生布店到了三四十年代，全店职工已增至近百人。协成生的股东李家在店中没有任何职务，平日也不过问店中之事。掌柜刘雅如负责管理协成生的全部事务，人事任免，财政支出和收入都由刘雅如管理。只在每年农历年底结账后，刘雅如才亲自向股东李家交阅店中的账簿。店中除刘雅如这个全权的大掌柜外，还有管人事和杂务，管采购，管“跑外”推销，管门市销售等几个部门的掌柜。刘雅如和这几个掌柜在协成生都吃“人力股”。就是根据每人吃股多少，年终结算后分红利。

协成生的一般职工每月的工资很微薄，到年终“说官话”时，可得到一部分“馈赠”。说官话是过去店铺管理的方法，掌柜刘雅如和其他掌柜在年终分头找职工、学徒个别谈话，总结他们一年的工作情况，好的表扬，缺点错误批评，并给“馈赠”。但是，每年说官话时，有的就高兴，有的就悲忧。因为按店铺规矩，协成生在说官话时，也是辞退职工和学徒的时候。另外，职工要打算离开协成生也在说官话时向掌柜提出。

协成生布店的职工包括掌柜在内，都宿在店中。食、宿、洗澡、理发都出店中之账，职工不用花钱。平日没有假日，职工每年有两个月的回乡探亲假，学徒在学徒期间不能享受，只有徒满后才能回家休息。

（三）撤点停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协成生布店在人民政府“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推动下，生意继续兴盛。但在50年代，由于政府需要这个地方，协成生撤点停业。

三、德寿堂牛黄解毒丸

过去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不论在报纸上、电台广播上，还是在各大戏院舞台的守旧（大幕）上，都有"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的字样。当时，"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一）康伯卿创办德寿堂药铺

康伯卿字印寿号旭东，北京东郊半壁店人。家中务农，他父亲时只有两三亩土地，养着他们弟兄、姊妹 7 人。农民的孩子能够进城找个店铺学徒，在当时来说是个最好的出路了。康伯卿十五六岁时，经人介绍进西单怀仁堂学徒。他在怀仁堂里先学切制饮片，后学炮制丸散膏丹的手艺，并习字读药书。药铺里的活计，不论后柜炮制，还是前店抓方剂售药，他是全都精通。

康伯卿于民国五六年（1916——1917 年），离开怀仁堂，在崇文门外下唐刀胡同家中，在家人帮助下，自己炮制万应锭、眼药棍、七珍丹、暖脐膏等小成药。前门和崇文门外客店多，康伯卿白天不是去药栈进药材，就是在家里带着家人制药，傍晚挟个布包，内放各种成药样品，串客店推销。由于康伯卿炮制的各种成药成本低，疗效好，价格低廉，深受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康伯卿的生意十分兴旺。买卖干到民国九年（1920 年），康伯卿已经积累下一些资本，为了扩大营业，他在崇文门外南小市口路西租下四间房，正式挂出"德寿堂药铺"牌匾。

（二）康氏牛黄解毒丸享誉各地

德寿堂药铺开业后，一面营业，一面潜心研制新产品。康伯卿根据人们经常患风火牙疼、暴发火眼、口舌生疮、嗓子疼痛等疾病，这些虽然是常见的小病，但是，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痛苦。而且当时社会上专治这些疾病的药品又不多，疗效又不好。因此，康伯卿请来好友中医师吴鸿溪帮助他研制新药。他们查药书，研究药性，最后选用：牛黄、黄芩、大黄、薄荷、桔梗、防风、雄黄、

赤芍、冰片、甘草等主要成分，研制出清热解毒，祛火化痰，通便润肠的牛黄解毒丸来。

德寿堂的康氏牛黄解毒丸所以疗效高，不仅是其配方合理，而且还由于他们选料精良，炮制讲究。用来炮制牛黄解毒丸的原料都是经过仔细筛选，次料一律不用；炮制必遵古法。制成的牛黄解毒丸都呈微红色。每丸重一钱，外吊蜡皮，上写朱砂色的“德寿堂”、“牛黄解毒丸”金戳字样。

康伯卿极重视广告宣传，在报纸上登广告，在电台上做广播宣传。派专人到处张贴广告传单，并且在三庆、华乐、广和、广德、开明、吉祥等各戏院做广告。在戏衣庄为戏院定绣有“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字样的舞台后幕。戏院悬挂此后幕，不仅不用出资购买，而且还得到德寿堂一笔酬谢金。所以，都愿意用后幕为德寿堂做宣传。此外，德寿堂还在有轨电车上张贴广告。德寿堂利用一切能做广告的地方大做广告宣传，在人群聚集之处，都可见到“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字样。

德寿堂的牛黄解毒丸在本市销是少量的，像京张线上的南口、康庄、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京汉线上的保定、正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京太线上的太原，京山线上的沈阳等地销售为大宗。开始德寿堂发往各地的牛黄解毒丸都是以代销为主，就是各代销点先卖货，后结算付款。后来因为货物畅销，所以，各地都争先付款定货。在民国年间，德寿堂的牛黄解毒丸年产量几万盒（每盒 10 丸）。仅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药王诞辰日）四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德寿堂大减价，八折收费，每天都售出万盒以上。

（三）从德寿堂的大发展到衰败

德寿堂药铺在门市是“汤剂饮片，丸散膏丹”都经营，但是使其大发展的是牛黄解毒丸的力量，1922 年，在下唐刀胡同两个院落设立炮制生产厂，伙友有 30 多人。民国十七年（1928 年），在

崇文门外花市东大街路北开办德寿堂药铺东号。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南小市口路东设石印局，以便印制药方、宣传品等物。同年，又在铁辘轳把（今花市东大街）设薄荷脑提炼厂。在广渠门外设养鹿场，养鹿以供提取鹿茸使用。两年后，又在养鹿场中另建植物园和温室，栽培各种药材为药铺提供采摘鲜药之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又在和平门外虎坊桥路北开设第二个分店——德寿堂药铺南号。与此同时，康伯卿还在东四、花市、广安门大街、下宝庆等处购买房屋设库房，建工友宿舍等。

在康伯卿的计划中，他还打算在东四或鼓楼一带商业繁华区开德寿堂北号，在西单或西四一带闹市开德寿堂西号。但是，还没等此计划实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后，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各地交通受阻，德寿堂与外地客户失去联系，客户货款汇不来，德寿堂的货物寄不出去，买卖受到极大的影响，生意一落千丈，营业年年亏损。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祖国光复，但是又爆发了国内战争，物价依然不断暴涨，德寿堂生意不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工商业又兴旺起来，德寿堂药铺也开始转机，买卖兴隆起来。1956年，三号德寿堂同时参加公私合营。1958年全市调整商业网点，德寿堂总号和东号都撤点，只留下南号一店。

四、“沙窝门焦排叉”

裕顺斋糕点铺原叫裕顺斋饽饽铺，是信德利于清光绪十四——十七年间（1888——1891年）开办的，铺址在广渠门大街（现名广渠门南小街）路南。该铺是前店销售后案制作，以生产北方人爱吃的满汉饽饽为主，特别是该铺生产的炸焦排叉为社会称道，都叫它为“沙窝门（广渠门俗称）焦排叉”。清末民国年间，“沙窝门焦排叉”名扬全城。

（一）信德利开办裕顺斋

信德利是直隶大兴县广渠门外人，家中务农。在信德利十四五岁时经亲戚介绍到东四牌楼的东聚庆斋饽饽铺学徒。出徒后，就在北京各饽饽铺耍手艺（干活）。信德利为人聪明、能干、手艺好，又爱交朋友。后来，广渠门内大街路南，德成当铺东邻一小杂货铺买卖做赔了想往出倒铺底（卖店铺及家具）。信德利看中了这个地方，在朋友帮助下，就将这小杂货铺买了过来。又经筹备，于光绪十四——十七年间，一个吉利日开张了。当时开张时，只有三四个人，请来了一位掌案（制作饽饽的头目人），带两三徒弟干活。前店卖货由信德利带一个徒弟应酬顾客。

（二）裕顺斋的饽饽物美价廉

裕顺斋地处北京东南城偏僻的广渠门，这一带城里城外居民多是工、农劳动大众。信德利看准了当地的商情，所以，他开的饽饽铺以生产物美价廉的大众化的饽饽为主。裕顺斋开业后生产和经售的饽饽品种有套环、江米条、缸炉、核桃酥、燎火、芙蓉糕、鸡蛋糕、喇嘛糕、喇嘛卷糕、绿豆糕、蜂糕、水晶糕、金钱饼、玫瑰饼、藤罗饼、五毒饼、龙凤饼、自来红、自来白、碗豆黄、炸焦排叉、关东糖、糖瓜、南糖、蜜供和酥皮饽饽等普通大众化饽饽，像大、小细八件，裕顺斋虽然销售的很少，但他们也准备。

裕顺斋很重视饽饽的质量，一是材料真实，面、香油、糖和其他瓜子、芝麻、核桃、枣等辅料都选购上等货，次货不要。二是投料足，各种材料搭配合理。三是制作考究。所以，裕顺斋制作的饽饽外观漂亮，味道咸、甜适度、香美。而且售价比别家便宜。因此，广大顾客都喜欢买裕顺斋的物美价廉的饽饽，日久，裕顺斋三个字传遍全城。

（三）裕顺斋的焦排叉和饽饽会

焦排叉是北京很普通的小食品，当年人人爱吃，生产者也多，不仅饽饽铺生产，就连烧饼小铺、街头炸油饼的小贩也做焦排叉。

就在众多生产者、经营者中裕顺斋却做出了名，创出了“沙窝门焦排叉”这块牌子。裕顺斋创这块牌子就是用“物美价廉”创出来的，为广大顾客所公认。首先是物美，他们生产焦排叉一定选用上等好白面，一斤面掺一两芝麻、二两香油加清水和面，下热油锅炸至焦黄透明出锅。这种焦排叉外观油光漂亮，入口香甜焦脆，而且放几天也不皮软，味道与众不同。当年大多数工农大众都爱吃“沙窝门焦排叉”。后来就连富家大户也常吃它。裕顺斋的“沙窝门焦排叉”不仅畅销北京南城各处，北城人也经常吃它；不仅城里人买它，农村人更爱吃它。像当时大小酒缸、酒铺都代卖“沙窝门焦排叉”。小贩拎着篮子到处喊着“沙窝门焦排叉”。从民国年间，直至新中国建立初，“沙窝门焦排叉”始终畅销不衰。

裕顺斋的饽饽会也很受城乡人的欢迎。当年北京人每到年节祭日都有上供祭佛祖的习俗。祭祀佛祖需上供品，有钱人家的供品很丰盛，一般人家只准备一桌饽饽供即可。一桌饽饽供包括五碗自来红和自来白月饼，五座蜜供。购买饽饽供对富有人家不算大事，但是对于贫苦人家却是个大事。当时，裕顺斋掌柜已于1924年换上周子华。他善于动脑筋，看到有的饽饽铺用“供会”做了不少好买卖，于是他改叫“饽饽会”也吸引顾客参加。这种饽饽会就是顾客从农历二月起至十一月，每月交裕顺斋一定的钱，到腊月就可取走一桌供。这种方法极大的方便了顾客，人们踊跃参加。除东南城人外，大多数是广渠门和左安门外十里八乡的农村人。近的有分钟寺、虎城、沙板庄、八里庄、三间房、八棵杨树人，远的有唐家坟、王四营、高碑店、花闸、杨闸等地人。裕顺斋为了多做买卖，特派专人按月登门收钱，到腊月赶上大车按户送供，这样，参加饽饽会的人家更多了，裕顺斋的买卖兴隆一时。

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裕顺斋房屋已扩充为两间门面，后案和库房占一小院十几间房。全铺伙友在平时就有十几个人干活，每到农历十月后活忙时，临时上工十几人。前店除经常有两

三人待客卖货外，另有两三人专跑外取“饽饽会”的钱和送货。

（四）裕顺斋并入崇文食品厂

裕顺斋买卖做到“七·七事变”后，北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本对北京人民进行疯狂地掠夺，使北京各种物资匮乏，特别是饽饽行业使用的主料，面、油、糖等奇缺。又因工农大众生活困难，连吃饭都不好解决，更没有多余的钱买饽饽了。因此，裕顺斋的生意萧条，买卖亏本。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在人民政府扶植下，裕顺斋的营业有了转机。此时改叫裕顺斋糕点铺。1956 年加入公私合营，1958 年撤点并入崇文区食品厂中。

五、全聚首饰楼

崇文门外花市西大街的全聚首饰楼是创办于清光绪初年（1875——1878 年）的老店铺，股东有三家。自设溶化金银、打制首饰的作坊，由于该铺讲究信誉，金银首饰成色好，式样新，在北京南城一带极负盛名。

（一）全聚首饰楼是从“攒作”发展而来

过去在北京，打制、经营首饰的有两种，一种是设在花市、前门、东四和鼓楼等一带街市上有门脸，有牌匾的首饰楼，卖的是字号，货真价实。另一种是设在胡同、小巷里，没有门脸，没有字号的首饰作坊，俗叫“攒作”。这种攒作，打制的都是假金银首饰。以铜料做胎外镀金就是金首饰，镀银就是银首饰。他们经营的对象都是农村或城市集市庙会。全聚首饰楼最早的领东掌柜就是从“攒作”学出来的手艺，后来自己设作坊干起了买卖。找了一个小学徒帮忙，自己进料，自己打制，自己串店房向外地来京的老客推销。这个人做生意很实在，各种首饰活做得好，价钱还公道，而且做买卖讲信用。因此，拉了几个常主顾。

这几个常主顾一个是京东三河县人姓张，一个是京北昌平县人姓赵，另一个是京南大兴县人姓魏，这三个人都是专跑农村集

市、庙会贩卖假金银首饰和杂货的。手里攒下几个钱，共凑了200两白银交给这个领东掌柜在花市大街开了这号全聚首饰楼。

（二）既打制首饰也经营金银

全聚首饰楼分打制首饰的作坊和接待顾客的店铺两部分。作坊中，工匠们自己用坩锅溶化金、银，根据式样打制足金或足银的镯子、戒指、项链、耳环、簪子、百寿锁等首饰和器物。此外，更多的是打制包金首饰。为了取信于顾客，在每件首饰的背面都钻刻有“全聚”两字，足金首饰还钻刻有“足赤”两字，银首饰上钻刻“足银”两字。凡卖出去的金、银首饰，不管到什么时候，顾客发现成色不对都保退保换。全聚首饰楼的顾客一部分是前门和崇文门外一带的居民，另一部分是东南乡的农民。应的买卖大多数是男女青年婚配所用的金银首饰。因为北京婚配习俗，不论汉礼，还是满礼或者南礼都离不开首饰，富有者讲究买黄金首饰，中等人家用包金首饰，一般贫寒人家才用白银首饰。

民国年间（1912——1937年），全聚首饰楼生意最兴隆，一方面是当时结婚办事的人家多，另一方面是当时各派军阀不断地混战，北京时局不稳，物价不断上涨，人们手中不愿存纸币，都愿意将纸币换金银首饰。所以，包括全聚楼在内的首饰行生意都很兴盛。此外还因为当时全聚首饰楼的管事掌柜于子权善于经营，店铺中不仅打制经营金银首饰，还收售金、银，收买荒金。倒卖金、银比打制金银首饰出卖获利更丰。

全聚首饰楼在买卖兴盛时期，共有职工十一二个人。生活待遇比一般店铺好，学徒、店伙都吃店中的伙食，每天两顿饭，都是四个人一桌，有肉、有鱼，主食以白面为主，年节伙食更丰富。店伙每月工薪约十元钱（1937年前），年终分红多，有的一二百元，有的三四百元。于子权掌柜还规定，除学徒外凡是店中的伙计，不论年限长短，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路费在柜上支取。假期两个月，月薪照发。于子权用人是比较宽厚的，但是，他用的人，不

管是学徒、还是伙计都必须对柜上忠诚老实，“手脚干净”。就是不能有偷摸的行为。进店有可靠的中人做介绍。一旦发现行为不轨，轻者通知中人解雇，重者送官法办。

（三）全聚首饰楼结束营业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百业凋蔽，对全聚首饰楼生意影响不大。虽然居民受物价飞涨的影响，生活变清苦了，没有钱买首饰。但是全聚首饰楼仍能以倒买倒卖黄金和银元维持生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黄金和白银定为国家控制的物资，私人不能买卖交易，金店和首饰楼都在取缔之内。所以，不久全聚首饰楼将库存金银按市价上交国家，学徒和伙计由劳动部门另介绍职业，店铺营业就此结束。

六、英秀斋钟表店

钟表是人们计时所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陈列的最古的“广钟”，是我国明朝时期广州制造的。除广钟外，还有苏州产的“苏钟”，这两种钟产量极少，造价高，穷苦百姓是无缘使用的，只有皇族和少数贵族家中有。自古以来，广大的人民群众计时间，都是白天看太阳，夜晚看月亮和星星；有的也用点“鞭杆子香”计时；中等人家用“铜壶滴漏”计算时间。

外国钟表在北京市场上出现大约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因为在清朝嘉庆（1796——1820年在位）年间成书的《都门竹枝词》上，有一首是这样写的：“三针洋表最时兴，手里牛皮臂系鹰；拉手呵腰齐道好，相逢你老是通称”。这说明在清嘉庆时，洋表是个流行之物。到了清末民初时，我国山东省烟台造钟厂，生产出“和尚头”木楼座钟。稍后，上海昌明钟厂也生产出“昌明”座钟。洋表和座钟在使用时难免出现误差和机件损坏，所以钟表维修业就出现了。北京最晚在清末时就出现了以修理为主的钟表店。

（一）英秀斋钟表店开业

英秀斋坐落在崇文门外繁闹的集市——花市大街路南，是一个叫高荩臣钟表修理匠开办的。原来他是前门外鲜鱼口一家钟表店修表的工匠，手艺好，活很忙，但挣钱不多。他打算离开这个钟表店，自己去干。他发现花市这个地方游人、顾客众多，特别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集市时，除原有店铺外，街的两旁又摆满了各种货摊，买东西的顾客拥挤不堪。但是，这个热闹的地方只有一个钟表店。他打算在这里开个钟表店，托朋友找地方。恰巧在花市大街路南，清真寺西边一点，有个闲房。房子不大，前边只有一间门脸，是个桶子房，可作修理钟表的店铺。经中人介绍，就将房子租了过来。买了三四张桌子，几把椅子，就于民国初年开业了。取名“英秀斋钟表店”。

（二）英秀斋的业务管理

英秀斋刚开业时，高荩臣没有找伙计，只有一个学徒帮他做些杂活，升火、烧水、做饭等。在门市接的活，不管是表，还是钟都是高荩臣一人修。后来，收的活越来越多，一个人修不过来，就开始找工匠。在英秀斋最忙时，店中有伙计和学徒十来个人。

高荩臣对钟表店的管理，延用一般钟表店的办法，前边设“接修台”。开始高荩臣自己接活自己修，后来才请人做“接修”。接修是钟表店的重要骨干工匠，是店中钟表工的头儿。当接修的，不仅手艺好，别人修不了的，他能修；而且经验丰富，见识广，什么牌子表都认得。接修面对顾客接活。他接下的活交给工匠去修。工匠修好，再交给接修检查。经接修检查后，认为质量合格才能交给顾客。

英秀斋后边修理工匠，分“修表工”和“修钟工”两种工匠。一般情况，修表工的手艺都好，因为钟表店里的学徒，都是先学修大钟。一般都是师傅先给学徒一个大钟拆卸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都拆下来。会拆钟，再会用汽油洗干净每个零件，并学会盘钟条。最后才学将钟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学会修钟后，才能学

修表。修钟的工匠多是修表的技术差，简单的洗油活还行，难活就修不了啦。所以，不敢担当修表的活。

英秀斋雇用的工匠，不管修表的还是修钟的都没有固定月薪，而是根据每个人每个月干多少活，采取"三七"分成制。也就是一个月收入的活钱，减去配零件的成本费，英秀斋柜上留"七成"，工匠得"三成"。后来，英秀斋找来了接修的，接修的也是分成制，他是英秀斋每月总活钱的"三七"成分。工匠的伙食由英秀斋免费供应。每月初一、十五日和五月节、八月节、新年改善伙食，吃白面、炖肉、有酒喝，平日都是窝头、白菜。学徒在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间，除白吃饭外，没有工钱。到新年，掌柜只给能买一双鞋的"馈赠"钱。工匠没有固定休假日，根据自己的情况，想什么时候休息都可以。只要事先跟接修的打个招呼就行。英秀斋这种管理，对工匠来说，自由性大，柜上对工匠只是从经济上刺激工匠。干活挣钱，休息不干活没有钱。所以，一般都不愿意休息。

（三）英秀斋善修难活

北京在民国年间，时兴怀表。怀表从外形上分，有平面怀表和闷壳怀表两种。平面怀表是表蒙子外没有外盖，表盘外露，看时间方便。闷壳怀表表蒙子外加了个盖。将表蒙子闷在盖内，因此，称"闷壳"。闷壳怀表虽然比平面怀表厚、蠢，但坚固，表蒙子不容易打破。从机件构造分，有普通计时怀表，有"打簧表"两种。打簧表内装有一组计时的机件，另外还有一组打击发音、报时的机件。表壳上有个搬动器，一搬动"搬动器"表内就发出悦耳的敲打声响。一点，敲击一下；一点一刻，敲击一下后，再加上一下。从表壳分，有一般钢壳、银壳，还有金壳等几种。

在钟表修理业务中，最难修，最要手艺的是"打簧表"和"老、旧、破表"。因打簧表有两组机件，不容易修，手艺不好，没有经验修不了。老、旧、破表，不是油丝乱了，"摆尖"折弯，就

是轮齿缺少。修这种活必须是手艺精的工匠，才能行。英秀斋专收以上这种难修的表，只要别家钟表店修不了，英秀斋就应活。英秀斋在民国年间，修难修的表出了名。

英秀斋也经营一些商品，除配零件、表带、表链外，还卖“和尚头”、“飞马”牌木楼座钟、闹表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英秀斋加入了钟表合作社。其牌匾就撤掉了。

七、大有蔚油坊

大有蔚油坊过去是北京一家有名的大油坊，该油坊生产的小磨香油和芝麻酱以其质量优，香醇而不腻，为食者称道。大有蔚油坊是张万金于清光绪四年至八年（1878——1882年）在北京东郊（原河北省通州）三间房开办的，后迁至崇文门外北河漕胡同路西。

（一）油坊开业

张万金十四五岁就在通州一家油坊学徒。满徒后在一些油坊里帮工要手艺，由于张万金手艺高，眼力善于观察芝麻成色与油质好坏和掌握炉火的火候，所以，他经手生产出的香油颜色正、清亮、味香而久存不变。又由于他为人老实，办事认真，在同行中人缘好。因此，有几个同行朋友约他办个油坊，大约在1878年至1882年大有蔚油坊就开业了。当时大有蔚油坊只有资本1000两银子，三间房（地名）一个小院，伙计、学徒四五个人。开业后生意很好，不久，就在东郊一带有些小名气。

但是，三间房不过是北京朝阳门至通州大路上一个小镇，与人口众多，商业繁华的北京城无法比。所以，就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从三间房迁到北河漕胡同新址。新址很宽敞，前后有3层院子，40多间房。账房、库房、炼油房、磨房、牲口棚和扬晾芝麻等都在这3层院子里。

（二）选料真、生产讲究

大有蔚油坊生产的香油和芝麻酱等最讲究精选、工艺认真。生产香油、芝麻酱主要原料是芝麻，一般油坊用的芝麻都是价钱便宜的普通芝麻，大有蔚油坊专门选用产于河北省永定河畔的固安县一带的白芝麻，这种白芝麻色泽发白，皮薄含油量高。每年秋收季节，大有蔚都派人去收购。大有蔚油坊先让学徒将芝麻过筛子并用净水冲洗一遍，而后将洗干净的芝麻入锅炒。炒芝麻是极为重要的一道工序，火小炒嫩了出油多，可是油没香味；火大炒老了出油少，影响产量而且油腻人；只有掌握住火候，芝麻炒得合适才能磨出清香的好香油。正因为炒芝麻很重要，既有关香油的产量和质量，所以，大有蔚油坊都不惜重金聘请有经验的师傅掌火候炒芝麻。芝麻炒完后，必须要将热芝麻风干风凉，在院中用柳条簸箕扬芝麻，用微风将芝麻吹干吹凉。大有蔚油坊磨芝麻是用牲口拉的细石小磨，这种磨磨出的香油清澈、醇香。最后是将浆糊状芝麻酱放入大铁锅中，用水煮炼。边煮边用长柄大铜锤在锅中捣榨。并且随大铜勺将上面的油舀出。油下面就是芝麻酱，最底层是酱渣子。

（三）北京有名的大油坊

大有蔚油坊生产的香油和芝麻酱主要以批发为主，门市零售是少量的。大有蔚专有两三个伙计跑“油市”和各家用油户推销。过去北京前门外东大市临襄会馆内设有“油酒市”。每月农历逢初二、十二、二十二，初四、十四、二十四，初六、十六、二十六，初八、十八、二十八，初十、二十、三十日开市。全北京的各油坊、酒店等都到此设摊售货。各油盐店、杂货铺、中药铺、造胰厂等用油酒之户都到此市订货办货。有些外埠油酒商也到此市办货。每逢开市之日，大有蔚跑市伙计跟着管事掌柜携带香油、芝麻酱样品在市上与买货人谈生意，看样品讲价钱订货。大有蔚的大宗买卖都在这个市上成交。买大有蔚香油都是些老主顾，像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庆仁堂药店和城郊及河北省、察哈尔、山

西等地的油商大多买大有蔚的香油。此外，本城一些小油盐店、饭庄、饭馆和富家大户也是大有蔚的常主顾，从大有蔚进香油和芝麻酱。1937 年“七·七事变”前，北平的物价平稳，大有蔚与老主顾交买卖都是先送货，到年节算账收款。

大有蔚生意鼎盛时期是在 1912 年至 1937 年这 20 多年间，当时大有蔚有伙计、学徒 30 多人。除掌柜、账房记账先生和跑外的几人外，余下的人都干活。大有蔚收学徒都在农历新正元宵节前后，到大有蔚学徒一般都是身体强壮的十四五岁的孩子。因为油坊里没有轻活，不是搬运芝麻口袋，就是在磨房里赶牲口磨芝麻。学徒期限是两年零一节，比一般店铺要短。大有蔚管住、管吃，没有工钱，到年终能得到一二块钱的“送钱”。满徒后与其他伙计一样，每月挣工钱六七块钱。干炒芝麻活的能挣八九块钱。伙计在年终可得“馈赠”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不等。管账先生、跑外的和经管生产的头头都在大有蔚吃“人力股”。也就是按年终结账，盈利多少分给“人力股”红利。赚钱多，分红利就多；赚钱少分红利就少；不赚钱或赔钱就不分钱。

大有蔚油坊在二三十年代，月生产香油都在 3 万多斤，芝麻酱五六千斤，当时是北京有名的大油坊。

（四）衰败又兴起

但是，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大有蔚的生产、营业一落千丈。日本侵略者为了其在华侵略战争的需要，疯狂地掠夺华北各地的物资，特别是对粮油等军事和人民生活必需之物资更加疯狂地掠夺。因此，粮油物资奇缺。1939 年，北平发生了油荒，大有蔚的多少存货也被抢购一空，又由于原料芝麻缺货，北京四大粮市上全都没货。大有蔚最终在 1940 年被迫关门歇业。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大有蔚油坊之原股东师廷秀筹资恢复了大有蔚的营业，1952 年改名“大有余油坊”。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后并入新街口油厂中。从此，大有蔚油坊终止了其店史。

八、天合成绒线铺

闻名北京的天合成绒线铺坐落在西花市大街路北，开业于清光绪三年（1877 年）。它经营的针、线、胰子（肥皂）、碱、梳头油等妇女生活所需用品，样样俱全，而且货真价实。售货员的服务态度好，不怕麻烦，一文钱的生意也做。因此，城乡顾客都喜欢到天合成买东西。顾客中有南城的，也有北城的，有城区的，也有农村的。由于天合成绒线铺门前挂着个大烟袋锅的幌子，长期以来，广大群众都习惯称天合成为“大烟袋锅”。而天合成这个本名却少为人知了。

（一）创业人刘货郎

天合成绒线铺的创业者名刘福成，是河北省衡水县人。为人忠厚老实，勤俭肯干。他创办天合成很不容易，经历了一段艰辛奋斗历程。

刘福成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 年），父亲是个贫苦的农民，在家种着几亩薄田。在刘福成十四五岁时，家乡闹了灾荒。为了逃荒，父亲把他托付给一个亲戚去北京谋生。刘福成到北京后，住在崇文门外大石桥一个穷乡亲家里。他一个小孩子能干什么呢？拉排子车和扛大个，没力气；进作坊学徒又无人介绍。没办法，他只好去杠房和喜轿局，在给富户出殡或娶媳妇聘闺女时打执事赚几个钱。刘福成年岁虽小，但很有远见，他想打执事有什么出息，也不能干一辈子，于是下决心积攒些钱，去做小买卖。他打了一年多的执事，除去给穷乡亲生活费外，尚余下一些钱。他拿这几个钱作本钱，做起了小买卖。花生、豌豆、排叉和糖果他都卖过。最后他挑起货郎担，摇着铜铃，走街下乡去卖针线。这时他已从乡亲家搬到蒜市口一家小店里住。刘福成不怕辛苦，逢农历一、三、五等单日子，就在城里挑着货郎担转，二、四、六等双日子，就下乡。在城里的一般路程是往北进北河漕，经珠营、东河漕、小市口直至花市各条胡同。往南进南河漕，经西河漕、东西马尾帽、

东西利市营、三转桥、南北岗子等各条胡同。下农村的一般路线是出广渠门，经关厢、沙板庄、老虎洞、虎城村、三间房、南磨房、大柳树、王四营等村庄。他每天早晨出去总是带两个窝头，几块咸菜，挑着货郎担，一走就是一天。由于刘福成做买卖说话和气，有礼貌，货真价实，所到之处，顾客都愿意买他的针线。有的顾客别人的不买，专等他来，买他的。这样，刘福成做了两三年的好买卖。加上他平日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文钱，因此，除每年给家中捎几个钱外，自己积下几个钱。这时，他感到住在小店里很不方便，就托人在南河漕里首院胡同找了一间房住下。

（二）办起天合成绒线铺

又过了两年，一天，一个同刘福成要好的街坊告诉他，在花市福源长干果子铺西边有一家小杂货铺要关张，他听了很动心。因为他不甘心挑一辈子货郎担，早就有开家买卖的打算。于是，他到处托人，要把这个小杂货铺倒过来。经过朋友的帮忙，好不容易才谈妥。刘福成在花市一家饭铺摆了一桌便席，请来中人、写字先生和原业主，立好了字据，把铺底倒了过来。接着，就筹备开业。他一边修理店房，一边进货，并从家乡找来了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做学徒。一切筹办就绪后，他从皇历上选了个“黄道日”，也就是清光绪三年（1877 年）端阳节。这天，买卖开张了，字号叫“天合成”绒线铺。取“顺天时，合人意，事业成功”之意。因为刘福成是个货郎，交往不多，开张那天，来贺喜的除去几个交买卖的外，没有其他人。那天正是花市集，尽管贺喜的不多，但门面油饰一新，外面又挂着红幛子，赶集的人很多，进进出出的顾客还是真不少。

天合成的店铺房屋既宽又深，门面足有两间的地方，但刘福成为了防盗，求严实，只开了一个门。门上方的横匾上写着“天合成”，在匾的旁边还挂了个“梳篦”的幌子。店堂里，迎门不足5 尺的地方，横着个通长的木拦柜，柜上铺着蓝布。柜里边有几个

抽屉，里面放着各色棉线球和其他货物。每个抽屉边都竖着一根似擀面棍的木棒，以备售货时绕线用。在拦柜前，除东西靠墙各有个小桌、两个小凳，店门里左右各放一条两人坐的长凳外，别无它物。

（三）独具特色的经营

刘福成虽然不是学徒出身，但他挑了几年的货郎担，走的地方多，可谓见多识广，所以，商业的规矩他都懂。开张后，他把店里店外，进货销货，学徒的使用，管得井井有条，买卖做的很好。刘福成在经营中特别注意做到：

货色齐全。刘福成挑货郎担的经验有一条，就是“不怕不卖钱，就怕货不全”。有一次，他挑着货郎担，走到广渠门外虎城村时，一位妇女要向他买些当时很少有人买的棕色绒线。刘福成没有。这位妇女说，“你是干什么的？卖线的，没有线，这个担子最好甭挑了！”刘福成红着脸没说话。他知道，顾客今天买棕色绒线你没有，明天买粉色线你还没有，这样下去，你再走过来，人家就再也不买你的货了。刘福成回去就把棕色绒线趸来，下乡时给这位妇女送去了。所以，天合成货上得很齐全。有妇女绣花和做衣服用的绣花针、大小钢针、顶针、剪子、色色棉线、绒线、各种纽扣，有妇女梳洗用的胰球、玫瑰碱、梳子、篦子、梳头油、红绒绳、胭脂、锭粉、疙瘩针、头网，还有旱烟袋、各种荷包、布袜子等。天合成的货物不仅齐全，而且讲求质量，宁肯多花钱也要进好货。他们的钢针，都是从南河漕有名的“钢针张”那儿进货。顶针从住在大石桥的“顶针李”作坊中选购。猪胰球和玫瑰碱专从前门外珠宝市的花汉冲进货。

薄利多销。薄利多销是刘福成做买卖的一贯作法。当时的城乡劳动妇女，买东西都是精打细算，都找好货，价钱还要便宜。她们经常把买来的东西做比较，甚至买棉线也要数数线圈。刘福成懂得买卖兴旺发达就必须想办法进便宜货，成本降低才能廉价出

售。像棉线，他进货进单股线，而后让学徒加工成合股线。其实天合成卖的货比别家也便宜了不少，像棉线可能是同样的价钱，但天合成比别家店铺多给一两圈线。别小看这一两圈线，它赢得了很多的回头客。

礼貌待客。老北京人很讲礼貌，妇女的规矩更多。而天合成的女顾客又多。因此，他们特别重视礼貌待客。售货员站柜台，必须梳洗干净，穿戴整齐，不管冬夏都要穿长衫。讲话和气，绝对不许顶撞顾客。不管顾客如何不讲理，伙计、学徒都要笑脸相待。也就是刘福成常说的“买卖人要有三分纳气”。

（四）“大烟袋锅”名扬京城

天合成的买卖做到清光绪“庚子事变”前夕，生意越做越红火，顾客整天络绎不绝。逢花市集时，顾客就更多了，有些顾客还是从远处慕名而来的。

在旧北京，劳动妇女大多是不识字的。天合成的门面又小，不显眼。尽管门前有牌匾，顾客也不易找到。虽然天合成门前挂着个“梳篦”幌子，可是，在花市卖针线和梳篦的店铺，不是挂“梳篦”幌子，就是挂“棉线”幌子。顾客要去天合成往往走错门。这样，刘福成才想出挂“大烟袋锅”的主意来。他找木匠做了个长约3尺，有茶碗口粗细，上涂黑色漆的大烟袋锅，下垂一条红布。这个“大烟袋锅”的幌子挂出后，方便了那些不识字的顾客。提起花市的“大烟袋锅”，老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

（五）管理严格有方

“大烟袋锅”的买卖虽然每天都很忙，但全店的职工只有六七个人，刘福成掌柜和记账先生都站柜台卖货。从早晨开店门到晚上关店门，除吃饭外没有休息时间。按规定每年五月节和中秋节各休息一天外，新年（农历）休息五天。另外出师的伙计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平日没有假。店中的伙食，不管学徒，还是伙计，都是免费就餐。平日伙食一天一顿粗粮，一顿细粮，有菜有

油。逢初一、十五日吃犒劳。吃犒劳时有肉有酒。学徒没有工钱，伙计的月工钱也很少。他们主要是指望年终“说官话”时的馈赠。每年腊月除夕，“大烟袋锅”买卖忙完了，关上店门，吃完年饭，掌柜的坐在账房找每个人谈话。他根据每个学徒和伙计一年中出力的多少，送给“花红”，也叫“馈赠”。学徒可得5或10元（银元）。伙计多的可得五六百元，少的也就是五六十元。表现不好，干得不好或犯了铺规，可能被辞退。如果伙计不愿意继续干了，也是在“说官话”时向掌柜的提出辞柜。并且规定“东辞伙，一笔抹；伙辞东，一笔清”。也就是说，掌柜辞退伙计，不管伙计欠柜上多少钱，都一笔抹掉。如果是伙计辞柜，就要一次还清欠柜上的钱。

（六）从绒线铺到百货店

刘福成把自己的心血完全用在天合成的买卖上，操劳了几十年。到了民国初年，他因体弱多病，无法继续干事，只得把买卖交给原本柜学徒出身的伙计来管，他回老家去养老了。这个新掌柜依旧走着原来的老路，买卖还是很好。

北平解放后，经过公私合营，天合成的经理换成了李维新。李维新是山西人，学徒出身，能干。他经营天合成后，随着社会发展，淘汰了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宜的商品，增添了男女汗衫、洋袜子、牙膏、香皂等一些新商品。在李维新正准备大干一场时，“十年动乱”开始了。“大烟袋锅”被弄走，至今下落不明。天合成的牌匾也被当作“四旧”摘了下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天合成的牌匾又挂了出来。但今天的天合成不同于过去的天合成，过去的天合成是绒线铺，今天的天合成是百货店。

九、天义长料葡萄店

天义长料葡萄店在花市南侧，南小市口里，是蒙古族人常在于清代咸丰年间创办的。天义长做的料葡萄，曾受到慈禧太后和

一般老百姓的喜爱，在1919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过一等奖。因此，人们喜称天义长的常氏为"葡萄常"。

常在为人勤劳、聪明、手巧，平日就喜欢制作一些手工活。一次，他用废旧玻璃烧了些葡萄拿到市上卖，顾客见了很喜爱，货被大家抢购一光。从此，常在一家就做起了烧制料葡萄的生意。边烧制边改进，葡萄越做越好，最后做出的一串串葡萄亮晶晶地就跟真的一样。这时候，常在做的葡萄有多少就卖多少，不用他去市上摆摊，都是店铺商人和小贩登门购买。

到了光绪年间，常在已在崇文门外花市南小市口定居下来。这时常在做的葡萄不仅行销全北京，就连清皇宫里也摆上了常家的葡萄。据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在颐和园的德和大戏楼前举办60大寿。慈禧和王公大臣边喝茶、边看演戏。在慈禧的面前，摆着各色鲜艳的干鲜水果。其中一盘挂着白霜的紫葡萄最招人爱。慈禧让李莲英给她拿过一串葡萄她要尝尝。李莲英赶紧回禀慈禧说这盘葡萄不能吃，是摆样子的假葡萄。慈禧一听很奇怪，假葡萄跟真的一样，拿过来我看看。李莲英给拿过一串，慈禧拿到手中才发现是假的，她问，这是谁做的，这么好。李莲英回禀，这是一个叫常在的做的。慈禧要见见这个人。慈禧见到常在，很喜欢他。给了常在赏钱，并答应赐他一块匾。没几天，太监给常在送来一块慈禧亲写的"天义长"黑底金字匾。

常在得了慈禧亲写的"天义长"牌匾后，声名大振，生意更加兴隆。从此，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葡萄常"。

在旧北京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所以，身怀绝技的人都不外传，传子不传女，传儿媳妇也不传女儿。常在有二子、三女和两个侄女。但二子身体都不好，并且相继夭亡。留下个孙子年幼。常在又年老体弱多病，常家烧葡萄的绝技怎么办？这是常在极为不放心的事。这五个女孩子看出了老人的心事，五女商量好为了保住常家的绝技不外传，决心一辈子不出嫁，也要把

常家烧葡萄的绝技传下来。

享誉世界的常氏葡萄所以能传下来，是五个弱女子献出的幸福，用青春换来的。

1966 年的“十年动乱”常家也是在劫难逃，“天义长”牌匾和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奖状都遭毁掉，买卖也被迫关了门。俟动乱收场后，国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准备恢复中国的民族传统工艺品的生产。此时，常家五位老姑娘，有四位已先后辞世而去，只有常玉龄一人健在，但已逾古稀之年。常玉龄不愿葡萄常的技艺失传，她在安定门内“葡萄常工艺品厂”里，毫无保留地将烧制葡萄的手艺教给了几个年轻人。

第五章　宣武门外大街地区

第一节　宣武门外大街的历史沧桑

一、宣武门外大街地处金中都城之内

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四个城区，历史最悠久的就属宣武区了。特别是从宣武门外大街东侧往西，这片地区是属于金代中都城的一部分。

当年金代的中都城，建于金天德五年（1153 年），城周 37 余里，设城门 13 座，北面有会城、通玄、崇智、光泰四门，南面有景风、丰宜、端礼三门，西面有丽泽、颢华、彰义三门，东面有施仁、宣曜、阳春三门。东面的除阳春门遗址在右安门外迤东处外，其余施仁和宣曜两座城门遗址都在宣武门外大街东侧不远处。

二、宣武门外大街的得名

宣武门外大街是由位于宣武门外而得名。宣武门原名顺承门，俗称顺治门，明正统四年（1439 年）改为宣武门。其城楼、城门遗址就在宣武门外大街北端与宣武门内大街、宣武门东大街、宣武门西大街的十字路交汇处。因为本文介绍崇文门城楼、瓮城及箭楼、石桥等建筑，交待的比较详细，宣武门的城楼、瓮楼、箭楼、护城河石桥与崇文门的规格是一样的，所以，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三、宣武门外大街各省会馆多

宣武门外大街离广安门很近，前文介绍前门大街商业街时已

经讲了，卢沟桥是北京与南、北各省相连的古渡口。到北京的人大都进广安门。广安门内大街、宣武门外大街、骡马市大街……是北京外城西部的主要街道，这一带交通方便，商业发达。所以，从明代起，全国各省、各州、各县争相在这一带设立会馆。据不完全统计，旧北京城内约有会馆540多座，其中内城有10余座，外城有530余座。而今天的宣武区境内就有380余座，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宣武门外大街有，“四川、永丰、建昌、抚临诸会馆……”，还有“全闽、直隶、关中、翼城、天门、歙县、韩城、灵石、咸长、善化、永济、南通州诸会馆”等16座。据查，一条街上有如此之多的会馆可说是北京之最了。

四、宣武门外的洗象活动

明、清时期，农历六月初六日，宣武门外西侧护城河有洗象的活动。河的两岸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

明、清政府都认为大象是吉祥的动物，代表天下太平，并用它表示“万象更新”的吉兆。所以，朝廷中每逢有隆重大会时，都将大象带至会场，有的分列两边矗立站班、有的身驮珠宝、有的架车运物。在宣武门内迤西有“象来街”地名，这里就是昔日养象的象房。象房里有一大批人役在此当差，有饲养者、有兽医、有驯象之人。据《燕京岁时记》上记载：“每岁六月六日牵（象）往宣武门外河内浴之，观者如堵。……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钱满数，而后昂鼻俯首，呜呜出声”。后因养象的夫役克扣养象的饲料，大象相继都饿死。到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时，“越南国贡象二次，共六七只”。一次，一只大象疯狂地跑出了东长安门，伤了人。因此，将六七只大象全都拘禁起来，两三年后，大象饥饿死尽。洗象活动从此也就不见了。

每逢洗象的日子，喜欢热闹的人都赶来观看。各地的小商小贩也乘此机会到宣武门外大街摆摊做买卖。因此，洗象活动对宣武门外大街的商业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土地庙庙市

土地庙在宣武门外大街西侧的下斜街。一般的土地庙都是很小的，一层殿，院子小，殿也矮小。但是，宣武门外下斜街的土地庙却不同，两层殿，院子大，殿也高大。据《燕京岁时记》书中记载：就连明万历皇帝都给这座土地庙立了碑“土地庙，其最古，有前明万历四十三年碑，称曰古绩老君堂都土地庙。辽金时庙在都城之外，今莫得其方向矣”。明万历碑刻记：“朕为圣母御世，圣目不安，钦传重修宣武门外斜街古迹老君堂土地庙，未尝开工，圣性归天。朕感圣母慈恩，代完前愿，今差奉御阎鸾重修新整。……”以上两段文字说明，这座土地庙早在辽金时就有，不是一般的小土地庙而是规模较大的都土地庙。而且香火很盛，因为皇太后都在此庙降香许愿。普通百姓到这座土地庙焚香者就更多了。开庙是“自正月起，凡初三、十三、二十三日有庙市。市无长物，惟花厂鸽市差为可观”。

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土地庙庙市上，卖鲜花和鸽子的最多。同治十一年（1872 年），刊印的《增补都门杂咏》中对土地庙花厂有一首竹枝词是这样写的：“下斜街里景如何？万紫千红锦绣窠；怪道寻香人不绝，瑞春厂内好花多”。因为宣武门外下斜街距右安门外黄土岗花乡较近，到土地庙开花厂和摆花摊的都是黄土岗花乡的花农，花好卖价又便宜。老北京大多数家庭都爱养植花草，另外有些人家喜爱饲养鸽子。所以，每逢土地庙开庙日，到此挑选花草和买鸽子的游人最多。

时至民国年间，土地庙由于年久失修，庙已很残破。可是，庙市依然每月逢三开市。这个时候的土地庙庙市，除卖鲜花和鸽子的外，增加了卖扫帚、铁锹、镰刀、锄头、犁、耙、筛子等农具的货摊。游人除去城市百姓外多是右安门外和广安门外的农民。

北平解放后，土地庙庙市和其他庙市一样，1960 年后就停办了。

土地庙庙市的商业活动对宣武门外大街的商业街的发展起过一定影响。

第二节 著名老字号

一、王麻子剪刀铺

剪刀是人民生活中离不开的工具，所以，从事生产、经营剪刀者在我国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村镇到处可见。其中不乏有名的剪刀作坊和剪刀店铺，而最著名的有两个，就是南方杭州的张小泉，北方北京的王麻子。张小泉剪刀和王麻子剪刀都是选材精良，剪刃锋利，经久耐用，所不同的是张小泉剪刀外观银白漂亮，王麻子剪刀乌黑，人称之为“黑老虎”。

（一）从小杂货铺到著名剪刀铺

王麻子剪刀铺的旧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南头路东，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1954 年北京市政府实施手工业合作化时，王麻子剪刀铺参加了剪刀生产合作社，才迁至崇文门外大街新址。

王麻子剪刀铺开业于清代顺治八年（1651 年），铺长姓王，原籍山西省，开业时只是个连家铺，经销剪刀、菜刀、烟袋、火镰、火纸和针线等日用品。由于铺长脸上有麻子，附近居民和店铺都称这个小杂货铺为“王麻子杂货铺”。

王麻子做买卖极重视信用，讲究商品质量，他收购商品都认真挑选，不怕多花钱也要收好货。他收购剪刀时，首先要看外观是否光亮、周正，看剪刃是否合口、锋利，看剪轴是否平直、滑润灵活。这些都合格后，还要进行验试，先用剪刀剪纸，再剪厚布。不合格的，不论价钱多么便宜也不收。顾客将这种剪刀买回去，经过使用都很满意，日久来此买剪刀的人越来越多。后来，铺长王麻子为取信顾客，特将自己收购的剪刀都镌刻上“王麻子”三个字，而后才出售。如果顾客使用这种带有“王麻子”三字的剪

刀，不管到什么时候，不是使用不当，剪刀出现锛刃、卷刃等质量问题都可退换。从此，王麻子杂货铺的剪刀在社会上取得很高的信誉，慕名来此购买剪刀的顾客日渐其多。由于王麻子杂货铺卖剪刀出了名，天天接待买剪刀的顾客还应接不暇，就没有时间经营其他杂货了，因此，在王麻子晚年时就改为专营剪刀一种商品，杂货铺就成了全城著名的“王麻子剪刀铺”了。

（二）各种“王麻子”的招牌挂满全城

王麻子离世后，其子接手继续经营这个王麻子剪刀铺。传至第三代孙，就是清代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时，正式更名“三代王麻子剪刀铺”并挂出招牌。此时的王麻子剪刀铺虽然店铺后还带家眷，但是前柜已雇有伙计、学徒四五个人。

旧京商业竞争很是激烈，王麻子剪刀在市场畅销引起一些同业的十分垂涎，他们不想创自己的名牌，却异想天开进行假冒王麻子的招牌。在店门前挂出“真王麻子”、“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万麻子”和“石麻子”等牌匾。据清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刊印的《续都门竹枝词》上一首词“汪王万石皆麻子，拨厥由来为火镰；自昔岂无人似玉，一齐刻划作无盐”。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刊印的《增补都门杂咏》也有一首词写：“刀店传名本姓王，两边更有万同汪；诸公拭目分明认，头上三横看莫慌”。最晚从清嘉庆年开始，假冒王麻子招牌推销剪刀的店铺在宣武门外大街出现，到了民国年间，在前门外打磨厂西口、隆福寺、东四、西单等地都有“真王麻子”、“老王麻子”等假冒卖剪刀的店铺。

正牌王麻子剪刀铺在同业的竞争中，他们一方面在店铺门前挂出个说明牌，上写：“本铺自创办以来，并没有后代子孙在外面开办分号，请社会诸君认明王麻子招牌，免受欺骗”。另一方面在剪刀质量上下功夫。他们要求与王麻子剪刀铺交买卖的打剪刀的作坊，给他们打制剪头长，剪把宽，剪轴粗的剪刀。并要求剪刀

软的能剪丝绒绸缎，一剪即断不挂丝；剪硬的能一剪剪40层布，细铁丝一剪即断，剪刃不锛。由于王麻子剪刀铺剪刀的质量好，所以，在同业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买卖久盛不衰。王麻子的剪刀不仅闻名北京全城，而且享誉全国。北京是首善之地，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有许多外地人都喜欢离京还乡时，买几把王麻子剪刀当礼品送给乡亲。

（三）“王麻子”之名蜚声海外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北平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各业萧条。王麻子剪刀铺买卖也不好作。尽管剪刀是居民和一些工商业者离不开的工具，但是，因为战乱北京对外交通不畅，王麻子的剪刀运不出去，货物滞销，造成王麻子剪刀铺有史以来的生意不振。此种情况直至1949年。

新中国建立后，王麻子剪刀铺的生意又兴盛起来。多年积压的货物在天坛全国物资交流会上全都售光。

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展小手工业者的合作化运动，把全市分散的几家经营剪刀的店铺和锻造剪刀的小作坊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剪子生产合作社”。1956年，剪子生产合作社与刀子生产合作社合并。1959年北京王麻子剪刀厂正式宣告成立。从此，昔日的小剪刀铺和小铁作坊变成了一个国营企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王麻子剪刀名牌产品，特在北郊沙河镇为王麻子剪刀厂建起新房，在崇文门外大街只留个门市部，其余生产车间和管理部门都迁至新址工作。新的王麻子剪刀厂与历史上王麻子剪刀铺相比，它不仅是职工从业人数的剧增，从最早时的一二人的连家铺，发展至现今的六七百职工；而重要的是工厂经过几次重大技术改革，很多只凭手工笨重体力操作，改为机器化和半机器化。产品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1979年，被轻工业

部评为优质产品，1980年荣获国家银质奖。产品和规格都有所增加，产量在80年代，年产量超过300万把。销路已过了长江，全国各地都有代销点，而且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还是畅销品。

二、双十字菜刀铺

北京多少年来，居家过日子，妇女裁剪衣裳都用王麻子的“黑老虎”剪子。在厨房里切菜切肉炊饭则喜爱用双十字的菜刀。

双十字铁铺坐落在宣武门外桥头路东，护城河南侧，开业于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它是前店后设打铁炉，自产自销。

这家双十字菜刀铺是个很不起眼的小铁匠铺，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极其重视菜刀的质量，打制生产的各式菜刀不仅外观漂亮，刀背厚，刀刃锋利，而且钢口好，切菜、剁带骨肉，刀刃不锛不卷，经久耐用。为了取信用户，他家生产的菜刀都凿打上“十十”两字，以作标记。如果顾客使用这种菜刀，不管使用多久，只要出现锛、卷等质量问题都保修保换。一次，有个顾客一把双十字菜刀，已用了好几年了，不知他砍什么硬东西，刀刃出现了一个小锛口。他把这把菜刀拿到双十字菜刀铺后，掌柜看了看，没二话，就给这位顾客换了把新菜刀。

双十字菜刀铺如此讲信誉，所以在社会上名声很高，用双十字菜刀的顾客很多。有居民用户，有饭庄、饭馆等用户。由于双十字菜刀在社会上信誉高，销路好。因此，一些同行就冒名，打出“士士”字招牌和“什什”字幌子，以鱼目混珠。

北平解放后，1954年双十字铁铺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后与王麻子剪刀铺合并，统称王麻子剪刀生产合作社。

三、宣武门外大街的席箔铺

旧北京的席箔铺一年四季买卖不断，而以夏季最忙。因为在夏天，一些住户的庭院和店铺门前，为了遮阳挡热，都要搭凉棚。

就连私塾房老师，按常规也给学生搭席棚，让学生从窄小的书房里搬到席棚下读书。

旧北京到处都有席箔铺，但是宣武门外大街最多。因为过去开席箔铺，不需要讲究店门面和店堂，只要店里宽绰，店前有地方干活可以编织席箔就行。因为宣武门外大街与其他商业街比，最宽阔，所以，引来席箔商人在此设店做生意。

席箔铺收货都在每年的冬天。因为收苇子的时间是在入冬以后。近处货源在前门外东南的三里河的南、北、中芦草园处。当年这一带有条从正阳门迤东护城河里流出的河水，经西打磨厂、鲜鱼口、芦草园、北桥湾、南桥湾、金鱼池、红桥，往东南流出城去的三里河。这条三里河出产大量芦苇。现在地名叫“大席”和“小席”胡同的地方就是过去存放芦苇之处。清代中期后，这条三里河干涸，并且河床里也建起民房。宣武门外大街的席箔铺就去东郊的通惠河沿岸收芦苇或远到直隶保定府附近的白洋淀收芦苇。席箔铺将芦苇收回来后，有的编成席，有的编成苇薄。与席箔铺交买卖的很广泛，棚铺用席去搭席棚，盖房子的瓦工匠多用苇薄盖房。除以上大量用席箔外，一般零散居民用席箔是少量的。

北平解放后，由于社会的前进，城区用席箔少了。席箔铺有的与山货铺合并，有的关门停业了。

四、方壶斋戏园

宣武门外大街也曾有过戏园，那就是方壶斋。方壶斋在宣武门外大街北段东侧，西茶食胡同内。据《京师坊巷志稿》引《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比年如方壶斋、蓬莱轩、升平轩最著。今诸园皆废，惟方壶斋屡易新名，人尚称为方壶斋，城西仅此一馆”。这座戏园是个较早的，大约建于道光年间，演出活动曾热闹一时，像当年的三庆班、四喜班、瑞胜和、春台班等有名戏班都曾在此演出。但是，大约到了咸丰年间就停演歇业了。此胡同的地名就是根据方壶斋戏园而来。

第六章　菜市口地区

第一节　菜市口的历史沧桑

菜市口在明代叫菜市大街，它是由于在街上有个规模很大的菜市，广宁门外的农民都到此卖菜，故得此名。明代的菜市大街，东起宣武门外大街南端丁字街处，西至下斜街口。清乾隆时，改名菜市口，其街界也极大的缩小了，东界未变，西界由下斜街口，缩至北半截口。新中国建立后，1965 年，调整街巷胡同地名时，菜市口东部并入骡马市大街，西部并入广安门内大街，从而菜市口地名已被撤销。但是，北京市民依然叫它为“菜市口”，并且有的商店店名还是用菜市口三字命名的。

第二节　菜市口发展商业的条件

本文讲的菜市口地区，包括其东边的骡马市大街西段，西边的广安门内大街东段，南北的米市胡同、北半截胡同、铁门等都包括其中。菜市口这一带地区早在明代时，就出现了有名的蔬菜市场和骡马牲口市场。而后逐渐地发展成仅次于前门大街、大栅栏、崇文门外大街的商业街。并使宣武门外一带成为文化名人聚居之地，文化遗址众多的地方。其主要条件就是广安门内大街、菜市口、骡马市大街，这条东西长约 6 市里的走道，是西南、西北各省人，进广安门后必经之路。到北京经商的，第一个目的地是

前门大街和大栅栏等地，这里商业发达，买卖好作。第二个目的地才是菜市口地区。到北京从政的就不往前走了，无论是暂住，还是长住，都以宣武门外一带地方比较合适，因为这里返乡最方便。由于菜市口地方四通八达，商业繁华，来往行人众多，所以，清代才将杀人的刑场从西四牌楼迁至菜市口。以达到杀一儆百、警告效尤的目的。1898 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这里被害的。

以上讲的是明、清时期的情况，到了清末，北京通了火车后其形势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修建了卢（卢沟桥）汉（汉口）铁路，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此条铁路又东延至永安门外马家堡。后又将这条铁路修进城来，起始站就建在前门城楼的西侧，称京汉铁路前门（西）站。从此，西南、西北各省的人，就不用坐车、骑马进京，而改乘既快捷又舒服的火车了。菜市口、广安门内大街和骡马市大街的商业也就停步不前了，同时，促使前门大街和大栅栏等地区的商业更加繁荣发展。

话虽然如此说，但是，原来各省人在宣武门外一带建起的众多同乡会馆和工商会馆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宣武门外一带地方依然是各省文人主要活动的地方。菜市口、骡马市大街的商业依然保持着一定活动，尤其是地处宣武门外大街、广安门内大街、骡马市大街这个交汇点上的菜市口，店铺生意还是繁荣的。

第三节　菜市口的店铺

菜市口的店铺有同达堂、鹤年堂、体仁堂、同寿堂、鹤鸣堂、天和堂、广和局等药铺，元兴号、同发长西记、志川永、宏远祥等布店，亿丰祥、华丰号、同义祥等绸缎庄，升记、步云斋等鞋

店，宝亨斋、聚文斋、三义泰、广聚源等钟表店，和盛当铺，福生局、乾祥号、聚丰永、福和局、聚和永、公兴裕、福和兴、隆记号、和记号、鸿成永等米面庄，广丰、广丰久、广丰厚等油店，福庆厚、义昌全、万和昌、广益公、吉庆长、世德长等干果杂货铺，广和居、便宜坊、宾宴春、新筵春等饭庄，万顺号、恒兴顺、悦来号等菜店，广安菜市场，聚源成、裕兴厚、德隆号、同和号、恒兴长等棉花店，瑞云号、协泰号、洪裕茂等茶庄，庆福斋饽饽铺，桂馨斋酱园，鹤年长棺材铺等店铺。

第四节　著名老字号

一、鹤年长棺材铺

棺材铺又叫桅厂，这种店铺，可分为三个派别，以北京人为主的叫“京把”，以直隶人为主的叫“直隶把”，以山西人为主的叫“山西把”。“京把”和“直隶把”做出的棺材，坚固，样子好看。棺材的大盖前头扬起，两梆凸出，前堵头隆出。从外形看显得有气势。“山西把”做出的棺材，不仅不坚固，从外观看长长的像大木匣子。因此，人们称“山西把”为“怯把”。

在民国年间，北京有名的大棺材铺有骡马市大街的鹤年长，东珠市口的贵寿，绒线胡同的福寿，宣武门内大街的同顺，八面槽的仁寿等棺材铺。

鹤年长是当年北京最大的棺材铺，资本20万银元，库存有楠木、柏木等大量上等木材，以及“建昌花板”、“凤翅花板”、“龙纹花板”和“茵陈花板”等各式上等板材。一般的材料像杉木、松木、杨木等，鹤年长也都准备。但是，鹤年长主要以卖好棺材赚钱。一口好棺材没有准价钱，几百块银元的本钱，就能卖几千块银元或一两万块银元。因为过去的官僚、有钱的富户，都要在婚丧上，讲排场，比阔气，不怕多花钱。你跟他少要钱，他说你的

棺材不好，亲戚、朋友会笑话他。所以，过去官僚、富户在婚丧上，就是以花钱为目的，多花钱就是好。过去做买卖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一口柏木棺材，鹤年长卖3000块银元，顾客不嫌贵，因为是在鹤年长买的。同样的棺材，在一般棺材铺卖他1500块银元，他说不值。所以，一些官僚、富户都以买鹤年长的棺材为光彩，露脸，讲给亲戚朋友听。

鹤年长棺材铺掌握了顾客的心理，他们的店铺与一般店铺不一样，没有柜台，在宽敞的店堂内摆架着各种棺材。讲买卖的地方在装饰讲究的客厅里。有钱的顾客来了，一般都不是一个人，都是三四个人。就请进客厅里，先不说买棺材的事，让学徒给客人敬茶，请抽烟。在谈话中，探出顾客是否讲排场，肯否花钱。如果看普通的棺材都不满意，摇头，就给顾客带到特殊的陈列室请他们看棺材。一口棺材停放在一间大屋子里，还有布帐子遮着。只要是顾客点头满意，要多少钱都行。如果还不行，再给带到比这个陈列室还讲究的“花板”房中。“花板”就是一口棺材的棺材盖、底、梆、堵头都做成了，可是还没有组装起来，单放着，这就是“花板”。前文已经讲了，这些花板都有好听的名子，什么“建昌”花板，什么“龙纹”花板等。这些“花板”不仅用布帐子遮盖着，而且上面贴着用漂亮纸条上写“龙纹花板”或“凤翅花板”等牌名。以显示其贵重。

鹤年长卖一般的松木、杨木棺材赚钱并不多，他们卖出的价钱不比一般棺材铺贵，而且多少还会便宜些。好以此做宣传，说明鹤年长的棺材不贵。鹤年长也做“火匣子”，什么叫火匣子呢？就是做一般棺材剩下的碎薄板，用钉子钉钉就成一个装死人的大匣子。意思是这些剩木板应该是烧火的，没用它烧火，用它做装死人的“棺材”了，所以称“火匣子”。这种火匣子又叫“狗碰头”。过去，埋穷人的“乱葬岗子”野狗很多，这些野狗很凶，都扒死人吃。“火匣子”白天埋在乱葬岗子，天一黑，群狗就来，将

土扒开，猛地用头一撞，就把火匣子撞碎，故名“狗碰头”。鹤年长做火匣子也是为了宣传，也可说是个慈善之举，给钱不给钱都行。

鹤年长棺材铺有长期工匠30多人，穿长衫的账房先生和接待顾客的业务员，称“柜里”，穿短衫干活的棺材匠称“柜外”。柜里是月工薪；柜外，有月工薪的，也有计件工薪的。棺材匠只有少数是长期工，大多数是有活来，没活走的临时工。北京的棺材匠，俗称“斜木行”。他们与盖房的，做家具的木匠不一样。他们做棺材以斧子为主要工具，棺材盖、梆、前后堵头，都用斧子砍，砍出的没有平直的，不是偏的，就是斜的，故称“斜木行”。他们做的棺材都有固定的规格尺寸，分“三、四、五”和“四、五、六”两种规格。“三、四、五”是棺材底四寸，两梆各四寸，盖五寸（实际是四、四、五)。“四、五、六”是底五寸，两梆各五寸，盖六寸（实际是五、五、六)。如果顾客还要大些的，就做“四、五、六”大放样了。

由于鹤年长棺材铺买卖大，字号响，是北京棺材铺的首户，所以，当年的政界、军界及社会名流死后，大都买他家的棺材。像军阀吴佩孚、京剧名演员谭鑫培、杨小楼等都是用鹤年长的棺材。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鹤年长棺材铺参加了公私合营。不久，北京寿材厂成立，总厂在东四马市大街，各区有分销点。鹤年长是外城一个分销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多数人逐步认识到用棺材埋死人，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落后陋俗。它既不卫生，又浪费木材和土地，应该改革。因此，1964年北京寿材厂撤销，从此，棺材铺被前进的历史潮流所淘汰。

二、便宜坊饭庄

现在介绍的便宜坊不是前门外鲜鱼口，崇文门外等处的便宜坊烤鸭店，而是北京最早，也是当年最有名的老便宜坊饭庄。

便宜坊饭庄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南侧，米市胡同北口不远处，它是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南京人开办的。

便宜坊刚开办时，只是个连家铺的小作坊。每天从市上趸回活鸡鸭，杀死褪去羽毛拾掇干净后，给饭庄、饭馆送去。他们除卖生鸡鸭外，还做焖炉烤鸭和桶子鸡等食品。买卖做得很兴旺。到了清道光七年（1827 年），创业的老掌柜病故，他的儿子把买卖接了过来。这个年轻人，虽然年岁轻，但心思灵活，从他接手后，生意更是兴旺。由于买卖好，活忙不过来，因此，打算找个小学徒给他帮手。恰巧，隔壁住着个山东荣成人，是个卖馒头的，他家中来了个找事做的十二三岁的小老乡，名叫孙子久，来北京很长时间了，还没找着事做。这样，经隔壁卖馒头的介绍，孙子久就来鸡鸭作坊当了学徒。这个孙子久不仅聪明伶俐，能吃苦，勤快，而且为人老实，天天起早睡晚，生火、做饭，看孩子，喂鸡鸭，送货等，家务活，作坊活，样样全干，所以，深得掌柜的喜爱。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三年零一节，孙子久满徒了。可是，他不想走，依然为掌柜的干活，出力气。掌柜的在孙子久的帮助下，生意越来越兴旺。正在此时，掌柜的独生子病了。掌柜的夫妇就守着这棵独苗，爱如掌珠，孩子病了，心里特别急。这孩子是脖子上长了个疙瘩，破了成了鼠疮。多方求医，就是不见好。一次，掌柜的请来个顶香的巫婆，给孩子看病。这个巫婆吃完饭，坐在炕头上，忽然打了个嚏喷，就装鬼神唱了起来。她唱着说："孩子的鼠疮脖子不好，是由于你们整天杀鸡宰鸭，招来的报应"。这时掌柜的磕头礼拜，央求巫婆给他儿子治好病。巫婆又唱说："只要你们今后不再杀鸡鸭，毛蓝粗布一丈三，二斗黄粮（小米）送上山，一把烟叶我带走，酒肉炸酱面敬神仙，初一十五还要送一蒲包饽饽供大仙，你孩子的病就好了。"这不过是巫婆骗吃、骗物的把戏，但是，这个掌柜就真信了，一狠心就不做这样的买卖了，让孙子久接手继续干。

孙子久接手后，就积极扩大营业，并在提高鸡鸭的成色上，在贱卖多卖上下功夫。他知道要扩大营业，没人不行。他很快从山东荣成老家，找来四五个十四五岁的小学徒。这几个小学徒有的跟着上市趸货，有的学杀鸡鸭，有的挑着铁桶给顾客送货，有的帮助做家务。孙子久主张鸡鸭的质量要好，制作要认真，卖价要便宜，所以，生意越做越红火。

便宜坊的烤鸭是焖炉，也就是地炉，这是烤鸭的正宗，它是由南京传来的。在清代，挂炉是烤小猪的。据《帝京岁时记胜》记载："南炉鸭、烧小猪、挂炉肉。"文中的"南炉鸭"指的就是便宜坊的焖炉烤鸭。这种地炉，炉身是砖砌成，大小约一立方米。当焖烤鸭子前，先用高粱秆的炭火将炉膛的温度焖烤合适。焖炉用的是暗火，技术性强，掌炉人必须掌握好炉内的温度。如炉火大了，炉内温度过高，鸭子就会烤焦烤坏；炉火小了，温度过低，鸭子就烤不熟。挂炉是明火，好掌握。焖炉烤的鸭子外皮油酥，肉鲜嫩，肥而不腻，并出肉多，不失水分。

便宜坊经营到清末民初时，已经成为不仅只卖烤鸭和桶子鸡的小买卖，而发展成经营山东各种炒菜的有名饭庄了。但是，到了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沦陷区人民的疯狂掠夺，便宜坊的米面油肉货源奇缺，物价又飞涨。所以，便宜坊于 1942 年，无法维持就停业了。

三、鹤年堂药铺

鹤年堂药铺原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铁门南口迤西，路北。

世上传言，也可能是商家自己编造的，说黑字金地的鹤年堂牌匾是明代奸相严嵩府内花园中一个厅堂的匾额。严嵩丢官被抄家后，商家把这块匾弄了来，就做了自己药铺的字号了。由此说明，鹤年堂是明代嘉靖末年开业的买卖，也说明鹤年堂牌匾来历不凡。

多少来年，鹤年堂的字号驰名京师，老北京都说："买成药，

丸、散、膏、丹，请到同仁堂，抓汤药，还是鹤年堂讲究。”“汤药”就是汤剂饮片，中草药。鹤年堂的汤剂饮片，一是采购地道的真材料，一是炮制认真，严格遵循古法，所以，鹤年堂的汤剂饮片，只要大夫处方合理，疗效准高。还有就是鹤年堂的货全，别家药铺没有的，鹤年堂有。

在清末，发生这样一件故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金石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偶患疟疾病，病得很厉害。请来大夫开的处方，其中有味药叫“龙骨”。这味药到处找都没有。有人说，到宣武门外菜市口鹤年堂药铺，一定能找到。家里人从鹤年堂将药抓回来后，王懿荣打开药包查看，无意中发现“龙骨”上刻着类似篆文的文字，他惊喜非常。因为王懿荣对中国古文字很有研究，他认为“龙骨”上的道道划划都有一定的规律，很像一种古文字。他为弄个究竟，就派人去鹤年堂将这种“龙骨”全买了回来。经他一块“龙骨”一块“龙骨”地仔细对比，他断定这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古人在龟甲兽骨上刻的一种文字。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原来这些“龙骨”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耕地时，从地里耕出来的。一些商人收了去当“龙骨”卖给了药铺。如果王懿荣的“龙骨”真是从鹤年堂买去的，这也应算鹤年堂的一大贡献。

鹤年堂除菜市口总店外，还在东安市场，西单北大街和陕西西安各开一个分店。1956 年，总店和分店（除西安分店于 1951 年停业外）各自参加了公私合营。“十年动乱”时，总店改名“人民药店”，后又改称“菜市口药店”。“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了“鹤年堂”老字号。

四、铁门酱园

铁门酱园本名桂馨斋酱园，因它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的铁门胡同，故老北京人都叫它“铁门酱园”。

铁门酱园开业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传说是个苏

州人创办的。这个苏州人在家乡学得一手酱制各种小菜的好手艺，来到京师想创出一番事业来。开始在菜市口一带推辆小车卖酱菜。因为北京人吃惯了老酱园的咸味菜，吃到他做的南方酱菜，觉得口味清甜。所以，愿意改改口味都买他的酱菜。在菜市口一带居住的南方人，早就不愿意吃只咸不甜的酱菜了，现在有卖家乡口味的酱菜，自然很高兴。因此，这个苏州人做的酱菜很受这一带居民的欢迎，买卖很好。如此，这个苏州人做了几年的好生意，又由于他省吃俭用，所以，手中积攒下几十两银子。心中盘算找间房子开个小酱菜园。后经朋友介绍在铁门胡同南口处租了一个小院几间房子，并找了两个小学徒帮助他干活，店字号取名“桂馨斋”。

买卖正式开张后，这位苏州掌柜很会经营，他本着保证酱菜的质量，提高口味，薄利多销的原则，使买卖逐渐地发展起来。桂馨斋的酱菜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特别是他家的甜酱黄瓜、甜酱瓜和糖蒜等是销售量最大的产品。后来因为这位苏州掌柜年老多病，无法继续干下去，就将买卖让给一个姓沈的伙友接了过去，他自己回家乡养病去了。

沈姓接手经营桂馨斋酱园后，买卖又有所发展。其原因，首先是桂馨斋制作酱菜讲究质量，价钱公道。第二是创制新产品，沈掌柜把原来的甜酱瓜，试制成“八宝甜酱瓜”，把普通糖蒜，丰富成“桂花糖蒜”等产品。在甜酱瓜中加上桃仁、杏仁、栗子、花生仁、莲子、松仁、瓜子等七样与酱瓜合称“八宝”。另外再佐以桂花、姜丝、青梅、葡萄干等辅料，使酱制出的八宝甜酱瓜，既有甜、香、咸味，还稍带些辣味。南方人和北方人都爱吃。一般腌糖蒜就是用糖，沈掌柜又再加上了桂花，使糖蒜有桂花味。

正因为桂馨斋的酱菜味道与众不同，别具特色，所以，驰名京城。过去老北京人善于观察、记忆店铺的特征。“桂馨斋”不好记，而其地址“铁门”容易记。故称“铁门酱园”。

1956年，桂馨斋参加公私合营后，政府又将其他几家酱园并入桂馨斋中，添置了设备，扩大了生产。后曾改名“北京市酱菜食品三厂”，于1992年在宣武门外南横西街恢复老字号，挂出了“桂馨斋”的牌匾。并在全市500多处大型菜市场和商场设立代销网点，以方便顾客。

五、广和居山东饭馆

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记载：“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清道光在位30年，“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那就是1835年以前，广和居就已开业。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带各省会馆众多，距广和居远的不说，广和居所在地南、北半截胡同中有江宁、黟县、绍兴、山东等会馆。库堆胡同（后并入北半截胡同）有浏阳会馆。七间楼小胡同中有吴兴、潼川会馆。丞相胡同（今菜市口胡同）有中州、休宁、潮州会馆。米市胡同有中州、江阴、光州、六安、重庆、南海等会馆。铁门有宣城、广信会馆。烂缦胡同有济南、元宁、常昭等会馆。在这些会馆中，经常侨居着在京城做官的或者外官至北京联系事务暂住之人。这些官员和社会名流大都饮宴在广和居。像清末洋务派首领、军机大臣张之洞，户部尚书翁同龢，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等人都曾就餐于广和居。

民国初年，我国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曾在南半截胡同里绍兴会馆住了7年多，曾多次到广和居吃饭，鲁迅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广和居，其中有“夜饮于广和居”的记载。

广和居如此吸引这么多的官员和社会名流，到此店饮宴就餐，是与离得近，方便有关。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更主要的是，广和居店堂宽绰，布置雅致，饭菜味道好，有特色。整个店堂是个大四合院，院中的大房是人多聚宴的厅堂，小房是一二人相会之雅座。环境十分清静，很适合文雅人在此或独饮或会友。广和居

经营的是山东菜，过去北京的各大饭庄、饭馆，大多都是山东菜，南方饭庄、饭馆为数很少。广和居的饭菜，既有普通的炸丸子、溜丸子、炒肉片、溜肉片等，也有烩海参、烩鱼翅、糟溜鱼片、炒虾仁、烩虾仁等高档饭菜。而且，他们做的每一种菜，要形有形，要味有味。因此，引来一些士大夫、文人墨客在广和居饮宴。

1928 年，国民政府从北京迁至南京后，广和居的食客逐渐减少，生意日衰，后迁至宣武门内，又维持几年就停业了。

六、谭家菜馆

谭家菜馆位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里路西，在一个住家的小四合院中，门前没任何标志，不知道的根本就不知这里是个饭馆。但是，它很有名。就连周恩来总理都知道有个谭家菜，解放初期，总理指示“一定不要让谭家菜失传”。

谭家菜馆从什么时间开始营业，无法考查。因为其经营者谭祖任原是个政府官员，民国初年时还在湖北省武汉电政监督的任上。可能是他解任后，谭家的女眷郭丽凤就开始经营起家庭菜馆了。

谭家菜馆出名就是菜烹调的好，掌勺人郭丽凤是广东人，从小就喜欢下厨房，做得一手的好广东菜。而且对四川、沪宁、淮扬和北方的山东等菜也很有研究。她做的菜是在广东菜的基础上，吸收各地菜的烹调方法，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谭家菜。谭家做的海参、鱼翅等山珍海味和鸡鸭鱼肉等菜，由于选料新鲜，烹调讲究，各种菜都是色、形、味俱佳。

谭家菜所以人人爱吃，无论南方人或北方人都适合口味，是其菜做得咸中带甜，甜中带咸，这是谭家菜的一大特点。谭家菜掌厨人对火候掌握得好，旺火和文火使用得恰到好处。所以，烹调出的菜看着漂亮，吃入口中味美，这又是谭家菜一大特点。谭家做出的菜，软硬适中，以软烂为主，所以，老少爱吃，特别适合老年人口味，这是谭家菜第三个大特点。一般掌厨人都喜使用

味精调料，而谭家菜很少使用味精调味品，讲究用原汁本味，这是谭家菜的第四大特点。

旧时，经商的人都知道，什么买卖都好做，就是饭馆的生意不好做。因为卖什么商品，卖不卖都没有关系；而开饭馆不行，菜、鱼、肉你都准备了，不进客人，没有吃，搁两天都坏了，这就是“货吃你”。菜、鱼、肉你准备少了，而客人多，没的卖，客人要什么你没什么。谭家菜馆不存在这个问题，都是经亲戚、朋友介绍或是慕名而来的，先订好饭菜，按日子摆桌就餐。在北京沦陷时期，各大饭庄、饭馆，生意都不景气，惟独谭家菜馆生意兴隆。订酒席者得排队，每月没有空闲的日子，排得满满的。

解放后，1958 年谭家菜的传人彭长海等人并入北京饭店的外餐厅，为中外人士服务。并不断地得到中外各界的赞誉。

七、广安菜市场

广安菜市场位于菜市口西侧路北，即今广安门内大街外，因此称此名。这个菜市场是原菜市里各菜行组建而成。像民国年间，该菜市场里的中兴、利兴、和兴、洪兴、俊兴、复兴、恩兴、俊山、泉茂、永聚、乾丰、仁和、德春等字号原都是菜市口菜市中的 13 个大菜行。前文“菜市口的历史沿革”中，已介绍了菜市来历。北京在清末民初有五大菜市，而以菜市口的菜市不仅历史最久而且规模也最大。过去广安门外和右安门外一带的农民将自产的蔬菜运到菜市，不许私自售卖，必须经过菜市里的菜行定价、过秤，才能与买主成交。

菜市口菜市的 13 个大菜行都有清政府发的“牙帖”，也就是营业许可证。菜行既垄断菜市行情，还控制买卖双方的交易权。到菜市买菜的都是油盐店中菜柜的伙计和担担卖菜的小贩。买卖双方经菜行说好价钱，再由菜行人给过秤，这样买卖做成后，菜行从菜价中扣除佣钱。

解放后，50 年代初，人民政府取缔了这种封建性的菜行。把

原来的菜行组织到广安菜市场中营业，规定买卖公平，不能强买强卖。

第七章　天桥地区

第一节　天桥地理变迁

一、天桥的具体位置

提起天桥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但是，如果进一步问：天桥具体的位置在哪？可能就说不清了。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北从现今的天坛路和永安路，南至天桥百货商场，西起香厂路，东至精忠（庙）街。在这一大片范围中都叫天桥。

以上说的这片地方只是对天桥的泛指，而天桥具体位置没有说出来。知道天桥的具体位置，特别是看见过天桥的人，现在只有那些70岁以上的人啦。因为天桥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由于展宽马路，就已经拆除了。笔者曾见过天桥一面，在我七八岁时，也就是民国二十二十一年，随家中大人去玩，走过天桥一回。我清楚记得桥栏杆是白色石头的，靠着石栏杆有卖东西的小贩，有乞丐，还有手持小旗招兵的。后来，再去天桥玩，这座石桥就不见了。用现在地名说，这座天桥坐落在前门大街，天桥南大街，天坛路，永安路，这四条路的交汇点处。这座桥是南北走人、过车马，桥下由西往东流水。

二、天桥与龙须沟

这个题目可能有些人觉得奇怪，天桥与龙须沟有什么关系呢？天桥与龙须沟不仅有关系，而且大有关系。

天桥桥下从西往东流的水，就叫龙须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编绘的《明北京城复原图》上绘记，从前门西响闸南流之水，与梁家园东流之水，在虎坊桥汇合后向东南流，而后又折东，到前门至永定门之间大道处，穿过天桥，经过金鱼池、红桥，向东南在左安门西侧，出城流入护城河中。这条河就是龙须沟。

三、早年的龙须沟——水流清澈，天桥是风景优美的游玩区

在清光绪年间以前，龙须沟并不是像老舍先生在电影《龙须沟》中描述的那样，又脏又臭，而是水流清澈。在天桥一带是河泊交汇，风光美好，像北国江南。据现存的《正阳桥疏渠记》碑记：在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因为天桥至永定门大道两旁水积太多，已成泽国。所以进行疏渠。这碑为乾隆手书，现存在天坛路北侧的红庙街 71 号院中。并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据光绪年间成书的《天咫偶闻》书中记：“宿雨初霁，踏青至天桥，登酒楼小饮，稚柳清波，漪空皱绿。渺渺余怀，如在江南村店矣”。由以上两个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知晓，当年龙须沟的河道，天桥一带的风光甚是喜人。每至初春，一些文人墨客，官僚富人，喜欢至天桥踏青游春，并赋诗作歌，抒发雅趣情怀。

四、龙须沟变脏变臭

龙须沟又是怎样变脏变臭的呢？在清末民初时，龙须沟沿岸，天桥以西的香厂、蜡烛芯胡同、永安桥、阡儿胡同等开设了 41 个洗染皮毛的小作坊。天桥以东的半壁街、苏家坡和东大市也开设了 81 个洗染皮毛小作坊（《北京市工商界联合会会员录统计》）。这些小作坊随便往龙须沟里排放污水，又由于龙须沟沿岸居民任意往龙须沟旁倾倒垃圾，致使龙须沟变脏变臭。夏天蚊蝇乱飞，臭水到处流。

五、天桥以西的龙须沟明沟改成暗沟

民国三年（1914 年），京师警察厅将天桥迤西的香厂地区规划为“模范市区”，又称“新市区”。计划北起虎坊桥大街，南至先

农坛，东起天桥，西至虎坊路，在这个地区进行开发建议。鉴于这个地区内城市建设的发展，市政当局开始投资整治龙须沟的西段。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记载："龙须沟年久失修，其壅塞湮积较大明濠为尤甚。现在外城商况日盛，居民日繁，该沟亟宜修理。"但是，限于经费不足，所以，当年只将天桥以西"邻近商场，餐馆林立，距城南公园尤近，于交通卫生均大有关系……香厂以南，城南公园以北之龙须沟，计西自永安桥起东至仁寿寺之南止一段，先行掏挖，改砌暗沟"。后来不久，又将暗沟砌至天桥。工程告竣，天桥以西的脏臭的龙须沟不见了，上面并修了马路，命名"永安路"。

而天桥以东的龙须沟明沟没有动，直到北京解放后，1950 年才将这段龙须沟明沟改砌成暗沟。

第二节　天桥市场的出现

一、集吃、穿、用、玩于一起的天桥市场

天桥市场从清末出现，至民国时期盛极一时，当年曾与东安市场一内城一外城，一洋一土，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各自客人。各种小手工业作坊的伙计、学徒，做小生意的小贩，拉人力车的车夫，各种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群众，都是天桥市场的热情客人。他们平日交谈离不开天桥，歇工时必去逛天桥。笔者曾接触过许多的手工业和各种劳动者，他们都说喜欢天桥，只要有空就去天桥，并且一去就是一天。

这些人所以都喜欢天桥，愿意逛天桥，因为到了天桥，要吃有各种风味小吃，有二荤铺，要穿有卖估衣的货摊，有家庭日常用品有杂品旧货摊，要看戏、看说相声、看摔跤的有戏棚、有各种文艺场子。而且都花钱不多，极其大众化。

二、最先出现的是旧货市场

过去和现在大多数研究和介绍天桥的文章，其着眼点都放在各种戏棚和艺人卖艺的场所，忽略了对旧货摊和小吃摊的介绍。而实际上，天桥的旧货市场和各种风味小吃摊也是天桥市场中的主体，并且旧货市场是在天桥市场中最先出现的。

三、天桥的旧铁器杂项和估衣市的出现

据曾在天桥东侧摆旧铁器摊的李永年说："50 年代初，我在天桥东，龙须沟旁'铁巷子'摆摊卖旧铁器多年。我是接我父亲的班，我父亲在'铁巷子'摆摊，是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以前。当时，天桥以南的卖艺的把式场还一个没有。那一带地方尽是洼地和水坑。"另一位在天桥估衣棚子卖估衣的朱顺说："我从十几岁就在天桥估衣棚当小学徒，那时在天桥附近只有铁货摊和卖茶的茶馆，没有一个卖艺的场子"。

《江湖丛谈》出版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是一部专门介绍北京社会民风的书。其中介绍天桥沿革、变迁的文中记："两坛（天坛、先农坛）之北天桥之南，地势很低，尽是水坑。天桥附近有些做买卖的。……天桥以前尽是浮摊，估衣摊、铜铁破烂摊，叫卖商贩销货之所"。

天桥的旧铁器杂项摊，从天桥根摆起，沿龙须沟北岸往东直摆至精忠庙街，长约半里。上百个小铁杂项棚摊。所以，有"铁巷子"之称。

估衣棚子在"铁巷子"之南，天坛之西，搭的都是布棚，棚内光线很暗。这是卖估衣掌柜的有意这么做的。估衣是旧货，顾客在棚内会将褪了色的衣裳看成颜色很好。买了给了钱，出棚就不退不换，这是当时估衣行的行规。

因为天桥市场是从天桥附近的旧铁器杂项"铁巷子"和估衣棚子兴起的，故有天桥市场之名。后来极其兴盛的，远离天桥以南的戏园、各种卖艺场子，虽然靠近先农坛，有的也命名为"先

农市场”、“城南商场”、“公平市场”等，但游人都统称其为“天桥”。

以上这些旧铁杂项摊和估衣棚子出现后，继之而开办的是，永定门大街以东的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等用席箔搭的戏棚子。这三台戏棚子曾兴旺过，梆子演员崔灵芝，京剧名武丑张黑都在这三个戏棚演出过。

四、天桥的“二道坛门”立为刑场

由于天桥市场的发展，这一带成为各阶层特别是劳动群众喜欢游逛的地方。所以，民国政府成立，京师警察厅就将处决犯人的刑场从菜市口迁至天桥南侧的“二道坛门”。就是先农坛东门的第二座门。以便游人围观，达到弃尸于市，惩一儆百的目的。

第三节　天桥市场的鼎盛时期

一、东、西两大市场

天桥的市场以永定门内大街（今天桥南大街）分，大街东是东市场，大街西是西市场。前文说的“铁巷子”、估衣棚子、歌舞台、燕舞台和乐舞台都属于东市场范围之内。最先兴起的是东市场。西市场内有先农市场、城南商场和公平市场。西市场是继东市场后兴起的。

西市场内升平戏棚大火，延及东市场。民国七年（1918 年）1 月 16 日晚，坐落在天桥街西的升平戏棚，“因升平戏棚于散戏后，人已散净时，该戏棚女座栏内有火柴及吸烟余火，该戏棚人失于检查，以致火起”（《外右五区警察察署民国七年开办天桥临时市场来往文件收支租款报告书》）。升平戏棚和附近摊棚都是席箔搭的临时棚，属易燃之物，虽有消防队和商民水会等赶来救火，但火势很猛，不容易控制。遂又将大街东的燕舞台、歌舞台等烧着。这次大火，损失惨重。计共有升平戏棚、燕舞台、歌舞台、东兴

茶棚、中华坤书棚等13家被烧光。

此后，燕舞台、歌舞台虽然曾筹资重建，但由于西市场戏园、电影棚和各种文娱、杂耍场子等大量出现，游人观众都拥向西市场，东市场的戏棚观众寥寥无几，生意不振，遂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先后停办了。从此，东市场只有货摊，没有戏棚和其他文艺娱乐的场子了。

二、天桥市场的鼎盛时期

天桥市场从20年代中期，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这十几年是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据《北平日报》1930年2月16、17日《天桥商场社会调查》一文写：“本市之天桥地方，乃是五方杂处，又可为全市繁荣之中心。……近两年平市繁荣顿减，惟天桥依然繁荣异常，各地商业不振，惟天桥商业发达。”该文归结其原因有三，“（一）天桥地基宽大，容纳工商、游艺极多。（二）游人无需花钱购票，是以上下阶级俱全。（三）具有平民公园性质，买卖物品及闲游均可。”该文最后记：市“惟据老于社会之人所述，买衣之人多至天桥估衣市，较比成做便宜多，非穿新衣不可者，亦多往天桥购买布头，较布铺减价数成……闻该处大布摊每日所收之款，竟有超过著名大布店者”。

三、天乐戏园的梁益鸣——有“天桥马连良”之美名

在二三十年代，天桥有天乐、小桃园、小小桃园、万盛轩、吉祥和戏棚、升平、歌舞台、燕舞台和乐舞台等十来家戏园。各戏园、戏棚每天都有演出，有的演京剧，有的演评剧。美玉霜在小桃园演出，经常上演《珍珠衫》、《桃花庵》、《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戏，由于她的扮相和嗓音近于当时享誉舞台的评戏皇后白玉霜，故有“天桥白玉霜”之称。王益禄是演京剧武生的，他在小小桃园以《挑滑车》、《走麦城》、《长坂坡》等大武生戏和红生戏见长，天天客满。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在天乐戏园演出的梁益鸣，他的大名传遍天桥，只要常去天桥的人，没有不知道梁益鸣

的。

梁益鸣（1915——1970年）北京通县人。自幼入天桥群益社科班学戏，先学武生后又学老生。出科后，就外出到天津、河北、上海等地跑码头，在外边演出饱受生活的辛酸。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到北京，与武生演员张宝华组织鸣华京剧团，长期在天桥天乐戏园演出。开始他上演的是余派戏《珠帘寨》、《洪羊洞》，谭派戏《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一次，他看了一出马连良演出的《串龙珠》，就迷上了马派戏。从此，不论马连良在什么剧场演出，他都追着看。买不着坐票，买张站票也要看，而且坚持到终场。他还买了不少的马连良灌的唱片，边放边模仿。当时，梁益鸣曾想拜马连良为师，但当时京剧界有大街南北之分。就是以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身份高，街南身份低，街北的演员绝不到街南去演，街南的演员也没资格到街北演出。所以，梁益鸣虽然多次托人去说，都遭到拒绝。

由于梁益鸣的坚强毅力，对艺术的刻苦追求，私淑马派，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凡马连良演出的戏，梁益鸣都演。所以，天桥的观众给梁益鸣送了这“天桥马连良”的美名。

笔者也是个戏迷，过去经常去天桥，多次看梁益鸣的演出，他的唱、念、作都像马连良，所不足的是他的扮相没有马连良那相潇洒。

北平解放后，大街南北的旧观念消除，梁益鸣不仅能到街北的庆乐、大众等戏园演出，而且，1959年梁益鸣宿愿得偿，终于拜在马连良的门下。

四、相声大师侯宝林在天桥——最早学戏唱戏的地方

相声大师侯宝林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回忆：“我十二岁那年（1929年），到颜老师家学戏，开始了我的卖艺生涯。我最早唱戏的地方是天桥的三角市场‘平地茶园’就在那里。”

他说，平地茶园是天桥有名“八大怪”之一“云里飞”的场

子。当时已是云里飞第二当场主了。每天演唱从午饭后开始一直唱到晚饭前为止。唱戏的行头是纸盒糊的帽子，这种纸盒是香烟盒，上面印着香烟的商标。一顶纸帽子，上面什么牌儿的商标都有。将大褂不系扣，敞着怀就算是戏衣，只有胡子和马鞭是真的。有一件特制的戏衣，把面口袋染红了，缝个背心，上至天子，下至走卒，都能穿。我们那时唱戏，除了给烟卷公司做义务广告，还给德寿堂药铺牛黄解毒丸做义务广告。因为唱戏的上场门、下场门得用台幛，德寿堂就送给你台幛，上印“康氏牛黄解毒丸”字样。那时我们的场子搭的是席棚。当时，天桥的场大都是露天的，搭棚的少。棚有两种，一种是席棚，一种是布棚。后来，因为老师和“云里飞”闹翻了，我就离开了天桥。

五、宝三的摔跤场

二三十年代，天桥的摔跤场子有好几个，沈三、宝三、张狗子等。其中以宝三的场子跤手多，时间也最长，一直摔到解放初期。

宝三名叫宝善林，他是清末民初，名跤手宛八爷的徒弟。天桥东侧的红庙的跤场就是宛八爷的，跟宛八爷学跤的有许多人，沈三、宝三、快跤满宝珍等都是宛八爷的徒弟。

宝善林五短身材，虎头短项，看上去就很健壮。前胸和两臂都纹了身，这是过去练武之人的习俗。宝三的场子夏天因搭有遮荫的席棚，所以，只能摔跤。到了秋后，席棚拆掉，到快收场时加练中幡。练中幡时，宝三和他的徒弟四五个人同时上场，经常的招数是，“左担山”、“右担山”、“霸王举鼎”、“苏秦背剑”等。由于天桥练中幡的就宝三独一份，其他地方练中幡的又很少，因此，每天傍晚，其他场子已经收了，而宝三的场子依然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些人就是专为看宝三练中幡的。

北平解放后，宝三被邀为国家级中国式摔跤裁判，他的徒弟陈金泉成为中国式摔跤运动健将。

六、张宝忠把式场

天桥的把式场有张宝忠、胡老道、牛茂生、朱国全等几个场子。

张宝忠在天桥以练大刀出了名，是天桥一个很招人的场子。张宝忠练武术是门里出身，他父亲是人称“弹子张”的武林高手张玉山。笔者曾在天桥看过张玉山打弹子。说这话是60多年前的事，当时张玉山约有60岁。左手持弓，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个泥弹，将泥弹放入弓弦当中的弹碗中，拉起弓只听啪的一声，泥弹就将桌上茶壶嘴上的泥弹丸打碎，而茶壶安然无恙。

张宝忠从小就跟他父亲学习武艺，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件件会练。每天他都是先练双手握凉棚立杆使整个身子悬空平直、而后腿朝空、头朝下，他说这功夫是幼年学的。快收场时练大刀。他场子里地上放着两把大铁刀。一把重160斤，一把重240斤。不过他只练几手，先用双手将大刀举过头顶，而后左、右单手举刀等。他的场子不要钱，练武术、练大刀主要是招引游人围观，而后售卖滋补大力丸。

张宝忠练大刀卖大力丸的场子，从清末民初他父亲张玉山起，在天桥几十年，日本侵占北平后，他的场子就不见了。后来，听快板书名手高凤山说，张宝忠遭陷害以“私通八路军”关进日本宪兵队。在狱中受了许多酷刑，虽然没死在狱里，但出狱后，身子已成了残躯。

胡老道在天桥呆的日子不长，但给人们的印象很深。笔者爱看他练软功。他有50多岁，细高个，头顶卷牛心发，赤着上身。偌大年纪他可以用杆红缨枪横放于脑后，而后将双脚攀在枪杆左右，双手撑着地。

牛茂生与胡老道不一样，他是练硬功的。他可以同时拉开三张硬弓。一张弓背套于脑后，双脚蹬弓弦，两张弓交叉于背后，左右手向左右推弓弦，同时用力，三张硬弓就拉开了。

朱国全也是练硬功的。牛国全经常练的绝活是赤着背，双手抱着单刀，竖起刀刃放在自己左胸上，让别人手握三节棍往刀背上打。打完皮肉不伤，只在他的胸上有道白印。

七、相声和鼓书场子

天桥的相声和鼓书场子太多了，数不过来。在天桥说相声的艺人有“万人迷”，笔者没赶上。后来著名的焦德海、陈子贞、高玉峰、高德明、张寿臣等都在天桥撂过场。其中以焦德海时间长，他演的《歪批三字经》、《开粥厂》等最受欢迎。

天桥大鼓场主要是唱西河大鼓，以唱成本大套的书为主。如田玉峰唱的《薛刚反唐》、《白袍跨海征东》，马连登唱的《盗马金枪杨家将》，蔡金波唱的《呼家将》最受欢迎。因为这些成本书都是接着唱的，故事性强，所以，有些人都是天天来听。天桥除有唱西河大鼓成套本书外，还有关顺贵、关顺鹏唱成本竹板书。他们以唱《前后七国》而闻名。

八、天桥八大怪

天桥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许多怀有奇术的人在此撂地卖艺。天桥的八怪就是这些众多有奇才艺人的代表。

天桥的八怪前后有三批，但说法各异，有说张三的，有说李四的，也有说王五的。第一批有唱太平歌词的“穷不怕”，原名朱文文，有以表演滑稽说唱出名的“醋尿高”，有擅长说笑话和摹仿各种叫卖声的韩麻子，有总是用敲盆为伴奏唱曲的“盆秃子”，有练杠子的田瘸子，有说化妆相声的孙丑子，有用鼻子吹竹管奏曲子的“打麻货铁壶的”，有开石头的常傻子等八人。

第二批有唱滑稽戏的“老云里飞”，有用鼻子吹戏的“花狗熊”，有善演口技的“百鸟张”，有让活蛤蟆表演的“×××”，有让金钟作招幌自己演唱的“金钟儿”，有善演中幡的王小辫，有练铁锤的志真和尚，有顶宝塔碗的程傻子八人。

以上两批天桥八怪，笔者都没赶上，只是听前辈讲说过，所

以只能极略一说而已。第三批天桥八怪，笔者不仅赶上了，而且多次亲眼看过他们的表演。

第三批天桥八怪，第一个是“小云里飞”，关于“小云里飞”前文介绍相声大师侯宝林“最早学戏唱戏的地方”中已说了不少，在此只补充，“小云里飞”叫白宝山。第二个是“大金牙”，他叫焦金池，在天桥拉洋片。他做了个大木箱子，中间镶有八个放大镜，箱内共有八张大画片。游人坐在凳子上透过放大镜往里看画片，大金牙一个人又击锣又打鼓，而且还结合画片内容唱着。虽然在天桥拉洋片的只其一份，（后来他徒弟“小金牙”又接他的班）但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怪的是他口内镶着个金牙，故名。第三个是“张狗子”，名张文山，在天桥摔跤，论摔跤的技巧与宝三、沈三等人比，并不高明，但是他人高一米八开外，体重200多斤，饭量大，一顿饭吃二三斤清油大饼、一斤炖牛肉还不怎么样。因此，在天桥算上一怪。后来，日本侵占北平后，摔跤挣的钱，不够他吃的，就去拉人力车。但是更挣不到钱，饿得大胖子变成个小胖子了。第四个是“大兵黄”。他叫黄才贵，清末当过兵，行武出身。在“七·七事变”前，笔者在天桥的公平市场，也就是天乐戏园的西北一点地方，见到他边骂街边卖糖。由于骂街骂出了名，被列为“八怪之一”。人称其为“大兵黄”。大兵黄是个大高个子，头留着辫子，戴着缎子瓜皮小帽，黄缎马褂，紫缎长衫，白布袜，福字履鞋。背着个大口袋里边装着药糖，手中拿着根手杖。据说他曾在张勋率领的大辫军队中当过兵。大兵黄既不练把式，也不唱曲，他站在那整天骂。今天骂张宗昌，明天骂韩复榘。因为军阀混战，欺压百姓，百姓对这些军阀恨之入骨。大兵黄骂的正是百姓心中想骂、而嘴中不敢骂的话。所以，有些人天天围着大兵黄听他骂街。笔者也多次听大兵黄骂街，但是他骂的都是下野（下台）的军阀大官，没骂过在台上的军阀和大官；骂的都是军阀，没骂过清政府。第五个是“蹭油的”，他名叫周绍棠，他在天桥专

卖癣药和祛油渍药。过去由于人们生活缺乏营养，头上和脸上长癣的多。又由于家境贫寒，一件长衫总穿在身上，没有第二件替换，所以，免不了长衫上有油渍。周绍棠卖药不是坐在那等着人买，而是站在那，手中总拿着癣药和祛油渍药，看见谁脸上有癣，就立刻拉过来往人脸上蹭；看见谁的长衫上有油渍就伸手扯过长衫，抹点吐沫就蹭。边蹭还口中边说："蹭呀蹭，蹭油的，蹭癣的。"大家认为这种卖药的方法，世上少，是一怪。第六个是数来宝的曹麻子，他本名曹德奎。为了招来观众，他脸上抹上彩，头上的带子系着小铜铃放在脑后，头一摇，小铜铃丁当的响，自然引来观众围看。手拿大牛胯骨（行话叫"合扇"），上系 13 个小铃当。敲起来，哗啦啦山响。他随敲牛胯骨随唱，唱的既合辙押韵，而且风趣引人发笑。所以，大家称之为一怪。第七个是傻二楞子，本名叫什么，不清楚。他在天桥练的是硬功夫，将石头放在长凳上，左手按着，右手运足了气，大喊一声，掌落，石头就断了。尤其他练"砸石头"使观众替他捏上一把汗。他赤着上身，脸朝天躺在两条长凳上，让几位年轻力壮的观众，将一扇约有 200 斤的磨盘放在他胸上。另一人抡起大铁锤猛砸磨盘。磨盘碎了，傻二愣子站起来，身上没有一点损伤。这在天桥是独一份，人称之为怪。第八个是"飞、飞、飞"，他叫曹凤鸣，在天桥撂地练杠子。场地上有个单杠，两头都装个带铃当的小龙头。人上杠后，小龙头乱颤，铃当丁当响。凉棚上还挂着两三个高低不等的小杠子。人在小杠子上，左右、上下蹿动，好像飞一样，因而得了"飞、飞、飞"之雅号，是一怪。

另外，也有人将"云里飞"、"大兵黄"、"大金牙"、张狗子、"蹭油的"、张宝忠、傻二愣子和胡老道为第三批"天桥八大怪"。

九、福海居茶馆

当年天桥的茶馆很多，大约有七八家，有清茶馆，就是只卖茶，没有别的娱乐活动，有书茶馆，就是茶馆中有评书演员在茶

馆里说书，有落子馆，里面有女演员唱大鼓书，还有既卖茶又卖饭的茶馆，北京管它叫“二荤铺”。此外还有棋茶馆，供茶客下棋。

福海居茶馆在天桥资格最老，开业于清末，是王姓在天桥迤西开办的，俗呼为“王八茶馆”。这家茶馆是个书茶馆。每天上午只卖清茶，下午2点和晚上6点评书开演。茶客边喝茶边听书。福海居中墙上写着“开书不卖清茶”。就是你进茶馆只喝茶，付茶水钱，不付书钱不行。福海居不仅在天桥，而且在全北京也是极其有名的大书茶馆，馆子宽阔，能容300余位客人听书。一般的小书茶馆只有四五十座位，上百个座位的都不多。评书演员都愿意到福海居说书，因为能多挣钱。但没名的次演员福海居不要，另外，次演员也不敢来，怕听书的客人少，丢脸，两个月说不下来，让茶馆给辞退了。所谓两个月，是书茶馆的规矩，一个评书演员在一个书茶馆说书，两个月为一期，行话叫“一转”。所以，当年在福海居说书的演员都是著名的，像说《包公案》的王杰魁，说《明英烈》的田岚云，说《五女七贞》的袁杰英，说《龙潭鲍骆》的品正三，说《济公传》的刘继业等，这些评书演员在福海居说书，不论“说白天”还是“说灯晚”都是满座。每说完一段，由福海居的伙计手拿一小笸箩向听评书的客人要钱。北平沦陷前，一段书就要一大枚。就是一个大铜板，合20文，50文是1分钱。评书演员与福海居茶馆，都是当天结账，一般是评书演员分七成，福海居茶馆分三成。按“四六”分成的是少数。

十、风味食品摊

要说天桥的风味食品摊既多又整全，什么地方也比不了。

豆汁是北京的特产，也是过去北京人最爱喝的。豆汁是粉房做绿豆粉挤下的浆汁，富有营养，用砂锅加热，熬成。天桥有多处豆汁摊，最有名气、买卖最兴旺的是“豆汁舒”和“豆汁王”两家。据1939年5月10日《新民报》的“天桥百写”专栏中记：“天桥豆汁，以‘舒’字为号的最享荣誉，因为‘豆汁舒’的豆汁

好，咸菜也不坏，所以远方人喜欢喝豆汁者，跨天桥，先找‘豆汁舒’。‘豆汁舒’的买卖一天忙到黑，除了豆汁以外，也兼营炸豆腐等小吃。在小吃界中，‘豆汁舒’不失为清洁卫生，它出名的原因大都在乎此也。”

扒糕摊更多。卖扒糕的到了夏天都兼营凉粉。扒糕是将荞麦面倒在沸水中，用木棒搅成团，再将大团分成若干与人手掌大小的面块，上屉蒸熟即成。顾客买吃时，卖扒糕的拿起一块扒糕放在左手中，右手用小刀将扒糕削为薄片放入碗中，适量投些花椒油、芝麻酱、醋、蒜泥、芥末、胡萝卜丝和辣椒油等佐料。天桥的扒糕以“扒糕满”最有名。

卖羊霜肠的在天桥也有几份。羊霜肠是往羊肠子里灌羊血，下锅煮熟，用刀切成小段放到碗里，浇适量酱油、香菜卖给顾客吃。因羊肠上有羊油好似肠子上有层白霜，故有“羊霜肠”之名。

此外，天桥还有卖爆肚、豆腐脑、老豆腐、清油大饼、锅饼、馅饼等风味食品的。到夏天，天桥卖酸梅汤和冰核的很多。

十一、骗人的勾当

过去北京人常说：“去趟天桥逛，不是受骗就是上当。”这指的是以下种种：

在天桥专以骗人为生的，当属相面算卦的江湖术士之流。据1927年7月5日《晨报》上“相面”一文中统计：天桥的“浮摊以相面的占大多数。复据册后总数标明，天桥一带的相面棚摊，共为91家。”关于天桥一带干算卦的这一营生具体有多少，没有统计，但是在1927年8月24、30日“算卦”一文中记：“兹经调查，……天桥所摆之卦摊，有‘周易’、‘六壬’、‘麻衣’、‘柳庄’等等分别。”由此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在天桥这一带相面、算卦者之多了。可以说离不远就有一家不是相面的，就是算卦的。

先说说天桥相面的如何骗人，天桥相面的有“抹黑”和“老揪”之分。“抹黑”就是他左手拿一块铜板，右手指醮着墨在铜板

上涂抹，并且边抹边念念有词地说："画龙难点睛，画虎难画爪"。游人好奇，不知他在干什么，围过来看。当围观的人多啦，他就不画了，就说："龙虎有形，人有相。我善看人的流年，预卜你的吉凶祸福。"相面算卦行里人，称这种用墨涂抹，为人相面的方法是"抹黑"。什么叫"老揪"呢？老揪就是相面者站在适当地方，突然向行人高喊："我看你印堂发亮，眼下有一笔大财等你去拿。"行人一听自然就站住不走了，过来相面。这就好像把人揪过来一样，故名。相面者，不管"抹黑"的，还是"老揪"的，为把别人的钱骗到手，一般分"前棚"和"后棚"两步。把游人引过来，并用话把人稳住不走，还得使用"乱点枪"。所谓"乱点枪"就是游人被引过来后，紧接着就说："我们这几位，各有各的事，其中有一位正在打官司，不知输赢；有一位想谋事，不知成不成；还有一位媳妇要跟他离婚，不知结果如何。"这就叫"乱点枪"。人们都好奇，自己虽然没有像相面先生说的那些事，但也想看个究竟，所以都不走了。从把游人引来，到将人稳住不走，这一套招术，行话叫"前棚"。后边给人相面把钱骗到手，叫"后棚"。相面方法都是大同小异，要说："欲晓您的流年如何，男左女右各分清，天伦一二初年运，三四周年至天成。"接着问："先生今年高寿？"随后先看脸后看手，都看完后，说："您的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承浆、地格都好，惟独……，"说到这里，就吞吞吐吐地说："您的青年运气不佳，事事遇小人。"接着又说："您交了相钱，我给您细看看。"他收了人家的钱，随后好像很认真地说："您是心直口快之人，吃得亏，让得人，甭看年轻受点磕碰，等老来，运气一定不错，会遇贵人，享老福。"就这样，说几句开心的话，就把钱骗到手。

说完相面的，再说天桥算卦的。天桥有个姓李的测字先生，自称"小神仙"。一次，小神仙的测字摊，来了两个测字人，一个打

扮像商人，一个像小贩。小神仙先给商人打扮的人测字，商人写了个“天”字。小神仙看看这个天字后，就问：“先生您问什么事？”商人说：“我准备与朋友合伙做买卖，想让先生给拿个主意。您看这个伙能搭吗？”小神仙稍一沉思就说：“可以，这个伙能搭，定能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这个商人很高兴地走了。小贩也照样写了个“天”字。小神仙问他：“问什么事？”小贩说：“有两个朋友找我，想凑几个钱，做个小买卖，您看行吗？”小神仙皱着眉头说：“不行，这个伙不能搭，要搭准让人把您坑了。”小贩听了问：“先生，您这个字是怎么测的？人家写个“天”字就好，我写个“天”字就不行，是怎么回事？”小神仙听后说：“不错，你们二位都写的是‘天’字，可是他写字时，手中拿把折扇，而且还在头上拍了两下。扇子骨是竹制的，‘天’字头上加‘竹’字头，就成了‘笑’字。因此，他的合伙做买卖，准能开市大吉。可是，您写的‘天’字就不同了。您写字那张纸下角，恰巧有个撕口，‘天’字下添上‘口’字，不就是变成‘吞’字了吗？合伙做生意，定有人私吞。”小贩听后，无可奈何付了卦金，扫兴而去。

天桥算卦的除测字外，以用《周易》算卦的最多，《周易》中的八种图形就是八卦。用代表阳的符号“—”和代表阴的符号“— —”组成。八卦为：☰，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盌，☲，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用它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天桥等江湖术士把八卦分为“六爻”和“奇门遁甲”。用“六爻”算卦是用 3 枚铜钱放入铜筒（或竹筒）中，求卦人摇动后倒入铜盘里。如此摇倒 6 次。铜一背两面者称“单”，两背一面者称“双”，三面者称“交”，三背者称“重”。而后再用八卦推算。八卦组成八八“六十四卦”。这 64 卦为：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

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诟、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奇门遁甲”是以天干中的“乙、丙、丁”为三奇，以“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八门。二者合称“奇门”。又把天干的“甲”常隐藏于“戊、巳、庚、辛、壬、癸”六仪之中，三奇和六仪又布于九甲，甲不独占一宫，称为“遁甲”。“奇门遁甲”算命者有的设卦摊，有的设于房内，称“问心处”或“赛柳庄”等。搞“六爻”和“奇门遁甲”算卦者，都是用这些有意弄玄虚，使算卦人看得神乎其神，摆卦者也未必全知，不过用此骗钱而已。

天桥除相面、算卦是骗人的外，还有“低头斋”卖过街烂的，卖“老虎”皮袄的，设宝局的。

“低头斋”卖过街烂的，就是摆破鞋摊的。破鞋经过修饰就摆在地上卖，看上去很好，上脚穿，还没走过街呢，鞋就坏了，故称“过街烂”。因为鞋在地上摆着，必须低头看，故名“低头斋”。

所谓“老虎”皮袄，就是破损、掉毛的羊皮袄，经过拾掇，用膏药贴在破损皮子板处，客人当时看不出毛病，拿回家一穿就坏了。所以称“老虎”皮袄。

宝局是赌博之所，天桥宝局设立者都是与警察相勾结的地痞流氓。他们雇有打手，保护这种非法的买卖。“宝”是一种赌博工具，一个方盒，形似小铜墨盒，叫“宝盒”。宝盒里有“一”、“二”、“三”、“四”字样，有个指针。有个大案子，叫宝案子。宝案子上画着一、二、三、四个图样。设宝的人，叫“开宝者”，参加赌博的人叫“押宝”的。开宝者需两个人，一个人是做宝的，他在后边将宝做好，就是将宝盒里的指针拨动好。如果指针指向“二”字，在宝案子上押“二”的人就赢了，其余为输。他把宝做好后，就将宝盒交给前边开宝的人。押宝的人将钱押在宝案子上

的一、二、三、四任何一方；也可押在一和四之间的斜杠上，叫“红杠”，押在二和三之间的斜杠上，叫“黑杠”，押在三和四之间的斜杠上，叫“大杠”，押在一和二之间的斜杠上，叫“小杠”。将宝打开后便知分晓。钱押在一、二、三、四上，输了，押多少钱就都让开宝人收去；赢了，押多少钱，开宝人给多少钱。押在任何一个斜杠上，赢是赢一半，输也是输一半。设宝局的人，都是不务正业之徒，他们以赌博为生，不会输钱的。假如押宝的人赢钱就走，打手就出来拦阻，打人抢钱。所以，凡是去天桥宝局押宝的人，只有输，没有赢。

第四节　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

一、新世界——北京仿上海大世界而建的游艺商场

上海有个大世界游艺商场，北京当局也曾计划将北京建成像上海那样的大都会。所以，把天桥西侧香厂地区规划为“模范市区”。新世界就建在香厂北口路东，民国六年（1917年）落成，据《北京近代建筑历史源流》记：“北京新世界商场共四层（实为五层），在正面另有三层尖塔。‘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建造的’。一楼有剧场，二楼有电影、杂耍场，三楼有曲艺，四楼有餐馆，夏季尚有屋顶花园。”楼内并设有电梯。在这座古老的旧城市里出现了这座奇特新颖的洋楼，轰动了全城，人们争相游览参观，曾兴旺一时。当时的票价是小洋1角，儿童5分。买了一张门票，进去既可看京剧、曲艺，又可看电影。

二、城南游艺园

城南游艺园开业晚新世界一年，其园址在新世界的东南，先农坛外坛的一部分，即今天友谊医院处。园中有京剧演出场、文明戏演出场、电影放映场、游艺场和杂耍演出场。城南游艺园也和新世界一样，买一张门票，进至园中看什么都行。而且城南游

艺场请来的演员都是当时著名的。像京剧演员孟小冬、碧云霞、窦荣芬，京韵大鼓演员刘宝全，相声演员焦德海、刘德智，洋戏法演员韩秉谦等，都是当时极受欢迎的演员。所谓文明戏，就是有说有唱，演的都是现实社会发生的实事，所以，观众看了倍感亲切。民国初年的电影都是外国无声、诙谐、引人发笑的影片。游艺场里有台球、地球、象棋以及各种游戏活动等项目。

由于城南游艺园地方大、宽绰，可玩的项目多，而且京剧、杂耍请来的都是著名演员，所以，每天游人拥挤不堪，盛极一时。

但是，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 年），政府迁至南京后，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游人骤减，不久，就相继停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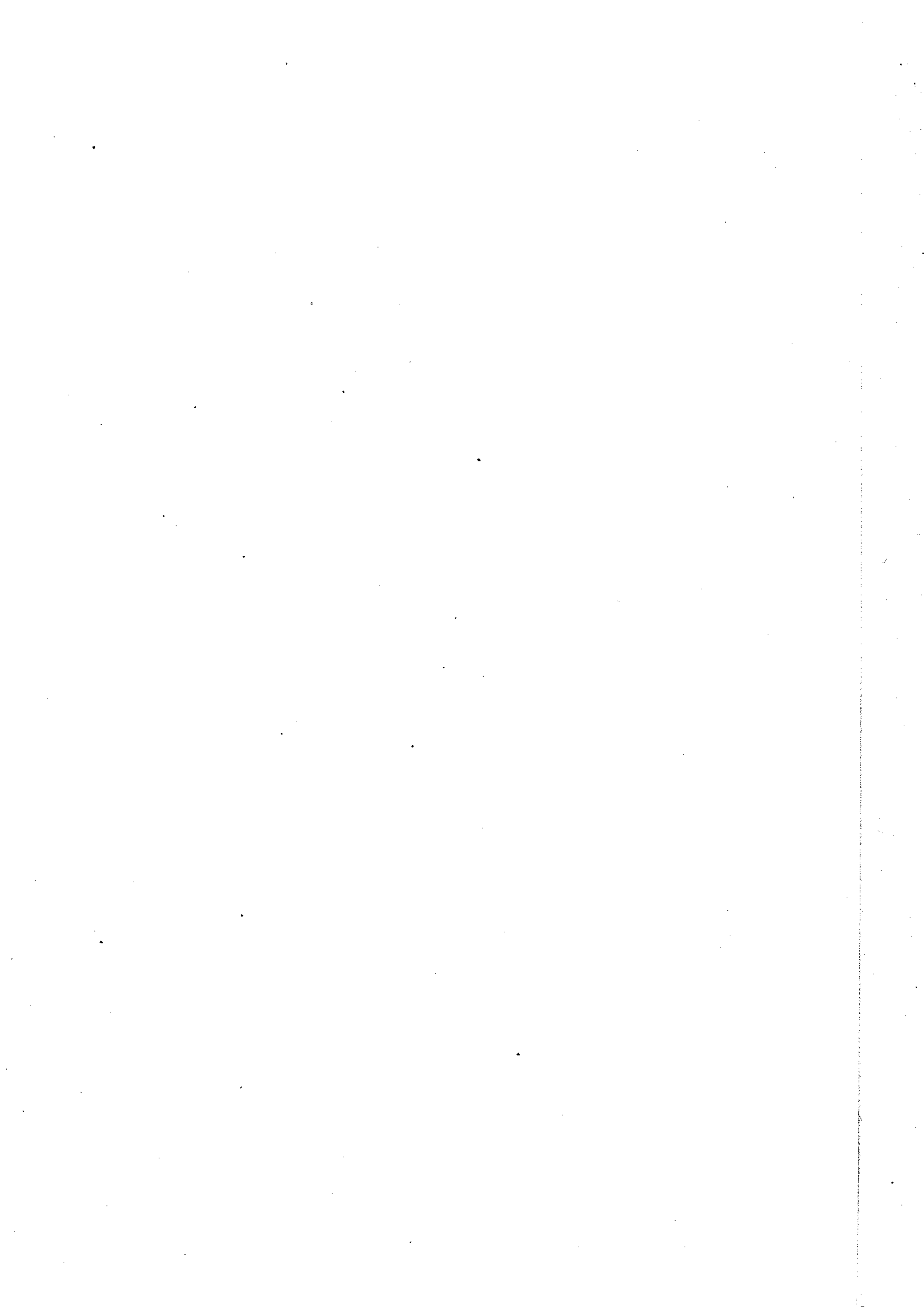
第五节 天桥的“三霸一虎”

天桥的“三霸一虎”也称“四霸天”。这三霸是“东霸天”张德泉，又叫“张八”。他家住天桥东市场，是菜行人，有人命，有歌谣说：“天桥菜市两头洼，不怕阎王怕张八。”“西霸天”福德成，又叫“福六”。家住天桥西，福长街头条。没有正业，在天桥结交地痞流氓，独霸一方，有人命。“南霸天”孙永珍，又叫“孙五”。家住天桥公平市场。他勾结日伪警察，无恶不作，有人命。“一虎”是“林家五虎”之一的恶霸林文华。他是中统特务。菜行人，欺行霸市，为非作歹，勾结日本宪兵队逮捕工人。

北平解放后，1951 年北京人民反霸斗争时，人民政府将“三霸一虎”镇压了。

下 卷

商品单一的商业街



第一章　旧货商业街

昔日北京卖旧货的店铺和货摊很多，可是最集中在东、西两条晓市上。据宣统元年（1909 年）印刊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上记载："晓市东西遥对峙，平明买卖闹如蜂；万般故物杂真赝，准备收摊九点钟。"东晓市在崇文门外，西晓市在宣武门外。最早东晓市在前门外，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宸垣识略》记："东晓市在半壁街南，隙地十余亩，每日寅（早 3—5 点）卯（早 5—7 点）二时，货旧物者萃焉。"后来迁至崇文门外西唐街和驹章胡同一带。西晓市在宣武门外桥东护城河边一带始终没变动。到此设摊卖货的都是下街收旧货"打小鼓"的。到晓市上买货的，天亮以前，估衣铺、古玩铺、金店、首饰楼、钟表店等，有人提着风灯到晓市买货。因之，晓市又叫"鬼市"。天亮以后，一般顾客才到晓市挑选便宜物品。在旧货街有旧衣裳、鞋帽、木器家具、金银首饰、钟表眼镜、锅碗瓢盆，什么都有。因为"打小鼓"的，下街收买旧货不知遇见什么。他们除了枪支武器外，什么都收买。"打小鼓"的，他们下街都敲打个直径约二寸的小皮鼓，故得此名。如《燕台口号一百首》所记："随处搜罗货独奇，到门交易想便宜；小环拾得灵星物，高叫街头打鼓儿。""打小鼓"的分两种，一是腋下夹个小蓝布包，内包戥子和试金石，他们专买金银首饰、古玩玉器、硬木家具、贵重衣物等。人称为"打硬鼓"的；另一种是挑担，以买各种坏旧物品、铜铁之物等。人称为"挑担的"。

过去北京除以上晓市的旧货街外，还有个售卖估衣的估衣街。

这个估衣街就在前门外的半壁街。据北京估衣行公会会员户名录记，在民国年间，半壁街中有宝兴厚、功昌号、永兴号、福成义、裕兴昌、隆兴成、兴顺义、天和聚、同益和、恒义号、聚兴隆、义盛公、三义永、同兴永、永和成、广通号、聚和永等56家估衣铺，其中以裕兴昌估衣铺规模大、有名，下面就介绍它的情况。

一、开业

裕兴昌估衣铺的掌柜叫刘毓宝。他十四五岁时就进半壁街同益合估衣铺学徒，满徒后，在本柜同益合效力了两三年，离开同益合就自己干。刘毓宝为人勤奋，思路活，所以，他虽然当时还只是资本极少，每天跑晓市抓货再倒手卖出去，生意却做得很兴旺。干了几年，就与同行合资于民国五六年（1916、1917年）开办了裕兴昌估衣铺。

二、昌盛

估衣铺属旧货行一种，旧货行包括当铺、挂货铺、古玩铺及下街收买破烂“打鼓儿”的。旧货行当年在北京所以很发达，是因为勤俭节省是当时社会上崇尚的风气。在估衣铺买一件像样的旧衣服要比做一件同样新衣服钱省得多。裕兴昌估衣铺从业人员，连掌柜、管账先生在内共有七八个人。刘毓宝管理有方，为了能使每个职工都积极为买卖出力，刘毓宝规定店铺为每个学徒和店伙提供免费食宿，并规定除学徒外，每个店伙既有月工薪又有提成的活工薪。月工薪从4元钱起，最高9元钱。年轻的新出师的店伙挣4元钱，管账先生、有本事能为店铺赚钱的店伙挣最高工薪9元钱。提成活工薪是每月结账后，按纯利分成。店铺得七成，全体店伙得三成。店伙得的三成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根据职务起

的作用不同进行分配。管账先生和上市抓货的分得多，在店中卖货的分得少。

裕兴昌估衣铺货源有从晓市上抓的，“抓”是估衣铺的行话，就是从“打小鼓”的手中买。北京在解放前，沿街收买旧货的小贩都打个小皮鼓，所以称“打小鼓”的。从当铺里买，当铺里当物，超过规定日期不赎就算“死当”。当铺每年都进行“打当”，就是进行处理死当。裕兴昌估衣铺有专人跑当铺参加打当，从中收买合适的旧估衣。此外他们也从拍卖行里收买旧估衣。不论上晓市抓货、参加当铺打当，还是去拍卖行从拍卖中收货都必须眼力好，识货，了解行情。识货，在估衣铺最重要，当年裕兴昌估衣铺买卖兴隆，获利丰，就是该估衣铺有两个能识货、眼力好的“把式”。呢绒绸缎，细毛皮货等货的真伪、成色、行情这两个人都吃得很透，出门抓货没买过赔钱的货。

门市卖货需要能说会道的店伙，裕兴昌估衣铺也有两个看人行事，会察言观色，善言谈、会做买卖的店伙。诚心诚意来店买货的顾客不用说，就连那犹疑不定的顾客，他们也要让其把货买去。裕兴昌估衣铺和其他估衣铺一样，商品不是明码标价，言不二价。他们在每件商品上拴有一小白布条，上记暗码。“么（一）、柳（二）、搜（三）、扫（四）、崴（五）、料（六）、撬（七）、奔（八）、脚（九）、杓（十）”十个数字。是估衣铺标价的暗码。如一件绸衫上写“柳崴”就是2元5角。一件狐毛皮衣上写“料杓”就是60元钱。在谈生意中，看顾客要价，经过讨价还价，让顾客将货买去。顾客自认为买得便宜，其实并不便宜。

一般估衣铺都是怎么收进来的，怎么卖，不进行洗濯、缝补加工。所以他们凡是“虫吃、残破”的呢绒、绸缎衣裳都不收买，而裕兴昌估衣铺却不论呢绒、绸缎等衣裳好坏都收买。特别是收买虫吃残破的呢绒、绸缎，经过修理缝补还可以赚大钱。裕兴昌估衣铺请来了一个善于缝补虫吃残破呢绒、绸缎旧衣裳的师傅专

做修补活。别人不收买的，裕兴昌用极低的价格买进，经过缝补在门市低于市价卖出，顾客高兴，可是裕兴昌还能赚得好利润。

裕兴昌估衣铺的顾客有买棉布衣裳的一般顾客，也有买呢绒、绸缎和皮毛衣裳的高等顾客。但是，不论是买普通棉布衣裳的，还是买呢绒、绸缎、皮毛等高等衣裳的顾客，都不是讲究的人，因为讲究之人就不穿估衣啦，都自己买材料找裁缝做新衣裳穿啦。所以，裕兴昌接待的顾客，都是想省钱，又想穿好衣裳的穷要面子的人。

三、结束营业

社会不发达，老百姓生活穷困时，正是估衣铺兴旺时。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老百姓不得安宁，工农业生产不景气，而估衣铺买卖忙。1937 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物价不断爆涨，老百姓衣食无着，北京的各业一片萧条，惟有裕兴昌估衣铺生意昌盛。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裕兴昌估衣铺开始衰落。1956 年并入旧货行中，裕兴昌估衣铺就结束营业，不复存在了。

第二章　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

解放前，位于崇文门外南药王庙前，西从水道子南口起，东至红桥，在这条长街上有百货批发店铺和摊商3000多户，经营的商品达6000多种。它是华北各省最大、最有名的百货批发街。

这个百货批发街出现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因为当时在南药王庙一带，有些帽子、荷包、布袜子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每天上午都到南药王庙前设摊卖货。进入民国年间后，远近各种手工业作坊纷纷到这条街来，货摊从原来的十几个，发展到五六十个。商品增加了布鞋、腿带、钢针、棉线、线绳、手巾、烟袋、网子、肥皂、头油、眼镜、眼镜盒等。每天太阳刚升起，货摊就满街摆上，中午11点左右收摊。到了20年代，这条街上的货摊增加近300个，商品约有三四百种。货摊从水道子南口往东大街北侧，一个挨一个摆成两行，直摆到南药王庙的东边。来这个百货批发街的客户，最初主要是那些赶庙会摆小摊的小商贩和四乡八镇的作买卖者。后来，一些外地的客商也来此办货，特别是西北、河北、河南客户较多。

由于货摊不断增多，买卖兴隆，因此，当时不仅手工业作坊把这条街当做“宝地”，官府也把这条街视为进财之道。从清末起，官府规定一个摊位每月上缴30个铜元的税钱。尽管每个货摊对货位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是，私下里街上一块2米长、1米宽的货位价值可高达五六百银元。

1937年，商人周芝轩在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上，开办了成记

洋广百货批发商店，这是该街出现的第一家店铺。成记开业后，来此办货的人很多，生意兴旺。不久，一个叫刘焕亭的也来该街开设了同益诚洋广百货批发商店。此后，栾亭臣、栾亭和兄弟二人合办的西聚成洋广百货批发商店，除金轩办的广义成百货批发商店，杨善亭办的永远商店等相继开业。1939 年，亿兆商店的百货批发部也从前门外瓜子店迁至这条街上。这些旧北京大的百货批发商店集中于此后，使这条百货批发街更趋繁荣，30 年代末，40 年代初，是这条百货批发街的鼎盛时期。每天各地客商来此洽商生意的络绎不绝。在几百个百货批发店、摊中，资本最雄厚、商品最齐全、买卖最好的当属亿兆商店。该店有从业人员约二百人，在上海有专人“坐庄”与厂家联系进货；在日本大阪也有专人“坐庄”，直接从日本进货。亿兆还有一批“跑外”（推销员）的，他们各跑一方，有跑内城的，有跑外城的，有跑郊区的，还有跑客店的。当年，外地商人到北京办货一般都住在前门和崇文门外的花市、巾帽胡同、喜鹊胡同等客栈里。亿兆商店的跑外的就是到这些客栈里与外地商人谈买卖。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货涌入北京市场，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货垄断了北平百货市场。在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上，我国的民族工业商品没有力量与日本货竞争，大部分手工业商品货摊生意不好。1945 年，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取代了日本货的地位，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上的民族工业商品货摊依然不景气。由于连年战争和反动统治者的搜刮掠夺，物价飞涨，不法商人乘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上，有不少货摊破产。大多数百货批发商店也奄奄一息，整条街前景暗淡。

1949 年北平解放，北京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城乡互相，物资交流”的方针，大力扶植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的发展。固定摊位，建立组织，10 个摊位为一组，设一组长。并要求，明码标价，公平交易，卖货开票。经过几年的恢复

和发展，到1955年，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店铺和摊商发展到3000多户，经营的商品有百货、布匹、服装、刺绣、文具、搪瓷、钢精制品、线袜、绦带、毛巾、手套、丝线、鞋帽等6000多种。1956年，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的全体店铺和摊商都参加了公私合营。北京市组建了几个专营公司，这条街的店铺和摊商都到北京市百货批发公司工作。从此，南药王庙百货批发街的历史宣告结束。

第三章　皮货街

皮货是指冬季人们御寒所用的皮衣皮褥等物。过去在北京都集中在前门外的东珠市口、西半壁街这两条街上，据不完全统计，东珠市口街上有同和成、德聚源、永庆和、天发成、义源长、祥庆福、德富成、东源聚、福利成、德源兴、全兴永等 37 家皮货行。西半壁街上有广盛茂、义恒永、祥福泰、庆兴德、荣益成、恒兴号、如茂号、吉祥兴、万盛号、恒和广、万成号、德义昌等 60 家皮货行。

此外，在前门大街、大蒋家（大江）胡同、东大市等街上也有几家皮货行，为数较少，称不上皮货街。

以上这些街上的皮货行分细毛皮和老羊皮两大行业。细毛又称直毛，老羊皮称粗毛或大毛。下面分行业介绍两个著名的店铺，细毛皮货介绍西半壁街的广盛茂皮局，老羊皮行介绍前门大街的兴盛荣皮货庄，虽然兴盛荣不在皮货行集中的皮货街上，但它在老羊皮业中很有代表性。

广盛茂皮局创办于清代咸丰（公元 1851——1861 年）年间。这是一家合伙的买卖，五六股共合资白银六千余两，买卖开张后，由于领东（资方代理）掌柜善于经营会做买卖，又由于当时有钱之人每至天气寒冷的冬季都喜欢购买貂皮、狐皮等高级皮毛做衣御寒。所以，广盛茂皮局生意极为兴隆。

广盛茂皮局进货选高质量的皮毛。为此必须有眼力好、识货的采购人员。广盛茂皮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有三四个善于看货

的伙友，掌柜派他们出去办货。细毛皮在我国多产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新疆、宁夏和内蒙古等大山、森林以及江南一带的大江大河中。像黑龙江、吉林的长白山以产貂皮、狐皮、黄鼠狼皮和灰鼠皮出名。宁夏黄河套出产的羊皮毛，皮板薄、轻，毛白细长，被称为“滩羊”，是驰名全国的贵重皮毛。其次如四川大江中出产的水獭皮，新疆产的旱獭皮也是名产品。皮毛讲究冬季“三九”天的货，因为这个季节皮毛底绒最厚，保暖性好。广盛茂皮局的采购人员既能识别其产地，还能看出皮毛剥下的季节。

广盛茂皮局很重视皮货的加工制作。新采办进来的皮毛不仅有臭味，而且皮板上还有血肉，称作“生皮子”。这种生皮子必须经过熟制加工后才能制成皮桶子做皮衣穿。选送至硝皮厂进行熟制，去其油污臭味。需染色的随之上色。而后取回自己加工，先将皮板伤残处该缝的缝，该补的补。要求缝得牢，补得皮毛顺，与原皮板不仅颜色一样，而且毛还要平顺，看不出修补的痕迹。下边就是将整张的皮板按颜色，毛头大小进行拼配，要求配成的整件皮料色匀、毛平顺、脊正条直。最后缝制在一起，用净水刷湿，用钢针钉在木板上晒干取下，平整好一件皮衣料就算做成了。

广盛茂皮局发展到民国初年时，掌柜的换上了张焕周，这个周掌柜善于交往，买卖得到进一步发展，生意甚是兴旺。当时北京的瑞蚨祥、谦祥益、益和祥、瑞林祥、东明祥等绸缎皮货庄都和广盛茂皮局交买卖，用他家的货。此外，天津、河北等地一些有名的绸缎、皮货庄也与广盛茂皮局有来往。

前门大街路西的兴盛荣皮货庄是专门经营老羊皮毛的店铺，掌柜叫孙廷瑞，开业于清光绪末年（1904——1908 年）。至民国年间（1912——1936 年），兴盛荣皮货庄是北京老羊皮毛业的有名大买卖。

兴盛荣老羊皮货庄与细毛皮货业不同，其货源来自本城的各羊肉铺。兴盛荣专有几个人每天到四城羊肉铺收买羊皮。兴盛荣

是前店经营接待顾客，后边是作坊熟制皮毛。将收购来的羊皮在作坊里先用水加硝泡，除去皮板上的油，毛上的脏东西及腥臭气味后，再经过以下“剪毛”、“打花”、“整板”、“揉筒”、“配色”、“拼板”、“揉灰”、“钉晒”等几道工序才能制成一件完整的老羊皮衣料。由于皮毛的颜色，毛的大小等的不同，故制成的皮筒有“一块玉”，上下一片雪白毛；“上花下白”，上边毛色杂，下边毛色都是白色；“大麦穗”，毛头长大，好像麦子的穗那样好看；“二毛剪茬”，将老毛剪去，留下不长不短的二茬毛。此外还有“碎拼”等皮筒。

过去经营细毛皮货的广盛茂的仅为北京、天津等大绸缎，皮货庄提供货源，而且也接待顾客。过去能穿细毛皮衣的人都是有钱的人。不是大官就是富商。广盛茂皮局在每件皮筒上写有暗码，而且言不二价。一价出口，不许客人还价。可是，如果是熟顾客或是有朋友介绍，可以让价、打折扣。经营老羊皮毛的兴盛荣是有虚价，能还价。当年一件老羊皮筒兴盛荣皮货庄定价 18 元，顾客给他十一二元就可买到手。因为穿细毛皮的社会上层人士不穿老羊皮，而家境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家又买不起老羊皮筒，所以兴盛荣皮货庄的顾客多是中等人家，像一般中小商人、农村中小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上一些中层人士。总之，当年穿老羊皮、二毛剪茬的人比穿细毛皮的人要多得多。另外，兴盛荣皮货庄在民国年间，经常遇到大主顾，一次就订购几千甚至几万件老羊皮筒。这些大主顾都是军阀，买去做军皮大衣。兴盛荣皮货庄虽然在老羊皮业中买卖较大，但是，遇订购上万件皮筒的大主顾，他一家也做不了，也要联合一些同业，共同把买卖做下来。在民国年间，兴盛荣老羊皮业是比较兴隆的。

时间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细毛皮业尚能维持其营业，而老羊皮货业就不景气了。因物价飞涨，中小商人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市面萧条，兴盛荣等皮货庄生

意少，营业衰败。

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广盛茂皮局和兴盛荣皮货庄都参加了公私合营。

第四章　绣花街

前门外的西湖营在1949年前，人们习惯称其为“绣花大街”。其缘由是从清代末年起，在这里相继开办了20来个以经营蟒袍、绣官服、绣围、绣披等旧物为主的绣货店。顾客都是欧美等国的洋人。在这20来个绣货店中以鸿兴德和元隆两家较为有名。

一、鸿兴德古绣庄

鸿兴德古绣庄的创办人和经理是徐秀昆。他开办鸿兴德是在民国十三四年（1924年——1925年），正是旧绣货买卖最兴旺时期。那些依靠清王朝为生的八旗贵族和众多的官僚、宗室大都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养尊处优的寄生虫。清王朝灭亡，清皇帝逊位后，他们失去了钱粮禄俸，为了生活都以变卖家存的金银首饰、珠宝以及绣物苟延度日。西湖营的古绣庄用低价买进，而以赢利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高价卖给外国人。古绣庄的买卖都是“不怕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鸿兴德开办时，连经理徐秀昆在内只有三个人，资本不过百十块现大洋。店铺陈设得却很古雅阔绰。外国客人进店，只要选中一件绣货就用高价出卖。这一笔生意就能赚几百块大洋。

鸿兴德的货物一是从王府和一些官僚府邸买来，另一种是从苏州、杭州等地购来的绸缎、缂丝等新绣货。因为外国人将旧绣物当古物买，新绣货不但不值钱，而且他们也不买。鸿兴德将新

绣货买进，挂在暗室中，门窗关严，燃起高香，用香烟将其熏成旧货，变成存放多年的旧绣袍、绣褂、绣裙等。另外，买进来的旧绣货，有的也需要加工整理才能卖大价钱。将破残的旧绣物经过仔细的挖、补、挑、织等以及补绣，达到整旧如旧的目的。

鸿兴德发迹很快，开业时只有职工2人，资本百元，没干几年，到了1930年，职工增至十几人，资本几万元，店房扩至前后两座院，房屋十几间，客厅、账房、经理室布置得很是讲究。鸿兴德在西湖营古旧绣货庄中算一大户。

1937年“七·七事变”后，鸿兴德就走向了下坡路，生意萧条，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控制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欧美等国人大都撤走。鸿兴德和其他古旧绣货庄的货源短缺，只得改营旧绸缎，加工绣花鞋面维持营业。到1948年，连职工的工薪都发不出，买卖已难以维持。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原鸿兴德的职工张铁九等人筹资在鸿兴德旧址办起“鸿兴德合记”绣货庄营业。

二、元隆顾绣绸缎商行

元隆顾绣绸缎商行的首创人叫王幼宸，他曾在鸿兴德古绣庄学徒。3年多的学徒生活，他学会了识别刺绣、绸缎的商品知识，学会了生意场中如何买，如何卖，如何待人接物等本事。民国十九年（1930年），王幼宸辞别了鸿兴德，在西湖营租了一间房子找来他的二弟，两个人就干起了绣货和绸缎的买卖。干了几年，买卖做得很有起色，人手不够，又将他的三弟四弟叫来。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元隆顾绣绸缎商行”正式对外营业。主要经营新旧顾绣和绸缎等商品。刺绣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于各地刺绣的技法和风格不同，又有苏绣、湘绣、京绣和顾绣之分。苏绣是指苏州一带的刺绣，湘绣是

湖南一带刺绣，京绣为北京一带的刺绣，顾绣是上海顾氏特有的刺绣技法。顾氏指明嘉靖年间的顾名世。他的家人刺绣成风，绣工精细讲究，绣出的不论花卉山水，还是鸟禽人物都是活灵活现，形态逼真。在《顾绣考》一书上记："其擘丝细过于发，而针如毫，配色则亦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不特翎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因此，顾绣深受人们的欢迎。元隆经营的刺绣主要是顾绣。元隆正式开业后，在经营作风上，以信为本，不论顾绣还是绸缎，新货就是新货，旧货就是旧货，不用新货充旧货。在价格上，一般商品定价低于同业，而特殊紧俏商品的价格无限，根据顾客的喜爱程度可高可低。外国顾客特别是有钱的外国顾客，只要货好，他喜欢，多少钱他都买；价钱要少了他倒可能不买呢。就是由于元隆的刺绣、绸缎等商品质量优，花色品种齐全，在欧美客人中享有盛誉，买卖十分兴隆。到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元隆已发展有职工十来人，在西湖营绣货绸缎行业中属中等户。而知名度远比规模最大的"振德兴绣货庄"要高得多。当时，西湖营里的绣货绸缎商店都没有门脸，从外表看就是个普通院落，与一般居民住家差不多，只是在门楣上挂着个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招牌。元隆是六间房一个小院，别家院落里冷冷清清，元隆院中天天顾客不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阶层多以节俭为荣，以讲吃讲穿为耻；欧美各国人士来华少。元隆顾绣绸缎商行和其他绣货庄买卖冷落。1956年元隆参加公私合营迁至珠市口东大街继续营业。元隆的营业依然不振，因为外宾都去北京友谊商店选购商品。1962年元隆被迫停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1981年，元隆顾绣绸缎商行在原来的红桥百货商场恢复了营业。现在的元隆经营的商品，仍以刺绣、绸缎为主，并且增加了高档裘皮、地毯挂毯、金银首饰、珠宝书面等特种工艺品等。元隆为了满足海

内外人士购物的便利，除元隆总店外，并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北京饭店贵宾楼、京西风景旅游区戒台寺和潭柘寺等开设4个分店。从元隆重新营业以来，它接待了包括来华访问的国家领导在内的大量的外国朋友和旅外同胞。

“改革开放”像甘霖浇灌着元隆重新发芽、茁壮生长。

第五章　木器家具街

在前门外的鲁班馆和大市街上，从明代末年起就有木匠开办木器作坊，到清末民初时，这条街上有大小木器家具铺 30 多家，因之，人称此街为“木器家具街”。这些木器家具铺有的生产销售硬木家具，有的生产销售榆木擦漆家具。在这众多的木器家具铺中以龙顺成最有名，它家生产的各式桌椅、柜箱，选料精良，工艺考究，造型美观大方，坚固耐用，油漆光亮经久不褪，所以深受各界用户称赞。

龙顺成木器家具铺原是一个姓王的木匠大约在清代同治初年（1862 年）开办的。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才正式取名叫“龙顺木器家具铺”。后来，吴姓和傅姓两家又入了股，因此，改名“龙顺成木器家具铺”。

自从吸收吴、傅两家入股后，买卖有所发展，职工从原来三四个人增至十五六个人。生产和经营的品种也增加了，有八仙桌、六仙桌、三屜桌、架几案、条案、厨柜、钱柜、立柜、连三、方凳、条凳、官帽椅子、罗圈椅子、箱子等。龙顺成生产的各式木器家具，最讲究质量。它家生产的木器家具主要用的是榆木，用枣木、椴木、柳木作辅料。在制作前，先对木料进行干燥。木料干燥分风干、烘干两个过程。把原木开成一定尺寸的板材后，按犬牙交错的形式堆码在院中，自然风干 1 年。把风干后的木料，码放进火洞中，下燃锯末，一火 15 天，共烘烤 3 次。经过风干和烘干，使木料的含水量大大降低，以保证做好的成品不走形不开榫

不断裂。接着就是木工制做了。龙顺成的木工，都是本铺的学徒，先进铺的是师哥，后进铺的是师弟，师弟必须服从师哥的管理。木工不管已出师的，还是没有出师的都是包活做。也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产品，从开料到制成成品是一个人负责到底。不论谁做的，无论大件的还是小件的产品都必须经过工头的检验。工头一拉一摔，从拉摔的响声中，就会知道产品合格不合格。如果不合格，他根本不对你说什么地方有毛病，就摔给你，让你修好直到合格为止。每做成一件产品，制做人要在桌椅的底下、柜箱的背面，写上自己的工号，以便负责到底。如果发现制做问题，以便查找。最后是上漆。在上漆以前，先用刷子蘸沸水刷洗白茬产品一次，经日晒风干后，再用砂纸打光。龙顺成上漆讲究“一油三漆”。也就是在上漆前，先上一道桐油，使油渗入木中，经过一个月的风干，再上三道漆。这样，通过第一道桐油把漆和木材紧紧地胶粘在一起了。再经过一年的风干（俗话“年漆月油”）后，桌椅等产品，呈鲜艳枣红色，防潮湿，不怕热水烫，越使用越光亮好看。

为了取信顾客，龙顺成在制做每件产品时，都在产品的明显处，像桌子腿、大柜的左侧或立根柱上，写有“龙顺成”3个字，用漆涂好，作为永久标记。

龙顺成卖出的家具，都有保单，在3年内除去使用不当外，如出现脱漆、变色、虫蛀、开裂等质量问题，无偿的保修、保换、保退。一次，住在京西蓝靛厂的一个顾客买去一张八仙桌，使用已近3年，桌子腿部受了虫蛀。龙顺成不仅给掉换了新桌，而且还付给了用户的运输费。还有一次，前门外一家饭馆的顾客，因言语不和打起架，双方盘碗乱飞，椅凳对打，等一场恶战平息后，碎碗碎盘满地皆是，也摔了不少的桌椅。但惟独标有龙顺成字号的桌椅，除了油漆有些碰损外，结构完好无损。从此，龙顺成名声大振，生意日渐兴隆。

龙顺成是用吃股的办法将掌柜、二掌柜、写账先生、工头，这

些骨干拉住，让他们卖力气管理铺子。这些人除每月拿固定月薪外，年终还可根据经营情况分到红利。东家（资方）通过他们控制铺中的伙计、生产工人和学徒。龙顺成的工人都是本铺的学徒出身，他们都是河北省深县、武邑、饶阳、枣强等县人。这些地方的人最能吃苦耐劳。进龙顺成学徒，一要有引见人，二要有铺保，三要立字据。字据上写明“逃跑、病死等一切与本铺无关，家长要赔偿学徒的饭钱。不遵守铺规，随时辞退”等。

龙顺成的学徒期限是 3 年零一节。学徒期间没有工钱，铺中只管饭吃，穿用的衣物自理。年终时掌柜赏赐块儿八毛钱的算是馈送。学徒每天早晨 6 点起来就干活，到晚上 6 点吃饭才算收活。有时赶上忙活，还得打夜作。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平日没有休假日，只有五月节、八月节，各放假 1 天，年节放假 6 天。正月初六日开铺干活。可做一两天轻些的零碎活，到初八日就得大干了，过去有所谓“赖七不赖八”之说。

龙顺成是前店后厂，后厂就是木匠作坊，过去作坊的生活最苦，龙顺成也是一样，每天早、中、晚三顿饭都是窝窝头、二米饭（小米和大米）、咸菜。有时候，吃上一顿菠菜汤或白菜汤。改善生活吃犒劳的时候也有，木匠有个规矩，“初二、十六，木匠吃肉”。明着是给工人吃，实际是掌柜、工头、写账先生他们借机大吃大喝。工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初二、十六，木匠吃肉，每人四两（当时 16 两为 1 斤），二八折扣；掌柜要吃饱，工头、先生要吃够；师傅能喝碗汤，学徒挨顿揍。”

从 1945 年起，由于各种省工省料的新式家具的出现，龙顺成的榆木擦漆家具受到挑战，生意逐渐不好作。

北平解放后，1956 年龙顺成参加了公私合营。1958 年，木器家具街的龙顺成、同兴和、义盛、六丰成等 35 家合并在一起，统称“龙顺成桌椅铺”。1963 年迁至永定门外大街，改产仿明式木器家具。试制出红木珐琅圆绣墩、花梨石面六角花台、花梨石面圆

花台、红木套器几、红木二屉三节柜等产品。这些产品投放到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畅销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六章　喜轿街

北京在明清时期及民国年间，姑娘出嫁都要坐男家雇的轿子，如果没坐轿到男家去，那简直是天大的短处。因此，多年来喜轿铺买卖始终很兴旺。喜轿铺很多，清代，东四和宣武门外菜市口都曾出现过“轿子街”。东四北现还有“轿子胡同”地名，宣外菜市口南侧一条“教子胡同”，就是从轿子胡同谐音而来。民国年间，崇文门外的南河漕有阜顺喜轿铺，其南邻三转桥有合兴喜轿铺。由于阜顺喜轿铺有时一天能抬三档子的买卖，整条街都是轿子、执事和抬轿子打执事的人，因此，人称南河漕是“喜轿街”。下面就介绍阜顺喜轿铺的兴衰史。

创办阜顺喜轿铺

当时崇文门外三转桥合兴轿子铺是著名轿子铺之一。这家合兴轿子铺，轿围鲜艳，执事齐全，轿夫鼓手也年轻，因此，不仅前三门的一些有钱人家娶媳妇都用他家的轿子，就连内城一些大户，也租赁他家的轿子。可是到了1920年以后，由于合兴轿子铺的后代不务正业，老掌柜死后，买卖很快就衰落下去。这时人称“嫁衣卢”的卢三兴起，在合兴轿铺的北边，南河漕开设了阜顺喜轿铺，卢三自任掌柜的，手下除了他的两个儿子外，还雇了一位管账先生和一个干杂活的。其他如轿夫、锣鼓手、执事人等，都是临时工，随时叫，有事来，完事走。就连轿夫头、鼓手头和零人

（打执事的）头，也都是临时工。阜顺喜轿铺有事时，先找这些头，再由这些头去茶馆等地约人。喜轿铺向外租轿子时，他们要赚两笔钱，一笔是他们出租的轿子、锣鼓、执事的租赁钱，另一笔是从轿夫、锣鼓手、打执事人等身上克扣的工钱。“七·七”事变前，阜顺喜轿铺出租一乘8人抬的一般的红轿子，8面大鼓，一队开道锣，一队号，就须49块大洋，对于轿夫的工钱，应买卖时，他们向顾主每人要1元大洋，可是付给轿夫头时，每人只给9角，从中克扣1角。轿子头转手给轿夫时，每人8角，轿夫头又克扣去1角。打执事的工钱，喜轿铺向顾主每人要3角，而给零人头时，每人给两角五分，从中克扣五分。零人头给打执事的，每人只给两角，零人头又扣去5分。这叫层层剥皮。

阜顺喜轿铺的发展

阜顺喜轿铺所以能发展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经常更新轿围，轿厢数量多，锣鼓执事齐全、漂亮，轿夫、锣鼓手、打执事的人等年轻精神，穿戴齐全美观。阜顺喜轿铺的两个少掌柜卢国青、卢国璋和两个杂活工，在没有买卖时，就油饰轿杆，刷洗轿厢油饰执事，整理锣鼓。因此，他们出租的轿子和执事以及轿夫、锣鼓手、打执事等人穿戴的帽子、嫁衣都很新鲜整齐。所以他们的买卖越做越好。逐渐成了北京有名的轿子铺。

当时，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专讲排场，不怕花钱。在举办婚丧嫁娶礼仪时尤甚。他们讲究用新的轿围，不管轿子铺原有轿围的新旧程度，哪怕是新绣的，只用过一次，也不行。他们总要订做新的。这样一次未用过的轿围，租价要加倍，有的租价相当于买价，碰上这样的顾主，轿子铺就可以得一崭新的好轿围。

喜轿铺同其他的店铺不同，一般的店铺都是天天有营业，可是喜轿铺营业都是在“黄道吉日”，俗说的“好日子”经营，所以

喜轿铺老要看历书，在那大吉大利的日子，买卖准多。由于买卖集中，小喜轿铺轿厢少，执事少，尽管主顾多，也做不了。阜顺喜轿铺轿厢多，一天能应“三伙”（喜轿铺把派出的一拨轿子、锣鼓、执事等称为一伙）买卖。甚至还外加一伙“赶伙”的买卖。所谓“赶伙”就是抬完一家后，再抬一家。雇“赶伙”的轿子虽然钱便宜，但谁也不愿用它。因为，一般都要在上午11点以前把新媳妇抬过来。而“赶伙”的轿子，最早也得在下午2点钟才能把媳妇抬过来。雇“赶伙”轿子，大多是因为家境不富裕，图省钱。

1929年，大家大户雇用阜顺喜轿铺的轿子，在珠市口路北天寿堂饭庄办事娶媳妇。这伙轿子是红绿三乘。当时有钱讲究的户，都用一乘红轿，由新媳妇坐；两乘绿轿，由娶亲的妇女和送亲的妇女各坐一乘。前边的执事有：一队开道锣，一队弯脖号，一队大号，一队伞，一队扇，一队大镜，一队二镜，一队筛镜，一队令箭，一队金瓜，一队钺斧，一队朝天蹬，还有四个吹喇叭的，八个打大鼓的。红轿子的轿围是红绸子的。各式执事油饰的红绿相间，油光漂亮。轿夫和执事人等身着绿嫁衣，头戴插羽毛的黑毡帽。上午9点左右，轿子在天寿堂饭庄门前摆列开，这叫“亮轿”。10点左右，轿夫抬起轿子，各式执事按次序排好队伍，锣鼓、喇叭、号齐鸣。过路人看了个个夸好。

1930年春天的一个“好日子”，阜顺喜轿铺同合兴轿铺在东单牌楼大道上发生了一次角逐。这一天，两家轿子各有一伙红绿三乘轿子，伞扇执事都很齐全，很讲究。上午11点左右，两家的轿子在抬回新娘的路上相遇，阜顺喜轿铺的轿子由北向南，合兴喜轿铺的轿子由南向北。到东单牌楼时，两家都放慢了脚步，锣鼓齐鸣。抬轿子的轿夫，都是两眼前看，腰挺得很直，有时，前头轿夫喊“左门照”（向后边的轿夫示意，左边有障碍物），有时喊“右门照”，还有时喊“左蹬空”、“右蹬空”（左边有坑、右边有坑）。到两伙轿子走至一左一右互相交错时，步子更小。他们不是

走而是一点点的往前挪，轿子平稳之极。这时路上观看的人很多。这次两家路上相遇，虽然阜顺喜轿铺没有完全取胜，但也没败。这样阜顺喜轿铺的名声更响了。

喜轿铺的轿子头都要懂得当时结婚的一些习俗（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封建迷信的陋习）。结婚的男方在起轿出发时称“发轿”。在发轿前，“全福女人”（丈夫、儿女都有）手拿历书一本、苹果一个、红纸灯一个、镜子一面、香一支，先后在轿子中晃一晃，这叫“照轿”。目的是驱除奸邪。轿子到了女家，女方要把门闭上，男方的男娶亲人要用包钱的和包茶叶的红纸包，从门缝中递进去，这叫“索包”。“索包”后，门才打开。新媳妇上轿抬回男方家后，轿子要在火盆上抬过。轿子落在喜房门口，新郎要用弓箭朝轿子连发三箭。新娘离轿进喜房后，轿子离开。轿子头再与雇轿子的男方家中算账，领钱。至此，这伙轿子才算完事。

喜轿行业的衰败

到了30年代初，由于新知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青年男女中自己找伴侣，不用“合婚”，不用轿子的日益增多，一些马车行业开始经营起新式结婚用的“彩车”。这种两匹大马拉的“彩车”既快又经济，一辆“彩车”租价才10元钱。后来一些汽车行也兼营新式结婚用的“彩车”。有些马车行和汽车行，还代营新式鼓号队为结婚用的乐队。这种新的结婚形式逐渐地代替了用轿子迎娶的旧形式，从此，喜轿业走向了下坡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搜刮，北平的各种物资奇缺，各大饭庄纷纷倒闭。各阶层人民尤其中下阶层人民，无力大办婚丧之事。这样，轿子行业更陷入困境。不仅阜顺喜轿铺不景气，北京所有的喜轿铺都无生意做。到了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接收北平后，喜轿铺行业继续衰落。解放后，人民

政府主张婚姻自主，完全废除了封建式的买卖婚姻，至此，喜轿行业在社会上也就销声匿迹了。

第七章　煤炭街

过去北京的宣武门外和西直门外沿城墙处开办有几十座煤栈，因此，人们都称这两条顺城的街道为“煤炭街”。

旧北京居民烧的煤，主要来自京西门头沟和房山各煤矿。在清代，没有铁路时，从京西各煤矿往城里运煤都是用骆驼。一般煤铺没力量拴骆驼，进货只能从有骆驼的大煤铺进。据30年代《晨报》记述：北京“内外城（煤铺）最（有）名者，仅两家，内城为钱粮胡同之洪顺，外城则观音寺（今大栅栏西街）之大德生”。又记“大德生有九十九把骆驼，骆驼以七个为一把，该号共有骆驼六百九十余个”。当年这两家大煤铺用骆驼从京西煤矿将原煤运进城来，再卖给各小煤铺，从中获利。

自清末，自京西至城内的铁路修成后，火车就成了运煤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一些大煤商就利用这种先进的交通工具为其运煤，在民国初年，宣武门外东、西两侧的顺城街道，开设有大德通、大成公、大盛德、东复兴、顺泰栈、宝瑞栈、大德亨、西源顺、万华兴、广聚隆、四合顺、公和盛等36家煤栈。西直门外南、北两侧顺城街道，开设有泰源成、成兴顺、宝和栈、泰合昌、三义栈、广盛厂、德丰恒、裕泰和、同元栈等26家。他们从京西各煤矿用火车运来硬煤块、煤砟、煤末，直接进入各自的煤栈内。

下面简要的介绍一下大德通和大德公煤栈的情况。

大德通和大德公两家是联号，都是前门外观音寺大德生煤铺的分号。大德生煤铺是利用火车运煤，在火车站旁设煤栈的第一

家。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修筑卢沟桥至汉口的卢汉铁路。两年后，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从卢沟桥往东延伸经丰台修至马家堡。大德生于是在马家堡车站旁设大德公分号，利用火车运煤。可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大德生和大德公都被烧毁。俟战乱平息后，大德生煤铺很快恢复了营业，并在它的西边五道庙开设大德玉煤铺。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将京汉铁路修进城至前门西侧。大德生的经理申云五在宣武门外西侧顺城街道筹建大德通煤栈，随后又派李锡三在宣武门外东侧顺城街道办起了大成公煤栈。从申云五在宣武门外开设煤栈后，各煤商也纷纷效仿，有的在宣武门外城墙根、铁路边开办煤栈，有的在西直门外设立煤栈，也有的在崇文门外、德胜门外、朝阳门外等铁路旁开办煤栈。但这些地方为数很少。只有宣武门外和西直门外最多，可称是“煤炭街”。

第八章　干鲜果子街

过去北京的干鲜果子街有两条，一条在前门外，一条在德胜门内大街。前门外这条出现在明末清初，据清乾隆戊申年（1788年）刻本《宸垣识略》记：前门外“大街东边市房后有里街曰肉市，曰布市，曰瓜子店”。在瓜子店南就是“果子市”即干鲜果子街。德胜门内大街的干鲜果子街出现的时间比前门外的干鲜果子街晚得多，大约在清后期。

从规模比，前门外干鲜果子街有永盛、永利、天增、万成、天盛、天泰、天和、天顺、广聚、恒兴、公泰、天聚等61家果行。德胜门内大街干鲜果子街上，仅有万顺、天德、清全、楼店等4家果行（根据民国初年，北京果行公会会员录记载）。果行是垄断市场行情，控制买卖双方的封建把头。他们有清政府发给的“牙帖”。（又叫“龙帖”）就是营业证书。他们凭借这纸牙帖，凡农村运来的核桃、栗子、花生、桃仁、杏仁、李子、樱桃、柿子、梨、桃、海棠、苹果、西瓜、沙果、葡萄等北方的干鲜果子以及南方运来的香蕉、桔子、龙眼、桂圆等，都要到该果行去登记，由他们给定价。到干鲜果子街趸货的都是北京城的各干果铺、鲜果局以及摆小摊和担担下街的小贩等。买卖双方讲好价钱，要由该果行掌秤的给过秤。果行从中获得“佣钱”。

因为干鲜果子收获的季节性很强，每年农历从春起，到初冬都有果子上市。最忙的时候是从“五月鲜”的大桃收获起，到夏天的西瓜、甜瓜、香瓜等运到干鲜果子街，这条街上从早到晚马

车、人推小车往来不断。等到各种瓜果忙完了，紧接着就是八月中秋，苹果、梨、核桃、葡萄大量干鲜果子运到，这两条街就更忙了。最后是“三红一黑”运来。三红指的枣、柿子、红果，一黑是黑枣。枣有“七月十五红一圈，八月十五落杆”之说。就是枣从农历七月十五开始由顶部往下一圈一圈地变红，最晚到八月十五就红透了，用杆子打下。柿子是经过霜降节就变红了可以采摘，并且不用漤也不涩了。红果就是山里红，到立冬时才红透。黑枣全黑透要到小雪季节。所以，干鲜果子街最晚到小雪后，这两条街才能清静一个冬天。

这两条干鲜果子街以前门外的最繁华，因为交通方便，各地果农都往这条街上运，干果铺、果局子都到这条街趸货。

解放后，欺行霸市的果行被取缔。1956 年，全市整顿街巷地名时，前门外的瓜子店与果子市合并，统称“果子胡同”。

第九章　金融街

旧北京虽然没有正式命以“金融街”之地名，但事实上已有金融界集中的街道。清代中晚期，资本雄厚，可控制北京金融命脉的恒兴、恒和、恒利和恒源“四大恒”钱庄的所在地，东四牌楼就是当时的金融街。

清末，政府颁布学习西方的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户部银行”，后改称“度支银行”，1908年又改称“大清银行”。民国年间，美国商人的花旗银行、英国商人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商人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商人的正金银行、德国商人的德华银行等设于东交民巷中。因为这些银行都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办的，而且又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经济，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因此，东交民巷中这个“金融街”，是带有国耻性质的。

西交民巷和前门外珠宝市才是真正的金融街。据不完全统计，在西交民巷中，有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河北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等13家。前门外的珠宝市在明末清初时，街上就有几家珠宝铺，因此得了这个地名。到清乾隆时，有的珠宝商改营钱庄，有的停业了。同时，在珠宝市这条街上出现了以经营熔化白银的众多炉房（在前门大街商业街中有交待）。以上说的西交民巷的银行和前门外珠宝市中的钱庄和炉房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开设的金融企业，所以，这两条街才算真正的“金融街”。

第十章　灯笼街

北京在明清时，使用灯笼极为广泛，人们不仅用它照明引路，而且用它装饰庭院、居室，美化环境。因此，生产经营灯笼的店铺很多，从清代到民国年间，以廊房头条胡同灯笼铺最为集中，这条街上有文盛斋、华美斋、秀珍斋等20来家灯笼铺。所以，有“灯笼街”之称。

廊房头条“灯笼街”的灯笼铺都是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它们生产经营的灯笼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圆纱灯，这种灯是用竹条做成灯架，外蒙红色或白色纱，红纱灯多作喜庆宴会时点燃用，白纱灯为观赏彩色花灯，上画各种色彩艳丽的人物或花鸟鱼虫等图画。另一类是宫灯，宫灯是用硬木或用其他上好木料，做成六棱形或多棱形的灯架，灯架上镶玻璃或纱绢。灯架上雕着各种玲珑剔透的花牙和各式花饰。玻璃上和纱绢上，都画着各种好看的画图。这些灯笼铺生产经营的灯笼，既是生活照明的工具，又是民族传统工艺美术品。

在廊房头条“灯笼街”中，以文盛斋和华美斋的历史最悠久，它们都是开业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老店铺。其他的灯笼铺大多是在它们店中学过徒，满徒手艺学成，出去自己另立门户，开业经营的。文盛斋和华美斋这两家生产的灯笼，不仅供应一般居民、店铺使用，也为清朝宫内生产精制的灯笼。

北平解放后，1956年廊房头条中“灯笼街”的灯笼铺参加公私合营后，组成了北京市美术红灯厂。

第十一章 玉器街

北京在民国年间，前门外的廊房二条、三条和崇文门外的花市上三条有“玉器街”之称。因为在廊房二条里有三盛兴、恒盛兴、聚丰厚、宝权号、聚源楼、富德润、三义兴、德源兴、永宝斋、荣兴斋、利贞祥、王盛公、毓宝斋、永记、瑞文斋、万义斋、泰源号、毓兴斋、宝昌隆、润亿合、杨敬记、德文斋等20多家玉器铺。廊房三条里有同义斋、全兴盛、全盛永、合成永、德顺兴、德山斋、瑞珍斋、恒聚斋、景华斋、仁和斋、蕴珍斋、万兴涌、永盛玉、同升号、恒盛斋等十几家玉器铺。崇文门外花市中三条有德顺成、正兴隆、广聚斋、万宝斋、聚盛公、祥聚公、公记号等近十家玉器铺。

这些玉器铺分蒙藏庄、本国庄和洋庄三类。三盛兴、恒盛兴等经营蒙藏等地的买卖，称蒙藏庄。他们一般用松石、珊瑚和青玉等原材料，磨制出蒙古、西藏人喜爱的头饰品、腰饰品和带饰品及各种鼻烟壶等器皿，向内外蒙古和西藏等民族销售。这些店铺除门市经营外，还派专人去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去推销。在这些地方，常以商品交换方式，换取蒙藏人的牛、羊、马及皮毛等土特产。聚丰厚、宝权号、聚源楼等是经营本国庄的，他们的顾客主要是各个时期的官僚、贵族、军阀及富商大户等。他们这些店铺卖这些顾客一般是翎子管、朝珠、顶珠、帽正、搬指、别子、带钩、带扣、烟嘴、烟壶、图章等以及妇女妆饰品所需的各类宝石、珠钻、碧玺、翡翠等珍宝，磨制成的戒指面、耳环、耳

坠等。富德润、三义兴、德源兴、永宝斋、荣兴斋、利贞祥等既经营本国庄又经营洋庄。所谓洋庄，是指其经营对象是欧美等国和南洋各地的买卖。洋庄的商品多是各种首饰、花片、摆件等。

在这几条玉器街的店铺作坊里，能工巧匠荟萃，一代超过一代。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有4位承前启后，技艺超群的工艺大师脱颖而出。就是被世人称颂的潘秉衡、刘德瀛、何荣和王树森“琢玉四怪”。潘秉衡是以磨制薄胎压金丝著称，刘德瀛的拿手活立体玉雕花卉被人称绝，何荣设计出的玉器仕女形态和神态都过前人，王树森以构思巧、手法新著称，他磨制出的不论人物还是花鸟等都有独特的风格。

第十二章　文化图书街

过去北京著名的文化图书街有琉璃厂、东打磨厂、隆福寺街3条。其中以琉璃厂历史最久，书铺最多。

琉璃厂在辽、金时代是有名的海王村。从元代起，在这里就设官窑烧五色琉璃瓦。一直到清乾隆年间这里还是烧琉璃瓦官窑所在地。据吴长元所著、清乾隆年间刻本刊印的《宸垣识略》一书记：在琉璃厂中“本朝设满汉监督董其事，烧造五色琉璃瓦。厂地南北狭而东西长，约二里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早些，琉璃厂的文化图书街开始形成。在《宸垣识略》中也记有：“厂前陈设杂技，锣鼓聒耳，游人杂遝，市肆玩好，书画、时果、耍具，无不毕集”，这段文字只不过是记载春节时期琉璃厂厂甸的情况。记载琉璃厂书铺是乾隆时人李南涧号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记得较详尽。书中记载当时有声遥堂、名盛堂、带草堂、同陞阁、宗圣堂、圣经堂、聚秀堂、二酉堂、文绵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宏文堂、英华堂、文茂堂、聚星堂、瑞云堂等书铺。以上是琉璃厂东街即厂东门内的书铺。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还写道：“桥居厂中间，北与窑相对。桥以东街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从李文藻的记叙，说明琉璃厂这条街中，不仅书铺众多，而且还有碑帖、刻章、裱画等与文化有关的不少店铺。到了民国年间，在《最新北平市指南》记有琉璃厂街中书铺有文友堂、文禄堂、文华

堂、文英阁、宏远堂、来薰阁、翰文斋、邃雅斋、直隶书局、槐荫山房等22家。这当中还有荣宝斋南纸店，一得阁香墨店，戴月轩湖笔店等。文化图书街规模不减当年。

崇文门外东打磨厂的文化图书街,大约出现于清道光年间,书铺数也比琉璃厂少得多，在《琉璃厂书肆记》中记:“正阳门东打磨厂，亦有书肆数家。尽金谿人，卖新书者也。”虽然东打磨厂里书铺数量少，可是这条街中有戴连增、三义斋、福润斋、文成堂、玉华斋等十来家扇画店。夏天主要经营苏杭雅扇。他们从苏州和杭州成批采办来各种扇骨和素扇面等半成品。让工人在素扇面上，画上泰山、恒山、长江、黄河等雄山大川或“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火烧战船”等三国故事。最后将扇面贴在扇骨上，扇子就组合好。他们主要是将扇子批发给纸店和卖扇子的小贩。

入冬，这些扇画店就开始经营年画。过去，每逢农历新年，不论城市与农村，家家户户都要买几张年画贴在房中，表示贺年。所以，年画在市场上是俏货。东打磨厂里的扇画店都是由天津杨柳青进货，而后批发给下街和下乡，叫卖年画的小贩。

由于隆福寺街的书铺在上文的隆福寺商业街中已作了介绍，所以，本文不再赘叙。

现在东打磨街和隆福寺街的文化图书街已不复存，只有琉璃厂文化图书街尚存。

第一节　厂甸

每年新春正月初一至十五日逛厂甸，是昔日北京男女老少最欢快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琉璃厂厂甸约出现于清代早期，到清乾隆时就已相当繁华了。每年正月厂甸集市时，在“厂桥”的东和西街上摆满了各种货摊。

文中提到"厂桥"这个地名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所以有必要将过去琉璃厂的地理环境交待清楚。

当年的琉璃厂北边城墙有个"水关"（就是流水洞）皇城西苑的水从此流出，经过琉璃厂往虎坊桥流去。在今天的琉璃厂西街和东街之间架有一座桥，便于行人和车辆通过。辛亥革命后北京市政当局将流经琉璃厂的明沟改砌为暗沟，并辟此街为"南新华街"。同时，计划在前门迤西，宣武门迤东凿开洞子门，以便内外城的交通。由于前门一带商人的反对，怕在前门西另开新门后，造成前门行人减少，会影响他们的生意，所以没有开成。拖至民国十五年（1926 年)，才在原处凿开左右两个门洞，取名"和平门"。

琉璃厂厂甸从开办以来，始终兴旺不衰。各种摊棚搭满街道两侧，有卖风车、风筝、空竹、地转儿、木枪、木刀、戏剧鬼脸、弹弓、花炮、灯笼等儿童玩具的，有卖大糖葫芦、元宵、年糕、油茶、茶汤、面茶、豆汁、爱窝窝等风味小吃的。特别是风车和大糖葫芦这两样，凡是逛厂甸的人大多数都要买的。在回归的路上，五六尺长的大糖葫芦手中一举，风车让风吹得"咯、咯"山响。这就是逛厂甸的标志。

玉器和古玩商人也来赶厂甸卖货，本来琉璃厂街里玉器铺和古玩铺就很多，每逢厂甸集市时，前门外廊房二、三条胡同和其他处的玉器和古玩商人在厂甸搭起高大华丽的席棚接待客人。他们卖的货品有古画、书帖、珠宝玉器、象牙雕刻、金石古器、雕漆珐琅、古币古镜、陶瓷器皿等，琳琅满目。

厂甸中古旧书摊更多。厂甸书摊卖的书，从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至戏剧、小说、诗词、大众唱本都有。到民国时期，厂甸书摊上，又添上近代文人的专著书籍和外文科技书、世界名著等。

由于厂甸的货摊既有年货、大众食品、儿童玩具，又有古董文物、图书等，所以，厂甸的游客极广泛，既有城市居民，也有

郊区农民；既有年长的，也有年少的；既有一般市民，也有文人墨客。正如清嘉庆年间，得硕亭写的《草珠一串》竹枝词中描述："琉璃厂甸又新开，异宝奇珍到处排；妇女摩肩车塞路，都言看象早回来"。又如道光年间，杨静亭写的竹枝词《都门杂咏》"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多是读书人"。

厂甸开办以来年年热闹，只是在民国初年，南、北新华街修暗沟，修马路时，曾将厂甸集市迁至天桥西的香厂路两三年(届)，修好马路后又迁回至厂甸。

此后，依然很热闹，而且货摊将新辟的南新华街也都摆满了。直到1966年"十年动乱"爆发，厂甸才停止举办。

第二节　著名老字号

一、松竹斋和荣宝斋

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是名扬中外的老字号。它原名松竹斋，是江南浙东一个姓张的于清康熙年间开办的南纸店。以经营宣纸、笔墨、砚台、印泥等商品和承应装裱字画业务。

松竹斋前店卖货，后设作坊。装裱字画工精价廉，后来又请来刻制木版的师傅，增加了印制信笺和诗笺的业务。松竹斋印制的信笺和诗笺色彩鲜艳、精美，享誉京城。乾隆、嘉庆年间，是松竹斋生意最红火的时期。但是，由于松竹斋的铺东张姓是读书人，不善于经商。特别是张姓后人，喜交友，只知从松竹斋往出拿钱，对松竹斋的业务不知过问。致使松竹斋的买卖虽然赚钱，但是生意却亏损。买卖做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无法维持，只得易主，改换牌匾。新店主将松竹斋改名为"荣宝斋"继续营业。

松竹斋虽然改名为荣宝斋，但是店中一切人员一名没换，而且依然经营原来的业务。这就为荣宝斋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荣宝斋所以能够继松竹斋之后，在北京众多南纸店中居于首位，一是其经营的纸张、笔墨、印泥等商品都是上等的佳品。二是它拥有一批当代书画、金石篆刻名家在店中挂笔单。像陈师曾、齐白石、张伯英、张大千等大师都曾在荣宝斋挂过笔单。三是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刻工精细，印刷精美，在美术界有很高的声誉。像荣宝斋印制的《二十四节令信封》、《七十二侯诗笺》以及1933年和1934年为鲁迅、郑振铎二先生刻印的《北京笺谱》、《十竹斋笺谱》等面世后，立刻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多次再版重印发行。

北京解放后，50年代初，荣宝斋就成了国家经营的企业。其木版水印画进一步得到发展。从过去只能印制小张书法、绘画，发展可以印制大张巨幅的书画作品。如1979年，荣宝斋印制出版的《五代·顾闳中绘韩熙载〈夜宴图〉》，高29厘米，长343厘米。复制这幅中国古代名画，共刻木版1667块，用了8个年头。从“像”，向“逼真”发展。荣宝斋复制印出的齐白石的作品，连齐白石自己都看不出是复制品。

解放后，几十年来，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印制了大量的中国古今书画，有的作为礼品送给国际友人，有的为收藏家所珍藏。

二、一得阁墨汁厂

“一艺足供天下用；

得法多自古人书”

这副冠顶“一得”对联是琉璃厂东街一得阁墨汁厂创办人谢松岱亲自书写的。

一得阁墨汁厂创办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虽名叫墨汁厂但实际是前店后作坊的店铺。当时生产和经销墨汁，一得阁是第一家。关于谢松岱开办一得阁墨汁厂其中还有个故事呢。

谢松岱是安徽人，自幼苦读四书五经等书，立志通过科举之路，将来攀上一官半职，好光宗耀祖。秀才、举人之名衔已取得，

可是，到北京的会试却不如意，第一次名落孙山，第二次还是没有考中。因为一是家中经济不富裕，二是年龄已近30，所以就放弃仕途之路，另走谋生之道。决定从商，他参加过的乡试、会试，看到凡是参加考试之人，都是现磨墨。有时，试卷还没答完，砚台里的墨已干，还得停下笔再磨墨。因此，浪费了时间。他想，我如果做墨汁卖，绝对是好买卖。一得阁墨汁厂就是这样开办起来的。

刚办起来的墨汁厂很简陋，只是个一间阁楼的房子，所以，就叫“一得阁”。谢松岱找了两三个人给他帮忙，做出的墨汁装入小容器里在店中出售。每逢开科场，各省举人进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时，他就派人带着墨汁到各省会馆举人的驻地去推销，生意还真好。

关于谢松岱生产的墨汁，有人说，这是谢松岱一得阁发明首创的。其实不然，墨汁早就有。在一得阁还没生产墨汁销售以前，北京的琉璃厂、打磨厂和隆福寺街的各书铺就自己制“松烟墨”印书。不过，都没有把墨汁当作商品出售而已。一得阁专门生产和销售墨汁是一个创举。

一得阁墨汁厂制售墨汁极大地方便了读书人和动笔写字之人。但是，有一部分人在新事物面前就是不愿意接受。多数学房的教书先生和一些文人，反对使用墨汁。教书先生看见学生用墨汁练习书法和写文章就严厉制止，他们的道理是，写字和写文章前，用一段时间研墨，既是“静心”过程又是写文章前的构思过程。用墨汁练字和写文章这个静心和构思过程就都没有了。对练习写字和写文章都是不利的。因此，较大的学房这个市场一得阁没有打开。在民国以前，一得阁墨汁的主要用户是店铺里的写账先生。科场举人用墨汁也就是3年一科那几天。进入民国后，大批地新式学堂出现，一得阁墨汁在这些新式学堂得以畅销，买卖兴隆了。

解放后，一得阁墨汁厂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家生产的“中华墨汁”、“一得阁墨汁”等获得国家承认的名牌产品，畅销于海内外。

三、戴月轩湖笔店

戴月轩湖笔店是戴斌于民国五年（1916年）在琉璃厂东街创办的。戴斌的别号叫月轩，他是浙江湖州（今吴兴）人。湖州是历史上著名产毛笔的地方，当地大多数人都以制笔为生，戴斌十几岁就学得一手制作毛笔的好手艺。

湖笔与徽墨、端砚、宣纸合称“文房四宝”。在钢笔、铅笔还没有传到我国以前，我国人民各行各业记事书写都使用毛笔。所以，毛笔行业在全国各地很普遍，而以“湖笔”最受欢迎。但是，戴斌的故乡湖州到处是两三人、三四人的制笔小作坊。他认为长期在故乡干难以有较大的发展，因此到北京来闯天下。当时，北京的毛笔铺和毛笔作坊多是河北人开办的，毛笔质量差，不好使用。戴斌从故乡带来的湖笔不久就全卖完了，戴斌从而看出北京市场广阔，北京人很欢迎湖笔。因此，他决定长期在北京干下去。开始几年，他是以经销毛笔为主，从故乡毛笔小作坊购进各式毛笔带到北京销售。干了几年积蓄了一些钱，计划在北京找个店铺开个笔店。经朋友帮忙就在琉璃厂东街开了这号“戴月轩湖笔店”。

戴月轩湖笔店在琉璃厂开业对文化艺术界是个大喜事。因为书写翰墨和绘画没有好用的毛笔，不仅影响书写和绘画的正常速度而且会影响艺术的发挥。过去北京的南纸店虽然也代卖湖笔，但是经常型号不全。戴月轩湖笔店是前店卖货，后设作坊生产，顾客要买什么样的毛笔他全有。

为什么湖笔受欢迎呢？湖州制的笔好，驰名全国，不是近代的事而早在元代就居全国领先地位。明代屠隆著《考槃余事》中记：浙江湖州“制笔之法，以尖、齐、圆、健为四德”。所谓“四德”就是四个特点。尖，笔头出尖，可写细笔道；齐，笔松散时毛要齐，可写粗笔道；圆，笔体需周圆，如此既美观，笔道又整

齐；健，就是笔有软，有硬，有弹性。因此，到了明代，“湖笔”就成了全国最著名的毛笔品种了。

戴月轩制做的毛笔，一是选料精良，以羊毛笔为例，他们专从江南采办嘉兴路山羊毛为原料，因为这种毛制的笔既有柔性又有韧性，书写运笔自如。二是做工讲究，以尖、齐、圆、健为标准，不合格的不卖给顾客。

戴月轩毛笔品种有羊毫、狼毫、紫毫、兼毫4类。按大小分有“大抓”、“提笔”、“大楷”、“中楷”、“小楷”。从笔杆分有竹、花梨、紫檀、玉石、象牙等。

北京是文化古都，文人墨客多，毛笔在北京畅销。戴月轩既在门市零售，各南纸店也代销戴月轩制的各式毛笔。

解放后，特别是近20来年，由于国家提倡，社会上形成书法热，使用毛笔的人多了，戴月轩湖笔店的营业又出现新的兴隆。

四、萃文阁纸墨笔砚店

琉璃厂街的萃文阁是著名书法篆刻家魏长青于民国十八九年（1929——1930年）创办的。店不大，经营的商品有南宣纸、笔、墨、砚等，还代刻印章。

萃文阁出名，不是经营纸墨笔砚商品出的名，而是魏长青写帖、刻印章、雕刻铜墨盒、制印泥出的名。

魏长青祖籍昌平县，光绪二十九年（1930年）生人。十几岁来琉璃厂一家刻字铺学徒。他刻苦好学，又聪明。他写的篆书、隶书都很出色，特别是写颜体字更见工夫。平日除了为客人刻印章外，就写帖再装裱起来在店中出售。由于魏长青的字写得好，装裱得也精美，所以购买者很多，经常供不应求。

魏长青的金石篆刻学的是吴昌硕的刻法，其刀工、字形深得吴昌硕运刀的技法，刻出的字很有气魄。因此，找魏长青刻字的很多。后来，他俩个徒弟徐柏涛和李文新相继出徒，独挡一面后，才减轻一些魏长青的工作量。

萃文阁卖的铜墨盒大多数是素盖。有些顾客买了墨盒后特另外付款要求为其雕刻。一般雕刻墨盒都由萃文阁里学徒来做。

印泥又叫印色。萃文阁自制的印泥是用朱砂、艾绒、珍珠、玛瑙和蓖麻油等原料精心加工制成。由于萃文阁都选用的是上等料，特别是蓖麻油用的是多年陈油。因此，他们的印泥色泽鲜艳，印章盖在纸上不溢油，而且颜色持久不褪。

萃文阁的魏长青和其弟子徐柏涛参加建造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伟大工程。

据徐柏涛在《我的翰墨生涯》文中回忆："由毛泽东主席 1949 年 9 月亲奠基石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于 1952 年动工兴建。毛主席亲自为纪念碑题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周恩来总理题写了碑文。毛主席的题字每字只有三寸见方那么大，周总理所题碑文字体也只有小楷那么大。字体的放大工作，就交给了我和魏长青先生。……我俩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放大任务，接着又用打格放大的方式，将周总理写的碑文放大成现在的样子。"而后镌刻在花岗石的碑石上。

魏长青先生辞世于 1978 年，享年 75 岁。继任萃文阁经理的是他的二徒弟李文新。李文新曾多次出国访问，因此，萃文阁不仅驰名全国也名扬海外。

五、宝古斋古玩铺

宝古斋古玩铺坐落在东琉璃厂街，是邱震生与他人合资于 1944 年开业的。

在介绍宝古斋古玩铺的铺史时，细心的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宝古斋是 1944 年开业，而清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就死了，死人怎么能为宝古斋写匾呢？

邱震生是琉璃厂虹光阁古玩铺的徒弟，在虹光阁干了 20 余年，1942 年，老掌柜病逝，少掌柜与邱震生有矛盾，于是邱震生辞柜离开虹光阁。两年后，邱震生与张叔诚、杨缉成、陈景虞、王

绍贤、陶北溟等共10人筹资20万元开办了宝古斋古玩铺。

在筹办宝古斋的时候，大家就研究店铺的字号问题。当时可巧琉璃厂街有一家叫赏古斋的古玩铺刚歇业，有一位股东提议，它是欣赏古玩，我们将古玩当做珍宝，就叫宝古斋吧！大家一致赞成。接着就商量请哪位社会名士给写匾。因为社会名士为店铺写匾会提高店铺的社会地位，所以老北京的店铺讲究请社会名士写匾，尤其是琉璃厂街里的店铺，家家门前悬挂的匾都是社会名士所题。研究的结果，众多都认为论资格论书法的功力，谁也比不上翁同龢，但他已早死多年。由此，引出了一段改匾的趣事。

匾是怎样改的，用邱震生自己的话告诉读者吧！邱震生在《我在文物界的一生》文一段是这样记的："说起'宝古斋'匾额，还有一段'偷天换日'的故事。旧牌匾（指赏古斋的匾）是翁同龢手笔'赏古斋'三字，为另一古玩店的匾额。为利用此旧匾，及请陶北溟先生设法改'赏'字为'宝'字，此匾遂为宝古斋所用。"

经营古玩铺要将买卖做好，首要的是经营者必须眼力好，能鉴别古玩的真假。将假货当真货买，定赔钱；相反定会赚钱。由于邱震生有很高的鉴别古玩的能力，所以，宝古斋开业虽晚，而买卖做得很好，发展很快。一次，邱震生去天津劝业场在一家古玩铺用百余元买了一批货，有瓷器、旧墨等。他带回北京后，其中一件明成化年间官窑产的青花小杯就卖了14000元。这是由于天津劝业场那家古玩铺没看出那件明成化官窑青花小杯是真品。由此，说明经营古玩铺经营者眼力好坏的重要。

原翁同龢所写"赏古斋"经陶北溟改制的"宝古斋"的牌匾现依然悬挂在琉璃厂街上一家文物商店门前，迎接着中外顾客。

六、来薰阁书店

琉璃厂的来薰阁是个很有名的店铺，它开业于清咸丰年间，可是当时来薰阁不是书店而是个古琴店，专门经售各种古琴。后来由于经营不善，生意亏损，经营者陈氏就将店铺典租与他人。

来薰阁陈氏的本族后生陈质卿曾在一家古旧书铺中学过徒，对古旧书的版本目录有所了解。因此，他筹得一笔资金又将来薰阁赎了回来，并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办了来薰阁书店。

（一）收购和修补

来薰阁书店开业时，只有四五个人，随着营业的发展，逐渐增加人员，在其买卖最兴隆时，共有学徒店伙十几个人。除去学徒以做杂活为主外，其他几个店伙有的专门负责收购图书，有的以修补破旧图书为主，活少时还要帮助门市上招待买书的顾客，有的专门在门市上卖书。

收购古旧图书必须有鉴别古书版本的能力。来薰阁里除掌柜的陈质卿经常外出收购图书外，还有他的侄子陈济川也可以到售书人家，验看图书将书收购下来。因为陈济川从十几岁就在来薰阁学徒，在陈质卿身边学习目录学和版本学的知识。

来薰阁收购图书一是门市收购，一是到旧货市选购，还有是到藏书家中收购。一般来说门市上和旧货市上，收进来的都是普通的和少量的图书。而在藏书家可以收到好版本的和大宗图书。像民国十一年（1922年），故宫处理一批旧物，其中有几千麻袋的破损明清档案和历代图书。来薰阁派出了两三个人，在故宫收进来十几麻袋的图书。又据《琉璃厂小志》上记：来薰阁于“1938年曾购天津李善人家古书一批，约两大卡车，其中宋元版数种；同时又以一千八百元得南宋刊本《欧阳行周集》二册”。另外，“又曾于日寇侵占北京时期购得上海孙毓修藏书一批。与隆福寺修绠堂等合购浙江嘉兴沈氏爱日庐藏书一批，其中多佳本。又得百回本《水浒》，明万历间刻本，极为罕见，近已铅印”。

收进的古旧图书，较完整的可以摆到门市书架上出售，而那些残损的，如虫蛀、受潮或撕毁的书籍，就要进行修补加工。修补破损的古旧书籍技术性很强，必须根据其朝代的不同，纸张的不同，版式的不同，以及如何损毁的，经过浸洗、刷污、平整、修

补等仔细加工，将破损书籍“修旧如旧”。

（二）设厂刻版印刷

琉璃厂中虽然书铺书店很多，但设厂刻版印刷出书者为数不多。来薰阁是个设厂刻版印刷可以出书的书店之一。

来薰阁印刷的书籍主要是刻版线装书。选好梨木做刻制木版的材料，使用的松烟墨汁也是自己制作。来薰阁印制的经、史、子、集等古书很多，据《琉璃厂小志》记载：其主要书目有：

“胡氏书画考三种（南薰殿图像考二卷、国朝院画录一卷、西清劄记四卷）、古文声系二卷、段王学五种（经韵楼文集补编二卷、王石臞文集补编一卷、王伯申文集补编二卷、段氏年谱一卷、王氏父子年谱一卷）、殷契摭佚一卷附考释一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书经六卷、诗经八卷、山带阁注楚辞六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越谚三卷、广韵五卷、南唐二主词一卷”。

（三）门市卖书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纷纷到琉璃厂各书店购书。因此，来薰阁的买卖很忙，做了一个时期的好买卖。

到来薰阁看书、买书的都是有知识的文人，有的还是闻名全国的专家、教授、学者。像鲁迅、朱自清、郑振铎等都是来薰阁的常客。来薰阁为了多做买卖，在店堂内设有几个座椅，为客人坐着看书选书用，而且还有热茶供客人饮用。店中学徒和伙计都必须热情为客人服务，这是来薰阁的店规。违反这个店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辞退。来薰阁要求学徒、伙计都必须做到，客人进门要说“您来啦！请进！”客人坐下看书、选书要为客人取书放书。要为客人端茶水，为客人点烟。客人走时，要将客人送至店门，并说：“您走好。”

解放后，1956年全行业参加了公私合营。后来，来薰阁是中国书店的一个门市部，继续为读者服务。

后　记

从拙著《话说前门》出版后，赵珩先生就鼓励我一鼓作气，写一本像《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这样的书，给社会留下点东西。但是，当时苦于资料欠缺，需有一段时间收集史料。所以没能及时完成。

《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书中关于老字号的资料，大部分是笔者多年来利用教学工作之暇，走访王四海、王德山、李福、张宝良、陈家骥、杜圭臣、田治国、傅士钧、苏德海、张凤鸣、张继志、许寿昌、马霖、郭维藩和高守信等老店铺的后人、老职工及知情人，积累下来的。另外，我从老师、义和团运动史和经济史专家金家瑞教授及其堂祖“北京通”金受申处也学到不少有关北京经济史的知识。

近年，我从为北京市政协、北京市工商联撰写北京工商史和参加崇文区编写地方志时，又搜集到一些新的资料。

《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方彪先生详细地审阅了全稿，从书稿的内容资料的增删、语言文字，到结构编排，都提出了可贵的意见。并不厌其烦地多次审看修改稿，为提高本书质量做了许多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我的老同事高级语文教师孟金先生为我通审全稿做了些文字修改，表示感谢。另外我的长子北京铁道报副总编辑王进卿也对书稿做了些较细的文字改正。

最后说明，由于本人知识有限，水平一般，疏漏、不当以及

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赐教。

王永斌

1997 年初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
作者=王永斌著
页数=442
SS号=0
出版日期=